陈平对话录精选

危机与转机

——工业文明衰亡与生态文明的兴起

第 1 辑　全球金融风暴成因

第 2 辑　全球危机与救市

第 3 辑　中国的危机对策

第 4 辑 危机中的中国改革之路

第 1 辑：全球金融风暴成因

论衡 001 集：全球金融风暴成因

主持人：世界经济的领域有一股飓风正在袭来，我们能否抵御住经济衰退的飓风对我们的影响呢？

陈平：你刚才把它比喻成为一个飓风，但我想不完全恰当。飓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次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消费的逐步疲软。再就是，坏账的出现，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危机到来的一种症候。这一次是全面的很深层次的经济危机。

主持人：事实上，20 世纪有两次大的危机影响非常深的，一次是 1930 年代，还有一次是 1970 年代。

陈平：这一次危机是很深层次的经济危机。我觉得和 1930 年代的危机具有可比性。和 1970 年代的危机不具有可比性。1970 年代的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引起，只要消化掉石油的价格上涨成本，消除生产和消费当中的价格影响，做一下调整，就解决了。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跟 1930 年代那次可以相比呢？从 18 世纪、或者 17 世纪开始的由西方强国——先是欧洲，然后美洲——进行的殖民全球化过程，通过经济和政治、还有就是军事的全球化，通过战争、征服建立殖民地政权，在 1930 年代以前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一个在殖民化状态下的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和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殖民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秩序的问题，所以很短的时间之内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 1930 年代的全球大危机。在 1930 年代之前，世界经济是一种秩序，1930 年代以后走向了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了另一种秩序。

所以，1930 年代危机实际上表明，殖民全球化所形成的分工和经济体系已经走不下去了。我是这么认识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两次大战和夹在中间的 1930 年代经济危机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相联系，都是要求重新调整当时的世界秩序。

主持人：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也像是一个多米诺骨牌，从最早的美国次贷危机，然后一步一步向欧美、向全球延伸。

陈平：次贷危机仅仅是一个表象，是深层次的矛盾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次贷就是它的信用点较低。次贷能够出现的前提是对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相信房地产的价格是永不落的太阳。这与自 1980 年代或者 197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在这一轮全球化中，经济分工上西方发达国家将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也包括低附加价值的服务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崩溃或者说冷战结束以

后，更进入到了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因为整个原来东方阵营一下子全部打开了。

加速全球化过程让欧美处在强势经济的状态，一个标志是强势的货币，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可以印钞票向全世界去买东西去。那么他一方面是低附加价值产业的转移，另外一方面货币不断地发行。格林斯潘被认为美国像英雄似的，实际上我觉得他就主要一招：发货币。降利率，发货币，降利率，发货币，两者都为了一个目的，让美国依靠强势的文明，强势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美元成为全球的最重要货币，不管美国真实的制造能力如何，也不管其科技创新的价值，或者创意产业的价值究竟有多少，美国几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与这个情况是分不开的，坦率说欧美增长 20 多年，物质和精神上的高度享受，与他们所发行货币的含金量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全球化，。然后，社会越来越走向高福利是做不到的。

就这样，财富转移的现象超过了本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带来国内制造业的衰退、实体经济在经济比重上的下降，也包括在人们价值观中的地位下降，人们必然会把关注和重心转向资本市场，甚至是投机市场也就是股市和房市。另一方面呢，在这种持续增长状态下面，稀缺资源的上涨也是必然的了，房地产就是个相对稀缺得资源，所以给人们一个感觉，房地产是永不落的太阳。

主持人：那为什么房地产的泡沫会首先破了呢？

全球化状态下，发达国家获得的更多，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也有所得，相对少一些。第一，都有所得，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双赢，这是真实的，第二，双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它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除非你假设自然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随着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使用到一定的时候，所有这些资源包括人力成本就必然产生一个价格的上升。就像前两年中国的招工难，跟着就是各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发展中国家资源价格必然上升的趋势，被投机资本捕捉到，反映在投机市场上面，必然会导致针对资源产品的投机，本质上来说，这种投机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上升趋势推波助澜而已，资源价格上涨的的后果就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或者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多得的地区就受到了威胁，于是房地产不落的太阳就要落了，接下来，围绕房地产不落太阳这这个假定的前提而运转的金融体系就露了真相，就出现了次贷危机。这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次贷危机仅仅是这么一个世界经济秩序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它也可能是一个导火索，现有的全球化秩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不下去，次贷危机于是发出了第一声警告的枪响。

主持人：按照您这个总结，目前我们面临这个困境，实际上由来已久。

陈平：　这一次经济危机，不是结构性的，不是短期的，不是风暴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危机。为什么长期？这是因为存在两个主要的且长期积累的矛盾。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两个矛盾既是人类因此而发展繁荣的因素，也是人类将走向衰退的因素。

哪两个因素呢？一是科学观：在自然科学上是实验科学，在社会观念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崇尚交换和自由竞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普选制民主，加上竞争性的政党体制。所以我们把科学民主连在一起叫；几百年前，这种价值观开始流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了普世价值观。回到经济上来，它还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主持人：以人类为中心，然后无限地去索取。

陈平：我们再往前推一点，今天在北京有天坛、地坛、先农坛，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呢？

主持人：其实是表达人对自然的一种尊重，天人合一的一种理念。

陈平：这些皇帝祭祀的地方，就是敬天敬神，实际上就是敬畏自然，那时候人类知道要靠自然生活，用这些祭祀的方法祈福，祈求自然赐福。所以在那个情况下，人和自然是处在一种协调的状态下。

但人类摆脱不了生物的贪婪性，无休无止的贪婪性，尤其是人类这种有想象力的生物，贪婪超越了本能的需求，现代科学产生了之后，人突然感觉到自然是可以认识、可以征服的。贪婪再加上自然可以征服的认识，在短短时间内，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体系、文明状态、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就完全走上了依靠征服自然、无休止地掠夺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极端代表就是当今的奢侈品，奢侈两个字，在人类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或者狩猎文明，或者是这个捕鱼、捕猎文明当中，都是标准的贬义词。但是在今天，奢侈已经变成了褒义词了。

这就是人类的贪婪的想象力在征服自然的科学的主导下、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驱使下，走向了一种一个忘乎所以的程度。但是忘了根本的一点，人类是自然之子，你去征服你的母亲，最后的结果你会遭报应的，我说目前的在目前这场危机是报应之一。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全球各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摆脱愚昧，走向进步，这是其正面的作用。但任何一种全球化，都有它的秩序，这个秩序的内容就是强者为王。

全球化在二战以后，毫无疑问是美国主导的。 既然美国主导，那肯定全球化最大的好处归美国人得，但是，在得到巨大好处的同时，强者也就逐渐变弱了。真正的强是自身内在的强，而不是靠财富分配的强。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经济之间。 第一奢侈文化成为整个西方社会顶礼膜拜的文化，第而人类的文明是在挑战中发展起来的。

主持人：对，他没有困难，没有挑战，他自然就不会思考，就不会有新的价值观。

陈平：所以呢，这种强者，强势，多得，这种秩序，也会让强者变弱。

主持人：您刚才说这富不过三代，确实非常好，一下子把这问题点得非常透。

美国一方面大量的制造业不做了，嫌不挣钱还又累又苦。然后普通民众的休假越来越多，总归一点，不干活最好，追求的是怎么去享受。这时候一旦发现危机来了，日子快过不下去了，你要他马上重新勤奋起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认为，全球化和人对自然的征服，这两个曾经推动人类巨大进步的因素或者特点，也是这次经济危机的最深层次的结症之所在。

这次危机不仅是生产过剩，也不仅是货币发行过多，我刚刚说的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生产方式，一个是强者多得的全球化，是这两个因素走到今天走不下去了，才发生了危机。所以我说，现在这一次的危机，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个货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产能的问题。人类应该思考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全球化的体制。这才是根本之所在。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目前这个危机和三十年代非常像，一提到三十年代那场危机，大家首先会用一个词叫大萧条，那么这一次是否也会如此呢？

陈平：不会，在全球化方面两次危机有点相似。但 1930 年代的全球化一方面是工业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工业革命以后欧美成为强势文明以后走上了殖民化，不可否认那时的全球化中有掠夺的成分。经济上廉价使用原料，同时又以比较好的利润去倾销。

但二战以后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依靠技术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和新产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走上了依靠科技发展为主线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这两次危机既有相似，也有不同。

主持人：那么我们面临这个危机，往下走的话，该作怎样的调整呢？

陈平：两个模式调整。

主持人：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另外一个还有是全球的。那么这个调整您预测需要多长时间？

陈平：我可能是比较悲观，我认为不会低于五年。因为深层次的全球化规则，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两年就能改变的，甚至不能让人们具有改变的意愿。大家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开始考虑自己做一些改变和调整，然后最后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一个革新的秩序。

第 004 集：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思考

主持人：以往说到大萧条的时候，它的跨度常常是七八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阶段，那么您觉得这一次，它的时间跨度是多长？

陈平：我认为这一次危机带来的萧条跨度会很长，尤其这次我们在虚拟的、泡沫的投机经济当中，爬得太高了，真的。爬得太高了，对于金融市场，应该重新反思。

第一我觉得，人类必须主动地医治投机行为。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思。有一种舆论认为，要永久性地禁止一些卖空行为。卖空是金融市场非常有代表性的投机的行为。它以规避风险的理由被设计出来。但实际上它几乎和赌钱差不多了，一手买赢，一手买输，这样

子规避风险，赢了也赚，输了也赚，但这对整个的经济体系运行、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力是很大的。

主持人：这样做，会不会意味着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倒退？

陈平：为什么会有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为了让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所有金融产品和涉及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资金或者生产要素能够更快更好更低成本的流向那些社会极需要发展的产业当中去。

但是，随着金融体系中的衍生产品越来越多，它开始脱离和淡化它原本产生的基础和目的。开始异化变成为投机赚钱的一个工具，而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目的了。实体经济创造财富，金融体系也可以间接地参与人类财富创造的过程，但如果它完全脱离于实体经济，它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只会创造泡沫。

主持人：去年有一本书特别流行，就是《伟大的博弈》，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这个样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可能他实体经济的一百多倍，而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市值往往是它实体经济的一倍多，甚至有的连一倍还达不到，所以他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其实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甚至，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值上的的差距，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经济发达的水准。

陈平：我不赞同这个观点，为什么呢？美国金融市场表现的市值是实体经济的上百倍，但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市值和全球的实体经济相比，差距就没有那么显著了。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央行就是全球客观上的央行。华尔街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中心，数字应该是和全球去比较。其他国家也都从这条路上走，第一走不成。

主持人：没有像美国一样，在全球的这个地位。

陈平：第二点，要走成了，我看世界末日到了。人是生活在实体经济当中的，美国人也不是整天就是把金融票据当饭，吞到肚子里去，美国的消费是全世界最豪爽的，钱从哪儿来，尽管不是全部，却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美国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获得的。怎么可能全球都是这样子，这不是荒谬的事情吗？

主持人：可能金融市场应该更多地是往它的本初的意义，也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个方向回归，但是金融市场也一直在鼓励创新，我想即便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也依然要用一些创新的手法来进行服务，那么在这当中，如何避免再出现像我们这一次的危机。

陈平：我认为这是人类面临的一项长期改造任务。创新不可避免具有双重性，如果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相得益彰的，这是好事，但是更多的创新，这些金融小天才们的创新，一定是趋利避害，往赚快钱这方面走。所以我认为，对于金融市场反思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抑制的过程，是在一定程度上面缩小它的作用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对于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反思的过程也是，一重新抑制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面，也缩小它作用的过程。所有的政策或行为都有副作用，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相比较而言，实践很明确地证明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金融创新，就予以支持。反之，尽管也有一些很灵活的作用的产品和创新，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太看得清楚的，那么就是予以禁止。

主持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平：我觉得人类还会还是应该走上保实体经济，控虚拟经济的道路。保实体为优先。控制金融市场，让金融市场尽管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主持人：听了您这个讲述，我感到有些幸运，因为中国目前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但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导致了目前中国出口的一些困难，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现在应该预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陈平：我觉得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远远没有美国所受那么大冲击，中国房地产的危机也远远没有美国所涉及那么深，那么广。所以不要跟着美国去救金融、救房地产之市，中国要救的应该是实体经济之市。

这两天刚在浙江那边走了一圈，浙江很多原来在实体经济上做得很不错的民企，现在也把现金拿去炒股票，炒房子了，人们对于投机所获得收益所带来的刺激，很难抵挡。国内很多城市都想要做成金融中心，我听到以后，就一笑置之，都搞金融中心。

主持人：那实体产业在哪儿？

陈平：只看到金融中心在泡沫中捞的钱，没看到金融中心异化的一面，没看到金融市场异化的一面，就是说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到破坏实体经济，这个问题，是今天我们人类必须要严肃地认真对待的。只有以平常心，公平心来建立我们的经济体系，建立我们的政治制度，建立我们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持久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希望这次救市能够让全球这些精英们统治者们能够冷静地反思，要把人类带往何处？就像一些哲人早就说过，人类的理性就是克制，人类的感情就是放纵，或者人类的本能就是放纵。放纵不仅是情欲的放纵，还有对于利益的无休止追逐的放纵。之所以我们社会要管理，就是尽可能多张扬理性，对过度放纵加以约束和克制。

主持人：过去几年中，美国金融政策一直在不停地减息，本身就有迎合大众花更少的钱但是要有更好的享受的嫌疑。

陈平：美国处在全球经济领导者的位置，减息的目的是使美元的成本最低，这是一个博弈，这个博弈我不认为是什么阴谋论，我认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认为，第一，这场由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会演化成为实体经济危机，现在救市扭转不了这个演化趋势。现在救市就是把坏账给买下来，各国政府都得花钱，有国库盈余的把盈余拿出来，没有盈余的就是印钞票。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实体的消费力会减弱， 所以我觉得苦日子还在后头。

但现在也不得不救，救了是争取时间，人们经常说长痛不如短痛，在这个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还是选择长痛吧，所以，现在的救市选择的就是一个长痛的模式，长痛也有好处，人们会在长痛中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来这个反思过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主持人：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陈平：既然全球政府都来救市，我也觉得，面临可能大难临头的海啸，是应该救的。但往下继续走，我觉得应该去救实体经济之市，那才是财富之源。然后，往更深层次去反思，我们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无限制的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征服，征用，消耗，还是再次提倡精神需求在人们的幸福当中所占的比重？

主持人：就是不再把物质追求当做一个全部。

陈平：通过这一次经济危机，如果我们人类能够深刻的反思，重新设计修正我们的社会体系，我们的价值观念，包括由这个体系和价值观决定的分配模式。那么对于人类讲是一大幸运之事。只怕呢，人类一次又一次的好了疮疤忘了痛。

第 006 集 全球经济危机让人类重新思考文明走向

陈平：这场危机起因是次按贷款，这场危机可以说是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走走歪的一个范例。很多时候，购买房地产已经不是在购买使用价值，它已经变成了投资品，脱离了它本身的使用价值，这次在美国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把房地产作为社会消费的主要的引擎，创造需求、创造消费已经成了社会无法停止下来的的发展模式。房地产零首付等以房地产建价格只涨不落为前提的金融支持模式，已经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都与这个发展模式有关。

现在很多人说美国政府让全世界为他买单，如果仅仅站在现在受害的角度，你可以这么怪，但是真正的静下来想想，谁都怪不了别人。为什么呢？前面二十年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好，还不是因为赶上好的世界经济形势，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需求的旺盛。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消费泡沫以及与之配合的金融泡沫，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全球市场经济需求呢？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看呢，谁都别埋怨。

主持人：那么现在需要大家来反思一下这种消费至上的行为、观念。

陈平：不以消费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会是什么样子，不可能一下子就想出来。

但是，最起码的，如果仅仅简单地从金融秩序或者金融体系入手，我觉得是不会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这么一个深重危机的问题。人类需要开始认真地反思我们的文明，一个消费主义，一个是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把它称为主流的大势，推得每一个人既是危机的推波助澜者，每一个人又是这次危机的受害者。
主持人：可能在这个时候，痛定思痛，更能让大家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事情的本源，更能发现这次危机的根源。

实际上这个危机已经在改变一些多年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在几十年里被人们顶礼膜拜的资本市场，被人们仰望着的华尔街精英，都已经光环不再，甚至是全军覆没。

主持人：对，几大著名投行，现在都已经要么破产，要么找了新的当家。

陈平：曾几何时，摩根史丹利，美林，雷曼，要是能到那里边工作，那是最顶尖的学者们的向往。那里面走出来人，那都是指高气昂，都被认为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

主持人：随着华尔街投行的这个消失，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好像更多的朝传统的商业银行回归。

陈平：投行的全军覆没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某个厂家的倒闭，而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板块全军覆没了。 而这个板块是现代市场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板块之一，他们是全球资本的调度者，全球资本的撬动者，全球资本的杠杆持有者，如今他们却他们消失了。当然现在还在危机发展过程当中，人们还来不及去总结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将要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标志式的事件。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

陈平：第一，我觉得这个转折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兴盛而走向衰落，也可谓是从二战之后长期繁荣，盛极必衰，这个结论可能是大家都不愿面对的，我们的世界都不愿意承认现在走到盛极必衰了，当然，衰了还会爬起来，我相信它会带来人类文明的转型，人类价值观的重塑，人类文化的重塑。

第二个重大转变，就是现在的消费主义、自由经济市场模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制度，在这种由盛而衰当中会受到质疑，有怀疑才能够去探索新的东西。人类已经走过了很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文明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文明也和人一样有盛有衰。我们现在要借这场危机来变革我们的文明。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今天也说不清楚，只是我们人类的精英们都应该要想一想，人类未来该怎么该怎么样活着。该怎么样真正做到像一些哲人不断说的：在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中获得一种平衡。

人类曾经过度强调精神需求，包括欧洲中世纪，但是，精神需求压倒一切的时候，人们也很痛苦，就像文革时时，衣服穿漂亮了就叫资产阶级，而推崇越穷越苦越光荣，这样的时代，自然是长久不了的。

反过来，近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对物质需求的强调，也太过度了。物欲横流到一个过度的程度，同样也会让人类进入悲剧时代。如果未来可能是长达数年之久的由盛而衰的衰退期，那么也就是前面几十年，物欲横流的代价。

我刚才讲没有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来呢，现在刚刚是债券的信用危机。第一不可小视，但是，不可惧怕，不可恐惧。此外，想着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人类修正自己的航向，改变自己的价值观，需求，走向更美好明天的一次大转折。

第 009 集：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将转变人类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上）

主持人：您显然不认为这场危机仅仅是对金融体系的挑战，我看您是把它放在文明的高度上。

陈平：现在舆论在批评美国政府、批评金融投机者，好像这场危机是由于一些人犯了错误而导致的。事实上，这场危机表现得如此猛烈，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联手救市也屡救不止，这表明，它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的某个错误而造成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产物。不可避免，也就是必然要发生，也是应该发生的。

现在目前采取的救市措施，第一是注入流动性，，第二，是降息，然后就是呼吁大家要有信心。可是，我想让大家记住，就在几个月之前，全世界还在谈论流动性过剩，难道短短的几个月，钱都蒸发掉了？实际上是因为信心问题，机构丧失了了信心，金融机构之间不愿意拆借，、愿意贷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才注入了这么多流动性的现金，可这样做未必有效，因为当人们失去了信心，或者当人们失去了信用的时候，再多的钱他还是啊不敢借出去，他还是啊不敢去花。那么这样注入流动行，给未来又埋下了不好的根子。

主持人：可能是流动性过剩这个问题。

陈平：流动性未来肯定是过剩的了，货币发行一定过剩的了，只不过现在是顾不了那么多了，目前就是救命要紧，救这些金融机构的命要紧。

主持人：您刚才是讲，它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的一个产物，那么您是怎么怎么来分析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呢？

陈平：我把人类社会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蒙昧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农业文明，或者叫农牧文明。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文明。，第一个阶段不需要去谈它，农业文明它是一种自然经济，也就是自然的循环的经济。

主持人：您提到的循环经济和目前使用的循环经济，有什么样区别？

陈平：　目前所说的循环经济是希望自然资源能够循环往复地使用，而不是浪费掉。这和我刚刚说的农业文明的自然循环经济，有类似的地方，它也有区别。

在自然循环经济的人类文明时期，自然灾难会导致灾荒等危机。但不会发生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过剩危机。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有了征服自然的手段和信心，就开始对自然征服、。大量的去采伐、利用自然界的不可再生资源，这么一个关系就不再是循环了。而且人对于这种物质的追求也变得非常的强烈。在这个状态下面，社会经济的发展状态，不是自然循环经济了，而是线性的增长型经济。

主持人：一直往前。

陈平：　它不能停止增长，就必须要往前增长。而增长，就是必须要依靠需求或者消费来拉动。但消费需求拉动线性的增长永远向前这个一个增长模式，要有几个前提才能够保证。

第一，支撑这种增长的环境与资源是也要同步增长的。 也就是说资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第二点呢，科技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就是人们不断地要创意出来很多前所未有的物质的精神的这个需求，把这个需求变成消费。但是，在这种模式下面，环境与资源不可能永远无止境地满足其需求。

如果大家回过头来仔细地来分析、观察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出现那些什么现象，那么就会发现，次贷危机发生之前，首先发生的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主持人：对，像石油，铁矿石等等都在上扬。

陈平：在次按危机发生的前面，自然资源已不可按照原来的价格继续支撑这种没有节制的一种增长模式、消费模式。美国是最典型的，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离谱的超前消费也最普遍，几乎平均每个人的负债都已经大于他的收入。

主持人：您觉得其实目前出现的问题，就是工业文明的这种模式走到了极限之后一个比较夸张的表现。

陈平：为什么现在产生了这个危机？除了资源不能支持之外，也因为现在没有新的巨大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消费空间，我们如果假设在 1980 年代没有发明我们目前几乎人手一个的手机，没有出现互联网所带来的如果新的消费的产生，可能这个危机来得还早一点。

主持人：恰恰是到了目前，大家开始把消费放在了房子上。

陈平：房地产本身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但给拉到都快成了快速消费品了，这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的结果。

主持人：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消费的理由和消费的领域。

陈平：对，而且要为消费创造一个可支撑的经济运行体制。如果没有这个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发明那么多金融衍生工具，这个房地产这个泡沫能这么大吗？2000 年网络泡沫以后，房地产成为了新的消费盛宴，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不断地得要创造消费，这是这个文明的必然的状态，包括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企业也是，挖空心思要想出来创造一块新的需求，形成一块新的消费。然后拉动了增长的人类工业文明的快车，更快地向前奔去。

主持人：听到您这样讲，我倒想起林逸夫他曾经有个观点，他讲上一轮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再怎么发展？那么后来就开始通过不停地降息，然后就开始把住房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陈平：是，因为不鼓励消费，不挖空心思想出一些消费，就经济就失去了动力。所以我说，这场危机，它是工业文明盛极而衰的一个危机。简单地看是信用危机、是金融危机，然后最多朝实体经济方面蔓延而产生经济危机，这都是表象。深层的是我们人类工业文明的危机，就是这种人类线性的增长的发展模式的危机。

主持人：那么如果要是按照这样一个分析的话，其实目前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还是一些治标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不是治本。

陈平：有些东西连标都治不了，这么多流动性做下去，人们还是没有信心，股票继续下跌，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看不到希望，怎么会有信心。？为什么看不到希望呢？这些政府精英们在联手救市的时候，也没告诉人们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涌现，出现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包括电影作品来描述未来的社会，如人人都有个人的信息处理器，人们不可以在家里工作，人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与人进行联系，最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打可视电话，等等吧，一切吧，这些描绘都实现了。

主持人：对，那个时候这就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信心。

陈平：这些东西给了人们未来的增长和未来需求上升的信心。可现在带动需求的却是历来人类社会引以为耻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就是奢侈文化，奢靡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跟不上这一趟增长的快车，不能及时提供更好、更新的未来的需求和消费。

主持人：就是没有通过科技创新打出一个消费的空间出来。

陈平：对。

主持人：那么发展就没有动力了。

陈平：环境不能支撑，资源不能支撑，科学又没有创新出来更多的新的需求和消费空间，人们又要延缓这种危机的到来，所以就采取了现在看起来是离谱的增长模式，就是超前消费，负债消费。根本目的是要维持这趟人类的这个工业文明的快车，不断地加速，而这快车上面的物质的承载量是越来越大，它体重还越来越大，而且你还越来越加速，所以就到了这个咔碴一下，全面爆发，这是我对这次危机的认识。

第 010 集 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将转变人类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

主持人：按您这个想法，美国住房消费的繁荣，其实是一个虚假繁荣。

陈平：以美国为代表的网络泡沫破灭以后，它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让这趟工业文明的快车再继续跑。

人作为一种生物，他的自私和贪婪是与生俱来的。工业文明以来无非是让这种自私和贪婪膨胀然更加，为其恶性膨胀提供了一种条件，一种工具，一个载体，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消费主义的文化，包括奢侈文化。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说，这也不能称之为错，这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的本性。当

然，人有想象力、有创造力，并不会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本能，他会修正自己的本能，以更好地符合自身的长远发展。

但是，这种创造性的修正呢并不是自觉自愿地一种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面临发展的极限，或是处在一个阶段的危机当中，才开始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修正自己的体制，然后再向前走。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面对这场危机，也不必悲观，也不必惊慌失措，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好事。我为什么说这是好事呢？在我们把地球彻底地毁掉之前啊，这场大危机来了，留给了我们修正人类文明的形态和发展模式，同时保存我们的生存空间的这么一个机会。

如果这时候又发明了新的消费需求，让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继续，我们会更多地去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更多的去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那给修正自己航向的、改变发展模式所留下的的空间也就更小。所以从这里来说，这是这个坏事中的好事，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主持人：这样其实才把问题充分地曝露出来。

陈平：这样人们才会往深层去思考，如果让我预测，我认为未来文明方式一定会走上，一个循环经济的时代，它还是要增长，人的欲望是永恒的，在农业文明也就是自然循环经济时代，增长是一种螺旋型上升的发展模式，自从蒸汽机发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就走上了线性发展之路，不断地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不断地破坏不可还原的环境里面。我认为，这个危机终结了这样的文明形态，人类必然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主持人：那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阶段。

陈平：我们可以叫科学的循环经济。

主持人：那么它和前面的自然循环经济的区别，在于科学两个字。

陈平：科学循环经济呢，是一个科学的，人变得主动的循环经济。所谓科学的，就是不是完全被动的。尽管它是按照自然本质和规律来运行，但是人是作为一种主动的主体来构造一个新的科学的循环经济的文明，这有别于屈从于自然的循环经济。

这是我的预测，可能我这个推理判断大胆了一点，我也是在画一个大饼，但我认为呢，这是可行的，第一，科学循环经济尊重人的不可抑制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望，依旧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空间、新的消费需求。在科学循环经济文明的时代，仍然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巨大的增长空间，同时又会人类重新塑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科学的循环经济的文明不像有些宗教开的药方，什么节制消费，其实是一种禁欲主义，还有罗马俱乐部，要求全球零增长，另一些流派则要人类尽量减少自己的消费。这些愿望是好的，提倡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是，我认为做不到的，因为违背了人性，人性总是想多多益善，好上加好，但这不是我们不消费不工作就能做到的，相反，只有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沿着科学循环经济的模式而更加努力地创造，努力地工作，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认为，这一场危机的本质是工业文明这趟增长快车的终点，也是是科学循环经济文明的起点。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新的循环经济这样一种文明模式，我想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振奋，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信心，那么您描绘的将来图景，能否带给大家信

心？

陈平：光靠救市，是救不出信心出来的。当人们忽然在晴空之下面临着狂风暴雨，你总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办吧，对不对？遮风避雨的应急可以，但不可能一直待在底下，你也要告诉他风暴会过去，而且要告诉他风暴是怎么回事吧。

所以我认为，第一，救市还是要需要，更主要的立刻要救实体经济之市。因为实体经济如果不去花大力气去救，一旦引发大规模的萧条，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那就远远解决几个金融机构的问题那么简单了。

第二点，应该开始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未来方案。我在这儿说的科学的循环经济，也就是姑妄言之，可能未必正确，但是提出救市的人，也应该提出来一个未来的蓝图，包括未来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什么？未来的消费需求是什么？你得有个自圆其说的大饼画出来。尽管我说得也不一定对，但终究有一个大饼，让人们觉得希望所在。然后才会恢复信心。像这样子，原因不说，未来不描绘，只知道增加流动性，这个危机的窟窿只会越捅越大。

主持人：这样看的话，危机可能还会比想象的要长，因为大家现在真的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陈平：舆论也开始在提出病因，寻找新的方法了。比如说写《世界是平的》那个作家，他在最新的一本书里面就说，未来什么国家能够拥有超级大国的地位？他认为，是那些能够牢牢地抓住和发展起来绿色产业的国家和地区。

主持人：他说的这个绿色产业是不是就您前面提到的循环经济的模式？

陈平：未来世界的巨大增长空间在于绿色产业，也就是我说的科学循环经济，这也是人类的巨大需求。第二点呢，绿色产业会促进我们的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的新的重大突破。这位作者大概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谁能够抓住绿色产业，并且发展起来，谁就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面对这一场危机，我觉得，第一，救助实体经济，分析过去因的，指出未来的蓝图，也就是创造新的文明，这些才是稳定人们信心的根本。那么，什么是未来的蓝图呢，就是绿色产业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有形的产业，也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美与丑的观念等等都需要重新梳理与重建。

我认为，必须是文明转型才能够走上新的健康增长道路。我觉得能够在五到十年间，转型能够初见成效就很不错了。我的预期说出来，可能人们觉得太长，但实际上从历史的轨迹来看，这样一个时间段并不长。

第 025 集 警惕新阶层（上）

主持人：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危机当中，您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明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往微观层面来看，大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作

用，哪一些制度和价值观导致了这些作用的发生。

陈平：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职业经理人成了一个全球的流行语，一个很时髦的称谓，也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对此我们不得不做一些痛苦的反思。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把当时西欧的社会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谓职业经理人阶层，这是社会的一个新阶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靠劳动的一面，但是，这些大公司管理层、大基金管理团队，包括大公司的高管，其收益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收益，很多收入都是资产性的收入。无论将他们定义为是无产阶级还是定义为资产阶级，我觉得都不合适。

这些职业经理人收入数额巨大，另一方面在经营过程当中，对资产的使用和获利拥有非常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当初设计这样一些制度，是为了解决这些企业的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但这种激励制度同时也让职业经理人从完完全全的工薪阶层，转变成为依靠劳动所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双重所得者。

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异化的现象，由于很多公司越来越大，绝大部分大的公司成为了上市企业，在这些公众公司当中，单个股东占股相对比例都不太大，他们对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能发挥的作用很小。这样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但这种分离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我觉得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网络泡沫，到这次的危机来看，很难说谁大谁小，可能弊还要大呢。

主持人：利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是职业经理人会有更多的积极性，那么弊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弊表现为短期逐利行为要远远大于或者重要于企业的根本发展。因为职业经理人的自我定位不是所有者，即使他可能工作年限很长，也形成不了所有者那种爱护企业的心理状态、那种责任感，他更多考虑的是在自己掌握、支配资产的时间段内，自身收益的多少。

第二点呢，他的风险远远要小于所有者，所以在他拼命地逐利的时候，他不太多会考虑企业破产的问题。

主持人：他的风险的偏好会强。

陈平：这次那么多申请破产保护和被国有化的金融机构，这些高管们除了未来的收益拿不到，以往的好处基本上一分不少，按说，这些金融机构是在他们掌控的时候面临破产的，他们怎么还能拿这么多钱走路呢？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在位的时候通过各种合法的，有时也采用不合法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收益，哪怕自己走后企业洪水滔天。这让我最近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

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模式，在前几年还被人们奉为好像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如今我对它产生了怀疑。也让我重新再认识了这一百多年来在企业制度上面、在所有权问题上面的演变历程。这一百多年来，实际上世界都在朝着一个社会民主的路在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者确实是很伟大的。

尽管在这一百年当中，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教义的这些政权当中，推行公有制导致了效率低下、生产停滞发展、科学落后、大量地浪费性地生产，其结果是人们陷入贫困，这和马克

思当年希望通过否定私有制而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解放，而使人类获得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预想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公有制国家的改革，无论苏东还是中国，基本的性质都是一样，先是通过承包，让一部分生产资料的使用和个人的效益挂钩，然后逐步地把一部分的企业变成股份化，也就是改变它原来的公有制的性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国有企业或者公有制企业一直受到一种批判，也就是所谓的所有者权力缺位，实际上对国有企业资本具有支配权的是经营者，经营者阶层在支出上大手大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直接收入和间接收入以及福利最大化，这成为了困扰着国有企业的一个难题，所以必须要进行所有制改革。

现在我们才突然发现，在私有产权处在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的制度条件下面，很多很多大公司、公开上市企业实际上也表现出了所有者权力缺位的一个弊病出来。

主持人：资本没有说话。

陈平：对。西方的高管们，和中国倍受非议的这些国企高管们，做的事都是一个目的：直接或间接地使自己公开或隐性地收入最大化。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世界两大板块殊途同归。在今天，不管是美欧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都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实际支配资产的经理人阶层，出现了所有者权力缺位的现象，而所有权缺位也就意味着，对这么一个管理者阶层制约能力的缺乏。

主持人：就是几乎是这个管理阶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所欲为了。

陈平：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有一个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新阶级》，他认为，整个东欧和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以为推翻了代表了资产阶级或者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但是却产生了新的统治阶层，他们打的旗号是代表广大民众或者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他称之为新阶级。我觉得，这种所有权缺位状态下的高管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也构成了一个特权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他们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必然让他们既不会承担所有者的风险和责任，但同时又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

主持人：对，他在使用和调度这些资产来获利嘛。

陈平：既不像所有者那样对于资产或者资产相关联的企业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有长远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但同时，他们又享用着支配工薪阶层群体为他们牟利的条件。今天，让整个世界对这些金融界的高管们非常愤怒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今天，不管是东方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新阶级，我们说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称作为既得利益阶级。

第 026 集 警惕新阶级（下）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华尔街的一些高级职业经理人，但是，仅仅对他们做道德评判，恐怕于事无补，而更有价值的是探究这背后的制度设计出现

了什么样的问题。

陈平：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新阶级、新阶层。这些既得利益的管理阶层，依靠对于资产和企业的支配权，采取短期行为的掠夺式的方式来攫取自己的利益。

这个模式也包括打着创办实体企业旗号，实际上目的是到资本市场上套现。这种现象前些年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创办公司，写出很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引来风险投资，再引来私募基金，最后上市套现。从一开始设计这个公司的时候，出发点就是上市，期望最终能够一下子通过资本市场，让收益膨胀几千倍、几万倍。

这次危机让我们知道了，这些投机行为不是通过实体经济造福于人，其获利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创造性的或者说辛苦的劳动，而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套利、套现，实际上，最后买单还是普罗大众，还是纳税人。

像今天美国这些大的金融机构，越玩越大，最后绑架政府，你不得不救。这就直接让纳税人来救了，制造泡沫的透支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来买单。所以我说这次危机，应该让我们很深刻地理性地反思企业制度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认识到，在所有者和工薪者之间，还有一个新阶层的存在，也就是我说的新阶级。

在今天，这是一个特权阶级。在美国很明显，新阶级已经上升统治阶级，高阶职业经理人和政客之间不断地互相角色转换。这又会把他们的短期行为传染进政治舞台上。

我们现在发现世界很多政府领导人，也带有很多资本投机者的行为价值观。不能不想，这个新阶级和政客之间什么关系？实际上，今天很多政客的们本身又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或者他们本身在政府里面当过一段时间的高官，又成为了新阶级的一员，鲍尔森就是从高盛的行政总裁成为美国财长，包括这次表态支持奥巴马的鲍威尔也类似。

所以，我觉得理论家们和学者们应该创新一些，应该认识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别老盯着一百多年前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二分法，那是在工业革命刚刚发生没多久的现代工业文明早期的社会两大阶级，而这几十年实际支配资产的是新阶级，而不是名义上的资产所有者，这么一个既得利益阶层或新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是建设性作用，还是破坏性作用，都应该引起我们对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新思考了。

主持人：那您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平：我觉得第一，应该重新肯定所有者，尤其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的模式，比如比尔·盖茨，作为创始人，他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管理者，比尔·盖茨作为一个所有者，对他的企业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要重新认识到，私有产权应该给予高度的承认的，尤其对中国而言。因为人是自私的。你说这东西属于他的，他就爱护。

第二点，怎么样解决企业为了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以致没有单一所有者能够形成绝对控制甚至相对控制的问题。以及如何形成有效的、保证所有者的管理权的环境和制度条件。

第三个，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也确实有它的问题。

我在经商之前，也就是在成为一个所有者之前，到哪儿出差总是选择报销额的上限，从不考虑节约，我自己成了所有者以后啊，很奇怪，我成了资本的奴隶了，总是考虑着怎么样尽量少花些钱。

主持人：这个变化的背后，就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

陈平：我自己得出来一个结论，叫大公则为私，大私则反而为公了。当你跟所有权没关系的时候，既然不是自己的，你就时时刻刻想着让这个资产为自己服务，去多花这些钱。当这些东西属于自己的时候，你倒时时刻刻想着怎么节约，怎么尽量让它增值了，而它增殖所产生的客观的效果，就是为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效益，最起码能产生更多的就业。

主持人：对，这是大私为公，大私为公。

陈平：所以我说，人的本性第一是利己，第二却又是利他的，而利他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利己，所以这是人性的永恒的矛盾。那么同样，公有和私有，就大众和个体，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一对矛盾。

这次危机爆发前，对职业经理人评价几乎全是赞美，危机发生之后，在欧美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那也是一片喊打，我觉得一片赞美也不对，一片喊打也不对，人性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当制度、文化、价值观出现缺陷，它就会钻这个缺陷的空子，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完善和发展，而不能靠对某个群体的道德批判。

面对这场危机，我们不能简单地表面上来理解，从更深层次的的理解，既有宏观的增长方式、文明形态，也有中观和微观的包括企业制度、所有权制度等等，只有全方位地立体地反思和再设计，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类走出这场危机，走向未来。

第 032 期 《资本论》能够为经济危机开药方吗?

主持人：最近我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报道，讲在欧美，像英文版的《资本论》有的地方已经都脱销了，那么您觉得大家这样的一个热情，是出于一个什么原因呢？

陈平：当越来越猛的这一场金融危机已经触发到了实体经济的层面，甚至可能引起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都在想，这是为什么，那么，曾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很精辟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确确实实系统、深刻，批判非常尖锐，那它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并不奇怪。

主持人：这三个都是非常高的评价，那么您觉得他的系统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系统是指他从人类社会的为什么发展，为什么如此发展，以及这样的发展进入了工业社会以后又将如何运转，做出了全面的描述，分析了工业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产生

被称为经济危机的现象。

主持人：我记得马克思当时说，这是“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那么您觉得现在看，在事隔这么多年之后，这次经济危机和当时的描述是否一样，大家能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药方，开始考虑病因和怎么来治疗？

陈平：第一，马克思这么说是对的，确确实实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如果我们更加抽象一步，把它从生产资料和生产社会化这两个概念再抽象，那么我可以说，这一个矛盾，也就是个人的占有和行为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是说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就存在。我在比较具体地回答你这样一些疑问的之前，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思想的一个成长或者说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 1978 年，或者 1979 年，准确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可以说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信仰者。

主持人：我听说在那时期，您是比较系统地把《资本论》等等经典著作系统地读了一遍。

陈平：对，不是一遍，很多遍，不仅是《资本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包括他们一些哲学著作，包括他们一些被现在我们称之为叫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论著，还有他们的书信，我都看了很多遍。因为在那个时候，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人的著作以外，其他的著作我们也很少能见到。当然了，还有黑格尔的、费尔巴哈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更古老的包括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在那个时代一切我能找到的书，我都看了，并且看了很多遍。所以我刚刚说了， 在 1979 年之前，我是非常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我之所以会卷入“四・五”运动这样一些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不满和进行抗争的一些行动中去，是因为我认为当时的社会实际上奉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到了 1978、1979 年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了怀疑。

主持人：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陈平：当我最后一次看《资本论》的时候，我产生了对于过去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怀疑。当然，所谓怀疑，并不是全盘否定。

主持人：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个怀疑？

陈平：我当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就是私有制、私人占有是错误的，所以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所以我们要消灭的就是私有制，这是解决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将矛盾的一方予以消灭。

但到我最后一次看《资本论》的时候，反而觉得这个结论有问题，于是我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个解决的结论是要把矛盾的两端消灭掉一端，我们知道，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既然我们说的对立的统一，那么就是两方面都存在，如果消灭掉一方，另外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对这个解决方法产生了怀疑，这是我从哲学的这个角

度来一种逻辑推理。

我说了到目前为止，对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描述，我认为百分之八九十正确。那么我们都知道，《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赞扬它，称赞马克思的伟大，称赞他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都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们、信徒们对马克思的赞美。这个赞美是对的，确确实实它把人们对历史描述，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描述，从宗教的神学的解释当中拉回到了人间来。

具体来说，为什么我读《资本论》读到最后反而是对于结论发生了一些怀疑呢？我对《资本论》里的结论和指明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向发生了怀疑。我刚才已经说了，要消灭私有制，这纯粹是概念游戏，从概念上讲，公是相对于私而建立的，消灭了私就没有公。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他说人类社会发展目的和动力是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求。这个物质和精神欲求也就是人本身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永无满足、永无止境的，这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而这个本质区别的根源在哪里呢？也就是人类具有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文化。

因为人有想象力，所以人不会因为衣食住行都满足了，就不再有欲望。因为人类不满足，所以人才能够不断地产生新的欲望，因为不断有新的欲望，所以就不断地有需求被创造出来，就不断地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产生新的工作的岗位、产生新的交换的商品。也就是说，人的欲望是不可满足的。人的需求是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从这个推理我们就会自然导出，社会到达按需索需，物质生产极大地丰富到了可以满足人的愿望，其实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满足的欲望和创造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这社会如果都满足了，那不就没有动力了吗？社会不就停止发展了吗？被马克思在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严密的逻辑，雄辩的才华，深邃的历史和哲学的修养，我一度是完全被征服了，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从甚至带有一点点盲从的坚信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怀疑，看到了这当中的矛盾，我认为我就开始从盲从走向了理性。

我把这些我自己的思想的历程说出来，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是不是一本《资本论》就成了今天的救市良方呢？我说不是。也救不了，如果能救得了，第一早就没有资本主义了。第二如果能救得了，也就没有这一百五十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也就不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那么多悲壮的历史事件和那么多的苦难。

这么说，我并不是否定《资本论》所描述的精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了更多地占有，会不断地去扩大生产和经营，最后导致某个行业某个产品某个服务领域严重地产能过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地浪费，然后社会从危机到衰退，到萧条，到再找到新的产业，新的增长点，再重新走向又一轮的增长，马克思这么描述没有错，就是增长、过剩，衰退，危机、衰退、萧条，形成一个大的破坏，然后再重建。

但是，根据上述描述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们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消灭矛盾的一端，消灭私有制。同时实行计划经济，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呢？因为他认为，只有社会按照人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和发展，才能够不产生经济危机，才能够避免因为经济危机而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社会的极大地浪费。但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有计划按比例、按需求的生产与发展呢？如果是生产资料私有，人各为己，计划也就无从落实，所以要有计划地发展，就要消

灭私有。这套说法在逻辑上市自洽的，如果不自洽，这一百五十年也不会有那么多信徒。

我质疑它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已经讲过的，从概念上面，公和私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消灭了私就没有公了。第二，既然我们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那么，由这个欲望不断产生的一种需求的创造，那么，制定计划的人就需要了解所有人的需求，这需要全能也就是类似上帝的能力才行，可是，在人间是没有上帝的，所以计划经济的破产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既然是人的欲望是不可满足的，那么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也都是暂时的，供给跟不上需求，才是绝对的，所以社会才会发展，而既然供不应求是绝对的，那么，在同一时空当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同时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这就会出现差别，有差别就有私有的概念，私人占有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说，人也是生物，从基因里就带有利己的印记，只有利己，他才能够作为一个生命体而存在。之所以成千上万年来人类总是在私与公这个矛盾当中徘徊、斗争、冲突，那是因为人同时也是群体性的生物。人类越是社会化，越是不可能一个人生存，这就产生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必须要顾及他人的生存，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所以，马克思说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回到根本点上，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矛盾，也就是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是人类生物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利己不能排除利他，利他更不能否定利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私是消灭不了的，人间也是没有上帝的，所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提出来大概一百五十年当中，实践也有将近一百年，它没有成功，也就是必然的。

我从我自己的思想认识的一个经历，通过概念逻辑、认识论的分析，以及从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从私人占有和社会属性的关系，得出了计划经济不能成立的结论，我要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资本论》对于市场经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精辟的、深刻的、全面的、系统的。但是不是他的结论，他的指出的解决的药方，我觉得是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矛盾。

第 033 期 从资本论反思当今危机下的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

主持人：具体到这一次的经济危机，那么《资本论》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陈平：《资本论》无非让我们再次地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人？人就是自私的，这次深重的危机，也是人的自私性所导致的。因为其自私，所以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需求的创造，产生了无科学的发明和灿烂的文化。因为其自私，又不断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走到愚昧的境地，走到荒谬的境地。

华尔街那些精英难道真的相信杠杆能到那么多倍吗？那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天平还是倾向于利己，今天利己了，哪怕明天洪水滔天，人类想象力，有别于动物的聪明才智，也一次又一次地害了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指某一个个人而言，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像公与私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这一点我认为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就像人要生病一也是他必然的现象。但不能说，因为人要生病，干脆就把人做成木乃伊吧？市场经济和私人占有一次又一次地把人类社会推向危机，然后从危机中再爬起来，再往前走，这是一个必然的又是正常的现象，就像人要生病一样，都是正常现象，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和私人占有会有一次次的危机，就否定私人占有和市场经济本身。从有人类社会以来，私和公一直有矛盾，，一宗教的、道德、伦理都是压制私而颂扬公，但是就主流的人类的思想史、宗教史、道德史、伦理史，它们也没有彻底地否定和消灭私。

历史上凡是要消灭私的主张占统治的年代，社会几乎都给窒息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公无私被强调到了极点，那些革命的旗手们如江青大公无私吗？老百姓不能看西方拍的影片，他们有自己专门的电影放映厅，专门从国外来看，他叫大公无私吗？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受其统治和愚弄，自己他来享受罢了。所以我说，千万不要否定私，否定私就是否定我们人类的本性。

主持人：这次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家采取了银行的国有化，这算不算公有制的卷土重来？

。

陈平：国有化并不代表公有制，这两个是有根本区别的，国家只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已。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个道路人类已经尝试过了，已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却是市场经济会导致生产过剩，就私人占有和市场经济，就一定意味着出现生产过剩，可今天那些重新捧出《资本论》的人，怎么不去想想，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年代的短缺经济现象呢？过剩总比短缺好，产生危机总比没得吃、不够吃、饿死人要好，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所以今天世界所谓的新左派，不要忘了这些左派的思潮在一百多年的实践当中给人类带来过多大的苦难，不要忘了有多少人活活被饿死，不要忘了短缺经济到了什么都需要凭票供应？我说，那个时代就那么容易健忘吗？

我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不需要改善，人类社会永远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过程当中来前进的。但是不能够否定一些根本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里面的描述和分析是正确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说到这步，真是英明伟大。但是再英明伟大的人也不是神仙

。

主持人：对于那些现在正在努力在《资本论》里想寻求答案的人，如果您要和他们有一个沟通，您会给他们提一些什么样的醒？

陈平：他们热读《资本论》，我说是好事，这些年，因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强了，更加全球化了，信息更加畅通了，而且文明的程度也提高了，所以发生经济危机周期的间隔时间也变长了，人们处理起危机的整个能力也更强了。但这不代表完完全全解决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既然说基本矛盾，他就是不可能消灭的，只要承认哲学上的矛盾体的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存在的一个根本的状态，那么你就不要因为某些时候人们的贪婪自私造成的问题，就试图去消灭贪婪与自私。就像不能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强调公过了头，最后导致了短缺经济和极端专制主义的出现，你就去否定公。

公和私都不要去否定，它是人本身需求的两个方面，人要利己，就要利他，利他是为了利己，然后就有了私和公，无非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更好地处理或

者说如何更好地动态地处理公和私的关系。

有的时候，自私过了头，阶段性的需求饱和了，却创造一些泡沫性的需求，这个泡沫越来越大。最后破掉了，人们的价值观的天平就会摆到另一边，摆到强调公的这一边上。所以美国摆到了奥巴马，所以《资本论》人们又要搬出来了。但是我说这些很正常，就是我们要正常对待之，而不要极端对待之。

主持人：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陈平：对，过分地强调公是一个极端，过分地强调私，也是个极端。极端对人，对事都不是好事情。所以我说，看《资本论》热销是好事，人没那么高尚，那普世价值观也不是那么万灵之药，所以马克思所揭露的丑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那是人类的一个常态现象，我们不要被这些很美妙动听的创新的语言给迷惑了，忘记了人类本性。

主持人：我注意到一开始您关于《资本论》的评价，为什么您一定要加一个定语，是在经济层面上？

陈平：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从人的层面上，他没有回答什么是人的属性，他没有说到人的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私有和公有是什么样关系？

主持人：马克思的论述经济危机是周期性，而且很有可能是越来越严重况，那么这个论述和目前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您觉得有没有一定的关联性？

陈平：对，周期性是一定会存在就是计划经济，它也周期性地要对它的计划做大的一个调整，那市场经济它也是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调整，而市场经济的方式调整，就是一段时间集中地会出现一些优胜劣汰，而这个集中地调整，它就表现为经济危机

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要不断地加深对自身的认识，对什么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进行更深刻地认识，而且勇敢地面对它，不要试图去消灭这个矛盾。试图消灭这个矛盾，就试图地消灭我们人类自身。因为人是自私的，人要不自私，就违背了人的生命本身的生物学上的定义了。

说得具体一点，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比私人占有更好的所有制形态。也还没有发现和看见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市场经济是到目前为止最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一个方式。就像金无足色，人无完人一样，任何一种制度，只有比较中的好与差，而这个比较，还是在历史的时空中进行。没有绝对的好与差，所以当这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坚持对有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当然，就像我以前曾经说过，私和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保护私，是为了大家共同更好地发展。

主持人：这就是一个公了。

陈平：维护公共利益，也是为了每一个私人利益的更长远的更好的得到保护。同样，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的基本的原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道德约束的市场经济。

我一直尽量减少用自由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什么叫资本主义，我认为概念定义就不太清楚，所以我宁愿用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定是要坚持的，人们不要动摇这个基本信念。第二，私有产权的制度也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两点，是和人性的根本的东西连在一起的，它是本，是第一性的。而计划的、公有的、国家政府干预的这些也是需要的。它也是本，因为它是矛盾的一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但是它是第二性的，它是为第一性，为利己而利他的演变成的第二性。还是要知道，什么是第一性，什么第二性。尽管利己从来是我们道德伦理、理想、赞歌所否定的，但是它是一个永恒的合理存在。这是我觉得是成熟的一个认识。

第 043 期　拨开迷雾　认清金融危机本质

主持人：您现在如果重新来看这次经济危机的起因的话，那么它的病根会在什么地方？

陈平：大家把原因归结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社会过度消费，我可以接着这句话，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过去近十年，也可能近二十年的时间当中，不得不走上过度消费的道路。因为从全球来说，应该说早在 1990 年代后半期，就已经走上了或者进入了生产过剩的时期。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面，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性的新的分工，导致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步。包括技术转移，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文明的覆盖等等。但同时他也使得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向一个模式的极端化走去。

这个模式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从农业可再生的资源向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转换，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转变，从循环的经济形态向线性增长的经济形态转变。这就我所说的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的文明形态。

我指的文明形态，主要从它更本质的层面上去看待它，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创造力，人用工具来延伸加强自己的直接肢体所不具备的能力，来获得了更大空间的生存资源，并且改造这些资源。在农业社会，这种创造的工具基本上还是人们体能的延伸，作用于自然的时候，和自然形成一个基本上循环的关系。到了工业文明，生产的形态变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自然为我之所用。

这种工业社会的特点表现为两种方式，不是生产过剩，就生产不足。生产过剩，是因为采取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生产不足，则是因为采用了工业计划经济。这两者都是工业文明。实际上面，马克思作为工业社会早期的有大智大悟之人，当时也就悟到这一步了。他悟到了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他没有看到生产不足也就是工业计划经济的固有的危机，这是相辅相成的。

主持人：在工业文明下，市场经济可能会存在生产过剩，而计划经济可能会出现短缺。

陈平：生产过剩的这一个现象，它是伴随着工业市场经济而生，马克思论断，这个危机是会周期性地出现的。在过去这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人类工业文明一次又一次经过危机，每经过一次危机，社会经过一次调整，获得一次发展。那么，多数危机的解决，或者使社会发展，都是由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使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条件、新的生存空间，新的工具、新的消费品、新的需求。然后有新的就业，实现了产业的优胜劣汰和更新，原有

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在新的发明、市场、就业、需求当中化解了，人类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关于这一点，我觉得马克思当年的结论下得有点绝对了，他把生产过剩的危机绝对地看成是一个坏事。第二个，他认为周期的危机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导致产生社会主义或者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上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工业文明并行的两种社会形态。还不能称之为两种根本的文明形态，危机一般性意义上都是生产过剩形成的。而生产过剩有它的必然性，表面上看是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但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市场的无形的手的制约，又总是会寻找新的出路和发展。

主持人：这个浪费可能是一个客观结果。

陈平：目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全球一体化了，所以过剩表现为全球性。全球化使原来的生产过剩的周期变长了，因为它有更大的消化的空间，在这更大的空间当中，发育出了更多、更广、更深的一种分工体系。

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二十一世纪初期，人们以为，网络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对于网络技术和网络的应用，全人类寄予了了一个新时代的巨大愿望。

主持人：对，在当时我记得像亚马逊书店，尽管是巨亏，但股价依然是非常非常高。

陈平：但反过来也表明，网络这么一个新技术之所以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是因为在这之前的很多产业和服务，已经进入了严重过剩阶段。

主持人：其实当时网络的兴起等于是一根救命稻草，让大家看到了，又开开一扇门。

陈平：对对，已经处在很严重过剩了，所以人们认为网络是一个新世界，当时的美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调整，包括降息，宽松的货币、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等等创新的鼓励，使美国从实体经济的一个美国，向科技的美国，然后向虚拟经济的高度发达的美国去转化。

但后来证明，网络不是一个新世界，出现了网络泡沫的破灭。这时候，美国作为世界的火车头，仍旧继续用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铸造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经济，而这个虚拟经济在通过财富转移增加美国人的财富的同时，不可否认地又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带动了新兴国家的生产的发展。，原本在一个网络泡沫破了以后的会爆发出来的一个生产过剩的危机，在一个虚拟经济快速崛起当中被掩盖了，或者说被推迟了。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制造制造业处在快速发展中。

主持人：对，供给要能够跟上。

陈平：到了 2007 年，这个虚拟经济不堪重负，它为什么不堪重负呢？因为虚拟经济继续制造需求、制造消费已经达到它的极限，这个极限不是来自于虚拟经济本身，而是因为最终消费需要由实体经济提供产品与服务，而实体经济的产品与服务又必须要依赖环境与资源的满足。

主持人：恰恰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像石油价格，已经达到了在过去十几年当中

的一个顶峰。这可能也就是本身就是过度的生产和过度需求的一个表现。

陈平：也就是说，尽管虚拟经济还可以创造更多的需求出来，但是实体经济已经是不堪重负。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不堪重负，传导到虚拟经济，使得虚拟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于是首先在虚拟经济领域产生了危机的爆发。因为危机在虚拟经济爆发，就掩盖了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主持人：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可能是一个导火索，但大家现在把导火索当成了这个真正的原因。

陈平：这次生产过剩，是在两头挤压下的生产过剩。一头是上游的资源，环境的挤压。那么另一头呢，是虚拟经济的高度的杠杆效应的挤压。所以这次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以非常深重的金融危机、信用危机总爆发的形态表现，并且很快就冲击到了实体经济。而目前又没有一个巨大的科技革命时候带来的新世界来化解这种过剩，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已经全部转化成为全球的政府的信用风险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全球性的需求不足，对前途的渺茫，信用的丧失，产生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又受着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的急剧恶化的制约，整个链条陷入了全面的危机。

主持人：面对这种全球性的过剩，那么可以开什么样的药方来进行解决？

陈平：应对这样一场危机，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比较单纯的金融或信用危机来处理。也不能够像 1929 年美国大萧条时那样采取罗斯福新政式的方式来解决，目前世界尤其像中国也在做的拯救经济的方式，大多是加大政府投资，加大政府风险，加大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在中国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注资，就这么几种方法。但我认为，如果不认清原因，不加分辨的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并且用政府的风险来替换已经缺失的金融机构的信用，用行政的力量来阻止企业的裁员，包括破产，对这次危机的解决不会起到多大的有效作用。可能还会带来副作用。

主持人：那么如果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开处方的话，那么可能开出的处方未必是个正确的。

陈平：我把这个危机作更细的分析。它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我认为是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这可能是这种形态的危机的最后一次总爆发。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更加历史的和面向未来的，从跨越文明形态的角度来寻求其原因，找出对策，获得新的发展。我提出这个论点，主要是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些救市措施没有找到原因，会救出问题出来。

论衡第 055 集　辞旧迎新是否是新文明的预言

主持人：在 2008 年的 1 月 1 号，很多人在展望 2008 年的时候，他们都会用一句话，那就是 2008 年注定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现在您再看这句话，您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陈平：我仍然赞同，2008 年是人类历史上面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份。

第一，2008 年预示着人类的生产发展模式走到了一个改变的关头，一个不得不改变的关头。那么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开始，这个时代的划分，我是按照人和自然的关系来做划分的。

主持人：那么您是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陈平：首先是自然的循环经济阶段，农业文明、狩猎文明，就是典型的自然的循环经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尚很浮浅，很朴素，在那么一个时代，人敬畏自然，人从自然获得生活资料，获得生存空间，就认为这是自然对自己的赐予，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对自然一直是一种崇敬的态度。

那个时候，不同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些向天的，向自然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最神圣的祭祀活动。中国的天坛，地坛，先农坛，都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来向自然祭祀的神圣的地方。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用工具了，已经开始掌握了自然的一些它的一些表层的规律，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被动的，完完全全服从自然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然后，就到达我称之为工业文明的时期，人们开始通过科学认识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时候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先认识它，然后是改造它，利用它。工业文明五百年来，人们越来越自信，人对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从敬畏到达藐视自然，然后充分地掠夺自然。

工业文明本身源于欧洲，而欧洲的文明有古希腊的思想基础，在认识论上采分析和机械式的方法，这种认识方法和角度导致了工业文明的出现，但反过来整体地破坏人自身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敬畏自然了，人们都快忘记了自己是自然之子，而觉得自己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在二十世纪，包括十九世纪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诗歌里面，你都会看到大量对人是自然的主人的一种颂扬。这虽然是文学描写，但反映了一种价值观。

所以我说，2008 年是非同凡响的一年，是对过去五百年的工业文明划上了句号。

主持人：像您这样的分析，给 2008 年定义的时候，那么是一个五百年的历史当中，2008 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陈平：今天已经是 12 月 30 号，还有一天我们就跨入了 2009 年，就要告别 2008 年。但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情况？经济危机正以无法遏制的凶猛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面蔓延。

通俗而言，我们的地球再也无法承载现代人类的这个狂欢了，再也无法承受工业文明所形成这么一个私欲膨胀到极点，对物质的追求至高无上的狂欢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包括亲情，都在这种狂欢中沉沦或者是苍白无力。这是我们的地球所不能承受的。

主持人：罗马俱乐部曾经有一个非常悲观的声音，那么现在如果再来回望当年罗马俱乐

部所发出的那种警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陈平：罗马俱乐部确实有先知先觉者之名，但是，人世间所有的先知先觉者一般来说都是被冷落的，大多数人一定是后知后觉的，都是到灾难来临，到了黄河方死心，碰了南墙才回头。现在主流的救市措施还是不回头，因为几百年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生存模式，这一个人类的洪流只有撞得头破血流，才会回头。回头是岸才会成为主流，但是 2008 年是一个标志性的阶段。

2008 年，几乎每一个月的危机发展的轨迹，和人们的反思、判断、对策、舆论大部分都是相悖的。人们在 2008 年，犯了无数的错误，无数次判断失误。 如果一个文明架构还能有效延续，那么，绝大多数人的一些共识，正确的概率肯定是高的，而当一种文明架构开始失效，在这个体系内去解读社会现象，绝大多数的这个认识也会开始变得失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文明也确实走到了尽头。

2008 年，对于全球来说，是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年。将要来的 2009 年，将是人类在碰得头破血流的救市行为下，开始转轨的一年。

主持人：但是您现在有没有一个特别乐观的估计，比如说 2009 年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新文明的元年吗？

陈平：我认为必然的，也是不以全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更不以那些学者们的在原有的文明架构当中的逻辑推理而决定的。就像到了南墙，你头撞破了，也还是走不过去，你必须是选择新的道路走。这就我说，不平凡的 2008 年，既是悲也是喜。悲这一场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以及它还是刚刚开始，不是结束，不是高潮，只是开始。喜，没有这场危机，人类不会主动地去选择新的增长模式，选择新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不会主动地去革自己的命，所以我说这是喜，当然这也是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规律。

第 057 集 美国汽车工业：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风向标

主持人：美国的汽车工业出了问题，是不是也是说明工业文明出现了问题？

陈平：汽车是工业文明的代表作，是象征，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赞同这个克鲁格曼的结论，美国人汽车工业是救不了的。

主持人：为什么会是这么悲观的一个结论？

陈平：随着工业文明的形态逐步地退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在新文明的社会当中，汽车工业会逐步逐步地淡出人们的生活。首先来看待每个人对汽车的态度吧，每一个人对汽车的态度，现在处在极端的矛盾当中。一方面都想有个好的车，但是一开出去，马路上塞车，又痛苦死了，这不就是矛盾吗？当然坐在车子里面，他觉得真是很舒服。这时候如果他没在车里面，在马路上面又会觉得这个环境简直糟糕极了，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地方。

人人都想要有车，人人又都烦车，人人都想一个干净的空气和安静的环境，人人都在释放着这个废气，人们都在制造着噪音。所以我说，每个人都是极端对立的矛盾，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的人，这种矛盾分裂对立，和工业文明的状态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既是享受者，又是受害者。每个人既是灾难的制造者，又是灾难的受伤害者。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滑稽的现象。

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汽车消费协会还是什么机构提出了个建议，要把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人们买车。本来已经是道路建设赶不上车辆增加，这不是又去火上添油吗？大气中已经是充满了有毒的排放，而汽车排放又占了一个很重的比重，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一幸免。这时候还要发展汽车工业，这就是工业文明的不可自我解脱的一个矛盾。

主持人：但是这个逻辑后面，是将汽车消费当作消费重点，以便拉动经济成长，走出困境。

陈平：难道在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后，人们就已经忘掉了这次经济危机是怎么爆发的？

主持人：怎么讲？

陈平：引爆点就是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人类工业文明对不可再生资源不断增大的需求是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本，中国在 2008 年初以反通胀作为首要任务，也是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的。资源型的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整体通胀，人们的收入相对减少，而房子原来就是过度消费，属于资产型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开始出现断供，就引爆了所谓的次按危机。

从这点来说，幸亏从从 2006 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想方设法地能够让房价降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对了，不管是英明做对了，还是凑巧做对了，总归是做对了，毕竟我们没有发生房地产金融的危机。

主持人：那么您是认为，汽车工业作为工业文明的一个载体，在这一个工业文明要转型的过程当中，有一道过不去的槛。

陈平：从全球意义上来说，汽车工业一定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有些东西根本是走不通的，比如说全世界每人一辆车，都像美国这样的，走得通吗？不管什么账算下来都走不通的。但是中国人所谓要发展的汽车工业政策，包括美国要救汽车工业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世界每人有一辆车，甚至每人还不止一辆车，这个目标可能吗？不可能。人类社会占用良田建马路越来越多，汽车排放的废气越来越多，全球变暖的现象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石油是越来越少，也不可能再支撑这样的一个汽车工业的发展。任何人只要稍微用理智想一想都知道，这条路走不下去。

主持人：但是我想人们恐怕还都是希望生活在四个车轮上面，那么有没有可能蜕变出一个新的汽车的文明？

陈平：尽管我也喜欢喜欢轿车，但是我觉得，公共交通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不是一个简单的新能源汽车就能解决问题，即使新能源汽车，也做不到全世界一人一部车，因为地球上

没有那么多修路的地方。 个人汽车工业，就是个人小轿车行业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大部分人采用的还是公共交通。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条件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全世界供一个美国可以，全世界都像美国，不可以。

实际上这也不完全是一个公共交通问题，也包括城市是否越大越好的问题，现在高楼大厦里面，人们只能把门窗禁闭，外面都是噪音，废气，让人窒息，这就是城市病。工业文明发展到了 2008 年该划个句号了，没有一个领域，还是发现它朝气蓬勃，得大于失，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彰显着失大于得，要考虑的是废弃固有的模式，走向新的模式。

主持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调整会是什么样的调整？

陈平：调整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痛苦，所以我说，这个新年开始了，2009 年开始，一大痛苦之事就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不可避免的走上破产，或者重组，也就是说，这个汽车形态的汽车工业，消亡是必然的，谁都救不了的。但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产业链是太长了，美国本土上下游都加起来，要失业 250 万人到 300 万人失业，那么又导致中国会有多少人失业。

主持人：对，中国好像是目前汽车原件的出口的第一大国，而且主要消费国是美国。

陈平：还有失业的人的消费更减少了，市场更萎缩了，所以我说，这个 2009 年我们碰到的第一个这个痛苦，不是光美国碰到，中国都会碰到，就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走向衰亡的过程。

从这种角度我说，现在的以石油，以不可再生能源这个为动力的汽车工业，会必然走向消亡，即使是我们已经发明出了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如果还是从个人轿车的为汽车工业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产业之路，仍然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汽车工业能够长盛不衰，还是走不下去，因为能源只是一方面，还有空间也不够，即使我们空间够了，那么，人们又要付出时间，在时间上付出失大于得的代价。我还是这么个结论，美国对汽车工业的这个拯救将是徒劳的，任何国家想把这种以个人轿车为这个发展方向的汽车工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的产业政策，都将是徒劳和错误的。

第 063 集 工业文明错在哪里？

主持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经济危机，以往是哪些地方错了，或者说被扭曲了，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陈平：我一再说，这场危机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但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来说，工业文明在走向兴盛的过程当中，各种关系比较顺，而由兴盛经过了最高点，往衰走的时候，内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为结构，都是越来越不顺，越来越扭曲，越来越畸形，具体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出来。

主持人：那比如说？

陈平：比如说，工业文明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增加的消耗的基础上，按常识，不

可再生的一定是越来越少的，同时也就是价值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贵的，对不对？但是，目前的工业文明中，，不可再生的资源的相对价值却是越来越便宜。

从绝对价值来看，不可再生资源比如石油的价格是在上涨的，去年都达到了 140 多美元，但是，石油在几十美元甚至几美元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才多少？如果把那时候的商品价格与当时的收入相比，石油的相对价值其实是在下降的。

事实上，无论是资源还是制成品，绝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以及用它们制造成的工业产品，上百年都是越来越便宜，形成一条向下的曲线。而且大部分的制成品不仅是相对价值和价格便宜了，就是绝对价值和价格都是越来越便宜。稀缺的是贱的，这个可再生的，是这个贵的。就像现在一件棉的服装，那肯定比化纤的要贵，对不对啊，但棉好歹还是可再生的，这化纤是用的石油啊。

主持人：但它却便宜。

陈平：本来是不可再生的，又凝聚了大量的高级劳动和初级劳动，却越来越便宜。这个现象被我们看做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这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和劳动的贬值的过程，这个就成问题了。它是矛盾的。工业文明不断地大规模地创造这些由不可再生资源所产生的产品来供人消费，消费的东西是越来越便宜，淘汰得越来越快。一方面你可以说它是社会进步，但这个进步又使得我们的社会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时空，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文明从新生走向衰亡的轨迹了。因为它扭曲了，它畸形了。

从人类和自然这么一个相互关系上来看待，不可再生的应该更贵啊，因为得为子孙后代留啊，怎么留呢？你只有让它贵了，它才能留得下去啊，如果它便宜了，它一定是花得更快、消失得更快嘛，这就涉及到怎么认识我们人类的本性问题了。而认识人类的本性，又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和它相关的则是社会制度，就是我们社会制度应该怎么设计？这关系到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看待我们人本身和社会怎么样能够一直是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主持人：显然，如果有一个新文明的开始的话，或者说我们走出它的危机的话，必然是这个关系的重新的一个调整。

陈平：为什么会扭曲呢？那还不是贪婪的人性导致的吗？应该让不同利益、不同的需求通过一种机制的博弈，而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制度。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很浅显道理，不可再生资源你要贵一点，可再生的，可以便宜一点。这里面你可以用税收来调节，对吧？

主持人：比如说像能源税，资源税。

陈平：对，能源税，资源税。这个税既可以在开采资源、能源时候收，也可以在产品消费环节上面去征收去。

主持人：对，可能像燃油税。

陈平：等于区别税率的消费税，对吧，这都是可以涉及的。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来制订这些东西？谁来主导？顺应大众，一定是顾眼前。但是主张精英政治呢，那又容易走向专制去了。所以这又是一对矛盾。精英政治和大众民主，它也是个博弈。

大众民主政治，顾眼前是跑不掉的，顾局部是必然的。精英政治承上启下，他可能会想得远一点，但可能他这个精英，也可能是个魔鬼，所以今天全球社会都有制度创新的问题，我扯开来说一下，去年底，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说了一句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这话说得也没错。因为那个体制也面临着要创新的问题。

工业文明由盛到衰，是由于它一系列颠倒的关系和扭曲的的价格所造成的。比如说，服务肯定最好再生的了。

主持人：对。睡一觉第二天又是浑身都是力量。

陈平：但是，现在人们把服务行业看的是比生产行业更高级的行业，服务业附加价值高，制造业附加价值低，但这是因为现在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它不是天经地义的。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是应该哪一个更贵一些？

陈平：我不是说哪个更贵一些，我只是说，不能这样地简单归结。有些生产几乎是在人类不可缺少的。比如说，你能一顿不吃饭吗，但人人都不愿意当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当农民呢？赚得少啊，为什么赚得少呢？因为他便宜啊，为什么便宜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

再一个，现在主张并购，从提高效率来说没错，但并购的结果，一定是使就业减少，同时并购的结果，往往是垄断增加。结果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增加了，劳动所获得的回报却减少了，那么社会的需求也就被压抑了，被减少了，那么这个并购到底是好是坏呢？从提高效率，它是好，从社会可持续发展来说，它是坏。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看到世界发展这么大的危机了，那就应该很多应该痛中深刻地去思痛之原因了。既不是我说的，一个工业文明由盛而衰的危机，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也不是现在的这个，这个美国或者包括中国政府的官员，比如说要转变增长方式一个简单一句话，能够解决的。要做很多细活。

主持人：需要全面地反思，可能不仅仅是这些显性的一些问题，包括从价值观，重新进行思考。

陈平：所以我倒是觉得应该呼吁，对于全世界而言，都要进行一次深刻的也是这个思想解放一个运动。把我们从过去的这个都习以为常的，认为天经地义的这个价值文化体系中解放出来。审视我们的价值观，审视我们的文化，审视我们的制度，才是解决度过本次经济危机的唯一之路，这就我说，在旧框框里面解决不了了。

第 077 集 反思工业文明　消除危机阵痛

主持人：您现在是比春节前更乐观了，还是更悲观了？

陈平：这点我自信地说，我一直是清醒的。一直既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是理性地在

看待这个事件的发展。我知道这一场危机是漫长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更加痛苦的。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加工厂，因为我们还有未完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我们古老的东方文明还没有真正实现全面地复兴和崛起。 所以我们的未来的道路会更加艰难。

主持人：您刚才是用了一个排比句，其实听了之后我是觉得，好像是不乐观。

陈平：但是，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包袱应该说比西方发达国家背得又少。这个包袱不仅是资本的产业结构，还包括价值观、政治体制，我刚才说了，我们有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很好地展开，还没有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威权的或者集权的状态，那么，一旦中国大陆的政治精英们看清楚了问题，充分地利用这种集权体制，倒是有利于我们走出工业文明的这一个系统，走出工业文明的危机。

主持人：那其实也是一个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的问题。

陈平：后发优势包括我们有后发政治优势，我一再说过，中国的集权政治有历史的原由，也就是帝国政治的传统，也有近现代的原由，西方列强从价值观上面希望中国和他们一样走上民主政治，但从利益关系上面，他又不愿意中国走民主政治。还是回到正题，我的看法，全球都将被形势推着走走上这个深刻的体制改革之路。

主持人：我注意到，其实您这话是有三个意思。

陈平：为什么我这么说？从欧美到日本，可以说都没招了，现在的招，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只会把局面越搞越糟。这就说明现有的社会体制都会发生变化，广义的包括文化，价值，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经济秩序，等等。

主持人：那么这将是一个任务非常艰巨的一个变化。

陈平：今天中国这个执政者，现在很关注社会稳定，你别认为仅仅是中国要关注社会稳定，今天啊，谁也别唱衰谁，我说一句可能舆论上谁都没说过的话，西方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动乱。

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这危机在越来越深广地蔓延。而精英们面对这个全新的局面，出的招一个个都不管用。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

主持人：其实现在确实是感觉全世界的人的这种焦虑感都在增强。

陈平：一代精英，多数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现在这危机是跨时代的，精英们会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西方人也要面临着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主持人：您说是这个解放是什么？

陈平：一个集权体制的发展，需要思想解放运动，一个自由的体制要转型发展，也要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要从是体制外力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者是要从固定的思维，固定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

有思想解放运动，才会有新的复兴，实现跨时代的发展。当然，不会是顺水顺舟，风平浪静的，所以我说，这一场经济危机，会让全球都陷入动荡当中，不动荡它就不会走出过去，走出习惯。这就是我对未来的预测，从全球性来说，不是经济回暖，也不是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在 2009 年要面对全球性的社会不太安定。

我们这社会需要对于人类五百年的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地反思。而这个深刻地反思，和新的伟大思想的产生，新的价值观的这个萌发，就像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总是有痛苦的，这个痛苦，就是由经济危机到社会的动荡。

第 081 集 对增长的批判再认识

主持人：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为什么大家会把增长看得这么重？

陈平：我反问你一个，为什么要增长？

主持人：我理解是，为了找到一种幸福。

陈平：增长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所以从这个标准上来看，把人类为了生活得更好，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本身就是太狭隘了。

主持人：狭隘在什么地方？

陈平：人们生活得更好，并不完全由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决定。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更多的表现为物质财富。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物质的需求在人实际上的需求的满足中，还属于中低层次的，物质需求满足以上的，还有精神需求，以及成就感，被他人认同等，这叫自我实现。所以从那个角度，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不光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对于增长的批判。

主持人：批判它的什么？

陈平：批判为了增长而增长。

就像中国为什么非要 8%的增长呢？那是因为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分配上面有不尽合理的地方。，通过制度的改革，而不是通过增长，更能使中国大陆人感觉到生活得更好。

增长的数字，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我就经济论经济，增长出来的这个财富，怎么分配，怎么使用？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当中去这个实现财富的造福于人的功能，这一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就经济论经济，那问题就更大了：我们为什么增长？

主持人：对，您刚才说的是，增长目标的转变。

陈平：我现在提的是，我们需要增长目标的转变。只有增长目标的转变，才能够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而决定增长目标的，又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这个身体不健康了，说你呀，生活方式有问题，说饮食习惯不好，生活习惯不好，我说我们这次的经济危机，根源就是工业文明加上西方文化的一些因素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靠占有、消耗不可再生资源，靠个人私欲的高度的过分的膨胀，以及由于这个膨胀而对于人类生存空间，生存资源的效率越来越递减地占有等等，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然后从增长的目标到增长的模式，这样一个方式，都已经不可行了，太过了。

主持人：那么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增长目标应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陈平：首先，顺藤摸瓜，要面对这场危机，第一，别去抱怨这场危机，别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这是一副苦口的良药，这次危机是一个苦口良药。

主持人：那么它治的什么病？

陈平：它治的是我们人类社会过于贪欲，而且走向了愚昧的贪欲这个病。

主持人：为什么是愚昧？

陈平：人是自然的产物，贪欲弄得在不断地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不是愚昧吗？

回到说增长的方式，首先要谈我们为什么增长，要从我们的目的去谈。我们为什么增长，那是因为我们要生活得更好，什么样是更好的生活？中国大陆现在一个很时髦的一个概念就是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这和谐要给它分解成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要分为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指标，我们现在呢，我想这个万事总是要有个开头，所以我主张我们开头，就是从对于增长的批判来开始。

就是首先想想，我们人要什么。面对今天这一场让人们惊慌失措的经济危机，我觉得反而我们要谈为什么要增长。重新来看我们有没有一些真正的需求，没有和以前的这些增长联系在一起，这些需求就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接下来的新的发展空间。

需求来自于内心，但是它具像的目标又源于科技的发明。我们到底穿什么最好，吃什么最好？住什么最好？怎样行最好？这都是牵扯到深层次的这个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改掉它，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的概念。

这个苦口良药的经济危机到来，是提供给了我们全人类一个机会，来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思引导我们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来重新认识增长干什么？世界各国政府，别把那么多钱，还去投向满足于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贪欲，投向不合理的增长模式的黑洞中去。而是应该反思，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重新寻找增长模式，然后那些不健康的，应该淘

汰的那些增长的载体，该消亡就消亡。

第 082 集 从文化根源上探寻经济危机解决之道

主持人：在我们以前《论衡》当中，您也曾经多次提到，就这一次经济危机，其实是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也注意到，马克思•韦伯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论断，他说学习经济史的一大收获就是文化会让经济的局面全然不同，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文明、文化和经济的这样一个关系？

陈平：文明包含了文化和经济，或者应该说，广义的文化本身也包含了经济，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想以什么样的物质方式来实现我们的基本需求，这里面就带有文化特征。文化包括了习惯，也包括了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表现为褒和贬，赞赏和不赞赏，这就构成了人们的需求，要什么，不要什么，用什么，不用什么。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了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又决定了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那么如果从这个逻辑我们推理下去，那么就可以看到，文化终究是有它发展的阶段性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人类不断地去发展、丰富、变革自身的文化，那么也就必然会不断地去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主持人：其实您是梳理了这样一个链条，就是首先是文化，文化开始导致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会导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最后会是一个经济模式。

陈平：今天全球都笼罩在强盛的西方文明当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不知不觉的按照西方文化的指引构筑你的需求。今天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于各国都是具有共性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再来关照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大家现在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其实这就要求我们是一定要反思这个全球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

陈平：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它一定会寻求转型。经济一定要转型，增长方式一定要转型，经济结构要转型，实际上面，首先要转型的是文化，转变需求的指引体系，不改变这个，需求怎么会改变？需求不改变，你的产业结构怎么会改变？产业结构不改变，经济结构怎么改变？然后增长方式怎么会改变呢？所以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把对于关于这一场经济危机的讨论，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文明的层面。

现在全球在着急的都是怎么样振兴经济，首要是提振需求。那么提振什么需求？这个危机的发源是美国的房地产，那么是不是还继续去用房地产需求来去启动它去，实际上美国人对于住房的过度需求，不是住房需求者对房子的过度需求，而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家和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推动了人们对于房屋的过度需求。但是为什么会把推动社会增长放在房子上呢？因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看不见，找不着体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但社会又必须要增长，不增长就活不下去，所以就就运用了金融的杠杆，运用了资本市场，运用了媒体舆论等等一切的引诱人们去追求那种这个超出现阶段的需求。

奢靡的文化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堕落。奢侈的背后，就是炫耀和浪费，那这一切，都是文化的体现。这个文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人类几千年，都是以节俭为美，西方文化蓬勃发展，极具生命力的特质，被马克思•韦伯所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也是节俭。怎么会走向这个奢靡，这为什么呢？一个积极的极具生命力的西方文化，为什么会走向它价值的反

面？本质上是人的贪婪。但为什么会把这个贪婪，没有边际地释放到了这个过度的程度。那是因为它是增长的需求，就是必须要增长，那么就不问目的的增长。

主持人：为了增长而增长。

陈平：对，而这个又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在出现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先进的文化状态。但同时，它也伴随着它走到今天这种状态的根源，就是工业文明的线性增长模式。在它的初期，这可能是能够带来社会进步的核心，但是到后期，可能反而是一种破坏力。工业文明源于人们个性的意识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个人权力的伸张，在此基础上面，又相伴相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人从敬畏自然，顺从自然，而利用自然生活。然后走上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而掠夺自然。这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的特点。然后，由于保障和伸张人权的社会体制的建立，它把这个源于勤劳，节俭而致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了这种极其丑陋的，违背了人性在需求方面的本质规律的这么一种社会现象，追求奢侈成为时尚，以践踏人类的母亲大地为荣耀，这么一个价值观，几乎快成了社会的主流。但是，这必定是走不长的。

一方面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资源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呢，人的需求最高的境界是自我实现，只有利他主义精神的升华，它才会转变成为社会的认同，形成个人的自我成就感。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一场危机，我觉得这个从各国政府来说，继续用传统的文化范畴内的这个思维习惯，政策手段，来面对危机挑战，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徒劳的。今天出现的一切状况，都要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去找寻它的原因和出路。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所要大声疾呼的，是这个认识我们过去的文化，这个探寻人类文化的复兴之路，来找到经济重新振兴的方法。

第 083 集 批判地认识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

主持人：以往提到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的时候，一般会做这样的一些归纳，比如把自然当做是客体，另外一个是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第三个就是消费的符号化。

陈平：第一个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它的哲学基础，是把人与自然，首先表现为主体与客体，就是把人与自然摆在相对的对立的一个角度上。当然，这种哲学基础或者认识论，有它巨大的进步的意义。不走到这一步，现代科学就不会产生，人就不会作为一个主体，去认识自然，去分析自然，去走向实验科学。但是，这个哲学基础，它也会留下了今天的祸根，或者说今天一些结果的原因。把人和自然分开，人们把自然当成征服对象了，但实际上，人和自然，怎么可能分开来？

我们现在也是站在大地上，如果地底下掏空了，我们不也完蛋？强调人和自然的相对的主体客体关系，轻视怠慢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破坏自己生存的环境。但我们不能说这个哲学基础是错误的，它应该说基本正确。因为任何一种认识论，都离不开确立认识的主体。只不过哲学认识论的主体一旦建立起来了，好听点解放了生产力，不好听就叫解放了人们的贪婪。它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也在极短的时间当中毁坏了我们的生存系统。

主持人：那么如果是说，您刚才讲，它最初是有它的进步作用的，但是现在看，它的破

坏作用也是更的一些，那么如果要是催生一个新的文化，文明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陈平：我觉得的话呢，也不能说它是这个错误的东西，人类社会就不断地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摇摆地往前进。在农业社会，对自然很敬畏，相适应的是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毕竟是仅仅这个略高于动物界的一种生活水平。

人类总是要往前发展的，往前发展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思想基础，一定要寻求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支持。在哲学上面，在认识论上面，就是强调主体和客体，古人的一些文字也都谈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除泛神论之外，也有些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主体客体关系，到后来，人们发现，原来我视为神的东西，现在能够解剖开来，认识认识，而且我还可以按照我的意志，能够为我所用。人类在这个状态下面，第一兴奋异常，第二，自信心的膨胀是必然的。所以从哲学基础上，主体客体相对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认为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最多到九十年代，就到达了顶峰。

主持人：您是怎么得出这个判断的？

陈平：我发现人们很多价值观发生了异化，对精神的追求朝更加的物欲横流去异化。

主持人：工业文明的这个第二个基础，就是对物质财富的一个过度的追求。

陈平：对，因为它发掘不出来更具生命力的新需求，所以，它然会回到已有的需求当中去寻找新的增长点，也就是对于物质的过度需求。所以为什么会奢侈成为时尚。 但是在人类价值观上面，历来是不主张奢侈，因为人类知道，奢侈会破坏掉人与自然的基本平衡关系。破坏掉人类社会的基本和谐的关系。

主持人：过度的物质需求是一个符号化的消费，其实最后在消费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符号，比如这是一个知名品牌，这是一个全球只有几百件的东西，大家会以此为荣，觉得我购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个人就是成功，就显示我的富有。

陈平：显示这个富有。但实际上不是富有，是贫乏，精神的贫乏，这就你刚才说的，符号生活，符号生活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很让人痛苦的生活模式，人的本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有这么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放纵，理性是约束。但是我们的这个，这种你刚刚说的，由穷奢极欲所一种生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符号化的生活，它让人更加不自在。它更加违背了人的本性，你说人还能够感到舒服吗？说到这里，我倒是觉得，我们人类该探讨一下，这符号化的生活，或者沉重的符号化生活，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

连太阳、大海、月亮、星星，这都不崇拜了，就崇拜一个，标上符号的名牌皮包。这不是很荒谬吗？这里面我认为是有社会走偏的问题。既有本性，又有误入歧途的一系列的原因，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次危机，真的是应该让我们全人类安静下来，冷静下来，在物质盛宴散场的时候，坐在物质盛宴旁边的休闲室里面思考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

第 084 集 对效率的批判再认识

主持人：30 年前，大家觉得效率是个好词，为什么现在您开始，觉得要对效率进行反思？

陈平：就像我对于增长的反思，，要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增长，对于效率的反思，我们要什么效率？效率不就是投入产出比越来越大，跑得越快越好吗？那么我们跑的快，跑哪儿去？多拉快跑，我拉的什么东西？我值得不值得？

在目前这场经济危机当中，增长和效率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就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效率而效率。我说反思就是让大家知道，效率是手段，不是目的，就像增长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推崇增长，推崇效率，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们人类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生活得更糟。过去十几年，我认为这个工业文明走向了顶峰，转向衰退，增长和效率，都在把我们引向这个不好多于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

主持人：不好多于好，怎么讲？

陈平：增长使环境越来越糟，而增长出来的东西我以电子产业为代表也最代表，上万块钱的电脑，绝大部分还没摸熟，摸熟了就要换掉，有因为时尚的原因换，更多的因为一大堆软件不支持了。

主持人：我现在想想，我也有过类似的心理，比如说一听说运转速度更快的电脑出来，就对自己现在用的电脑有另外一个看法，而且好像内心一种恐惧，担心慢下来的一种恐惧，总是想要快要快。

陈平：这是文化的引导，但也有为了增长而制造出来让你必须换的理由，如软件升级了，所以不能用了。为了对效率的追求，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忙碌、紧张、焦虑，我们失去了恬静，我们失去了欢笑，失去了很多天伦之乐。人在这工业文明最后的狂欢当中，却欢笑不起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文化走向衰落的各种表征。

主持人：那么这是效率本身的错吗？

陈平：效率两个字，是没有错的。但效率两个字，如果变成了像图腾般的被崇拜，而把它变成了这个目的，而不是理解它为手段，那么这就是走向极端化了。我刚才说了，我不是要去这个否定效率，而是我要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我们人类需要的东西。

我也一直坚持，我们应该承认人的自私，贪婪的权利。这是人类社会所有辉煌发展的源泉，当然来讲呢，也是人类社会一切丑陋和罪恶的这个根本来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切都是人性决定的，就不去反思和批判。既然人创造了文化，对于文化，对于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追求的反作用，就应该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去认识它和重视它。

回到我们以前探讨过的，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了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是我们效率的目的。

那么我们又是怎么创造自己的文化呢？我跳跃性地来思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

象。文化存在的形态就是信息，而信息需要各种载体来传播，我们统称为媒体，媒体的发达应该是大大的繁荣了我们的文化。现代的科技的发展，让信息获得了更快速的，更逼真的这个传播。按说我们人类应该进入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但是，我想你也有这个体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这么一个本应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怎么好像我们绝大部分人，好像离文化生活越来越远。满足人的需求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文化享受，越来越少，电视是越来越发达，但是，人们上歌剧院，上音乐厅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人难道不需要文化生活了吗？难道我们比以前更加吃不饱，穿不暖了吗？

主持人：对，当具备了更多的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倒退，或者是大家对它的一种遗忘。

陈平：那么这里面呢，我说我发现了一个既有趣，也可悲的一个现象，就是人类社会指引需求的价值指标系统，发生了和人本身所应该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大的这个分离。
声音 4：我发现了一个既有趣也可悲的现象：人类社会指引我们需求的价值指标系统，发生了和人本身所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大的分离。

效率和增长，就在加速，就在加速这种这种分离。这是为什么？人们又如何会走上这么一个自己增长的异化当中，原因我们不需要说明，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的自私和贪婪。但是，在自私贪婪上面，所形成的具体的一个个需求的方向，它又是被文化所反作用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从效率引出来的思考，对于我们要什么，我们人类要走向何处去的思考。走到今天这个状态，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本能，但是，我们一定要修正我们在进化过程当中，哪些走偏掉的事情，走偏掉的方向。

第 085 集 文明转型期下的全球化解读

主持人：提到全球化的话，如果我们要对它进行反思，您觉得它的利弊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应该这么说，不管对于全球化做如何评价，全球化是必然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它。全球化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个是谁也阻挡不了。因为全球化的根子在于基本人权。

主持人：怎么讲？

陈平：人有迁徙自由。确确实实，人是有迁徙自由的，你没有任何理由限制人只能在这儿，不能在那里，一切限制人们迁徙自由的，都是反动的。因为它是源于人们的基本权利，第二点呢，全球化从总体上来说，它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一定程度的不利的东西，是局部的，是暂时的。

主持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全球化的话，可能这一次的危机就会局限在一个区域之内，而这一次大家普遍的定义就是全球经济危机。

陈平：第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肯定要全球化。第二点，不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不代表你能过上世外桃源似得富足的仙境般的生活。今天的朝鲜没参加全球化，它没有卷入这

次经济危机，它是世外桃源吗？它不是。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比较的概念，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告诉任何一个人，你只能在这儿待着，你只能用这儿生产的东西，吃这里生产的粮食，穿这儿生产的衣服。那人他一定不干。极端的说，让人过这样生活，相当于是把人坐监狱去了。全球化的本质，是人权，它的开花结果，是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文化的融合，经济的交流，和生活的发展。

在全球化过程中，每一个局部，它都会有得有失，但是从发展的眼光，从整体的眼光，都是得大于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有失，如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很多美国原来的产业工人失业。当然，美国人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很多，那种超级市场里面的购物车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便宜。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加工厂获得的不过是微薄的利润，但是得到总比不得到好，毕竟发展了。全球化格局中的分配公不公？从数量上来看，分配不公。但是从发展的阶段上面来讲，这个分配又是公的。对不对？古代中国丝绸卖到欧洲赚大钱，泥巴烧成瓷器，不也赚了大钱？

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经济危机，全球化对文明转型，是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还是会增加一些新的障碍，困难。

陈平：我觉得是积极的作用。一个很简单的全球化的好处吧，一战，二战为什么会打起来，是德国要获得新的生产空间，那时候因为全球化不充分。今天有些耸人听闻的人说这次危机可能又会导致新的世界战争。我告诉你，全面的世界性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因为全球化已经让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互相的依存度非常高。

主持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平：再说，没有全球化，可能这个危机呀，早就爆发了。

主持人：怎么讲？

陈平：没有全球化，可能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早就过熟了。可能呢，中国还一直陷在供不应求的危机当中。而全球化呢，这个为我们人类赢得了最少几十年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那么这一次面对的全球性的危机，它最后会不会催生出一个大融合的全球文明形态？

陈平：不会一步到位，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以及西方文明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下。不要去排斥，排斥是没有意义的。三十年河东，就是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再谈河西。全球化会让原先落后文明种落后的因素消失得更快。任何一个过去文化的东西的消失，现在人都是会表现的非常的惋惜，要极力的保护，但是，那是要保护和留住我们人类的记忆。

主持人：对，并不是说为了像那样的一种方式去生活。

陈平：人永远是在创造明天。人永远是什么好，什么有利于我，我就用什么，采纳什么，

这才是进步的动力。所以在这一场危机，我认为短期可能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长期一定会加速全球化。

为什么我说短期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那是因为，短期内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大陆，还是会沿着正在过去的工业文明时代的规律，架构，目标，方向，价值观，来进行对于经济的拯救。但走回头路是永远也走不通的，时间嘀嗒一声，每过去一秒，过去的那一秒，我们是永远不会回去的。所以我对未来的判断，先保守后进步。

保守是徒劳的，变革是必然的。保守会产生阶段性的全球化的倒退，保守无效，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那么又会向着更彻底，更坚决的全球化方向去发展，而这个全球化，会更多的冲破意识形态，冲破各个政权所设置的疆域，那么一种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全球文化会在融合状态下面的新文明的的孕育发展，中诞生，使我们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新的时期。

第091集 反思工业文明进程中的媒体

主持人：现在媒体似乎变成了广告的载体。您怎么看？

陈平：过去谈到新闻媒体，也就是一些主流媒体，都说它是社会的公信力，它代表着社会的正义，代表着人们的良知，但是现在媒体变了味，公信、良知、正义成了媒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我认为现在不分社会制度了，都是这样子。

主持人：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陈平：我刚刚说，要从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它，今日媒体的状态和今日全球的社会发展状态是一致的。

五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与科学，就是以个人权利伸张为主的民主，和这个征服客体，征服自然为代表的科学。也就是极度的人本主义。那么它冲破的在欧洲是神本主义，在中国是皇权主义，从压制个人权利，到伸张个人权利，这是一个过程。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媒体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陈平：在这过程当中呢，媒体应该说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当中都体现了社会公信的功能，但是当这个工业文明走到了由盛到衰，表现在今天的媒体的形态上，就是今天的媒体成了资本的奴隶。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面，那么媒体它是权力的喉舌，但是，在政治上面获得了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社会制度下面，媒体又沦为了资本的喉舌。这是工业文明的后期必然发生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工业文明上升期间，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视程度，一定比今天要大得多，多得多，于是在社会各种利益的角逐和平衡当中，媒体自然承担了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到了工业文明后期，当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膨胀到了极度的时候，那媒体就会沦为资本的奴隶了。

为奢侈翻案的是谁？媒体。媒体在大量地鼓吹奢侈，鼓吹浪费的生活方式，背后是这些奢侈品制造商广告的推动。是资本在推动它，你包括今天的电视媒体，媒体都是哪儿热闹往哪儿去，其实这是吸引眼球的一个工具，而背后其实也是为了吸引有更多的广告进来。

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人类社会要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转型，那是很困难的。因为，经济转型、社会制度的转型、人们需求的创新和改变，首先要有信息的引导，也就是要有新的文化的产生，而在社会生活中，承载着信息传播、文化传播的是媒体，媒体也就成了这个走向衰亡的工业社会的代言者，如果媒体整个代言的是一种衰亡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文化的复兴，那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了。为什么在这场危机当中，各国政府难以创新，而忙于救市？不能不说，受媒体的舆论的压迫是一个很重的因素。

主持人：其实这背后是需要媒体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一个新的观念。

陈平：创新的声音频频在大学里面产生，而我看了很多媒体，声音却不强，由这么一个事我想到，大学实际上也是媒体，广义的媒体，承载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可大学为什么可以说不呢？那是因为，大学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中，形成了可以相对地不屈从于资本、也不屈服于权力的一个生存发展模式。在西方社会，大学注册一般都是叫做私立非盈利机构，就是它不以赚钱为目的。出资是私人，但是它不以盈利为目的。我现在理解了，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就是为了让大学能够不沦为资本的喉舌。不沦为资本的奴隶。

主持人：那么他盈利的这些钱，如果不作为盈利，它做什么？

陈平：它还是作为它的教育的发展，这样子它就在传播知识文化的过程当中，能够代表更多的公共利益、更多的未来，更多的体现了种精英的精神。

主持人：对，独立的，前瞻的一些判断。

陈平：但是媒体呢，尤其是一些大众媒体，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成为商业的机构，也就是盈利性的机构，我觉得真是有点误入歧途。按说今天物质丰富得多，人们生活好得多，但你看媒体那种急喉喉地赚钱的状态，好像是一个三级贫困户似的，这为什么？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今天的媒体人都堕落了，今天的媒体人很痛苦，在作为媒体的道德和良知，以及资本的追逐的压力，两者之间，在痛苦地选择。

主持人：尤其是有理想的媒体人。

陈平：但是，多数不得不选择资本。因为资本和生存连在一起。我这儿前面说了这么多话，那么我试图想要表达的，我们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要开启一扇走向未来的大门，需要改变目前媒体的定位，恢复媒体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公正、公共、精英，和面向未来的这么一个精神，以及承担起它作为知识、文化、信息传播者的的社会功能。

当然，资本需求也不能把它一棍子打死，社会必须要在互相制衡中发展，失去了制衡，是有问题的，对资本要有制衡，对权力也要制衡。对媒体本身，也得有制衡，都得要有制衡。对各个产业，都得要有制衡。那么首先我觉得现在，应该要使媒体尤其主流媒体摆脱资本的属性，应该参照或者说学习教育机构的这种制度性的安排。

我想这样子的话，在我们社会急需要的文化复兴并由文化复兴来带动经济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媒体才能够充当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否则，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想法，都没有载体。

第092集 用新文化和新需求迎接新经济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新经济的形态是什么样子？

陈平：我们首先再回顾一下，这次经济危机，到底是哪些方面危机？
第一是需求危机，需求危机、生产过剩，和金融的过度泡沫化以及透支，它在本质上面还是因为增长的极限，是因为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所共同形成的这么一个体系，它所能容纳的需求和增长都走到了极限。而在极限下还要增长，才会用这种金融杠杆，用负债和透支，来拉动需求。

主持人：其实也是一种畸形的，勉强维持的一种增长。

陈平：这是对发达国家而言，对中国则因为有国际市场旺盛的需求存在，走上了投资驱动型的道路。一边是这个过度消费、透支消费，叫做消费拉动增长，一边则是投资驱动增长。这种过度的消费本身是靠金融杠杆所支撑，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良性的需求，当它垮掉之后，全球性的危机焦点就变成了需求不足，另一面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全球都陷入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当中。现在，美国、欧洲也在刺激经济，用透支来解决透支。但这个需求，还是不起来。中国用投资来解决需求，自然也是推不起来。

主持人：对，其实这个和您前面讲的真是，美国其实是在用老办法，来解决老问题，就是依然是透支来解决透支所带来问题，而中国的大陆现在所采取的也是老办法，投资来解决投资带来的问题。

陈平：在本质上面，这个危机爆发前，全球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文明的晚期了。只有晚期，才会有各种异化现象的产生。

主持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异化？

陈平：包括在刺激需求方面。从实体经济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市场，本来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却变成了创造需求、引导需求，实际上就是，你不要的，我也要给你。为了实现资本的收益，为了实现社会的这个增长，必须是要让你需求。这就叫做消费为增长服务，增长本来是一种结果，增长不是目的，增长是自然的经济现象，但它成了目的。

想方设法地创造需求，想方设法地去满足人们需求，想方设法让人们拥有实现需求的能力，从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但有界限，在这个社会发展模式的容纳范围之内，它是积极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社会发展的模式或者系统容纳不了了，那就会产生异化。那么这时候，就只有改变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经济模式的转型。人们要走上新经济的道路。这时候再去创造需求和发现需求，是在一个新的台阶，新的一个，一

个体系中去创作去了。

改变经济模式，是要改变需求模式，因为经济模式是和需求连在一起的，先有需求，后有满足需求的这个科学发明、生产经营活动。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要破茧而出的话，那么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式，那么它的要素应该有哪些？

陈平：我觉得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一定在相当多的方面是对旧有模式的否定，是对旧有的一些需求的修正。谈到否定和修正，这就不是纯经济的概念了，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如果把经济危机作为社会生病了，你去救它，就是重新恢复健康，那么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生病前。

主持人：康复，复就是回到以前。

陈平：但如果救不起作用，我们就要开始考虑，不能救了，要扬弃了，那么这时候，只有扬弃，才能够新生。

主持人：可能需要更大的力度，更多的勇气和反思。

陈平：需求，是这场危机的核心，但是我们通过仔细地分析得出了结论，振兴旧需求，这本身是走不通的道路。一定要去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个新的需求，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能够理性地来看待这样一些危机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想朝旧的状态去康复要，那么，需要的说就是扬弃。是扬弃和创造。这需要文化、价值观念的改变，还需要制度的设计，我们要形成新的价值观，新的指导思想，或者新的世界观。

主持人：如果说在旧的文化模式情况下，可能大家的所谓的美好未来是指个人能够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那么您所描述的这个新的经济和文化的美好的未来中，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陈平：我觉得，人总是想占有的更多，但是，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起的作用就是对人的私欲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限制。

主持人：可能还有一个引导，让这个私欲能够变成一个，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东西。

陈平：对，你说得很正确。所以我刚刚说了，要迈入新经济，要有新经济的观念，既然要迈入新的，就必须对旧的扬弃，这里面我非常想强调的一点，放弃挽救现有经济局面，回到或者康复到过去的那种所谓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这个乱局、困局，就是过去的美好时光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回不去过去。我们只有走向未来，走向未来，就一定要下决心，去扬弃过去。

第 093 集 在科学发展观中重建新经济

主持人：面对以往的困境，面向未来的出路，那么您对科学有一个什么样理解？

陈平：目前已经是老少皆知的一个提法叫科学发展观，我觉得从概念上来讲非常正确。工业社会，就是建立在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形态，也就是中国人“五四”时期所呐喊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之上。在过去的工业社会当中，科学的概念应该说是西方文明的特质，是咱们东方文明所没有的。中国传统的语言词汇里面没有科学两个字，科学是外来语。

主持人：对，最多我们是叫格物致知。

陈平：科学是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以人为本体，去分析解剖客体，通过分析，实验认识客体的发展规律、进而采用所得出的知识来利用客体，改造客体，征服客体。所以在一般人概念里面，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强大的一个方法论，同时也是工具。

中国文化没这个，中国文化没有很明确的主体客体，中国文化叫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尽管有指南针、火药的发明，但是中国没有走上工业文明，其实中国从宋代工商业就很发达，明代也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是当时的统治者阻碍了中国走上这个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片面，他不知道中国文明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这种科学概念，那怎么会产生以这个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然后满足人的欲望的这么一个工业社会去？如果天人合一，怎么能那么做呢？

中国走上工业社会这条路，是没办法。是被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给逼到这条路上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科学的发展观给它分一分，首先，对科学这个概念进行重新的认定。工业文明的科学发展观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就表现为这个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

科学观表现为对于自然系统认识的片面性。过于地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当然，工业社会的科学观，它也必然会有工业社会的民主观，核心是人权，就是人追求现实的幸福的享乐的权利。所以，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人有追求现实的享乐的权利，一个轮子就是工业社会的科学观，去征服自然，去改造自然，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它的片面就表现在，它的起点不是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出发。

今天我们这个不得不再次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新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弥补过去科学定义中的一些片面，我觉得，中国传统文明的天人合一虽然是有点原始和蒙昧，但是，在未来的科学观的定义当中，可以有它的核心价值。在工业社会之前，解释人生和自然有很多心灵感应式的文化，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蒙昧的时代，那么工业社会呢，是一个片面的，不全面的科学时代。工业社会之后，我们就要走向系统的，全面的一个科学发展的时代。但这个科学发展的时代，它的状态是什么呢，可能恰好是中共总书记所提出的一个口号或者目标，就是和谐社会，我不知道中共总书记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提出的和谐社会，但是我觉得，和谐社会这四个字确确实实是未来人类要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既要以人为本，也要以自然为根，根本根本，本不能离开根，更不能破坏根，一定是根和本要和谐的。

当然，我们不能够由此个否定个体，而张扬集体，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那么，个体应该怎么样伸张，个体伸张是不是要有限度？我们注意到了，西方主流文明当中，个人利益的伸张、个人权利的伸张不能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只是这个天赋人权里面并没有提到也不能

侵犯到自然的权利，所以从天赋人权的确立本就少了一块。

工业文明之前的社会思想、学说、宗教，采用神学语言来表达社会对人的规范。基督教说赎罪，赎罪就是通过你的对社会对于他人的好事，来赎这个罪。但这套东西现在变得苍白无力，它被过去几百年的科学发展，以及科学带给人的自信和力量所削弱或者是摧毁了。但是，过去宗教的一些理念和精神也有它的合理的内核，就是体现了人和自然是本和本的关系。

主持人：对，其实他强调的还是人和自然关系当中人的克制。

陈平：人和他人，人和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对于贪欲无所节制，不讲奉献，是会毁掉人自身的。无非过去蒙昧时代，用宗教来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这个真正全面的新的科学时代，是以我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更加理性和精确的把握所形成的一些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制度的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走向新经济，谈到走向新的文化，看起来这扯得蛮远，但是，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创造怎样的真正有效的新需求。创造有效新需求，才能创造一些新的产业，也就创造了新的经济。

主持人：也就有了新的增长点，健康的增长点。

陈平：所以我说，文化成了基础，经济形态，社会需求在这个层面上又成了派生物了。从最初是人的基本需求、人的本性派生了人类文化，那么，人类文化又会反过来修正和塑造人类的需求和经济体系。

主持人：所以恐怕我们在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就不能仅仅是就经济谈经济，这样恐怕这走不出这样的一个怪圈，那么只有通过文化从更深层次地去想，我们要什么样的经济，我们要什么样的需求，才能真正找到救市的良方。

第 094 集 谁将成为经济危机的真正受益者

主持人：奥巴马在演讲当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美国不能再用和以前一样的一堆沙子，再重建美国的经济，美国一定要在岩石上建造房屋，而且他说一定要为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打下新的基石。您对他这样的一个表述，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陈平：从次按危机开始算起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觉得美国从刚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很严重的危机，到一个阶段应对失措，到现在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一些本质性的原因。你刚刚说的奥巴马说的那句话，不能再用沙子，而是要建立在岩石上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要重新奠定美国经济的基础，既然是基础，一定是文化的，价值观的，制度的东西都会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

周勇：美国现在把新能源，作为经济振兴、作为这个重新建立经济基础的一个国策。

陈平：对，同时包括在欧洲，我最近看的一个报道，瑞典做出来个计划，2020 年完全摆脱对于石油的依赖。他们实际上表达的一种非常清晰的对未来的选择，就是走向循环经济，走向绿色经济。所以这场经济危机，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

周勇：好在什么地方？

陈平：好在在人类自我毁灭赖以生存的地球之前，让人们迫不得已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在地球上面唯一超越了生物链的物种就是人，因为有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让人类这个摆脱了食物链的制约，这是一个好事。是生物进化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革命，但是，这个这同样意味着人类因可以自己而走向最终的消亡。因为人类不可能彻底地超越生物链条，人类的这种贪婪的非理性膨胀，应该得到制止，应该走向理性的和自然共生的经济状态。

周勇：危机爆发在美国，那么现在看，他们受到的破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会不会成为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一次机遇？

陈平：不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会是这次危机最大的得益者。第一，以美国为例，他们具有显而易见的制度与文化上的优势，美国拥有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它对于各种声音、各种利益诉求的包容性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对各种利益诉求、各种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当这个国家在遇到和平时期的危机时，就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为什么加上和平两个字呢？因为，如果是面对的突发的自然的灾难，突发的战争，我们不可否认专制体制往往会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是如果面对这种和平时期尤其是经济生活的深刻的危机，面临必须要转变生活方式和生产发展形态的局面，这可就是民主社会大大地具备优势。

周勇：为什么？

陈平：第一，变化首先是认识上的变化，而认识上的变化要变成共识，形成国家行为选择，民主社会更具备恰当的机制和优势，我们说民主社会它不是效率见长，而是纠错能力见长。它效率上可能比专制社会弱一些，但是它的纠错能力要更强。

周勇：可能它的转型会更彻底，更深入。

陈平：它比较容易能够发现错误，而且错误能够在民意作用下通过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很快地反映出来。我举一个美国转变的例子，你知道在这之前，京都议定书美国都不签字的。他不参加世界关于碳排放的协定，但是你看现在美国在排放上面走的多积极，简直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几年前，美国在这方面还是表现的很自私，它为什么现在一下子转的这么彻底呢？这就是我说美国的制度优势，你不得不承认他这个制度优势，它优势在哪里呢？知错就改。但是它那个知错，不是别人告诉他的，而是要他自己体认到的。

周勇：对，成为全民内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认同。

陈平：对，第二点，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充分民主化的社会，它在这个舆论方面是很自由的，所以各种意见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也可以自由地争论，在社会发展的根本的方向、目标和方式上，能够更好地达成社会共识。

美国在迅速地把可持续发展经济作为它的最主要的国策，而且是它的国家发展战略，同时，美国本身就具备全世界最发达的教育，具备全世界最发达的最强大的科技力量，具备全球最强大的资本的力量，它又具备全球对于世界各种民族、各国人才最强大的吸引力。它一旦把一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定为它的一个重大的国策和战略目标，它肯定跑的是最快。你看全世界最快速的限制高管薪酬，谁出手的？

周勇：对，恰恰是美国。

陈平：华尔街象征着自由市场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堡垒，能够立刻采取了高管限薪，并且很多高管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民众的舆论压力，主动地提出降薪。别看这是一个降薪，它实际上随之而来的，或者伴生的就是在价值观上面的一种重塑。原来美国社会，储蓄率是负数。现在短短的几个月，已经上升为 6%了。

周勇：这应该是 1995 年以来的储蓄率最高的数字了。

陈平：可以预见，美国社会还要发生更多的深刻的改变，我可以这么说吧，这场经济危机会推动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着他们的文化优势，制度优势，包括科技优势，教育优势，资本优势，而朝着一个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跃进，我用了跃进这么一个词汇，他们会跳上一个，我们现在可能还定义不清楚的，但是一定是更高层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

周勇：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工业文明由盛到衰，是发生在发达国家，那么可能新的文明的产生，一定也是先在发达国家。

陈平：现在看来是这样子了。而那可能是相对于现在的社会形态又一个美好的社会时期。就像这个欧洲从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迈向了工业文明，不仅产生了蒸汽机，电灯电话，包括电脑等等，同时产生了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人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产生这么一个时期，那么这场危机，又会迫使这个西方社会会走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第 2 辑 全球危机与救市

第 003 集：美国“救市”得与失

主持人：您认为最初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一系列问题，是否还有很多地雷没有爆炸？

陈平：最近全球政府都在救市，实际上救的是金融投机市场之市。现在所救的，主要是债券层面。救的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之市，我为什么说是投机呢，因为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整个就是一个投机产品，我并不完全否定投机，也不排除投机和投资并存，只要奉行市场经济，那么开办金融市场就一定会有投机行为。投机本身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倾向。

主持人：但正是这些衍生产品放大了我们目前的这个危机。

陈平：目前所救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主要都是这个美国房地产的债券。在过去十来年当中，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如果你去过美国，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卖房的广告，上面的内容让有常识的人一看都觉得离谱。

怎么离谱？没钱也能贷到款，不需要首付也能买到房，没工作也可以买到房。只要能付得了头两年的利息，就能买房。在房地产持续涨价的情况下，这样几乎不用付代价就能买到房子，住上两年再卖掉，没准赚上一笔。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买房吗？

主持人：这等于平空捡大便宜。

陈平：那为什么会这种情况会出现？

主持人：支撑它的基础是什么？

陈平：一个，就是我曾说过苏东巨变后的加速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资源财富的再分配，非常有利于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以长达 20 年西方国家的低通胀、高福利和相对来说很好的增长，但是，这个很好的增长是否能满足这么多的消费需求，乃至可以达到上面那样离谱的状况？其实做不到，这当中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来自于全球化中的红发展国家，包括中国。

主持人：对，我记得有一组数据，由于中国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的消费价格大大降低了。

陈平：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低廉的午餐吃了几十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只有一样产品不可能通过全球化而来，那就是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附着在土地上面，不可能把中国的土地搬到美国去。

主持人：全球性的流动。

陈平：房子要人们愿意买，还要把道路、水电建起来，环境绿化起来，还有配套的商业

设施，这些资源都必须在本土发生。

主持人：这是个区域性的一个消费和生产。

陈平：到美国超市里面一看，东西是便宜啊，都可以从美国以外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过来，但房地产必须是在本土发生，绝大部分都是本土资源和本地劳动，那么，怎么样来让房地产也像其他商品那样通过全球化的过程而获利，这就产生了很多招数，我并不认为是阴谋论，但这是人的本性使然，这样子，就发明了一个又一个金融的衍生产品。

没钱也能买房子，但无论是建房者还是卖房者肯定都是要收钱的，出钱的是谁？提供按揭的金融机构，但它也不会一个人来出这个钱，所以他就把按揭的业务也就是债权做成债券再卖给投行和一些基金，风险让投行、基金承担了一部分，收益也分了一部分给他们了。这就所谓的英文上缩写叫 CDO 的债券，然后这个债券呢又被设计成为各不同等级，根据情况，把债券再拿一部分钱买保险。

主持人：听您这么讲的话，我觉得现在一环套一环，其实风险是越来越大。

陈平：不，对于参与各方来说，似乎风险变小了，但另一方面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风险是越来越大，因为他放大倍数越来越大，放大得越大，房屋的销售前端和首次按揭公司的行为就越来越离谱。反正风险不要我独家承担的，有这么多大投行，大基金在承担，我少赚一点钱就是了。你刚才说风险越来越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第二个过程呢，就开始把这个风险向全球分担。

主持人：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陈平：中国就买了房地美，房地美一大堆的债券嘛。为什么两房一倒又牵扯到雷曼、美林？因为这些投行不仅为住房按揭公司提供融资，购买债券，同时也在向全世界推销这些衍生产品。

主持人：他也参与进来，要分一杯羹。

陈平：所以，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这块的风险就全球化去了。美国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是靠全球的人一起来给提供担保的，来提供支持的。但这里面就是个链条，只要房地产价格不上升，这个链条就断了。

而不上升就像我以前所说过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发展模式，即使有了全球化让它获得空前的繁荣，但这个发展模式也是被证明要修正的，要改革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可能永远支撑人类贪婪的各种欲望的。

所以我刚刚这个逻辑说下来就知道，现在救市救什么？救的根本还是绝大部分就是投机的债券，什么债券？房地产的债券，房地产的债券的债券，房地产债券的衍生各种金融债券。

主持人：现在很多国家往一些面临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对这种做法，您怎么

评价？

陈平：我认为也不得不做，不做，那就是一场更加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但这不是治本，这是救急。这不是一个治本而是治标，如果从治本来说，那么我觉得还是得从人类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对人的行为规范来做很深刻的反思。不去反思它，它就会成为资本市场自由主义的走向衰落的拐点。它本身可能就会葬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主持人：这次等于是敲了一个警钟，那么如果说那个市场经济他自己来做一些调整和完善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做，以后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陈平：本质上这次可以称之为信用危机。因为以前投机都建立在人们对投机品的信用上面，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拿出了九千亿美金来这个救助这些个金融机构，我干脆说，这救助的就是投机金融产品的信用。但我说刚开始就说，它只是最表面上的一层，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单都买下来，由于现在这个经济萧条，恐怕大家信用卡还款的能力其实是正在下降的。已经发生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违约了。这又是要牵扯一波，那么，金融机构就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收紧再收紧信用，这个一旦收紧，美国这么一个以贷款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就会遭受到重大的打击，那就意味着消费市场会大幅度地这个衰退。

主持人：这样的话，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

陈平：到那时候呢，这种对于实体经济，对于消费市场的重大打击，才真正叫萧条，所以说大衰退还没到呢，作为社会真正基础的商业银行、生产企业、销售渠道、零售店、服务机构等等，现在已经日子很难过，但对他们的真正冲击还没到。

主持人：您估计还有多长时间能看到您说的这个局面？

陈平：这是必然到来的，我觉得时间短的话也是在 2009 年的下半年，长得话可能还要往后，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球政府的救市行为在延缓这一个危机的发生的时间。

第 005 集 美国救市能否给全球经济带来转机

主持人：前不久，美国政府又提出了一个七千亿美元救市计划，那么您是个什么样的判断？

陈平：布什发表全国讲话的语气和他的篇幅之长，包括里面的一些词语，几乎就像是战争动员令了。那么美国的财长鲍尔森，为了能够获得国会的支持，做出了给女议长佩洛西单膝下跪的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到了这一步呢？

这次在华尔街首先爆发的危机，应该说现在还是债券危机。仅仅是发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这个层面上。但实际上这次危机，远远没有过去。

债券危机，是一种信用危机。现在看来，市场上所发行的债券的数量很庞大，我看到的

数字，全球 GDP 去年大概是 40 万亿美金，但是现在发行的债券总额已经达到了 516 万亿美金之多。也就是说，12 倍多了。不管怎么样，债务总是要靠正常节余的钱来还。但是，按照目前这么一个生产方式当中，节余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经济大衰退，因为我们是处在消费主义时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靠消费，社会发展靠消费，社会进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消费进步。

为什么这次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财长鲍尔森会做出如此的动作和宣言。我觉得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看到了这场由债券引发的危机，可能会引发人更加深的，更加广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向商业银行乃至一般的经营领域蔓延，会向实体经济蔓延。

但是，美国政府提出来的七千亿的救市计划，你细细地看它，它的目的又都是非常短的。七千亿干什么，就是把这些金融机构手上的那些坏账给买下来，也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或者用新印刷出来的钱，把这个坏账给兜下来。兜下来怎么办呢？兜下来以后，难道这个垃圾就变黄金了吗？

主持人：只不过政府把这烂苹果自己装到自己的筐里了，那么这个苹果能不能再变成好苹果，起死回生。

陈平：只不过是用国家信用来替代了金融机构的信用。因为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人们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个应急措施，一个未必能够有多大功效的应急措施。但最起码可以暂时稳定人心，只是今后所留下来的是利是弊，利弊谁大谁小，我觉得现在很难做出评价。

主持人：布什也提到了，他说我是自由企业的坚定拥护者，因此第一个反应是反对政府干涉，但是他又不得不去为了救这个急，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到底它的这个影响，对于美国的市场制度的影响，对于市场经济理念的一些影响，到底会是什么，现在还是难以看得出来。

陈平：按理说，做了错误决定的企业应该来承担这个后果。但是为什么最主张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最主张自由经济的党派——美国共和党是主张自由经济，布什也是美国共和党里面最主张自由经济的政治家之一——要这么说，这么干？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不救却是不行，不救，眼看着就会发生更大的危机冲击，发生更大的风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人情常理上来看，布什的任期已经就剩几个月时间了，我相信任何一政治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任内那么发生灾难性的现象。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个美国七千亿美金救市计划，尽管的在国会，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总的来讲，绝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是持支持的倾向。一个结论是很明显的，不救，那么就危险了。 在这危险到来之前，我们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去谈那么多这个。

主持人：道理和原则了。

陈平：为什么这么一个明显违背在西方被认为是颠簸不破的自由市场经济真理的行为，会没有受到社会巨大的抵制？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今天这场危机的到来，使人们可能或明

或暗，或朦胧或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某几个企业的错误决定所能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几个企业的错误决定，全球都在救市，都在救那么几个企业闯下的祸，我认为不是全球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全球的官僚政客都变得如此的具有责任心了，而是他们或朦胧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是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这是我的看法。

第 011 集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全球合作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这个罪魁祸首不仅仅是美国？

陈平：我觉得如果是罪魁祸首，各大经济体都是罪魁祸首。包括东南亚、中国在内。几年前，任何国家、地区，任何企业，都会以能够获得美国的订单为荣。那个时候，怎么大家就没有想到，美国人都是在花你们的钱：东西便宜地卖给美国了，美国用借债消费的方式来买这些便宜的东西，付给你的是美元，你拿了美元又再去买美国的国债，一来一往，那你不是白白给美国打工吗？

主持人：对，借钱给美国人来消费。

陈平：美国今天的超前消费，过度透支，也是过去几十年新兴国家的需要。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模式，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增长的巨大消费市场，能起得来吗？中国始于 1978 年的改革三十年的巨大成功靠的是邓小平说的抓住机遇。那这个机遇就是美国的超前消费来的。

你可以抱怨说，辛辛苦苦赚的钱，结果又买成了国债，让你们拿去超前消费，岂不是亏大了？但是，发展总比不发展好，那么既然人类社会就是不断地创造需求、创造消费来推动快速发展的模式，那么在世界的产业分工上面，就必然会有享受消费盛宴的一部分人，也有辛辛苦苦的生产商品的人。

主持人：这是整个链条的两头。

陈平：这是相辅相成的，缺了一方就没有另外一方。所以我说，过去三十年新兴国家的选择也不是笨蛋的选择。今天都谴责美国，也不是聪明的认识。

今天这场危机，我说是全球共责。中国有很多企业，也包括台湾的企业，这些年互相竞争，弄到最后，美国所有的采购商都有账期。从贸易层面的赊帐，到金融层面用金融衍生工具实现透支和债权债务的转移，这是必然的。所以尽管这些年美国人日子过得是最好，获利最大，但是新兴国家也有获利，谁也离不开谁。

主持人：对，这是一个全球的分工。

陈平：这也是历史客观进程使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既然率先进入了工业文明，成为了世界的新文明领军者了，它就是处在一个获利最大的位置，中国既然落后了，能老老实实地得小头，就不错了。亚洲四小龙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在靠消费拉动需求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得了小头的成功者。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我觉得这场经济危机谁也不要去责备谁，每一个相关的国家都应该认识到，这场祸啊是我们大家共同参与和制造的，大家也应该共同地来解决这场危机。

主持人：我注意到，在共同行动当中也还是出现了一些杂音，在在救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摩擦的。

陈平：承认这场危机是全球共因，大家都是这个参与者、制造者。并不是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没有自身的利益立场了，但是，能够承认原因是全球共同造成的，最起码比不承认这一点，或者以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来参与这场全球大拯救的行动，要更有利于人类克服这场危机，更有利于人类走向未来。

主持人：如果说美国在面临危机之后要进行调整的话，是不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路径上也要做一些调整？

陈平：这一点是肯定的啦，美国经过在这么一场危机，已经很难再走过去那个模式，那么像中国这一些新兴国家，产能已经这么大，也不可能还继续指望着靠出口拉动来不断地增长。在目前这个一个转型过渡当中，世界几大经济体的运行状态，都会有所调整，都会和过去有所不同。

主持人：那么这个调整会怎么表现？

陈平：我刚才已经说了，首先，大家认识到，危机是共同造成的结果，这样才能够比较客观而理性的面对它去。第二点呢，美国过度透支的消费模式，他称之为叫做资产消费模式：资产用来抵押，抵押贷来的款用于消费，这么模式成立的前提是资产会不断地增值，所以资产能给我提供很多收入，资产如房子也就成为了自动提款机。我认为这是不能持续的，应该重新回到收入消费模式，就是量入为出。

此外，为了克服危机，美国可能还是要采取一些金融杠杆的方法。

主持人：但这次出现危机，恰恰就是因为它的金融杠杆化程度过高。

陈平：但是，目前不能不用了，在目前，美国可以选择从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拉动增长的方式，而转向超前投资、透支性的投资去形成新的需求，进而来动新的增长的这么一条道路上去。而美国如果选择了这么一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方法，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通过投资来加速美国经济的转型，那么，目前美国已经有巨大的财政赤字的状态下面，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肯定是扩大赤字。尽管现在的美国已经是债务缠身了，但是不能说赤字巨大就不这么做了，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叫做债多不愁吧。你就别去愁这个债多了。邓小平有一句话是很英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问题。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了消费的信心和热情，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走不通了，在这情况下呢，总得启动另外一个引擎，也就是超前投资、透支性的投资去形成新的需求，进而来动新的增长的。我觉得美国现在应该启动投资引擎了。

主持人：从消费拉动到投资拉动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陈平：那么，第一是投资什么方向？应该向新的科学循环经济的方向去投资，这是最有希望的一个领域。而且美国在当今世界上面也是最有条件的。

主持人：最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

陈平：它的研究力量、制造能力，无人能比的科技领先，它最具有转向科学循环经济的基础条件。现在缺的是钱，而这只有靠发债。

在这过程当中，新兴国家或地区我想也应该胸怀宽广，不要觉得买美国国债是重蹈覆辙，又亏了，该买的还是要买，一方面你也不得不买，另外要把这个买看成是自己的事情，当成是建立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过程。因为新的产业最终还是需要全球分工，如果说负债消费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了，那么，向着人类新兴的循环经济的领域去负债投资，却是一个宽广的阳光大道。所以这个债是不怕的，有了这个可发展的硬道路，问题都可以解决。债是能还得掉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能够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他应该是可以大规模地向全球举债。

主持人：大家也敢借给它。

陈平：那么全球呢，为了自己也可以买他的债，因为美国的投资如果能给美国创造新的增长和就业，也还是为这个全球新兴国家创造很多出口的需求。

面对这场危机，我觉得世界是慌乱多了一点，冷静思考少了一点。另外呢，从深刻的人类文明的角度去看问题少了一点，从技术层面去分析问题多了一些。

主持人：头疼医头的做法多了一些。

陈平：我认为解决目前的状态，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欧洲，应该站在历史的一个高度去看待去解决它去，另外呢，我们既然已经是全球化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相互依存度非常之大，谁也别想独善其身。全球这些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必须是把那个自我的利益、，权力收敛一点，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能够全球的更快的走向新的繁荣，走向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繁荣，这是我的观点。

第 013 集 救信心之市究竟难在哪里？

主持人：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救市，股市也曾经非常短暂地出现了一波上扬，但是很快又迎来了一个 21 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这是不是表明大家仍没有信心，为什么这样呢？

陈平：短暂的股市上扬不是信心的恢复，而是投机。为什么在全球联手救市没有救得了信心之市，为什么仍没有信心呢？我一再说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能仅仅用金融危机四个字涵盖。它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危机，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文明由盛而衰必须要转型的一个信号，一个迫使人类社会转型的一场危机。

主持人：全球各国政府出手豪阔，救市都是天文数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信号释放出来之后，大家的反映是这样，那么您觉得是不是这几招没有搞对地方？

陈平：不管是欧洲两万亿，还是美国七千亿，他们干什么，怎么做？欧洲的两万亿包括几方面，第一包括了向银行直接注资，政府成为银行的股东，而且占了不小比例的股份。第二种注资方式叫做可转股债，目的是解决银行的资本金不足，在这场危机中很多银行或者说几乎绝大部分银行的资产都缩水了，这时候需要增强资本金。

现在像欧洲这些国家，都承诺了无上限地为银行的存款提供担保，这是要让所有把钱存在银行的人都放心，让人们对银行的这个兑付能力有信心，这又是一种救市。

美国一开始七千亿的鲍尔森计划也是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后来看来市场不理这个茬，美国就部分地改变了方式，拿出来两千五百亿美金，也是直接入股银行，提高银行的资本金，，给银行提供这个无上限的存款担保，就是告诉人们银行不会倒。或者说告诉他们即使倒了，我政府来付这个钱。

但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人们的信心问题？不是因为银行资本金充足了，存款有保障了，人们的信心就恢复了。通过这么一段时间，从刚开始的仅仅是流动性地恐慌，包括兑付的恐慌，人们已经逐步地理性地认识到，或者感觉到这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层面的危机了。在房地产一直上涨的预期下，人们把房地产这个资产做抵押，来进行一种超出自身偿付能力的消费，如今这个泡沫破灭了，人们恐慌的是未来没钱可花了，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信心匮乏。仅仅是让银行的资本金充足一些，让我的存款放心一些，能有用吗？

主持人：对，其实这时候人们的预期变坏了，甚至不知道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陈平：无论是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还是接踵而至的房地产泡沫，都是制造需求，然后来创造消费。根本的一点，是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线性的、永远不能停止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必须要增长，那么就来创造增长，我用创造两个字带有贬义，意思是生拉硬扯，硬要创造这个需求，于是就必须采取一种泡沫的方式，美国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全球的经济中心，应该说它也是全球的一个统治中心，它也就炮制了大量的神话，以及和这个神话相匹配的金融衍生工具，加上股市上的泡沫等等，共同来形成这么一个需求和消费，然后拉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这个时候的增长已经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导致金融危机的是发展模式的危机，是需求拉动消费，消费拉动增长这种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一场危机。就像一个人体力透支过度的积劳成疾。随着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越来越对神话不再相信。对那些金融工具的神话更加不相信。所以，解决了资本金不充足的问题，信心并不会立马恢复。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给银行资本金充实和给贷款提供担保，给存款提供担保，它这个确确实实呢能够避免金融机构因挤兑，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的一个危机。

主持人：先让有一个局面可以稳定下来，然后才可以做一些事情。

陈平：但是，想依靠这么一个救市措施，就能够阻止股票和各种金融产品的市值的下跌，

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你不可能把防止出现更深重危机的救市行为，把它的功效扩大为能够让经济从衰退走向重新增长、的灵丹妙药，这是不现实的。就像一个人受了伤，先要止血，但人们是要看到真实的病体康复了，才会有信心。那么现在人们要看到什么才有信心呢？要看到就业机会在增加，就业机会怎么样才能增加呢？那就是要看到真实的需求在产生。

主持人：那么这个需求怎么产生呢？

陈平： 这就是我一再说，要救实体经济之市。首先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衣食住行，包括教育、医疗等等。这样一些基本需求上面，人们比较愿意花钱当然这需要收入有保证、收入增长有保证，而这就需要生产性的、服务性企业尽量地少破产，此外，还需要新兴产业的持续增长，而不是那些难以为继的产业比如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的继续维持，只有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新产业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越来越多，人们才会有信心，才会激发出真实的需求。

第 014 集 如何才能提振提振公共信心

主持人：那您刚才讲的，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一般指那些领域？

陈平：第一，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所谓基本需求，也就是永不衰败的行业，比如农业。当然资本是逐利的，哪儿利高往哪儿走，人们不到农业上逐利，要到网络上逐利，那是因为有股市上面的泡沫可以套现，所以在这点上，骂资本是没道理的，但是通过修改会计的准则，通过修改上市公司的上市条例，可以说让泡沫难以鼓起来。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资本的逐利本性，然后在社会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原则上面来引导、来改变，来因势利导地利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能够充分地、因势利导地利用了资本的逐利行为。

第二，环境，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坏了，好环境是人们非常期望获得的生存条件。但是人们很难把一个环境变成一个个体私有的东西，为什么环境的建设、环境的保护很难，因为它和人的占有性是矛盾的。

主持人：它是个公共品。

陈平：那就看我们如何在公共财政，公共投资和公共品提供这样社会一些制度上做文章了。

第三、可回收，可循环再利用的一些材料，社会发展计划包括配套的法律、政策，应该因势利导地将资本和财政投入投向这一块的研究和发展。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包括贷款担保、贴息等等方式，让这样一些产业发展起来，也可以通过税收的杠杆来调节，这样子人们就会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人们就会有信心。有信心了，对于目前的困难，人们就会去克服它。

现在救市仅仅是让人们对银行的存款有信心。如果让人们看到一个好的市场和为了这个市场而发展的非常好的产业，看过国家的各种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都是在帮助这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的产业去发展，那么银行自然会锦上添花，才能走出这场危机。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救市不能够挽救人们对于经济的信心，衰退、萧条的到来是必然的。如果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不迅速地花非常大的力量去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人类可循环的实体经济，那么这个萧条和衰退将是漫长而惨烈的。

主持人：说到泡沫，现在人们都说泡沫统统要挤干，你怎么看？

陈平： 我觉得这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而我提出第三个观点，叫做历史的观点。

主持人：怎么讲？

陈平：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应该这么做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期过程当中，它又是合理的。

过去，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负债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用资产抵押，获取现金来负债，而资产就是房地产。那么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上升，它的资产不断地增加，所以它资产消费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但是这一点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是信用卡，信用卡大量地透支，信用卡透支额度越来越大，只要你不断地付这个利息，你还能继续透支下去，但这个呢也是不可以持续下去的，所以这样的危机就会到来。那么，现在我说咔碴一下子信用卡全断掉，泡沫全挤了，整个市场运转的规模就会一下子缩小多少？

主持人：您是不是说，其实泡沫还是有它一定的作用？

陈平：如果我们原来没有泡沫的话，我并不主张去制造泡沫，但是已经制造出了那么大的泡沫，你又不可能说把泡沫一下子全挤干了，一下子整个世界的经济规模会缩小多少？能受得了吗？

还得有一个过渡期。我并不是说仍然是用房地产来制造泡沫，一定的消费信贷泡沫现在也还不能全部破掉，可能要支撑它一段。另外一些新兴产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还是要通过金融、政策等等手段去扶持它，哪怕是相对来说过度一点的负债发展。

主持人：对，那么让它能够快速发展，那么这样稍微有点泡沫，我们还是愿意接受的。

陈平：不，不是愿意，你不得不要这个泡沫。

主持人：这样才能够支撑我们的发展。

陈平：但是这个泡沫的内涵变了。我们可以说这是制造业泡沫，但是相对良性的泡沫。

主持人：这个泡沫的良性和这个恶性是怎么划分的？

陈平：良性就是有坚实的需求，而且是人类迫切要发展的一些需求，用这些产业来拉动消费。恶性的比如这次房地产泡沫。

我还是借用一句我认为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的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我加上几个字，叫做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第一必须坚持用发展是硬道理来解决这次危机。，走向重新的这个经济振兴、社会发展。两个前提是，第二去发展那些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永远是人们的基本需求的那些产业，以及可循环的那些产业。

第 017 集　危机进行时

主持人：这个经济危机发展的阶段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想听听您的意见。

陈平：在全球已经联手救市的情况下，20 号以后全球的股市依然是大跌。为什么股市还继续掉？在全球很多媒体上可以看到这么一种说法，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机构的坏账，转向了对于实体经济的关注。而实体经济的一些不好的消息，也正在陆陆续续地暴露出来。

大概在两个月之前曾经有过讨论，认为这一次的危机恐怕不像人们最初时候估计的那么乐观，它不仅仅是金融领域的问题，而是很快就会往实体经济蔓延，那么，在两个月过后，它的症状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原来人们认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过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灭。从而导致流动性太多变成流动性突然几乎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这么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谈论的是金融海啸。

主持人：对，还是定义在是一个金融的领域。

陈平：那时候我就一直在说，这仅仅是人类这场危机的开始，是危机的最表层的一个部分，应该说刚刚触及一点点。但是，一度在金融海啸中惊慌失措、或者失去信心的这些投资者，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趋于理性了。

主持人：您觉得表现是什么呢？

陈平：表现就是救市不管用。增加银行的资本金以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以国家信用为银行的存款担保，以国家财政来购买金融机构之间发行的商业票据，其目的都在于增加流动性，增加人们对于存款的信心和贷款的信心，但这些方法已经不管用了。

全球联手救市，实际上是联手救股市，救金融之市。以免较大的商业银行因为人们绝望中的挤兑而破产。这个作用目前看来是起到了，但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是很小的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依旧悲观。所以，我们应该提出这么一个概念，那就是把股市作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来作为衡量人们的经济信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主持人：就是说靠维持高的指数来证明形势向好，这已经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陈平：我觉得在目前识时务的做法，是让人们完完全全知道真相。

主持人：不回避，不心存侥幸。

陈平：现在看全球大概花了多少钱，已经花下去的，加上承诺要花下去的，加起来我估计大概五万多亿，全球四十万亿一年的GDP，五万亿就是八分之一，比八分之一全球GDP还多的现金救市，还救不了一个股票市场的下滑。这时候再延续这种救市模式，一定是徒劳无益。

主持人：那您说的这个真相是什么？

陈平：第一全球的这些精英们，尤其这些政治领袖们，政府的管理者们，自己要面对真相。

第二，也去认真想想，这次的危机和网络泡沫破灭的危机，和1970年代的美国的萧条，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它们有什么不同，最后，才能发人深思地想想这次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补充一下，为什么现在需要把真正的真相和可能最坏的结果告诉人们？因为现在人们有一种深层次的恐惧？觉得前面一片黑暗，看不见底。但是精英们今天冒出来一句话说已经见底了，明天大众却没有看到这个底，这就造成精英们失去信用，普罗大众也会因此感到更加恐惧，越发会觉得危机深不见底。所以这时候，让人们知道真正这个底是在哪里，有多少窟窿要填，这是让人们稳定信心的第一步。

然后，必须告诉人家我们怎么走过，怎么跨过这个深渊。而要跨过深渊，还要告诉人们，跨过深渊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第二步要能够从心理上做到什么呢？就是让人们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克服困难的信心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他知道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那么全球的精英们就需要告诉人们，为什么困难是可克服的。第二点，需要告诉人们，困难克服了以后，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主持人：要有希望。

陈平：就是你要指出来一个希望的明天。这也是叫做重新恢复信心的步骤，我们给它总结为叫三步曲。第一步，面对现实，做最坏的打算。第二，告诉人们，这困难怎么克服。第三步，指明未来的光明的前程。这三步走了，才会有先稳住阵脚，然后恢复。

主持人：信心。

陈平：希望，然后重建信心。 大家每天都在关注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现在正在开的亚欧峰会，对于我刚刚说的这个信心重建，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些会议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如果我说实话，这些会议连上述三步中的第一步，都还没走到。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认为？

陈平：为什么呢？第一，这场危机何时休？危及到什么程度，最坏的状态是什么？第二，这场危机的过后，我们社会重建成什么样子？都没有涉及到嘛。所以每一次说又大规模救市了，又什么利好消息出来了，我都跟人打赌股票最多涨两天，第三天一定又崩盘，我依据的就是我刚刚那个判断。当然，更深层次地判断，就是我一再说的，这次危机不是以往发生过很多次的那种经济危机。而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一个危机。所以在这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够直面这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直面这危机不同于以往危机的一些本质上的原因。世界是难以恢复信心的。

第 018 集 危机笼罩实体经济

主持人：就您的观察来看的话，这个危机的破坏性，它的深度会坏到一个什么样子？

陈平：金融层面的冲击还不能说已经差不多完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才刚刚开始，从技术层面，第四季度还有大量的对冲基金要平仓，那又有很多亏损要冒出来的。金融层面，一些非次贷的信用危机也要暴露出来。事实上包括房地产断供，已经暴露出来了。

主持人：您很早就提出来的，就是这一场危机必然从最早的金融衍生品领域开始往商业银行蔓延，可能还包括像信用卡的这样一些危机。

陈平：信用卡危机我觉得还没开始，信用卡危机仅仅是有一点点信号，在金融的层面，在贷款消费的层面，我指的主要是美国市场，包括欧洲。在负债消费，负债购买固定资产，或者固定资产贷了再贷，屡次借贷，就是这样一类的这个金融领域的危机，还会继续扩大和深化。

主持人：这个您描述的这个景象的出现，您估计会在什么时候，今年年底？

陈平：我认为今年年末不会结束，到明年上半年这一波差不多该结束了吧。

主持人：我听到一个数字，在美国和房地产相关的按揭总额，能够占到美国 GDP 的 70%左右，如果出现像断供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的话，那对美国经济真的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打击。

陈平：你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呀，它也是美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机会。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尤其投行的全军覆没，未必是坏事。世上也没有永远常青而不变的文明，也没有永恒的一个社会制度。我以美国硅谷为例，硅谷的最黄金时间应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这最黄金时期硅谷的房价并不高，那时候大量的硅谷人真是在安居乐业。所以我说，别以为房地产是好东西，房地产建起来让人们安居乐业，就是好东西，房地产成为像赌场里面的一个筹码的时候，这可就成了一个社会的毒瘤了，它会把人都赶走，人去楼空。

主持人：对，在这儿工作的人反而在这儿买不起房子，安居不能解决，乐业就更谈不上了。

陈平：对，所以我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尤其投行的全军覆没，未必是坏事，对美国也未必是坏事。美国人口也不少，移民还不断地增加，国土面积又那么大，过去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虚拟经济的幻觉当中，觉得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美国也可以像香港那样以金融中心为主要支柱，我想这是不现实的。金融泡沫的幻灭，对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实体经济的重新振兴，不是一个坏事。

主持人：那它从哪些地方可以带来好的转机，变化会在哪儿？

陈平：美国那些顶尖的大学，过去一段时间几乎不管学什么专业，出来的第一选择是投行。虚拟经济把最尖端人才全吸引进去了，实体经济必然是顶尖人才匮乏。所以说房价泡沫的破灭，以投行为代表的过度虚拟经济产业的全军覆没，对于坚实的实体经济，尤其是有技术含量的、有巨大创新的实体经济的复兴，是大有好处。

我们人类社会的精英们，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设计，应该是心中有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而这又要是通过一个合适的利益机制来加以保证。

以前的那个结构也不能说全是错误，这是一种文明发展由盛到衰时期的必然，去年美国大学，政客们就老拿中国说事。说中国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可美国这种经济产业结构和利益机制，生生就把自己的饭碗给毁掉了。到中国来买东西，到中国来投资生产，这也是你美国人趋利避害之选择。你能怪人家抢你的饭碗吗？所以这场危机，所以我再重申一次，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像没有常青树，世上也没有永远常青而不变的文明，也没有永恒的一个社会制度，也没有永远存在的一个政权，一切都在运动。

第 023 集“信心”在经济中的作用

主持人：一个调查了全球五十二个国家将近三万人，调查的结果是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在未来的十二月之内，进入经济衰退，这表明大家的信心是非常非常不足的，那么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救市措施之后，还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个救市措施有没有出问题？

陈平：目前为止的救市措施最主要的仍然是解决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也就是救银行，救金融机构，我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说，这些投放下去的流动性，都会像进入黑洞一样，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证实了这种判断。您刚才说了，调查了世界上面一共多少国家？

主持人：五十二个国家。

陈平：五十二个国家，人们都对未来缺乏信心，刚刚出台的对于消费信心指数的调查，也已经说是走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主持人：就是大家的消费意愿越来越低了。

陈平：我刚刚从这个信心来入手，消费者会捂紧口袋，尽量地少消费。那企业的投资者、企业所有者，或者是经营者，就会尽量地减少支出，压低成本。

主持人：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其实现在都在有一个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现金为王，把现金拿在手里，是最安全的。

陈平：全球到目前为止，已经投放出去的现金可能到两三万亿美金了，承诺的救市的钱，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十万亿美金了，要说这个数量已经是很恐怖了，所有的这些措施中，减息、减税和正在推出的给小企业的流动资金的贷款这样一些刺激经济的举措中，钱花得是很少的，大部分花出去救市的钱都是给了金融机构，实际上给这个钱的目的，我认为并不都是避免破产，也是想让金融机构把贷款放出去，刺激经济。这两天，美国的一些银行向政府做承诺会尽量地放贷款，但那仅仅是做承诺，当人们普遍地对未来预期不看好的时候，放再多的钱出去，效用都打折扣，风险还大，所以银行不大可能多贷款。

因此，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对于让经济重新活跃起来，让人们重新对未来充满信心，都做不到，或者说连隔靴搔痒的作用都没有起到，或许啊，对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还产生一个负面的作用。

主持人：什么作用呢？

陈平：我想任何一个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哪有这么多钱，拿这么多钱出来救市，这些钱从哪儿来的？这些钱还是负债来的，也就是说，政府多花出去这么多的钱，未来是要纳税人来还的。

主持人：目前这些所谓的精英看问题时候，可能比老百姓还要再近视，我就想问，是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还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

陈平：我认为是两种状态都有，这些精英们——不仅是中国，实际上包括美国和欧洲——长久地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在社会的基层生活和工作过，脱离了社会的普通的生活，长期生活在金融家的俱乐部当中或是金领的圈子当中，于是在他们一部分人的眼中，可能经济好不好就是指的股票好不好，形成这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

主持人：精英们在制订政策时候，他是代表谁？

陈平：从这个角度，你刚刚一个问题说得非常好，现在的救市是代表谁？是屁股坐在哪里？是坐在普罗大众的民生利益上面，还是坐在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投机者这一个势力阶层的利益上。也可能他们自身并没有觉得自己代表了金融资本，但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屁股指挥脑袋啊，就像现在人们对于鲍尔森的非议很大，说他雷曼不救，高盛就救，因为曾经那个当过高盛的高管，此外，他把不良资产买得来，让纳税人来为金融投机客们的失误来买单。所以，有人归结于鲍尔森是投行的利益代表，而美国共和党政府是保守的代表，代表了大财团，大资本的利益，这是一种评价。相反，英国现在是工党执政，工党信奉的社会

民主党的价值理念，所以工党的救市方案是采取了直接注资金融机构，成为金融机构的掌控者、大股东，原来的大股东们得股份就被摊薄，这样子用纳税人的钱还能够，道理上还能说得过去。

但是不管是鲍尔森的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的救市方案，还是欧洲这种社会民主党的救市方案，他们看重的都是股市、债市和资本市场。我觉得有点舍本求末。

主持人：那么您，舍本求末的话，那么您对这个本和末是怎么界定的呢？

陈平：这个本就是就业。就业保证了，觉得可以消费，可以越来越大胆地消费，这就是本。有了这么一个不断增长的消费的信心，有了这个本的发展繁荣，银行金融机构才有生意好做。

目前的救市，是救股市，救债市，救投机市场之市，而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实体经济层面的救市，除了减税计划，减息，没有看到更多的举措，只看到现金越放越多。

从美国提出来七千亿救市到现在也快一个月了，这么一段时间以来，不得不让我自己偶尔会产生一些推论，一些连自己都不太愿意去面对推论。每一个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人，都很讨厌阶级斗争，都很讨厌阶级分析，因为人为的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割裂了民族、割裂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最近几天来，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想，是不是现在这些政府真的成了金融政客，或者金融资本的。代言人的政府，否则，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是舍本求末？明知已经没有多少提振经济信心的作用，还要继续这么做下去？难道他们真的就这么样地缺乏常识吗？所以这两天我不得不在这些精英究竟是缺乏常识，还是因为他们是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这两个之间不断地想，到底是那个原因，或者是哪个原因的比例更大一些。

第 024 集 解决经济危机的“独门秘籍”

陈平： 面对这么样一个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出生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即使他代表的是金融资本、金融投机客们的利益，即使是为了救他们自己的阶层，也应该首先从实体经济，救民生角度着手。

中国过去经常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容为船和水的关系。

主持人：水能够载舟也能覆舟。

陈平：民生的消费就相等于是一条大河，以前这些金融机构用了很多金融杠杆，让这个大河水流湍急，上面的浪花、泡沫很多。所以它也漂浮得很快，很高。

主持人：这个比喻很好。

陈平：那么现在呢，这个民生大河的水位在下降，他还继续往这个船上注水，这就叫做

本末倒置，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即使是为了金融资本的一小撮人的利益，也应该首先救民生。首先让这个河水再涨起来，而救民生的根本之举，就是用一切方法促进就业，促进普罗大众的收入增长，而就业和增长又来源于一个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关于本末的问题，那么您要说的第二个是什么？

陈平：第二个，为什么现在拯救实体经济的措施，仅仅停留在减息，减税，或者是对于一些企业放宽贷款条件之类，而没看到其他措施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客观原因第一是减税、减息也要有一个可承受的一个度。以美国为例，再减就零利率了。减税也空间不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很大，所以现在美国的脑筋总是动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头上来，希望能多买他的国债，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现在企业也觉得前景不好，新生的需求没有产生，旧的需求市场在萎缩，新的需求市场又没有产生，即使要救实体经济，也是缺乏救的空间。

这就是推出了另外一个命题，就是怎么样来救实体经济，还是要在发展中救实体经济，通过创造发展，来救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唯一可选择的一条道路。一是需要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进行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通过投资来拉动需求，创造消费。

第二个，有些本应该由企业来投资发展的符合循环经济的产业和产品，但是因为现在发展前景并不明朗，政府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现在的救市，变成了政府在负债和透支。政府负债也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最终在未来要由纳税人来承担，如果纳税人在未来收入不增长，承担不了，最后就是通货膨胀，总是要有人买单。

因此，总是要透支的，但透支在什么方向？一个方向，通过透支完成了经济转型，实体经济重新发展，人们就业大幅度增加，收入开始增长，那么今天的透支可以通过未来的增长来买单。

主持人：对，这是个良性循环。

陈平：如果如果今天的透支方向错误的，或者说虽然是完全错误但没有能够促进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这个方向，那就是灾难的。

我认为，摆在我们全球人类面前的是两个关于未来的可能性，一个是我认为好的状态。首先是衰退，同时伴随着通胀，然后再走向增长，同时还伴随着通胀，最终是持续的高增长，同时是低通胀。我认为这个周期最短是十年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第二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情况，衰退，同时伴随着通胀，然后依旧是高通胀，同时伴随着衰退，最终走到高通胀，同时伴随着萧条。如果走到这一步，下面可能会出现怎样的结局，我就不愿描述，总之我们都不愿见到的，也是我们预料不到的。

主持人：我记得以前看《光荣与梦想》开篇的时候，他描述的 1930 年代的时候美国的

大萧条，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

陈平：我推论这两条路都离不开通胀。因为你这么多的透支总要消化，一个是良性消化，一个是恶性消化。

良性消化是实现了人类的增长的转型，或者我们更广地说，文明的转型。就是我一再所说过的，从工业文明的线性增长走向科学的循环经济的增长。如果能实现这个转型，已经和将要付出的十万亿美元，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如果不能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到最后还是通胀，那就是非常惨烈的一种局面。

主持人：实际上现在在救市的选择上已经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陈平： 我觉得不管这些精英们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代表着哪一个阶层的利益，不管你是具有对于人类的普遍的爱心，还是很自私，很贪婪，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人类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都要把救民生经济，放到重于救股市，救债市，救金融之上。而救民生经济，应该大力地发展可持续发展产业，把它看成比股票的涨跌要重要得多的课题，们必须立刻做出选择。

第 036 期 在拯救危机中创造转机

主持人：这一次对于中国来讲，有可能发生的机遇和转折，会在什么地方？

陈平：汉语的精妙之处，在危机两个字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前面一个字是危，后面是一个机，所以危和机是相伴相生，而且一般呢，都是先有危后有机。这也是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危那么就不思变，不思变的另一面就顾眼前，顾既得利益。

说到这一次先是金融危机，现在都承认经济结构衰退，是一场经济危机。这次危是由于过度地投机、超前地负债地消费和生产严重过剩，还有我一再强调的，这是线性发展模式的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如果资源、环境还能够支撑这种无休止的增长模式的延续，这场危机规模不至于这么大，影响不至于这么深，这场危机也就会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些危机一样，只需要进行社会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的一定调整就会过去。但这次格林斯潘就说是百年一遇甚至百年不遇呢的危机，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危机里面的问题太大了。

但我说这是一场幸运的危机。因为这个模式还没有走到彻底毁掉人类的这一步，还给了我们寻求新的增长模式或者说转弯的一个空间。这一次危机逼迫着今天的人类不得不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朝着可持续发展、可循环的经济去发展，具体而言，这个危机在这方面的一些好处，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

美国吧，美国过去连《京都议定书》都不参加签字。现在美国很多企业在迅速地去加大对于新能源的投资，甚至美国有人说新能源是走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些说法，原来只停留在人们嘴巴上的，原来是一些环保主义分子、绿党，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理想主义

在呼吁的。但现在被投资者、企业家高度重视了，也被社会多更人开始高度重视了。没有危就没有这个转变的。

我听说上个星期，沃尔玛召集了全球供应商明确地推出新原则，就是商品必须要符合环保，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刚刚推出来的四万亿救市的十大举措，也是把这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其中一条。

主持人：其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还是很大的，包括城镇污水治理，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等。

陈平：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财长鲍尔森从买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转变到了救实体经济，美国社会也有人呼吁美国政府要救三大汽车公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形成救三大汽车公司的共识。在舆论上面可以看到，有些人认为救三大汽车公司并不是根本的解决危机的方法，而且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目前的汽车产业终究是要完蛋的，无非现在牵扯到美国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所以又不那么容易放弃。

那么，为什么这三大汽车被人如此看衰呢，这是因为在廉价石油的情况下，美国式的消费或者说浪费已经成习惯了，所以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身上已经深深地烙上了线性发展的工业文明的那种模式，这个烙印是结合得非常紧的。我想每一个用车的人都知道，美国车的耗油量各方面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次如拯救他们，如果它们不能够转变成为新能源，或者节能型的交通工具的提供者，它早晚还是要死掉。那无非是给三百万人，多发几个月工资罢了。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表现出来的疑虑和不同的声音，这次危机让人们开始在产业逐步地建立起了明确的标准。就是这个产业或产品是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是不是节能的，是不是对环境起保护作用的。这种共识、这种舆论的一致性真是来之不易呀。而现在是很多是发自人们内心的了，不再是过去停留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了。

主持人：以前，可持续，绿色，节能什么的，往往都会认为是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但相比企业的创新和赢利是次要的责任，但是，现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先行的标准了，而不是说是社会责任这样次要的概念了。

陈平：对，你这个说得是非常好，非常准确，这就是因为这场危机，我们幸运地踏上了人类文明转型的这个机会。

当然，我并不是主张就是看笑话似的，让这三个企业破产去吧，那么怎么样在拯救经济过程当中，拯救汽车产业的过程当中，有方向性地拯救。用中国一句谚语，用吐故纳新方法去拯救，利用这场危机，把旧的利益格局给打掉，这就便于建立新的利益格局。所以，危机危机，危中大有机。这场危机是我们已有的工业文明由盛到衰，也是是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文明的新生的开始。

所以在各国政府救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不断地去呼吁在救市的同时，把握这次机会，把握这一次旧的利益格局被冲破的机会，而向新的经济形态、新的增长模式迈进，也就是扶植新的利益格局，朝这一个方向去从事救市和振兴经济的行为。

如果能充分地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应对经济危机的联手救市的机会当中，把握住或者是说充分地利用一切导向未来，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个机会。这样子我们这个代价付得有值了。未来几年，我们全人类都会付出艰辛的代价，这个艰辛代价如果还是重建了旧的增长模式和社会结构，那么这个代价就是白付了。如果这个代价我们付出了，建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文明形态，一个增长模式，那么我们就为我们人类的子孙万代，付出了我们很值得付的代价。

第 045 期 注资与投资的利与弊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各国政府的策略目前看是两个办法，第一注资，第二是投资，那么您觉得，这两个办法的有效性怎么样？

陈平：我觉得都是救急，不能长久这么下去，在短期无非是稳定人心，长期靠这个方法会酝酿成为更大的灾难。

实际上可以看见，尽管全球已经拿出来这么多钱了，但是实体经济还是不断地出来坏的数据、坏的消息。我一直说这次是工业文明的危机，也就是说，现在的生产过剩已经很难在现有的增长模式当中再去发掘出来新的消费空间来。而目前也没有技术革命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新世界，虽然目前给银行注资，也是应该做的，在我认为是应该救急和治本同时并举。治本也就是对现在的产业做细分，哪些产业确确实实过剩了？哪些产业应该升级换代？哪些产业应该扶持？还有哪些是人类应该发展的方向？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所以我觉得，目前全球应该把还能够调动的资源，绝大部分去投向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去。投向为了未来的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上去。

这次危机我说是总爆发，总爆发意味着你已经不可能在系统内进行修补了，必须走出系统外，就是走向新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经济，也就是循环经济。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环境能够进行再次地进入循环状态。

主持人：现在中国，重点还是要铁路、公路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它导致的依然是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再一次的大发展。

陈平：所以我说，对传统产业投资应该很慎重。而应该把还有的能够调动的资源投向未来，只有未来才能够救得了今天。在这一点，我认为应该说美国又走到了世界的前面了，从鲍尔森提出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到今天，七千亿美元使用的领域和方法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第一次应该说还是屁股指挥脑袋，用老方法来医治毛病，主要是由政府来背上这个不良资产；然后，转变成为由政府直接注资控制金融机构，来改造金融机构；到现在，已经转变成为第一是解决就业了。

我还是以通用汽车公司来举例，通用如果破产，要影响 250 万人的就业，但是美国现在这些决策者们，应该说他们不愧为是美国选举出来的精英，并没有为之所动，在国会参众两议院的讨论当中，没有立刻答复通用汽车的，包括克莱斯勒、福特的要求，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拿出自身改革的方案，包括让他们拿出方案阐述，怎么样从一个高耗能的产业，转变成为

节能的、环保的、清洁的，也就是面向未来的交通产业。

这已经是很明确的方向，要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做下去，就不救。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宁愿承受那么巨大的失业所带来的社会冲击，也不去徒劳地去救一些没有希望的、应该做出改变的产业。所以我说美国可能要走到前面去了。另外在美国的救市资金的使用上面，也越来越明确提出来，要投向新能源，也提出了新能源的目标，

现在看到欧美社会，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巨大的冲击，已经从刚开始的旧立场，向这个新的方向开始转型和前进。

注资，提供信用，是救急，是实现社会稳定，而投资和加大货币的投放，那是为了转型的发展。现在这个欧美社会已经开始走上这条轨道的起始点，对比之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着急，为什么很着急呢？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在危机的时候，经常是原来落后的、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获得了后发的优势。但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人们所说的金砖四国、还有亚洲的韩国、台湾，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反应滞后了。在九十年代末，美国表现为网络泡沫，中国那时候是紧缩，所以，当年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本建设，使中国走出了通缩，但不要忘了，中国走出通缩和美国从网络泡沫到跨过网络泡沫危机，又走向了金融衍生工具高度发达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兴起，这两者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美国的巨大需求市场，使中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找到了出口。

主持人：对，我们增加的产能，可以很快地就卖到美国去，然后挣回外汇回来。

陈平：所以当年是同步的，今天仍然同步，但是我们认识上滞后了，中国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尤其严重。在美国危机爆发之前，无非是我们的过剩产能的危机，是以毛利率越来越薄的状态体现出来的。实际上危机早就有，无非还没有显现得如此这么明显，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产能严重过剩，又赶上了出口受阻，而内需萎靡不振，在这个时候，我担心仅仅以大跃进式的投资，会闯大祸的。在这个时候，几万亿、几十万亿，都是更加推动已经是严重的过剩的产能再去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说，我对这，尤其对于这个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种认识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滞后，采取措施的还是在传统的这种救市的概念，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说，我们要应该是大声疾呼，应该迎头赶上，超越欧美已经迈出的这种增长模式转型的步伐。

对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种认识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滞后，采取措施还是传统的救市概念，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应该是大声疾呼，应该迎头赶上，超越欧美已经迈出的这种增长模式转型的步伐。

人类在这个星球，必须要转变自己的生存发展模式，当然，船到桥头自会直，不可能这一次危机总爆发，就把人类给毁了，之所以它要这么爆发，也是人类的这自调式的能力的体现，必须要穿新鞋，走新路，我们可以给它用现在约定俗成的一个定义叫绿色产业。走什么新路呢？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或者叫和谐经济的一条道路。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欧美社会已经在往这条路上走了，他们的救市方法在一步一步地变，变向走穿新鞋走新路了，而新兴国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要大声疾呼，中国应该快速地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穿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企业的新鞋，走上循环和谐经济的新路。而别去四万亿，十几万

亿那么不去进行道路上面的判断清楚，而是投到了已经过剩的产能的建设当中去。

第 050 集　再议美国救市三部曲

主持人：美国一开始买不良资产，后来转变成为向银行注资，那么再后来又提出来通过投资，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是什么因素来推动的呢？

陈平：我觉得是民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一个能够采纳民意的一个机制，在面对危机挑战的时候，就会逐步地找到正确道路。

主持人：如果我们把美国救市的几个步骤称作三部曲的话，那么在这当中，这个民意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呢？

陈平：第一步，为金融机构的失误买单，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那么这一点，你也可以说，鲍尔森出身于高盛，无形的价值取向的联系，让他可能是无意识地立刻做出这么一个决策。当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解读就是说，屁股指挥脑袋，他还是大资本的代表，所以如此决策。但为什么他会变呢？因为整个美国媒体做的民意调查中，高达 70%到 80%以上的人坚决反对这么干，于是参众两院的议员都不敢投赞成票。因为议员都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

接下来，七千亿的救助计划设定了一系列的条件，让购买不良资产变成了注资，对于金融机构是条件非常狠。既要债券又要股权，原来的管理层就卷铺盖滚蛋。这个刚刚做了一点，整个舆论又迅速地反应，说现在钱用得不好，这些金融机构把钱拿去发奖金，于是又有新要求，要求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放弃年薪，放弃奖金。

再接下来，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问题不仅仅出在金融机构，实体经济出也问题了。然后进一步认识到，像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鲁格曼所说，三大汽车公司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因为它们不符合可持续发展。于是到现在，美国对经济的刺激和救助计划，已经越来越走上了一条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政策取向。

主持人：对汽车工业的救助中，通过一些条件的设置，其实也是希望让这个救助方案能够变成面向未来的一个方案。

陈平：主要在两点，第一，怎么降低成本，第二，怎么能够发展新能源的交通工具，低耗能的交通工具。

主持人：也就是，如果转型面向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才是可持续的，这样的产业才有希望。

陈平： 只有发展出可持续产业，人类社会才会赢得又一个健康增长的时代。现在地球需要大修了，地球需要在保护状态下和人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可能是永不枯竭的巨大的需求。这个需求对于市场的拉动，才是真实的、可持续的。

主持人：那么美国能实现政策的自我纠错，靠的是什么？

陈平：我说靠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者的制度建设。还是以七千亿救市方案为例，从提出来到得到国会批准将近一个月时间，其中不断有民意的表达，再不断地修正，包括舆论的责备批评，也包括参众两院议员们的一些反对指责。到现在，汽车企业救助的最终的执行方案，还没有能够达成。所以我说，美国这一次救市政策的出台不断地向着越来越正确的方向去转变，这说明美国社会有它的制度优势，美式民主体制是有它的巨大的生命力的，这个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就是纠错能力和再生能力。我再说一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要不要学习，你都要清楚美国的这种活力、这种优势。它的其他的决定性优势如科技优势、经济优势、军事优势，都是它这种制度优势的派生物，美国有一种内在的强健。这个内在的强健正在一天天显露出来。

主持人：那么这也可能会使得美国恢复得更快一些。

陈平： 除非中国发生奇迹，除非我们在制度创新和自我革新上发生奇迹，否则，美国将是全球第一个走出危机的。而走出危机以后，美国扔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核心。

主持人：那么我们在政策制订或实施当中，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陈平：美国的巨大的制度优势，但是不是就是说，今天马上就把美国的政策制度完全搬到中国来呢？我可以明确说，搬过来也肯定是出问题。

我首先想强调的，我们必须要承认美国的制度优势。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学习，结合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优点。面对这场危机。

主持人：能够内生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陈平：我一再说了，这个深化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必须要做的。现在已经没有从容的时间了，已经很紧迫了。

因为美国它和我们相比，它的文化历史包袱要轻多了。所以它的制度改革要比我们容易，比较能够直接地一步就跨到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上去。相比之下，中国要难一些，因为我们还需要解决很多历史的包袱，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来了，把增长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要把保增长和转型结合起来，执政者也都看明白和说到了。无非是怎么能够实现，怎么能够尽少的受到既得利益的干扰，尽量少的被历史包袱所羁绊，尽量勇敢地以开放的心态，以政治开放的心态，引入对于权力的制约，完成我们的改革、转型、发展。

主持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有它的后发优势，那么这一次其实也应该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有一些创新和改革。

陈平：我们的转型既有经济层面的转型，也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上转型，也有更深层的文明形态的。所以我们相对美国而言，任重而道远。过去几个月还经常出现中国可能独善其

身的这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我想现在不会有了。现在我们应该有的是先世界而忧而忧，后世界之乐而乐的心态。

从文明转型上面，我们有后发优势，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型，它必然要触发到文明形态的转变。我们的后发优势在这上面；在制度层面，在经济结构层面，我们没有后发优势。除了文明转型的层面以外，其他优势都在美国。

从美国救市的提出，到救市政策的不断地修正，充分地体现了美国的这个制度优势。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的，但又不是盲目地照搬。同时的话，面对这场危机，我们会比美国遇到更加大的挑战，但我们也可能有更深层次的一种机会。

第 058 集 顺势而为而不是盲目救市

主持人：面对这次经济危机，到目前来讲，什么样的心态比较成熟理性？

陈平：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社会也是这样子，社会不可能永远处在繁荣增长的高潮状态，所以，我们对待这个经济危机来到时候，应有的这么一个心态，叫历史观。

从历史观，人类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但人类还是一天天的越来越繁荣昌盛，现在面对这场金融风暴，在寻求对策的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惊慌失措。对于未知的恐惧，表现出来却是虚张声势这样一种状态，这是目前一个蛮普遍的状态，我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历史的理性角度，来看待迎接这场挑战，然后你才会知道，我们将怎么样来应对这种不同的危机。

主持人：但是，可能这次危机的到来，我觉得有一个节点，比如对于中国来讲，其实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是经济快速发展，然后生活水平不断上扬的一个过程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么大的一场危机，美国在此之前若干年，也是一个狂欢盛筵。那么，没有经历过坏情况，会对人的心态产生一些什么影响？

陈平：我之所以刚刚提出来，历史的，理性的，平静的一种，一种状态来应对这个挑战，实际上我是有所指的，与其说是关注全球，不如说是关注中国，从 2008 年开始，是一片欢欣鼓舞，到奥运会，走到了我们历史的一个最高点。

主持人：对，民族的这种情绪的一个表达。

陈平：然后，8 月份雷曼破产以后，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是怎么一个态度？先是否认我们会有危机，然后是侥幸心理，希望我们的受冲击面是很小的，甚至还有人开始幻想中国可以当救世主了，可以趁此而缩短崛起的时间了。

主持人：对，我看到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是，本来到 2027 年中国有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 GDP 的全球的第一大国，那么美国这次要衰落了，那么中国可能会有更短的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

陈平：在众多的官方的和学界的和民间的各种舆论当中，最强烈，最明确的表达对于未来的担忧的是温家宝总理，你记得不记得温家宝说过，2008 年是一个异常困难的。

主持人：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

陈平：这是看到危机，勇于面对危机的一种心态。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不断地否认危机，或者是侥幸认为短期就可以渡过，这反而是最有害的。它不仅直接对社会很多民众产生误导的心理，使大家准备不足。而且的话，它会使一些公众人物丧失社会的公信力，一个社会缺乏公信力，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说，我们首先要有历史观，就是我们要清醒地认知，或者说承认，这个社会发展，总是这个有顺利，有不顺利。有高潮，有低潮，危机来了，这也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有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看待它，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好惊慌无措。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该怎么救市，而是呢，讲的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一种态度，就承认不承认，社会发展有高潮与低潮。承认它，那就是这个以平常之心对待它。不就是日子过得苦一些，积蓄拿出来花一些，甚至政府也约束约束自己的开支，政府也过起紧日子，这也能过去，同时这样子冷静了，反而会在危机状态下面，能够真正地把危机中的机会，给发掘出来。

主持人：中国也是老话叫塞翁夫马，其实福和祸是相生关系。

陈平：如果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后你再回过头来看，我相信得出的结论是一次福，是一次让人类认识到我们过去的这种生产方式要改变了，不改变是不行的，所以说它是福。一场祸换来我们未来上百年可能更长的一个福，但这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态度。

只有大家像承认月亮有圆有缺一样承认经济危机，也是我们生活中必然要经过的过程，这样子，上上下下，想的不是救市，而是顺势而为，顺着这个势，而为什么呢？为着把副作用减到相对最低，实现应该转轨的事情，应该调整的事情。所以我说，历史的理性的平静地对待经济危机，然后我们不是要天天喊着做着怎么样救市，我们应该怎么样顺势而为。

第 061 集　尊重规律 顺势而为

主持人：从 2008 年开始到现在也有一年的时间了，您觉得现在关于这经济危机的理解是不是准确？

陈平：我认为首先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和工业文明，或者我们说现代文明，两者是相伴相生的。更准确地来说，经济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

主持人：那为什么这么讲？

陈平：因为工业文明是和过去形态不一样的文明形态。在工业文明之前是循环经济，简单地说，基本上是靠天收，靠天吃。那时候的危机跟现在的危机不是一回事，主要是由于自

然原因，但那不能说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有特定的内涵，经济危机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同时又采用了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所带来的危机。

工业文明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仍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进行。只要不是发生战争，或者统治者掠夺过分，那还是有个自然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经济危机，只有天灾和人祸。只有进入了这个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具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向自然索取，来维持自己生存、发展、享乐、消费。工业文明让人们增强了力量，所以呢，人们往往是一方面不是完全按照朴素的一种自然的规律来行事。第二，工业文明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分工，形成了与分工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开始尝试追求非常有效的组织、分工、生产、消费的模式，这其一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失败了，计划经济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短缺。另一种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调节，由供需关系来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尽管谈不上失败，但也不能达到很理想的状态。也经常地出现过剩的现象，有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可能做得太多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过剩经过一段时间，会以一种比较剧烈的方式显现出来。

经济危机的出现都是在告诉当时的人，应该要调整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分工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量，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需求的变化并不会完全和及时地被生产部门捕足到，某些产品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并最终通过危机表现出来。

主持人：对，要到一个临界点，才能把问题表现出来。

陈平：如果我们这么样地来看待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危机是工业文明必然周期性出现的现象。

主持人：那么就不用特别惊恐地来看待这一次。

陈平：对，因为工业文明不是自然的循环经济，而是由人主导的分工经济，不断地需要调整。对不对，需要调整，就要有调整的信号，危机就是这样的信号。

主持人：现在想一想，在 2007 年的时候，还是集体的狂欢。那个时候，恐怕更难以保持理性、克制，和审慎。

陈平：2007 年如果多一点理性，也就清清楚楚看到危机来了。你想那时石油都涨价涨到什么程度？一百多美元。各种矿产品也几乎是翻着跟头往上涨。这还不是危机的信号吗？股票市盈率轻而易举都是几十倍，所以种种迹象，不是说 2008 年才有的。我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私下的场合，也经常说一点危机要来的话。当然那时候，也不敢大说，为什么不敢大说呢？

主持人：形势一片大好。

陈平：中国人嘛，百年奥运梦，那么一个全民情绪状态下面。

主持人：对，那时候是情绪激昂。

陈平：对，这时候，确确实实任何的悲观的论调，都是会不受欢迎的。但规律就是规律，

人类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经济危机是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周期性现象，一次一次的危机，也让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修正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包括法律法规，甚至包括人们的价值观。所以这点来讲，第一，危机是正常现象，应该以像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历史规律一样去尊重危机的周期性的规律。

主持人：那么，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态的话，救市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陈平：第一，我认为就不该说救市这两个字。救什么市啊？这个救到哪里去？如果危机的出现是正常的，那么你要硬是让它出现的东西，不让它表现出来，那么反而不正常。从历史角度来看，从尊重规律来说，救市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现在所谓的救市，都是说现在情况不好了，我们要救市，救到哪儿去呢？救到危机发生前的状态去。这从逻辑上都是荒谬的。历史不会倒退，就像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一样，今天的危机，一定是过去人们的行为，也可能是过去的繁荣所导致的。如果把救市的目标定义为回到危机发生前的人们认为美好的生活当中去，那这是很荒谬的，是不能成立的。

经济危机来临之后， 要分析清楚这次危机是怎样的危机：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是全面性的经济危机。

主持人：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陈平：一般性的经济危机是指某些产业生产过剩了，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是指某一个重要领域的结构比例失调了，比如亚洲金融风暴这样的危机，它既是金融性的，它又是结构性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则是普遍的或者是根本性的，像这次的经济危机。如果是全面的经济危机，那么，在原有的框架之内，你已经是难以解决它了，按照原有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社会组织形态、包括原有的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已经是解决不了了。

主持人：就是说这次的危机解决，需要跳出这个系统。

陈平：本次经济危机我已经说了好多次，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它已经不是一个能在工业文明范畴之内的解决的一个危机了。第二，我们救了半天，要想救到哪里去？不是救回到工业文明曾经的繁荣和舒适的社会生活当中去，而是要用新的文明，或者新的增长模式来替代它，工业文明是线性的增长模式，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模式，是依靠于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的消耗，所以是不可持续的。

从这些论述出发，我想说的，第一，这个今天的人类，应该坦然地面对这场危机，因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异己的洪水猛兽，如果把经济危机看成好像是一个异己的一个洪水猛兽，好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全球要来抵抗这个经济危机，可是，经济危机本身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产物，抵抗谁去？

这危机是我们的社会必然的一个产物，所以是把它看成异己的，还是看成非异己的，这是一个根本的心态。这会决定了我们人类会怎么做？所以，这儿说的一个简而言之的话，经济危机是工业文明的规律性的阶段性的发生的，会出现包括破产倒闭失业萧条等等一些令我们社会生活不舒服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是让我们抑制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调整一下

自己，或者这个病比较大了，就是告诉我们要做很多根本性的改变了。但不是异己的洪水猛兽，不必要惊慌无措。坦然对之，然后就是我主张的，不是救市，是顺应经济危机发生之内因，和它的规律，而顺势而为，理性面对。

第 074 集 救民才是救市之本

主持人：达沃斯论坛大家一贯是寄予厚望的，但是这一次，在达沃斯论坛过后，人们好像没有惊喜？

陈平：我想是这样子，这次达沃斯论坛呢对于这次危机的形成原因确实没有深刻的探讨。发言基本上还是围绕美国的次按危机，反思金融杠杆过分和华尔街的贪婪。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见到讨论这场危机的深层的原因。

到现在为止，全球在所谓的救市举措上面所花的力气，应该说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强度和相互协调性。可为什么在全球如此力度的救市行为下，仍然在经济层面不断地出现越来越坏的局面？这是为什么？这就不仅仅是现在普遍认为的金融危机了。其实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一个浅层次的原因，就是全球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就产能过剩，可连这么一个浅层的原因，这些精英们都很少有把它归于主要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其实可能他这样分析这次经济危机，重复的也是以往让他们成功的那些经验，而现在事实上环境已经变了。

陈平：可以这么说，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是在过去成功的经验当中形成的。因此，他们也还是在用过去成功的知识、经验来看待这场危机。 第一，几乎没有对于经济危机的原因的深刻的探讨，你连危机的原因都没有深刻地探讨，你怎么能够重建新秩序呢？重建什么新秩序？所以我说，如果大胆地加以评价，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伴随着这次经济危机一起将会逐步地淡出人类历史舞台。

主持人：其实本来大家对于达沃斯，真的是寄予厚望，但是结果成了一场争吵，指责。

陈平：目前为止，在救市上面，没有一个有效的举措。同时在达沃斯论坛上面，也无新的救市的建议。既说不清楚其原因，也指不出其办法，想不出其办法出来。

但总的来讲，这一系列现象，就预示着我们人类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分水岭。过去的路，过去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用过去的时代所形成的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无法去认识、解读和寻找解决这危机的办法。

主持人：奥巴马政府 7800 亿美元的救市方案终于出炉，效果究竟如何

陈平： 对于奥巴马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是否能够有很大的作用，或者说能够有所建树，我说第一，我不乐观，并且我说，我很不乐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把救市的金额又要增加八九千亿，再一个呢，汽车产业还是要救。房贷又得救，这些领域应该不应该救？应该救，就证明对于解决这个危机是有作用的，而不应该救呢，这无非是延缓这个危机。

这些金融机构本身是危机的元凶，华尔街贪婪地制造泡沫那么理所应当，这些机构本身不是要取缔，就是要改造。 救它，无非是把纳税人的钱，继续往这个社会的癌细胞里面去注入营养。第二点，救市的其他几个主要的方向，比如汽车产业，要把汽车产业救向何处去？不管是从道路的需求，对于资源的消耗，对于环境的污染，都已经预示着，这个产业尤其是以私人轿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不可持续发展。哪怕是在能源上面找到了很好的新的能源，对环境一点都不污染的新能源，这也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主持人：一般会理解，汽车是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此外造成大量污染，那么如果有了新能源，它不再污染的话，为什么汽车产业还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

陈平：地球有这么大的空间吗？越来越宽的高速公路，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城市高架路、地下快速路，然后再修越来越多的停车场，每一项的需求，都意味着需要更长距离的空间。让这个地球已经是难以应对了。以个人轿车为代表的这个汽车产业，它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它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新的需求的增长点。

救一个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前途的一个汽车产业，通过它来保住那些工人的饭碗，这是事倍功半呐。还不如把救的钱转变成为这个失业保障的费用，转变成为人们再学习的一个免费教育基金。

主持人：对，为将来的转岗，创造新的岗位。

陈平： 我说的是，该救人，而不该救那些明知其没前途的产业。救人于这个失业的状态当中，去帮助这些人的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帮助这些人走向新的就业岗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远远比救那些明知是要淘汰的产业，要好得多。或者明知现在就没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要好得多。救产业，救没有需求产业，只能说是愚蠢之举，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国民的不负责任。

第 090 集 制度转型化解工业文明危机

主持人：制度其实是价值观和文明形态的物化，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为，乃至会影响到文化，经济，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制度都包括什么？

陈平：制度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同时又是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互相关联，回过头去看，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当中，制度设计都是倾向于推动工业社会的发展，比如税收，哪一些产业重税，哪一些产业免税。

文化上也有哪一些是是被称赞的，颂扬的，我记得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可能到七十年代，在世界上基本上是到五十年代吧，那烟囱冒着黑烟还是被颂扬的。那时候很多油画、照片，会把黑黝黝的从煤矿里开出来的煤称之为黑金，带着那种金子般的审美。浓烟代表力量的象征，一种发达的象征。

可见，当时的文化和当时的制度都推动这个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信用卡和消费贷

款，进而把这些贷款再打包证券化，再经过杠杆把这些债务撬动更多的资金，来提供给人们作为购买力，这一切都是工业社会里面的文化和制度安排。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要改变了，当然这改变不是一切都改变，但是，已经知道有很多东西要改变了。比如，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上面，去遵循天人合一的科学观，对自然的保护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上面，必须要有制度层面的配合，而制度层面又带有强制性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个体都是充分地贪婪的，所以光是文化层面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制度层面。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我觉得应该快速地在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内，课以重税。

主持人：那么其实是通过一个税收制度，来保护自然，来实现这个人和自然的一个新关系的一个产生。

陈平：我举水资源为例，淡水资源在一些地区非常稀缺，一方面还在对淡水资源破坏性地使用，一方面海水淡化技术实际上已经成熟，但因为成本的问题不能推广。那么如果我们强制性地提高淡水使用的资源税。

主持人：就可能这个海水变淡水，它就不显得那么贵了。

陈平：人们可能说，这样子承受不了，我觉得，在人类的贪婪所形成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人类的更好持续和谐的生存发展这两者之间，一定是要有所取舍的。这个取舍，既有文化上的导向，也有制度上的硬性安排。

主持人：其实可能包括目前很多新能源，太阳能等等，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陈平：我觉得在制度设计上面，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体系。有些东西贵了，有些东西便宜，对吧，那么可再生的，我们通过这个免税，有些甚至是补贴，让它变得便宜了。要高度地重视制度设计，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面向转型的制度设计。

人们总说，让市场来决定价格，我告诉你，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完全做到让市场来决定。有的时候，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人并非随时随地都是理性的，相反，人绝大部分行为是感性的。政治精英们就代表了理性，代表了公共利益，所以，政治精英们代表了公共利益和理性作出制度设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

我们就是说，人们在贪婪和需求上面，实际上面，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是源于对于人性的认识和承认，而又高于人性一些本能的简单的理解，我们总要希望这个社会，不是仅仅是有钱了，就代表着强大，现在知道，不仅要有钱，还要有知识，有文化，又称为软实力。

主持人：对，还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道德意识。

陈平：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和制度设计是相辅相成的。制度有的时候是强迫人必须要怎么做。所以面对现在这场经济危机，我觉得与其救市，不如更多的梳理了我们未来要什么，怎么样才能走出危机，而把重点放在新制度的设计上面。

主持人：通过制度来引导人们，往这个新的文明，新的经济上走。

陈平：包括我们反对把人生的目标仅仅建立在物质的享乐上面，那么，人们对于精神的追求，在制度设计上面，他就应该是获得好处。

主持人：对，有一个褒奖。

陈平：这样子才会形成一种社会的风尚，以奢华生活来获取他人的赞扬、羡慕，这是一种一种对社会并不怎么有利的生活方式。而通过为社会做贡献来获得人们的赞赏，这是一个更加有益的生活方式。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作为未来方向的实施者，要把制度设计作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我这里强调就是，制度设计在经济危机当中的作用和走向新经济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还是我一再呼吁的，不要救市，而要顺势而为。这顺势而为，就包含了这个文化观念上的梳理和创新，制度设计的安排。由此而实现需求上的推陈出新。然后也就自然实现了产业和经济层面上的推陈出新，也就进入了新经济，新文化的状态，只有在扬弃中，寻求新的道路，现在我不断地强调扬弃，不断地强调不要救市，因为整个世界，我看都在想回到繁荣的过去，想回到今天危机这个恶果的原因当中去。

主持人：回到因，肯定还要再回到果。一个恶性循环嘛。

陈平：那么在刚刚我们谈到了，要高度地重视制度设计，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面向转型的制度设计，在面对经济危机和身处经济危机当中的政府的作用。

第 3 辑：中国与全球金融风暴

第 002 集：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危机的不断蔓延

主持人：您觉得目前如果说中国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话，可以做的有哪些？

陈平：改革开放三十年，也积累下来一些没有进行深化改革的，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能够推动的深层次的改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能够克服这一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带给中国的困境，或许可以让中国在这次全球衰退当中，通过自身的变革异军突起，实现一种跨越性的发展。

主持人：您认为，如果要应对目前中国的危机，应该要搞搞深层次的变革？要有一些制度性的变化？

陈平：为什么深层要搞变革？为应对全球衰退带来的出口减少，本能的反应是我们要扩大消费需求，要扩大内需，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投资政策来扩大内需。钱从哪里来？发钞票会形成通货膨胀，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出口持续大幅增长的过程，钱可以从国际市场上来，随着出口总量的增长放缓，以及由于国内成本的上升，出口产业利润很薄，或者是零利润，甚至为了维持生存，可能是负利润，这么一种状态下了，从哪儿来找增量，来进行扩大内需的投资呢？

通过这些年的积累，那么这些年积累到底有多少？我不相信有多大的节余，因为这些年政府的开支规模非常庞大，如今想到了要用家底来发展经济的时候，这个家底到底有多少？

主持人：但人们会经常讲到中国的外汇储备。

陈平：外汇储备也不管用，第一，部分外汇储备不能轻易动用，比如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国债，你能随便抛吗？

主持人：这会有连锁反应的，会是一件大事情。

陈平：第二，外汇储备购买了像房地美房利美等资产，你随便能抛得掉吗？

主持人：现在抛损失就不再是帐面的了，而是实打实的了。

陈平：第三，美元连续地贬值，人民币上升，这一万多亿已经贬掉了不少；第四，外汇储备不是国库的节余，这外汇储备是强行结汇所致。我对于一些学者们提出来这种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我觉得第一，投资能力有限，第二，作用有限。

主持人：也有人提出减税的办法，我觉得税肯定应该减的，连续这么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 GDP 增速，这本身就有点过分。

陈平：在这个时候呢，有点减税是应该的，不减企业死得更快，民间消费力更差。但

是我们又有多少减税空间呢？这个账谁算过吗？我已经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有多少政府盈余可以用做投资？第二，目前的财政体制，有多少的减税空间？

我认为这两方面——投资和减税——都不足以使中国减少衰退的痛苦，并且还能够让中国在全球衰退当中，一支独秀，向上发展，这两招不足以解决。

主持人：您如果支个招是什么？

陈平：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增量改革，存量大部分不去触动，而是增量改动，增量来自民间经济，首先放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然后是个体户，个体户然后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然后国有企业的承包，然后才是私营经营，然后是外企来投资，都是以前没有的。

存量不动，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存量这一块的效率一定是低的，中国每百元投资产出率是低的，能耗产出率也是低的，原材料消耗产出也是低的，之所以效率之低，都在于我们目前，还是依靠增量，存量不动的这么个模式。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存量是指什么呢？

陈平：存量就是原来一直被垄断的那部分。增量就是竞争性的行业，让非国有经济来做，说难听点就是难做的你们民间来做，好做的政府垄断来做。就像我说美国一样，富不过三代，存量这一块就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越来越没有效率，因为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出效率，才能出效益。

主持人：如果说我们要开始动这个存量，怎么来动？

陈平：哪些东西好做的呢，首先是像石油、有色金属这样一些资源性行业，包括像电信、铁路等等垄断行业，这里面有巨大的被低效率所掩盖的财富。这一部分释放出来，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量，把存量变成高效的增量是一个放大效应。 能够循环不断发展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业都成为完全市场化的，但是现在打着国计民生的战略之类口号，实际上是为了利益而垄断。中国电信也好，中石油也罢，肯定自称代表国家，代表全民利益的。

主持人：对，关系到石油安全问题。

陈平：但不能把国有和国计民生和战略完全等同了，应该让法律来规定哪些由国有的企业来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有企业的责任是什么，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着赚钱的责任，同时应更多承担着社会责任，以社会责任为第一前提。没有社会责任为第一出发点，国有企业独家来做的前提就都不存在了。可以说国有企业既提供商品，也提供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公共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石油，垄断可以，那么要给它规定，这么多利润不行。要保证不是把钱挣给自己，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尤其是还那么高的福利、那么高工资，更不行。

主持人：成为一个内部的利益集团。

陈平：第三，国有企业和政府和政权又是两回事。政府和国有企业什么关系，国有企业对谁负责？如果是对全民负责，怎么体现对全民负责？

存量的第二个，庞大的政府开支和事业单位开支必须要缩小。这个省就是要精简，机械式的精简也不行。过去三十年机械式精简，永远是越简越多。只有动体制改革之路。

第三，就是政府必须更多的摆脱政府的利益倾向。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包括很小的一个乡镇，县的政府，政府大楼盖的都比其他国家的大楼还漂亮，有必要吗？政府节衣缩食才能增加民间的收入，只有政府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才能够有这个让利的空间。

只有政府和国企的关系划清楚，让国企成为社会公共品提供者，那么国企才会尽到社会责任，而不是单纯以追逐利益为目标，才会从垄断的倾向转变为社会公共品的提供者的角色。这样才能设法把相当多的被垄断的低效率存量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两个字，公平，所有中国公民的机会的平等，机会的公正、公平。

主持人：平等是指，一开始大家是不是在一条起跑线上。

陈平：机会的平等就能导致我们最有效的、最节约的利用我们的资源。这是面对危机时中国当务之急需要做的，也是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做的，这一快既是我们目前的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能妥善克服，又是我们走出衰退，异军突起的一个机会，关键在于我们的体制改革。

主持人：一方面是一个挑战，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机遇。

主持人：那么这一次，一方面是一个挑战，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机遇。

陈平：我相信，会成为机遇的。因为中国也是一个这个实用主义的民族，实用主义的一个文明的特征。所以来说，当然这好过的时候，他肯定各方就多争利，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大家就想着我们怎么样这个妥协平衡，能够走出一个好过的路出来吧，所以我对这一点是表示乐观。比如中国或许能够在这一场全球性的衰退当中，获得异军突起的跳跃性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存量，存量这一块，我们有巨大的三十年改革，还没有触动，或者很少触动的这一部分的能量。

主持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一个活水了，怎么能把它引过来？

陈平：其实是死水，当然，这个死水可以通过改革变成活水，把这巨大的一潭死水，变成推动中国继续发展的一潭活水。当然，中国也不会在短暂期间之内，一改革就出现爆发，毕竟这个改革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动到根本了。

主持人：但是您还是乐观的。

陈平：我是短期不看好，长期看好，短期内，中国可能会比欧美更加痛苦，因为我们的效率比他们低，但是我们因为体制改革落后而没有触动的一个巨大的存量。

第 012 集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挑战

主持人：从您的观察，目前中国经济受到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平：这一场危机是全球性的，不应该简单地理解成是美国的。

中国股市从去年的最高点六千点，跌到现在像两千点，你说它是受美国的这个影响也可以，说它本身就该下跌，我觉得更准确。

主持人：您认为是对价值的一个重估。

陈平：我们不是几个月前还流动性过剩吗？流动性过剩，必然会在这投机领域会推波助澜。另外一方面，全球化的盛宴已经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所以中国的股市的大跌，可以说是受全球经济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自己的必然走势使然。

主持人：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先兆让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呢？

陈平：因为市场的衰退啊，出口市场的下滑我认为比较明显的发生大概是从 9 月份，到 11 月份我就感觉到比较明显了。所以，中国受这个危机的影响主要在实体经济方面，首先反映出来就是一些出口性的企业，而出口性的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在沿海的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吸纳了中国上亿的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如果这块下滑的太快，那么这个状态就非常的不好的。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针对这样的现象，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陈平：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我说了，我们应该有更加理性而开放的心态来应对这场危机，包括也应该帮助美国渡过它金融上的危机，推动美国经济的转型，以便让中国出口下滑的幅度小一点。另一方面呢，尽快地把内需的市场启动起来。而内需市场的启动，就需要中国政府要下决心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打破既得利益对于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尤其是一些打着这个关系到国计民生旗号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棘突的国有垄断行业，应该让全民都能够参与。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进行以机会平等为目标的一个改革。

主持人：从起点上可以公平。

陈平：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既得利益者本身不愿意放弃自己垄断的权力，垄断的利益，所以，中国必须得要开展我们称之为民主化的改革，民主化改革的目的是更加公平、机会上更加平等、财富分配上面更加公正。因为这样，才能够激活被垄断所限制的国民资源，让这些资源在平等的机会条件下面带来极大的收益和增长。

主持人：前不久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有一些新思路，农民的土地流转问题做出了一些新规定，这些是不是也属于您说的起点公平、分配上公正的方法？

陈平：土地承包第一变成永久性的，第二可以流的，我觉得它有几个作用，一是推动农业向规模化的方面发展，二是土地流动等于是让农民获得了一块资产性的收益。这种改革呢，是还利于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的的永包和流转，实现了还利于农民，它就会带动起一块新增的需求。

主持人：那就是启动内需的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陈平：再有一个呢，就是政府精简和压缩开支。

主持人：公共财政的使用。

陈平：对，公共财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行政费用降下来，包括各个地方政府大型楼堂馆所的建设，不仅要禁止，更应该重新问责。

再一个，是对国有企业的界定。第一，一般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应该和非国有企业处在完全平等的一个地位参与市场竞争。

主持人：不能因为它的所有权的属性，让它在市场上有特别的优势。

陈平：政府要真正地和国有企业分开来，执政党要真正的和国企分开来，包括所谓的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现在都是执政党的组织部任命国企的官员，那么，这些国企的官员怎么可能是市场的平等的竞争参与者呢？

事实上，执政党拥有这个包括任命权在内的诸多权力，看起来是好事，实际上是坏事。因为作为执政党而不是过去所说的革命党，总是希望自己永远执政下，总是希望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吧，所以你要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个团体的利益，而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不是嘴巴上的口号，而是要用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制度设计来加以保证的。

我认为启动中国内需，需要在公正这两个字上深化改革。你刚才问面对这场危机怎么办？有危机了，才会有危机感，有危机感，才会有改革的动机，尤其是深层次的改革，所以我说这场危机对于中国也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当中，我们的出路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清醒、理智、坚决地深化以公正为目标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不仅会使中国得以应对这场危机，还能够获得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同时，还要继续开放，开放深度也要加强，过去开放是跟世界接轨，吸收西方文明好的东西，未来的深化开放，要知道小我和世界这个大我的关系，有的时候，要开放到主动去帮助他人，。所以最后一句话，还是四个字，

改革开放。

第 015 集 房地产的公共属性决定其需要特殊的监管

主持人：现在大家的焦点还都是放在金融产品上，那么您现在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房地产市场，您为什么会对它有这样的关注呢？

陈平：我把一部分的重点放到房地产上面，因为次贷贷什么？是房地产的贷款，抵押贷款，那房地产的抵押贷款怎么会变成，演变成为这么一场巨大的危机呢？如果我们说金融，有监管不力，现在普遍指责美国政府，对于华尔街的金融监管不力，放任自流。难道对房地产就没有放任自流这个问题吗？对各行各业都应有监管，都不能放任自流，都是要对于资本的逐利行为有所监管。

主持人：那么这样具体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哪一些的逐利行为呢？

陈平：我这个话是有所指的，今天在中国媒体上面还经常能看见要救楼市的呼吁，还说得振振有辞。前几年中国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从今天来看利大于弊。中国早在前几年就出台了二套房购房限制，尽管是有一点点不合理，但是如果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时候是利大于弊的。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作为商品，大多数充分自由竞争的商品不是完全一样的属性。

第一，房地产的价值和价格并非完全由房子本身所蕴含的材料和劳动所决定，举个简单例子，同样的房子，在香港的港岛、九龙，价格却不一样，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劳动，价格都不一样。就像房地产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说房地产里面颠簸不破的一个一个真理，叫做区位、区位、还是区位。就是它所处的，位置是决定了它的价值。也就是说区位决定价值。

主持人：而不是劳动。

陈平：那么请问，这区位是这个地产商创造的吗？区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没有实业，哪儿有房地产的区位价值的建立，既然区位决定价值，那么怎么能够把它和其他充分自由竞争的商品等同而对待呢？两者本质上就是有区别的，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对待房地产本身，是不成立的。这是第一点。

既然建立不起来，这一次危机由房地产引发，我们在反思发展模式的同时，也要反思这次的害群之马也就是房地产行业，今后该怎么样实现对它监管，该用哪些区别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政策、法律来管理它？

我说了，所有的产业都要有监管。就像食品行业、电子电器行业要监管安全行。既然房地产价值由区位决定，区位又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一定的社区空间里面的人们共同来创造的。那么，对房地产从业者的监管，对房地产的财政、税收各方面的政策该怎么样，我觉得会是未来摆带人类社会面前一个题目。

主持人：今天中国的舆论中救楼市的呼声，为什么显得极其荒谬？

主持人：今天中国的舆论中救楼市的呼声，为什么显得极其荒谬？

陈平：我想房地产业的从业者们，大概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口头拥护者，权力经济的暗地拥护者，因为区位这个公共创造的价值最终落到某一个地产商手上，房地产商从中就可能获得了暴利。今天喊救市的人，可能就是其中一员，当有人指责他暴利的时候，他会用市场经济原则来作挡箭牌，现在亏钱了又要救市，拿房地产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来说事，这个有点不公平。

陈平：再说，房地产业在一定阶段确实会在国民经济中有较重的比例，但这是有阶段性的，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房地产产业的比例都比较低。因为房地产不可能无休止的大规模发展，终归会回到常规式的增长，那么，当房地产处在高速增长期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未来长期的状态。在城市超常规扩张的时候， 房地产确实对经济有拉动的作用，但城市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时候，还靠房地产拉动吗？

一个城市不可能永远都靠房地产发展，，建房子是为了人们居住、工作、消费和休闲，首先得要有足够的人口，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城市待下去，是因为他能在这个城市取得就业，也就是古话说的，安居乐业。所以房地产是为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经济局面服务的，这是这个行业属性。但是商人总是受逐利动机的驱使，如果没有合理的监控和制约，房地产就会从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经济局面的服务者，而走向经济发展的破坏者。

主持人：怎么破坏的呢？

陈平：商人总要把这房子卖得越贵越好，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在房地产商的面前，普通人处在劣势状态的。因为区位创造价值，你要在这个区位工作，你就倾向于在这个区位买房子或租房子，那么占有这个区位的房地产商，就有了一个强势的议价能力，这个选择是难以公平的。

主持人：定价主动权其实在开发商手里。

陈平：今天我看到一个对香港的评价说，香港的经济困境会比美国和中国更甚，他举了一条理由，香港现在基本上是除了金融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以外，也就还有商业服务业，其他就没有什么产业了。

主持人：整个香港其实让人感觉空心化。

陈平：没有实体经济。由于房价高昂，香港各种产业，包括玩具业、服装业、钟表业、珠宝业，统统都跑到了内地，但原来从事这些行业的人我看最少有四五百万人，也都迁到内地去了？所以说，房地产是一种生活要素，也是生产要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果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需要警惕，房地产作为一个要素，其价格的膨胀更应该警惕，甚至应该比农产品价格上涨要更加警惕。

主持人：它的破坏性会更大。

陈平：为什么？房地产的选择性更小。大米贵了，可以从其他地区或国家进口，房地产要贵了，除了走人就没有别的招。既然社会是要一个稳固和安居乐业的结构，那么，一个社会中下层的安居乐业，才是一个社会稳定良性发展的前提。中国的房地产应该像一些有良知的学者所的呼吁的一样，让价格理性地回归。

主持人：那您认为目前它的价格其实和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相匹配的。

陈平：和发展阶段不相匹配，和这些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不相匹配。

第 016 集 想救市，先听证

主持人：最近，经常可以听到关于房地产救市的呼声，那么，假定我们要救市，那么我们看救谁？

主持人：对。

主持人：那是救买房子的人，还是救开发商，还是救和开发商相关的有贷款的银行？

陈平：现在不知道说救市救谁？

主持人：楼市的救市现在也出台一些政策，一些地方政府给买房人发补贴，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些无息、低息的一些贷款。通过政府补贴来救市，尽管消费者拿到了这个红包，但真正受益的还是房地产开发商，因为他把商品销售出去了，而且是高于市场价卖出去了，这么救的话，救的其实是房地产商。红包给了消费者 利益给了开发商

陈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些救市的呼吁和提法，还不如一直被批判的资本主义美国的救市行为。美国的救市行为，可没有去照顾那些造成信贷危机的那些银行家，那些高管们。而是面向大众，为了社会的稳定。而上面这种救楼市有什么道理？任何一种利益的行为，我们总是问一声，得利者是谁？

主持人：目前的这个救市措施，您认为得利者是谁？

陈平：我认为现在的措施，得利者还是暴利的地产商。

主持人：而不是消费者。

陈平：建设部门能够不能够公布平均的楼面地价、平均的建设成本、然后这些年平均的销售价格，把这三个平均拿出来。暴利不暴利，晒晒价格单。

主持人：暴利到底是多大，就很清楚了。

陈平：救市既然是一个公共政策，那就应该全民听证，既然要听证，要尊重民意，那就

要把平均的楼面地价、平均的建设成本、平均的销售价格公布出来，平均利润也就自然出来了。那时再来看，是该救这些地产商，还是该救其他的实体经济？到底谁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更能繁荣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

如果说救房市可以救经济，那么可以把这本账算出来，以北京为例，救房市到底可以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可以拯救多少相关的产业？　房地产业又不是银行，大家存款在里面，不救就天下大乱了。此外，现在这种救法，房地产仍然是救不了。因为经济下滑，人们收入减少，现在的房价，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买得起吗？有一些传闻，说有可能降低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通过这个来激发人们的购买力等等来救市。但这个不是救市，这是减负。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主持人：它俩区别在哪儿？

陈平：这是利息那么高，给他们减去一些负担，叫减负。它不是救市。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应该要让它冷下，让它回归到一个正常状态。当然，这就需要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走出来。

可惜，相当多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步。当然这也可能跟我们的体制有关系，为官一任也就四五年，能够手头宽裕搞搞发展，自然最好。是朝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向发展，还是只顾眼前，可能就不会考虑那么多了。事实上还是根本一点：安居乐业。不管是在经济危机状态下面，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状态下面，安居乐业都是本，如果让房地产不断地价格上涨，涨到人去楼空，还谈什么安居乐业？

所以我说房地产是一个双刃之剑，对它的监管导恰当，它就是安居乐业的缔造者。对于它的监管失控，导向错误，那么就是人去楼空的一个制造者。

总的来讲，在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当中，房地产的价格在人们的生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了界限，弱势的群体敛基本生存都不能维持，就等于把大厦底下一步步地掏空。事实上，地产商如果这样短视，也是害自己。

主持人：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于房地产市场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继续探底，还是引导它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陈平：对于房地产价格来说，应该让它继续回归理性的价格。我们先对房地产本身下一个定义。那么第一，房地产它是一个特殊行业，与充分竞争的一般性商品不同的行业。

主持人：它还际上有一定的公共性含义。

陈平：因为决定它的价值和价格的是区位，而区位价值是共同创造的。第二点房地产建筑是生活的基本资料和生产的基本要素，不可能让它完全受居垄断地位的强势方的支配。所以从这个角度，理性地回归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不幸是它价格已经涨得这么高，已经被哄抬了这么高，大幸是它还没有走到美国次按危机那一步。

社会的根本政策，社会的救市之举，应该是朝着安居乐业的方向去坚定不移。这里面还

是要强调的一点，政府要从房地产的利益格局当中坚决地走出来。即使政府要寻求更宽松的，更多的财税收入，更多的财政支配能力，想远一点。依靠房地产也是短视之举，是断了未来的财路。，那么，它作为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的基本要素，又跟公共生活联系得太紧，带有一定的公共品的性质。任何的救市之举措，应该采取听取民意的方式。既然一个手机的话费要听取民意，要举办听证会，那么我建议，救楼市嚣得如此之响，那么请政府对于楼市该怎么救、该不该救举行听证会。

主持人：这个听证会的前提之一可能就是要把相应的房地产各个链条当中的成本、利润等等要有一个公示，大家再重新评估一下，这个价值是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我今天在这儿说，也是我一家之言。该不该救市，我看还是要各个地方政府举行听证会，但听证会一定要是公正的方式，公正的程序来进行这个救市听证。

第 021 集直面金融风暴

主持人：尽管现在亚洲在银行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但和整个欧美相比，风险还是小了很多。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差异呢？

陈平：与欧美相比，亚洲应该说不是风险小了很多，也不是真的有那么一堵防火墙，而是危机的表现形态和涉及的层面会不同。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可以说，主要国家谁也躲不过去。

主持人：那么欧美是什么形态，亚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陈平：欧美先爆发了金融危机，而在亚洲，金融层面的危机好像没有爆发，或者是感觉不强烈，这个和世界的分工是相关联的，本身美国华尔街它就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这块也当然在它那里感觉强烈，在它那里首先发生。所以我说，不是中国存在一个香格里拉，而是因为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它金融中心里面爆发，这是分工的原因。

主持人：那么这个分工是怎么形成的呢？

陈平：这个分工实际上是这一两百年的发展形成的。

那么第二点，亚洲没有感受到进入那个危机，也不尽然。中国的股票不是从去年六千多点跌到现在连两千点都不到了？我们的跌幅可是比美股跌得还多，按比例来说，哪一个冲击大？

是，我们没有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需要由国家注资来接管需要由国家来担保信用，可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要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国有化的，本身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信用就是国家信用。我很奇怪，怎么没有人点出这个事实。美国欧洲原来金融机构是私人的，也不靠国家信用来支持，我们本身就是国有化，所以这根本就不可比。

第三点，欧美尤其是美国，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当中，金融和服务业占的比重就比其他地区要高，亚洲无论中日韩台湾，还都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并不是说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场危机在时空上展开的过程，是先金融衍生品，然后是金融机构，然后再往实体经济上面传递。我们不是处在那么一个分工的位置上面，所以在第一阶段肯定是感觉不明显，但是，当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时候，亚洲的感觉也会强烈。现在日本也进入衰退了，中国现在沿海的加工业中，破产或者是隐性破产的也不在少数了。

另一方面呢，之所以形成这种分工状态，除了欧美通过数百年全球殖民的过程成为全球的主导者这个历史原因之外，，亚洲以实体经济为主，也有文化的原因。中国文化在亚洲文化里面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主体文化，这个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别说这些金融业和金融衍生品，在一百多年前连工商都要排斥，务农为本，其他都是不务正业，这一百多年当中开始重视工商，也还是工为本，商次之，更别说那种和赌博几乎差不多的金融衍生品、对冲基金等等了，这么一个文化占主体的亚洲地区，在世界性的分工当中，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实体经济占为主。

主持人：还是相信眼见为实的东西。

陈平：既然实体经济比重大，那么金融层面发生的问题感觉就不强烈。所以，当冲击波没有冲击到实体经济的时候，人们好像还沾沾自喜，方法世界大乱，唯我安全。

主持人：风景这边独好。

陈平：这其实是对世界的分工和自身文化的特点没有一个充分的清醒的理智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我判断在未来也就是 2009 年开始，亚洲在这场危机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

主持人：在韩国，目前也出现了金融方面的一些不好的迹象。

陈平：因为韩国是外债负债型的发展模式，所以当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整个世界性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严重不足，欧美金融机构从境外抽回资金，韩国在金融层面感受到了冲击会比其他东亚国家大一些。但是针对亚洲的冲击，主要还是实体经济。

主持人：那您觉得实体经济的这个冲击，目前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陈平：目前刚刚擦着边，如果形容为海啸，目前只是海啸前面的浪花打到了。真正的大浪还没到来，人们可能认为我这话有点悲观，但这是一定会面对的现实。

主持人：那如果要到来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陈平：实体经济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内需和外需都会不足，实际上出口和内需这两者是相连的，我举一个简单的联系，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中国人吧。他们每个月领到的工资奖金也是外需吗？

主持人：当然是内需，用来消费的。

陈平：当他们出口市场受巨大影响，这些工人和管理者的收入受到影响，难道不是内需本身也在减少吗？这些企业用电，用煤，用水，用地，是内需还是外需？

主持人：当然也是内需。

陈平：所以光看到出口市场的下滑，而认为我们还有庞大的内需，这是一个片面的看法，不是一个系统的认识。内需和出口它是一个系统，两者之间是有着关联性的，尤其在目前中国的状态下面，出口好，内需也会相对好一些，出口差，内需就会差一些。

主持人：我看到测算讲，目前在中国的东部像纺织行业里面，现在已经将近有两千万人下岗。

陈平：所以我觉得在欧美实体经济遭受的冲击，也可能比我们还会小。因为本身实体经济在其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就没有像亚洲尤其中国这么高。在实体经济中就业的人数比例也没有这么高。另外，他们的资源也比我们要丰富得多。而我们很多基本需求的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原材料都要靠进口。我们没有美国的世界央行的地位，可以发货币就买来了，还得靠出口赚取外汇才能买得来。所以我说，面对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亚洲尤其是中国，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应该是做好抵御非常坏的环境的心理准备，有了心理准备，有了认识上的清醒，才能够在工作、生活和政策策略制定当中，准备着更加地扎实。

主持人：目前大家在做分析的时候，是一个二分法，先说出口受阻是什么情况，然后寄希望于拉动内需，但是就像刚才您前面也分析到的，出口进一步大幅萎缩，其实也会导致内需受影响，我想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很多外贸企业在出口受阻之后，都开始想做内销，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产能过剩，我们的内需又没有起来，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怎样的情景？

陈平：我们会碰到更多的失业。可能内需不但提不起来还萎缩，就算想靠投资靠公共建设来拉动，我们还是需要很多外汇。比如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了在铁路建设上投资两万亿人民币，那这两万亿的铁路建设投资里面要有多少钱是花得要进口的材料、设备、技术上面去？而这个进口，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出口的规模，来能够保持这个平衡。

我这么说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面对现实，第一要系统地看问题，内需外需，出口导向和内需导向，都不是绝对的，不是泾渭分明可以分得开的。，第二，我们必须要在国际收支上面，要能够继续地能够收支平衡，或者说是有所增长，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内需能够有效地拉得起来。

第 022 集　危机前的经济决策

主持人：随着这场危机日益地演变，我们的经济政策有哪些可以进一步地改进的地方？

陈平：第一我觉得政府已经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其中有些则是在纠错。比如几个月前还在谈什么腾龙换鸟，沿海有那么一点优势的加工业或者做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想着让他们

离开。过去几年是形势不错，但也要看到，大量的企业已经处在微利状态了。在微利状态下面，应该保护它们，而不应该做一些雪上加霜的事情，。更不应该想着把它们赶走。

企业情况稍好一点，政府好像迫不及待似的把出口退税率给降低，现在看到情况不妙，又了升上去，这么短的时间来回折腾，政策制定者怎么自圆其说？当然，现在调上去是对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回答当初为什么那么快地调下来。在过去一年当中，政府做了多少打击出口的事情？做了多少加重出口企业负担的事情？包括增税的方式，也是先增后退，所有的做法都是加重负担；还有超越了中国发展阶段的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征求了企业的意见吗？中国企业有发言权吗？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没有人来说明这究竟是在保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在破坏工人的利益？

所以我一再说，中国要面对这次危机，最大一件事情是深化体制改革。最起码，做出错误决策，官员们应该被问责，不反思不问责，今后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过去两三年当中，中国这些出口加工企业已经是非常微利了，平均的毛利也就 4%左右，你去折腾它们干啥呢？

主持人：目前应该有一些扶持的办法，能够让企业正常地发展和盈利，保证企业更好地发展。

陈平：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尊重非国有企业。官民平等，任何国家的事、民族的事，在官民平等的基础上面，共同探索之，决策之。

主持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经济危机导致倒闭的企业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几乎都是私有企业，那么这会不会对私有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一个断层?

陈平：倒不会断层，中国人最具有韧性的，像割韭菜一样，中国人无论给割了多少趟，割了以后还要顽强地再长起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那些倒闭情况比较严重地区的官员们表示自己也有责任，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是父母官文化、老爷文化。这个老爷文化不改掉，我们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是很弱的。应对这么一场全球性的深重危机，应该全民总动员，可老爷文化妨碍了全民一致和一心。

主持人：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有积极财政政策，另外我们加入 WTO，分享了 WTO 的红利。但是现在很难再发现新的在外面的一个突破口，只能向内寻找自己的解决方向。

陈平：中国在上个世纪末经济也不太好，但是世界经济很旺盛，尽管旺盛里有泡沫，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国际市场，国际环境的帮助。但是今天国际环境也在危机当中，今天中国应对危机，将主要转向内部，靠练内功，这就对我们的体制，对我们的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能指望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就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很多官员，今天出台一个文件，明天出台一个文件，能起多大作用？我们的官员都是从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然后当官，某种程度上是脱离社会的，尤其脱离生产经营实践。所以我们的体制和我们的官吏队伍更加需要听取民意，更加需要与各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士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然后形成一个个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

主持人：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制度性的办法，来实现您刚才说这种交流？

陈平：那就是改革，而且非常明确地说，就是民主化的改革。

主持人：什么样的民主化。

陈平：这个民主化就是首先要民意畅通，这个畅通，单纯地靠什么信访制度是不行的。首先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的自由。媒体一定要能够相对自由，当然来讲，我赞成媒体应该是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光挑错，。新闻自由是保障民意畅通、保障各个不同阶层，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充分沟通的、保证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比方我就说《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它本身是很根本性的一个法律，应该在在程序上面，在吸收意见的广泛性上面，都能够充分表达各个阶层的意见，可现在是，谁都不待见这个法律。

主持人：工人们难道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法律？

陈平：我前两天到深圳，国庆期间，在深圳给我们做配套加工的企业，他有订单他也不做。为什么不做了，休假期间加班工资是平时的三倍。

主持人：他算一下，我这个利润根本就不够多出来那两倍的工资的数额。

陈平：对呀，这些工人都是远道在这地方来打工的，结果一个大假期就住在工厂里面，工人想加班，但老板不干，因为有《劳动合同法》，三倍工资付下去，是亏的。就像今年圣诞节，西方受欧美受金融危机冲击，订单是大减。但即使有一些订单，有的企业最后也不做，宁肯关门，因为圣诞订单是阶段性的，过去，很多企业在淡季的时候给工人放假，旺季的时候全部都是加班，尤其是圣诞前两三个月，都一直加班，那么现在他为什么不能加班了？因为加班是两倍，三倍的工资，无法消化这个成本，最后谁都不得好，工人收入减少了，企业混不下去了，政府财政也减少了，我们的出口额还减少了。

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劳动合同法》，产生了这么多弊端，我看从媒体到官员全部失语，没有一个吭声。现在圣诞的订单，很多都处这个状态，企业不接，他不是不想做，他做不了。

主持人：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目前我们出口受阻、萎缩的情况下的雪上加霜。

陈平：所以我说，我们的体制再不深化改革不得了。各个部委还是用老的一套父母官的方式，老爷式的作风，发号施令，随意地一些推出政令，这是不行的啊。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加入了全球化，我们的社会也已经是很多元化了，还用一元化的农业文明的官僚政治体系来管制，这是要出问题的。当国际经济好的时候，年年增长，叫一好遮百病，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大毛病，小毛病都出来了。

主持人：事实上这次危机，等于这样也是一个试金石，那就看一看，你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

陈平：前面两年，珠三角每一个城市都是在搞产业升级，一些地方的领导人说，我就是要他们待不下去，当时说这些话的、做这些事的官员，今天如何面对父老乡亲？

所以说到头，就是一再说的，只有深化改革，去改那些过去不敢碰的，或者不愿碰的一些底线、红线，中国才能够在危机中发展，在危机中能进一步地保持我们的来之不易地三十年的好势头，维持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牺牲了那么多人，经过了那么多苦难，而换来的今天的局面。

主持人：那么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面对目前的这个危机挑战，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陈平：我们的调整，要加强系统性的认识，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出口和内需的关系。既保出口，也拉内需。而保出口和拉内需，要我们下决心进行深层次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除此以外，别无他路。

第 027 集 如何拉动需求让中国经济度过寒冬

主持人：您觉得目前中国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陈平：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刚刚感受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波。

主持人：为什么是刚刚呢？

陈平：因为在欧美，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刚刚开始，那么从欧美再传递到中国，它本身就会有一个时间的滞后，现在感受到的无非是我们的出口受的影响。

主持人：对，出口的增长开始下降。

陈平：实际上面，在出口受影响未来还会更大。

主持人：为什么呢？是因为像欧美他们这些本来的主要的进口国，消费会进一步减少？

陈平：欧美出现了有纪录以来最低的消费指数，我想圣诞节订单大幅度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中国的冲击会是第一波，接下来，欧美的失业率会上升，消费会继续下滑，所以我们的出口市场，也会继续下滑。

过去三十年，不断增长的出口额，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里面所占的比重的不断攀升，是改革成功的一个条件。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效率并不高，无论是资本的投入产出率、原材料的投入产出率、能耗率，还有人均 GDP 的数量，都远远到不了与总量相符的排位。我们的效率的提高，和我们的国民（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包括外汇储备的提高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过去我们只看到了渐进式的改革的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渐进式的改革所依赖的条件是持续增长的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持续进行的国际产业的转移过程，也伴随着国际资本的投入。

主持人：这个需求现在看来是在逐步地萎缩，出口现在有人预计明年的增幅可能会在10%以下，甚至会更低，那怎么办？

陈平：刚刚说了，我们的国民经济结构当中，实体经济比重大，而实体经济当中，外向型经济比重又大。而冲击来自于国际市场，所以，经济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我认为会比危机的发生地美国要大得多，这个话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听，很多人更不愿意发生这种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很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内需市场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够这么红火这么长时间，也是和国际经济密不可分的。就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吧，房地产市场火在哪里呢？都是和国际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地区和城市，什么城市联系得越紧密，什么城市就会房地产越火。

第二呢，地方财政这么多年对于土地财政严重依赖，之所以能够严重依赖，也是得益于出口市场的高速增长。因为出口市场高速增长，把大量土地上的农民都吸引到了沿海。这样子，才会腾出来那么多土地可以被政府以征地的方式转变了用途，变成了城市的工业、商业、住宅、娱乐用地。而走出去打工的人又把打工赚的钱，相当多的汇回他们的家乡，构成了当地的内需。所以我说，不能简单地以出口占 GDP 的 30%几来看待，实际上 30 年的发展都是围绕着统计的这 30%多在进行。

主持人：出口对中国的经济作用是非常大的，中国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对出口退税又做了调整，范围扩大了，退税的额度又高了，那您觉得这个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陈平：我觉得退税发挥作用不大。因为西方的消费市场总量在缩小，尽管退税增加了一些，但是订单少了，指望一个退税的增加，就能挽救我们的出口市场，这是不现实的。

主持人：除了您刚才说的，出口对于中国的增长非常重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房地产市场，前不久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措施。那么您怎么看？

陈平：从房地产价格来讲，再降个 20%—30%仍然不会旺起来。因为人们对收入的预期在降低，本身房地产价格就够高的了，怎么会旺起来呢？第二点，现在的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是满足住房的基本需求，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投资品？前几年许多房子卖出去却没人住的，为什么？所以这么一种形态下面，还要发展房地产来靠拉动经济，那么基本需求在哪里，你怎么才能让这个需求能够实现？除了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能够启动刚性需求市场以外，还有什么更高的招？

我看现在一些舆论上面为铁路两万亿投资而振奋欢呼，认为这个可以拉动很大需求，我从事研究的人，或者政府做决策部门的人应该把账算一算，两万亿到底可以提供多少就业，两万亿投资下去以后，形成的铁路的运力又能够提高多少产出？我觉得，把它作为来挽救中国经济的法宝，可能靠不住。

主持人：在消费方面，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讨论，那么您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正面的促进？

陈平：会有促进，但是我觉得，进行得有点晚了，时机有点不太好，一些利民的，而且面很广泛的福利措施，一般来说，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面进行是比较恰当的，因为那时财政收入比较充裕。在目前状态下面，中国出口在萎缩，经济在下滑，也就意味着税收在减少，同时又要通过减少税赋来刺激经济发展，所以这种靠税收以提高全民福利的医疗体制改革，它的空间很小。

主持人：我觉得大幅度地压缩公共开支，应该成为中国政府的首选措施之一。

陈平：我们大家都知道，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是美国经济非常好的一个时期，而克林顿上台时美国正债台高筑，克林顿上台以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削减公共开支，当时好像我记得削了大概将近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只看到中国领导人那些讲话中提到，要压缩行政开支，我觉得现在该拿出一个比例了，拿出一个刚性的比例出来了。比如说压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要有数量概念。

主持人：其实像前面节目您讲到的，很多时候这个时效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抓住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解决合适的问题。

陈平：所以说到这里还是一点，深化体制改革，只有还权于民，才能够还利于民，还机会于民，还资源于民。然后才能够救我们中国经济之市，，把更多的创造财富的机会和权利还给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自然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内需，自然会使中国经济在广大的地区都发展起来，我们多年解决不了的发展的巨大的差距，包括贫富的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东部和西部的差距，在这种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还机会于民，还资源于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得到解决。

第 028 集 徒劳的救市

主持人：最近我注意到，救市的迫切性被人们强调得越来越多，也开始见到一些行动，那么您觉得目前紧迫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陈平：现在所说的救市，我觉得主要是救两方面，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楼市，就房地产。

市场出现问题了，才会有救市的呼声。救市的呼声，主要是地产商喊得最大。我在想。市场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从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讲，是去年我们开始对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和利息加重之后，开始导致房屋销售变得萧条，那您觉得真正的因果关系是什么？

陈平：对于二套房购买的一些限制，以及对于贷款的种种条件上的规定，确实会对房地产的销售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它的影响绝没有目前被夸大的那么大一个程度。

不管什么领域，只要有利可图，即使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反的政策，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

作用。政府实行这种调控措施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从 2006 年、更早从 2005 年就开始对房地产的调控，那么产生多大作用呢？在从 2005 年到 2008 年下半年这个期间，房地产的价格还直线上升，而且销售量仅仅到 2008 年才开始下降，在 2008 年之前，一直在调控，销售不仅是没有下降，还在往上升。走到今天，销售直线下滑，价格也开始松动往下跌。我认为宏观调控不是主因，因为从 2005 年上半年就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能是导致这次房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陈平： 主要原因是经济走向了下滑，经济走向了衰退。2005 年之前，向中国的投资的外资的基金和投资机构，很少设立地产基金，中国内地更加是凤毛麟角。但从 2005 年开始，在中国政府和舆论一再呼吁要控制房地产价格飞涨、控制暴利，包括打击在房地产领域泛滥成灾的官商勾结的情况下，历来对中国政策变化非常敏感的外资并没有缩手缩脚，或者裹足不前，他们反而更加大胆，甚至不惜犯规地进军中国的房地产。在今天，决定人们市场选择行为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市场需求。只要市场一好起来，需求一好起来，人们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去突破政策的限制。只要有钱赚，这些政策都形同虚设，作用甚微。但是呢，即使是对于很多实业家来说，到 2007 年开始对于这个房价都开始发怵，不是买不起，而是理性上觉得不值。

主持人：已经脱离它那个实际的价值所在了。

陈平：而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薪阶层，已经是买不起了。房价被炒到了脱离实际可承受的水平的时候，虚高的房价，是构成房地产由盛而衰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因此，房价下跌第一原因是经济大势，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房地产过高的房价，被炒作出来的过高房价，而导致了这个行业由盛到衰，从 2007 年底到 2008 年上半年开始，很多外资的房地产基金已经开始有点缩手缩脚。以北京为例，如果北京在四环到五环之间的比较好的住宅房如新建的公寓住宅房，价格降到一万一平方米以内，也就是说七千到九千之间，你看看有没有市场？

主持人：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一万三左右。

陈平：我说这个数字，是要说明房地产的价格太高了，你别怪市场衰退啊。

主持人：如果说真的降到您说那个价格的话，意味着很多开发商以去年的成本是要亏的，而房地产的产业链条又很长，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也是大家要救市的原因。

陈平：中国房地产的成本飙升应该是 2007 年，我相信 2007 年之前拿的地，绝大部分都是能够做到以一个比较理性的价格销售。地王是 2007 年集中出现的，而那些地到目前大部分都还没盖呢。

主持人：那么如果真救市，能发挥多大作用？

陈平：救市仍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对于真正需要房子住的这个群体来说，这些宏观救市的举措作用是很有限的。消费者或者购房者，也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经济的衰退，也让他们不得不变得更为谨慎。在这么一个状态下面，救市是徒劳的。

主持人：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出来亲自救市了，包括政府买下目前的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那么您觉得政府如果亲自拿钱来买房子，能不能救得了。

陈平：第一我首先做结论，救不了。

我们首先看房屋的类型的构成，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过去地产商都没多大兴趣的。房地产大部分都是高价房，很多是公寓，别墅，写字楼，商业建筑。这些房子政府会拿钱出来买吗？再说，政府以什么价格购买？以目前的高房价去买你花的钱可是纳税人的钱，按照提供给一般的工薪阶层保障性的住房的价格去买，地产商会卖吗？

主持人：那么个地方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来这么做，他究竟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陈平：实现房地产重新火起来，因为地方政府在这几，长时间的一个，尤其是这十年当中，不知道，应该说七八年当中，深陷房地产产业当中，而难以自拔。

陈平：因为房地产已经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挂得太紧太紧了，尤其是目前实行这种任期制，几年一任。

主持人：对，他总是希望在自己任期内能够立竿见影。

陈平：那么什么东西才能让为官一任有所作为呢？只有土地。卖了地，招来商，银行又觉得有土地抵押可以放心贷款，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多赢局面了。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分配格局和中央和地方的税负利益格局下面，这种模式几乎成为过去这些年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唯一的可选方式了。这些年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的收入太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业的相互依赖程度太深，官商勾结也太多，这些东西招致了很多的批判，但是从另一方面，它也是客观的。

主持人：它的历史合理性。

陈平：我觉得舆论呢也不要一味地批判各个地方政府，批判土地财政占那么高的比例，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年土地财政收入的。

主持人：积极作用。

陈平：所以我说，历史地看待，理性地批判。所谓理性地批判，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制度的当中权力不受制约，它必然导致腐败。资本是逐利的本性，没有一个制度性的制约条件，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权钱交易，也是必然发生的。

第 029 集　　救市—发展的代价

陈平：对目前救房市之举措，首先，我觉得这些措施出台是应该的，因为减轻了消费者的一些负担。对于购房者的购房负担，我认为还应该继续减轻，现在房地产交易的税负还是过高了，应该继续降。第二，购房贷款的比例可以进一步地提高。第三，对于二手房，要注意，二手房是和二套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在金融政策上面，二手房应该和一手房完全一视同仁。你不能说，只鼓励卖新房、买新房，二手房也是有完整产权的，为什么要受到歧视，因此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政策。

那么对于这个二套房，我觉得应该恰当地进行一个限制。

主持人：为什么要限制呢？

陈平：因为二套房更多地用于投资，这里面所要限制的，是对于房子的一个过度的投资投机行为，避免因此抬高房价。为什么我说适度限制？这个度在哪里？这度在什么地方，二套房中，哪些属于改善，哪些属于是投机炒作，哪些属于正常投资的？什么叫正常投资，就是人们买了房子不是自己住，也不是去为了转手，而是用于投资，也就是租出去。因此，我说的适度限制其实就一项限制政策就可以了。比如说，对于买了再卖出去有个时间的规定，很短的时间就卖，政府收的税就高，这样就可以抑制这种投机，

相反，你租赁出去，那么政府收的税就应该低。因为我们社会要鼓动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动性，需要住房租赁市场，房屋的租赁市场应该受到社会的鼓励，租赁市场也不能只有政府的廉租房，也需要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来做这件事情。

主持人：目前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当中，是调控需求，抑制需求，在买的时候把门槛提高，你的方法是换了一个方向，在卖的时候，从卖这个环节上来提高门槛，减少投机行为。

陈平：买房本来救市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还是通过经济方法来调节。所以，对于二套房，三套房，都应该放开来允许购买，二手房，二套房都应该放开，这不是救市，这是还市场本来面目。 还市场的权力于供求双方，于买卖双方。

主持人：如果说房地产的价格不能够维持住一定的水平，真的降下去的话，那可能很多目前以不动产来作为抵押的这些资产，价值就会大幅下降，进而会大幅提升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个比率，那可能会是整个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所以也有房地产说，可能真的如果要地产深入调整的话，先死的不是地产公司，可能是银行。那么怎么办？

陈平：第一，先死的一定是地产公司，不会是银行。因为中国的银行还是政府控股，政府掌握的，死不了。第二，银行当初接受那么高的房价估值的抵押，就已经是种下了不良信贷的果实，房价跌下来，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你银行决定的。也不是政府决定的，既然自己种了因，就得自己来消化。

主持人：但如果这样，最后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呆坏账大幅增加怎么办？

陈平：这就是调整，这就是发展的代价。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地方政府需要迅速地改观城市面貌，迅速地改变基础设施，迅速地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银行也出于逐利和安全的考虑，都觉得这个房子有抵押是安全的，也大量地贷款，这样一个模式导致了中国长

达十年的房地产的繁荣，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得益彰。

发展是发展了，可世界上哪有发展不付出代价的？今天地方政府财政突然去了一大块来源，房地产商一下子变得资金链断裂，变得日子很难过，那么，银行又将会出现很多不良资产，这可以理解为，叫做发展的代价。

我们承认这个发展的代价有它的合理性，包括这个代价当中可能人们最不愿接受的腐败现象、利益输送现象，也包括房地产商的奢侈消费，这都是代价，这当中既有必然要付出的良性的代价，也有非良性的代价。

主持人：那么目前有可能引发的银行的比较高的呆坏账的比例，您觉得是属于哪一种代价？

陈平：我认为应该说还是一种良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房地产、银行如果那时候不加入到这么一个模式当中，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就形成不了。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利益的吸引，那么多私人资本包括外资就不会进来。
当然这里面也有恶性的，非良性的代价，就是腐败。腐败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和秩序。所以它是恶性的。

主持人：房地产本身是一个产业链特别长的一个行业，之所以积极地想法要救市，可能也是为了拯救以房地产为龙头的这一系列的产业链，那么您对这个怎么考虑？

陈平：在过去几十年来发展当中，房地产负载这么多功能也是必然的。在中国经济这么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房地产本身既是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的善生活、工作、投资环境的重要的一个领域。所以这点来讲，在过去这几年赋予它这些功能也没错。但是未来还是不是要赋予它这么多功能，房地产在国民经济当中比重较高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

惯性思维也是人类的特点，既然过去尝到了甜头，总想继续下去。所以我说，无论是作为政府还是企业，都应摆脱这种惯性与依赖，清醒地理智的判断和决策，是依赖于惯性、依赖于过去的经验，还是能够展望未来，这两者相比，也就分出来了水平高低、决策的英明与否。

今天，房地产整个产业链会受到比较沉重地打击，它不是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这个现象，而是市场的选择。你不得不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市场选择才是正确的一个选项，，强行违之，是不可能的。它该萎缩的时候还是萎缩的，有些东西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

政策所要引导的，是引导房地产更多地符合人们安居乐业的一个状态。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是让人们来安居乐业，来工作，来生活的，而不是来炒房的，所以作为政府，就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干涉房地产的这种炒作性的投机。包括一系列的欺行霸市的行为，因为它在危害人们基本的生活空间。

相反，目前对二手房、二套房这样一些限制，我觉得有点不合理。面对财政收入减少，你只能想其他招，我看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想其他招，这个招应该说是对的，就是开放地方政府的发债。 第二，怎么解决在发展中一些可以避免的现象，就我说的一些不良代价，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欺行霸市牟取暴利等等，这是因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就要主动地设计和创造对于权力的制约。

主持人：其实这也是长治久安嘛。

所以我们应该把改革放到比救市更重要的位置。救市是徒劳的，发展终归是由代价的，可能银行会出现不良资产，政府的土地财政会减少，房地产商会倒掉一批，这都是代价代价。因为我们权力没受制约，一批原来很优秀的官员成为贪官进了监狱，毁了自己毁了家庭，这都是代价，与其救市，不如为我们的未来，想到怎么样来减少代价的新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生活当中，主动地设计和创造一个对于权力的制约机制，这更重要。

，

第 030 集 救企业才是真正救股市

陈平：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股市还是全球最高的。按照市盈率，股票价格还是全球最高的。尤其到 2007 年，上证指数到了 6100，这已经太离谱了。今天看到股市到了 1700 点，你觉得要救它的市了，那最好你自己买回去，谁要救这个市，倒是自己来买啊。

主持人：对，救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产品买过来，自己定一个价格买过来。

陈平：股市所赖以存在和作为好坏的根本判断，是企业的盈利状况，企业的经济实体受到了冲击，股票价格你要怎么给它给救上去？如果给予实体经济更宽松的环境，对于实体经济给予一些更加合理的、宽容的放水养鱼的条件，股市自然会好。过了一个投机狂潮期以后，人们都趋于理性，人们都开始看到股票高低的根本决定性因素是企业状态的好坏。

主持人：证券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企业融资，以这样的股市指数和股票价位，企业很难再有一个融资的一个机会，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什么不救市，让市场好起来。

陈平：股票代表的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反映股票买卖价格的根本的东西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于股票的持有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一个权益就是分红。什么叫股票市盈率？市盈率就是股票价格等于多少倍的利润。可见，股票价格跟资产没有多少关系，一座矿山可以说净资产很大，可如果市场不好，它未必是一个良性资产。我经常把资产形容为老母鸡，如果我们养鸡的目的是为了下蛋，那么这个蛋能卖得出去，卖出去的价格比我喂鸡的成本要高，这个鸡就是良性资产，如果卖出去的鸡蛋价格低于喂养成本，或者干脆这个鸡不下蛋，那这个鸡就是负资产，就得宰了。所以我们评价一个资产，是从资本的角度，从生产流通环境的要素的角度，只有产生增值的才是良性资产，不产生增值的它就是一个负资产。

主持人：这个时候其实和所谓净资产的那个数字是没有关系的。但由于股价这么低，一些企业无法到市场上融到一个他认为恰当的资金，这是不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一个伤害？

陈平：股市投资者为什么要投资？为什么买股票？他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直接的收益是分红。此外就是股票上涨后出货盈利，但股票价格上涨也是因为这个企业是挣钱的，这个企业是好企业，如果企业也非常困难，资金紧张，它怎么有投资价值呢？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初创的可能有前景的企业，一时间还不能盈利，那应该让风险投资去投资，或者是银行

评估其前景和风险后，给它贷款，而不是跑到股市上来圈钱。

中国现在股市的管理体系下，除了创业版，发股票融资也要符合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几年的连续盈利，以及盈利不得低于多少，等等。因此，一个企业，当它处在盈利状态，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上市仅仅是融资的手段之一，是扩大再生产的手段之一。如果它真有盈利，银行也会愿意这些真正有前景的，符合发展方向的盈利的企业投放流动资金，即使没有抵押物，担保公司也会愿意给它提供担保的。

可见，股价低与企业融资难没有多大关系，根本还是在于实体经济的环境是否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和盈利。

主持人：但是如果不救市，那么我也注意到，现在江浙一带大量的企业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他们的资金怎么办？

陈平：这些企业能上市吗？股市再好，他们也没有资格上市，资金链都要断裂的企业，证明它入不敷出，那上市不是害人吗？，此外，救股市，除非政府拿纳税人钱来托市，来买。

主持人：现在有人提出了要建一个股市平准基金，政府在低位买进，然后等以后股市涨起来之后，政府再卖出获利，以此来救市。

陈平：如果能够低位买进获利，为普通纳税人挣了钱，这也是好的啊，但是这么做风险极大。我们已经看到多少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掏空、被假账掩盖，已经出了不少问题。那么你怎么能保证政府的平准资金就能以合理价格买入，并且在日后获得赢利？这么搞，还会向散户传达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信号，最终会使散户们损失更大。

主持人：对，散户有可能会因为相信政府的举措，信心被激发而入市，最后却可能被套住。

陈平：再说，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买亏了，自己承担亏损的代价。政府买亏了，谁来承担责任？

主持人：这是问责的问题。

陈平：所以还是一点，救市，先救企业。比如有些企业确实不错，因为形势的突然变化而出了问题，又或者是因为企业的一些投资操作失误而出了问题，导致企业现金流非常紧张，那么，对这样一些企业，当然可以采取采取破产保护的程序。当然，不是说原来老板的损失由政府，纳税人承担，既然破产保护，那就要企业重组，原来这个老板肯定是要承担损失的。但是企业保护下来了，，这叫做拯救企业。我觉得对今日的中国来讲，应该既要大力推行破产保护这么一个救企业的模式，更主要的是要为企业建立一些公平的，宽容的金融环境，包括减低税负，减少各个地方名目繁多的收费，也包括减少政府各个部门的随心所欲的政策变化和发布政令。

当然，如能做到这些，与其说是救企业，不如说是我们政府进行改革。我们说了，要建立法治国家，如果真正给企业一个法治的健全环境，我相信尽管面对现在的困境，相当多企

业会更有信心的去克服困难，发展下去。所以根本还是改革。出台关系到国民经济很重大的发展问题，就凭几个官员难保它的正确性，这些东西都应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立法程序，都应该纳入建设法治国家的轨道上去。我一再说，尽可能多地采取公开透明的听证，尽可能多地通过立法程序，另外，各个部门的政令频出、朝令夕改应该严令禁止，尤其是很多为了部门利益而采取的行为，要让企业面对一个透明的看得清楚的稳定的法治环境，早在 1980 年代，邓小平这些老人就一再强调，要给企业、社会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如今我们不要用政策环境这个词汇了，因为政策两个字是人治的代名词，它依赖于清官，好官和明君，现在应该说给中国企业、给中国老百姓一个透明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的政府应尽可能加快自身改革，与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它内涵什么呢？包括法律设立、修改的程序是清晰的，出台法律和讨论法律的过程，是尽可能公正的。这样子，人们对于法治环境的稳定性才会有一个预期，企业才不会两面作战，既要面对市场的挑战，又要应付变化多端的环境。让企业一面作战吧，让企业背靠一个坚实的，稳固的政府，法治环境来迎接市场的挑战。这样做得作用和意义，重要性远远要大于所谓的救市

第 034 集　4 万亿投资能够救经济吗？

主持人：政府通过加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一些举措，在前不久已经开始出台了。那么现在您觉得出台的时机合适不合适？

陈平：现在也就是说不得不出台，就是再不出台，或者再不采取一些下猛药的方式，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和困境。所以从这个认识角度，这个出台是非常合适的。

主持人：这些条款总共是有十条，包括像安居工程，还有针对农村、文教的事业、生态等的一些投入，那么这个措施的的有效性会如何？

陈平：这十条中，加快建设保障性的安居工程，应该是值得拥护的一个好事。加快农村基础建设，也非常及时，能够迅速地拉动内需。铁路、公路、机场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的国情下面，以政府来推动投资建设，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态环境，这些投资的方向，绝大部分我觉得都是很正确的。可以说是两方面吧，一个是公益、公共，一个是基本的民生，我首先说，这个救市举措，应该说比前一阶段美国鲍尔森的救市举措要高明多了。

主持人：就是购买不良资产，然后增加流动性。

陈平：尽管面对着在股市上投机的一些机构利益代言人的压力，面对着房地产商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舆论上的压力，但是从的这十条出台来看，中国政府这一届领导人清醒、理智，而且站在民生立场上，这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而实际上，你真的是要救市，你也只有站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角度上面，才能够救市。大众有钱消费了，放心消费了，才能够使市场重新恢复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坚决拥护，原来从舆论包括有些官员的说话来看，好像救市已经快成了救股市、救房市、救投机之市，

我当时很担心救市成了华尔街式的救市。当时我还准备想呼吁说我们要民生优先，而不是华尔街优先。但是这次国务院的出台四万亿的扩大内需的方案，以及它所说明的十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举措是完全正确。

主持人：那么在十项措施当中，它的具体执行当中，您有什么建议？

陈平：政府把财政的钱实行这种投资，还是减税？我觉得应该讲，减税的效果一般来说会比投资效果更好。

主持人：减税的话，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进而增加大家消费的能力。可一方面在加大投资，另一方面如果又减税的话，可能会对中央政府财力上形成很大的压力。

陈平：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比例关系了，因为减税比如说把所得税起征标准大幅度提高。那么老百姓的个人负担，工薪阶层的个人负担就减轻了，他会转化成一种消费。如果对企业的税负减轻了，企业在就更容易生存，也就会更多地创造一些就业，也就会提供社会更多的内需。今天国际市场份额减小的情况，减税也给这些出口型的企业多增加一些竞争力。一般来说，政府的投资效益，相对来总是低一些。

主持人：对，其实现在大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担忧，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或者突击建设等等。

陈平：如果不得不做的一些公共建设、公益建设，可以由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做。其他则尽可能的把财政政策倾向于减税方面去。当然减税也要有一个区别对待。尤其对于企业来说，肯定要扶植是有发展前途的这个企业。比如说，现在马上就面临就业问题，所以对于企业多雇佣人，采用企业多雇一个给一份补贴好呢，还是通过减税更好呢？

第二，我们肯定要鼓励一些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对这样一些产业，肯定减税幅度就大，或者干脆就免税了，甚至不仅不收税，还给予补贴。这种减免税负的刺激作用和效果会优于国家政府直接投资于这些产业。

何况这些直接投资还有负作用，这两天已经有报道，跑部进钱现象又已经迅速地变得非常红火。这就容易或者说必然会使腐败事件增多。所以我说，政府投资在救市总额当中，占的比例越小越好。用减税让利的方式，让利于民、减税于企业，引导企业朝着有利于社会增长，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去走，这个比直接投资要效用大得多，为什么一定要是由政府来花钱，内需市场本身是人民的事情。

所以这点来说，官员们需要改变习惯思维，改变凡事都要自己来干的习惯， 第一，救市也要效率优先，那么减税让利于民，通过产业政策和财政补贴、或者是税收政策进行产业引导，这么干的效率和效益要远远大于政府直接投资，也更加利于朝着廉政化、民主化和健康化的发展。

第二点，如果都是偏重于这种政府直接投资，自然又是国进民退。大型的建设多数一定又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一在这些领域它具有垄断的地位，第二，它拥有比非国有企业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更多的政策性资源。那么就会在客观上面，对非国有企业或者民营经济造

成更大的挤压，这样不仅拉动内需的效率和效益不高，同时还把社会的经济结构导向一个对于解决这场危机，以及对于未来的经济健康发展不利的方向上去。

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危机当中处在这么一个危急的状态，为什么它的抵抗能力会这么弱？一定程度上是前面这些年国进民退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亏待了民营经济的结果，如果在过去一些年里一直坚持了从 1980 年代开始的方针，凡是能够让民间做的，都让民间做，那么，今天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就会小得多，内需就会比现在大得多。

所以在这一次扩大内需的猛药中，怎么样让民营经济得救率更高、发展得更快。借这个时机，让一些产业和行业变成国退民进，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主持人：就是市场准入，对非国有企业能够进一步开放。

陈平：这就需要首先进一步对民营经济开放，第二个扶植政策向民营倾斜，最少是应该平等。当然最好向民营去倾斜一些，因为民营的效益是高的。

主持人：我也看到大家在估算四万亿到底是怎么构成，可能是中央政府直接往外掏一万亿左右，其他则是省市一级的配套，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社会资金。那么在这当中，如果能够让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包括非国有资金进来的话，可能会对这四万亿整体的效率和效益都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改观。

陈平：我觉得只要能够自觉地克服官本位，救市的一系列举措自然会寻求效率、效益更高的方向，也就是非国有的成份去。而现在以政府为主投资，一方面政府规模会更加庞大，效益也比较低，同时还会挤压民营经济。

主持人：实际上我也有一个担忧，通过政府来投资，来拉动经济，可能又会增加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作用，以前一直在提大社会小政府，那么这个政策的实施，可能也会对我们要创建服务型政府，创造一个小政府起到反向的一个作用。

陈平：对对，所以我认为，十大举措四万亿的这一个规模到底该怎么来作，通过收税，再由政府把钱投出去，这是四万亿。减免两万亿的税负，投资两万亿，也是四万亿。

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这十项的扩大内需的举措，我觉得确确实实完全站到了民生立场，但是站到民生立场，又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在方法上面也要尽可能地依靠民间，由政府或者由官员来主导的救市，尤其是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讲效率和效益都是低下的。这一点，我想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是怎么来的？当时一个经典的总结叫做人民战争。今天面对危机，怎么样能够继续走一条依靠人民来解决危机、走向繁荣的道路？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扶持对象应该是民间企业，让利的对象、减税的对象更主要的是人民。让人民和民间的企业，有钱来消费，有钱来投资，有信心来消费，有信心来投资，来发展、扩大生产，而不是通过税负的方式，从民间把财力收集到政府手上来，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

实际上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两条道路。而只有基于民生，发动民生，才能够利于民生，也是利于整个我们中华民族，也利于全人类。如果还是官本位的思维习惯，凡事都要伸手，都要自己来干，往往是事倍功半，还会衍生出来很多一些腐败，也会让机构更加变得庞大、臃肿。这其实是我们不愿见到的违背发展潮流，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

第 035 期　亡羊补牢——抓紧建立蓝领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

主持人：最近很多的企业被迫这样的关闭，或者是破产，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农民工失业，那么就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像长三角，还有珠三角，具体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陈平：实际上不仅是出口企业受到影响，很多面向内需的企业也受到影响，这次影响是比较全面的，不完全是出口的一些企业。我觉得目前这个严重性，还没有被社会普遍地认识到，这可以说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量地蓝领工人的失业的问题。报纸和网络上常见到说某些大型跨国公司或者金融机构又裁员多少，却不太关注生产型企业里面有多少蓝领工人失业。

主持人：一个劳动密集型加工的企业，可能动辄就是成千上万的数字。

陈平：它不仅是一个人员的绝对数量的关系，对于跨国公司等大公司的白领、技术人员，失业了问题可能并不大，第一，他们过去的报酬比较丰厚，失业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冲击是比较小的，同时，这些金领和白领都是社会比较精英的人士，也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寻找新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蓝领来说，失业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危机。因为中国的蓝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包括我本人在内，有很多批判新《劳动合同法》的声音，但是新《劳动合同法》也有它做很对的方面。中国的蓝领工人绝大部分不享受社保，，另外，他们进入了城市工作，身份还是农民。到目前为止，这种历史造成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城乡二元身份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依然被法律和行政所固定化。所以这次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会是蓝领工人群体，也就是农民工群体。

尽管从今年 7 月份开始，企业需要强制性地给他们交一种比较低标准的社会保险，，但这些农民工，很多失业了就另寻出路去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取失业救济金，怎么样去转自己的社会保险、转到哪儿去，事实上这些农民工处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的状态下面，处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公正、不平等的处境当中，他们一旦在危机当中失去工作，可能并没地方去领失业救济金。对比美国，其实美国实体经济也受到影响，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发达，很完善，失业无非是过的拮据一点，有失业救济金，还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而对中国的大量农民工来说，失业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觉得，目前社会对此的关注度不够，而这个群体也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主持人：您刚才讲，社会的危机其实表现为个人的危机，那么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讲，他们的个人危机是什么？

陈平：就一无所有的危机，如果我们现在不高度地重视他们的危机，，不高度对这个群

体地进行倾斜，那他们的个人危机就会形成社会危机，就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不仅仅是社会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社会是否稳定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除了官方组织外，没有其他的民间组织。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现在能够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他们自己也一盘散沙，组织不起来，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一盘散沙就无所谓，当经济状态好的时候，工作好找，这个群体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经济不好，这一盘散沙就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危机根源，事实上已经有浮出水面的一些迹象了。

主持人：您现在有没有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苗头？

陈平：就像现在不断有农民工因为工资问题，和工厂主，然后地方政府乃至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所以它已经不是企业倒闭这么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摆在我们眼前必须要迅速解决的社会问题。此外，重视这么一个问题，不仅能够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预防社会发生动乱，还可以为我们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同时也是体现公正、公平、和谐等基本的原则。有些事情，我觉得应该马上就做。

比如说，迅速完善对于中国蓝领工人的社会保障，在政府提出来的四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当中，是不是可以拿出相当一块来建立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金呢？失业的农民工领取了保障，不是也要消费吗？这不也是拉动内需吗？同时的话，有了基本的失业救济收入，他们生活也就有基本的保障，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第二，那么是不是好些企业出了问题，这些农民工只有回乡一条路呢？回家乡去也会给当地增加很重的负担，也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现在的和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失业蓄水池了，从那个蓄水池已经蓄不下去了。

因此，可不可以给暂时碰到困难、但还有发展前途的的这些个企业也提供一些支持，让这些民工先留下，同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自身的技能水平，为他们未来再就业创造条件。中国要实现城市化，本身就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这些人走出来这么多年，为了为了中国的发展默默地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么一个弱势群体或社会阶层，我们今天应该拿出相当一部分的财政收入来作为他们的社会保障，同时给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这也是在危机过后中国企业的升级所需，为中国企业的发展而培养更加合格、更加高素质的工人群体。

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人的竞争力，中国现在的蓝领工人大都是一些简单的操作工，缺少优秀的技工。在这么一个拯救经济的大举措当中，应该拿出来一块财力出来，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联手地来做一个既安定、保障民工，又为民工提供再学习技能的机会。只要企业有发展方向，当企业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下面，也应该帮助，帮助企业也就是帮助广大的民工。

主持人：这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利益考虑，还有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陈平：同时也是未来发展的考虑，未来发展需要让这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民工，变成熟练的技术工人，熟练的技术工人是未来中国再次起飞不可或缺的力量。相反，放任他们自流，会，会给社会的稳定埋下不好的种子，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局部动乱。从道义上面，我们也应该给予农民工坚实的社会保障，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农民在几十年城乡二元结构中牺牲奉献很多，到今天这一步，不应该再让他们牺牲下去了。在这个危机当中，应该让

已经走出来的农民工享受到城市人的基本待遇。应该要通过一些法律把这一点固定下来。

能不能做到让绝大多数农民工尽可能地不要走，尽可能地在这次危机当中尽管失去了工作，而不失去生活，尽管失去了工作，还能够有未来，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精英们和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应该应该积极去做的一项事情，也就是迅速地建立起中国农民工也就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尽可能的完成他们从农民身份向他们打工所在地准城市的工人身份的转换。并给予他们过去所缺乏的技能培训的一些资源。让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发展，在危机后起飞的一股强大的一个力量。

第 038 集 18 万亿谁来掏

主持人：按照我们的 GDP 来算的话，十八万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现在大家都是有点疑问，那么这个钱是从哪里来，是否能够保证可以有钱投得出去？

陈平：十八万亿的计划，现在仅仅是汇总了已经提出投资计划的各个地方政府的数字，或者说是投资畅想，我用了畅想两个字。因为很多人都在问，钱从哪里来？

主持人：那您是担心，很有可能钱未必就能供得上？

陈平：第一，这个钱可能来自于政府的直接投资，而政府的直接投资又从哪里来呢？一就是中央政府的国库里的盈余，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盈余。那么，有没有这个盈余？答案是否定的，没有。

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些年中国政府的大手大脚，支出规模也非常大。地方政府的办公楼、广场、形象工程之宏大，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其他包括人员开支，包括各种各样费用啊，已经花很大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支出也是连续的增加，把他们的收入的总额和收入的增加，和他们支出的总额和支出的增长这几个数字一算，就会知道，没有这么多节余的钱来用于投资。

节余不多。第二条就得靠发债，用举债来形成政府投资。

主持人：其实在 1997 年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发国债。

陈平：发债是两种方式，一是发国债，二是现在可能地方政府也发债券，举债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向金融机构借贷。

我觉得这次政府的投资当中，自有资金是很小的，占绝大多数的部分会采取公开发债和向银行借贷两种方式。第三条就是拉动、带动其他的投资者的投资。包括外资。就是这三块。，那么政府公开发国债，不可能发到上万亿的国债，因为有一个风险比例。18 万亿的计划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向银行、向金融机构举债这个来源上，而且又必然是通过政府直接的掌控的国有企业来作为投资主体，相对来讲，这样的效率、效益都是比较低的，也是风险很大的。

主持人：关于地方政府发债，您觉得它的可行性如何，它本身会存在的风险会在什么地方？

陈平：第一，能不能都发得出去，向谁发，向普通的公民发？向企业发？还是向金融机构发？能不能发的了这么多？即使是全部向金融机构发，现在中国的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是不是有这么多资金可贷？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不能完全完全相信报表上的数字。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状态下面，银行和企业之间一定是又会进入一个合作状态，我指的这种合作状态是什么？就是借新还旧，账户空转。这样转着，因此，现在咱们银行里面的钱到底有多少是机动的可贷的款，我觉得还是一个未知数。

就算有符合这个规模的可贷的款，是不是能贷，贷款条件是什么，也存在问题。毕竟金融机构也要强调一个风险控制，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几个主要银行。除了农行刚刚完成股份制的初步改造还没上市，其他都是上市企业了。尽管是国有控股，但毕竟它们不可能再像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那样作为政府用行政命令就能任意支取的金库了。

所以，这个十八万亿的资金来源到底有没有，我觉得还是未知数。第二，有没有必要这么大规模的进行政府主导的投资，这是第二个问题。

主持人：必要性的问题。

陈平：能够起到拉动内需，重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那么是有必要。现在社会舆论上普遍发出的一种质疑，担忧，就是这样大规模的进行政府主导的投资，第一低效，第二腐败，第三会重新加大本身应该改造的体制。会反而对于真正能够大量解决就业，真正能够提供大量税负，真正能够形成未来中国走向世界的产业主体的这样一些民营企业产生一个挤压的作用。

一边是低效，低效就意味着有相当多浪费，同时又是在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当中，权力的体系里面运行，那么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加上有绝对腐败，这些钱就成了绝对腐败的润滑剂。那么一边是这个钱还起了不好的作用，一边又挤压了健康的企业群体。

主持人：如果这么来算投入产出的话，可能未必是一个划算的一个举措？

陈平：最近看到温家宝总理的一些讲话，一再地强调要深化改革，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出台深化改革的具体举措。大家都在担心，继续这种以国有投资为主的方式，会导致低效，导致浪费，中央出台了绝不能建楼堂馆所的禁令，可我们几十年的禁止，禁而不绝，禁而越大，禁而越广，难道这一次就禁得了了吗？

主持人：尤其是当这个蛋糕是十八万亿这么大规模的时候，掉一点渣，那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陈平：为了今年底的一千亿投资，报道上说是派了 24 个监察组分赴各地，十八万亿分摊到一年得三万亿到五万亿吧，那要派多少个监察组下去？谁又去监督他们？所以我说深化

改革的第一条，第一要务，就是怎么来监督？这个执行者就是政府派出的，政府自己监督自己，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者，能行吗？

主持人：对，那么就是要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实现真正监督。

陈平：不能自己监督自己，那怎么来监督？就是还民，还权于民，政府的权力本身是来自于人民，立刻来组建新的救市的体制，也不现实，公共设施、道路、铁路、桥梁还得要政府来主导，历来说共产党人高风亮节，那你就先高风亮节，把一部分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主持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做？

陈平：我觉得最快的方式，你首先开放舆论，通过舆论来监督，通过媒体来监督，让他们承担起一个监督的角色，你别怕媒体自由了、舆论自由了就失控，失控不了的，因为可以透过法律来管理媒体，哪怕是明确告知媒体哪些东西不能够乱说，以及说话要负责任，只要适度的开放舆论，总会起到一定的监督效果。

要让投资权、投资分配权也就是花这个钱的权力和它的决策过程暴露在阳光下，那什么是阳光？就是人民的喉舌也那就是媒体。所以我说，这个应该立刻着手，先对新闻做一个立法，然后再改造全国人大和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的管理办法，通过这样一些宪政建设来更加地完善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确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

所以我讲，第一，钱的主要来源一定是从金融机构举债，第二，能不能如愿以偿地筹到这么多钱，还是一个问号，解读这个问号的是钱怎么花，花得有效没有。而钱怎么花，花得有效没有，是体制的问题，先让它处在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下面，然后再通过宪政改革，健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制约机制，否则，可能会出现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后果。

我们的体制有大跃进的传统，千万别上演二十一世纪的大跃进，要真出现大跃进，可能它的后果会比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更加要严重，危害要更加大。

主持人：那么大跃进的后果，有可能会是什么，如果在二十一世纪发生的话。

陈平：强行的利用目前还不受制约的政府强权来实施这么庞大数额的投资，那么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可以想像的到，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滋生大量的腐败，甚至会使民怨沸腾。同时，又解决不了它希望达到的救助弱势群体，解决失业、增加就业，拉动内需的作用。反而造成社会更加严重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危及安定。

第二点，这么大的钱花出去，如果效果不彰，或者违背了救市拉内需的方向，那么，就会成为全民的一个大负债，导致未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很有可能就是对大多数家庭的资产的变相掠夺，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非常巨大。

情急之下，单从数量上看畅想出来十八万亿的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而执行者有是目前不受制约的权力主体来说出来的，那么这种救市，这种投资拉动内需，也就成了一把双刃之剑。

主持人：就小心在用它破解难题的时候，别割伤了自己。

陈平：那么只有改革在前，投资紧随，而这改革必须是还监督权于民的改革，才可以把这双刃之剑伤到自己的那一面概率变得低一些。

第 039 集 18 万亿的刀刃在哪？

主持人：中央这一级拿出来的四万亿的投资计划，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民生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医疗，教育，后来到了 22 个省级政府拿出来的方案当中，大量的都是像地铁，地方公路这样的一些建设，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的话，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陈平：第一，投资效益低，怎么回收的问题。如果项目是公益性的建设，那么它就是要通过地方税收。不是今天面临这场危机，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一般都是该做的。但无非有一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但在这个方面，就怕会形成是从政绩、面子或者更加不可告人之目的出发来推动，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说，这个不能孤立地看这些东西该不该做，而是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

此外，这个投资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拉动内需，那这些项目在拉动内需当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主持人：地方政府背后好像还是有它的一个习惯性思维，以 GDP 为重。

陈平：他不完全是 GDP 了，更多的是形象，政府确确实实经常主导一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像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只不过过去没那么多钱，那么，现在放手让地方政府举债来做了，这样子的话，做就做吧，本身也就是要做的事。

还有一种就是本身设施已经可以满足了，但是每一个城市的官员，包括每一个城市的居民，他一定也希望自己的城市的机场更好，公路更宽，一般人是不会去做投入产出分析的，一般人也不会去做宏观的中观层面的经济可行性的考虑的。

那么这时候就是要看，整个城市的财力能不能支撑，建了以后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如果可以支撑，那么今天负债建设也是可以的，这里面有个科学论证的问题，这又不能说是自己来认证，一定是要第三方来论证，那谁来确认第三方，谁来判断这该不该，还是要还一部分权于人民，才能形成公正的，公平的决策，也就是科学的决策。

主持人：如果地方政府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拿出来的这个投资方案，论证比较扎实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投资，但如果说是为了要做形象，或者是做政绩的话，那么这么快的时间就拿出这样的一些项目来的话，那么这个投资就应该是值得考虑的。

陈平：之所以这样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拉动内需，就这样一些领域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克服经济危机，效果到底是怎么样？拉动内需的最急的要务，是减少失

业，增加就业。就业、就业，还是就业，而这个就业不是靠行政命令的，有些地方行政命令说企业不让裁员，到时不让裁员的企业没钱发怎么办？是不是政府掏钱出来给企业发工资？

所以关键是，形成经济增长来形成就业，通过就业来形成更多的市场需求。形成更多市场需求，又才会拉动经济更快地增长。这才是对抗经济危机，走上转型后的良性经济发展的一条道路。所以现在的判断我觉得首先不是在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该不该建、这个城市需要不需要，而是在于现在经济已经受到冲击了，而且还在一步步加重，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救经济。而不是搞建设。

主持人：对，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尽管可能从表面上来看，都是说在做工程，都是在加投入，但是它可能会是两个方向。

陈平：对，首先是救经济，而救经济的这个当务之急，是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而搞建设，如果说是符合增加就业这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那么这个建设本身也是救经济之举措。

主持人：那么可能在进行核算的时候，这个项目能够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可能也会是一个考核的一个目标。

陈平：对，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增加多少消费能力，而这消费能力不是集团消费，而是正在面临着失业，正在面临着可能会到来，深层困难的这个广大基层大众的消费。所以我刚刚那两个概念，一个是，是大干快上搞建设，还是当务之急抓就业，同样一笔钱，投到哪里去，同样一笔钱，用什么方式花出去？

主持人：对，那么在他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到最后同样的钱，最后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

陈平：当然如果这两者正好是吻合的，那就最好。

主持人：看到有一组数据，大规模的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对于 GDP 的拉动，在 1997 年的时候，产出比是 3.17，那么到 2007 年的时候，就已经下降为了 2.13，而且是从 1997 年到 2007 年一直下降的，那么是不是靠投资固定资产拉动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处在一个递减状态中？

陈平:过去十年为什么递减？根本是大量的制造企业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在降低，投资基础设施的产出很多是间接的，如果企业本身的状况不佳，有些甚至关门大吉，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也就不会好，比如修一条公路，如果人们的收入在减少，石油价格还会上涨，人们就会减少使用汽车，公路的收入和效益就会递减。

主持人：对，投入产出比就会变得更差。

陈平：你刚刚说了十年，这十年中世界的蛋糕和中国这个经济蛋糕是在不断扩大，无非在扩大过程当中，单位的获得的份额在减少罢了。现在这蛋糕在减小，你再投资增加，那单位效益肯定更不如从前。

主持人：现在还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导致重复建设，进而可能又是一个产能过剩，怎么办？

陈平：现在本身就产能过剩。建设是应该做的，但不是今天当务之急。今天当务之急是救市。救需求之市，消费之市，人们就业之市。所以说，在这次的政府主导投资当中，一定要注重分清或者是目标明确，目标是救市，目标是拉动内需，拉动内需的根本是是就业，是让更多的企业活下来，让更多的企业吸收更多的人力就业，形成更多的消费需求。所以现在建设是其次，就业是为首。

主持人：在这次的各个地方政府拿出的方案当中，有一个其实和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是个相反的一种做法，就是在中央政府提出来的方案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廉租房的建设，而在地方政府目前所提供的这十八万亿的方案当中，恰巧没有这一条。那么地方政府的思考会在什么地方？

陈平：因为土地财政是对地方政府太重要了，廉租房对土地财政贡献太小了，估计可能这个原因而对廉租房积极性不高吧。另外，怎么花这个钱，和谁来花这个钱，什么人来作为主体，又很重要。

是由政府直接来做，还是让很多企业来一起做，是花新的钱走老路，还是走新路，现在已经产生严重过剩的产能，再走老路搞建设，不是更过剩？所以说到根本一点，在目前的方式方法，存在的主体等等方面，我觉得条件不太具备，可能是好的愿望，但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们不太愿意看见的结果。

主持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日本也曾经用这种就是政府来加大投资力度，进行这种公共设施建设的这样一种方法，来想刺激经济，当结果是没有刺激起来。美国七十年代碰到滞胀，它后来逼着美国走向了一些的新发展的道路，比如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等等，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一些和就业相关的、和消费相关的努力，那么它可能就会真正能够见到实效。

陈平：通过就业相关，消费相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让企业拿新钱做新事，第一减少政府直接使用钱，而让企业使用钱，让企业使用钱，也不是拿钱来维持旧的格局，而是要走新路，什么是新路呢？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而可持续发展产业，是大量的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大量的新产品的研发推出，来实现我们对于更好的生活环境的追求，所以这里面是，这个钱怎么花，是要花在有希望的这个项目上面。要花在能够承载有希望的项目的主体。

主持人：企业。

陈平：实际上我说首先要不要这十八万亿新增投资。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没有其他方法了。作为政府来讲，压力非常大。但是，也要情急之中，冷静地判断，形成这种危机状态的根源，性质是什么。然后再根据未来发展的需求做出决策。是要通过来加大投资，还是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阻击金融危机的冲击，来实现我们的经济的转型，包括社会的转型。

第 040 期 新劳动合同法是把双刃剑

主持人：您对新《劳动合同法》目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总的评价是什么样子？

陈平：我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应该这么说，第一超前，第二生不逢时，不合时宜。

整个中国经济在世界分工体系当中，并没表现出来技术优势，更没表现出来技术优势所赖以发生的创新优势。而主要依靠的是人力优势。中国目前整体来讲，企业基础水平还不高，人工成本的优势仍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当中的主要优势，减弱这主要优势，就叫做超前。

第二叫不合时宜。在讨论制订《劳动合同法》的时候，美国次按危机还没发生，但实际上面，那个时候美国和西方经济开始要出问题已经表现出来了，意味着世界经济会停止增长、或者减缓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再减低这个人力优势，那不是向这个伤口上撒把盐吗？

主持人：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要同时保护好企业和劳动者的双方的利益，《劳动合同法》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怎么发挥它的作用？

陈平：这个里面是一系列矛盾，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主张企业升级，它往往会暗含着或者是说必然会导致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乃至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减少用工。可如果不能减少用工，得一直就用下去，那不是向铁饭碗回归吗？这不是与企业的技术升级是冲突的吗？企业为什么要升级，因为企业受竞争，它必须要升级。员工为什么提高自己的个人劳动技能和素养，也是因为就业的压力和获得更好的工作收入的压力。所以他们这两个所受的压力是一样的。

今天已经知道，美国通用汽车的成本为什么那么高，为什么今天那么个庞然大物，占了市场那么大份额要破产？

主持人：是高在人工上。

陈平：高在人工，高在那个高福利上面。人类的文明进步乃至每个人的进步，也是因为挑战，而有了进步的动力。所以，福利化，铁饭碗，只会阻碍进步。阻碍进步的结果，只会导致损害更多的人民利益，只会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会增加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根本一点是工作岗位的增加，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而不是强制性的，让企业在用工制度上面背上更多的行政命令的枷锁。

最近看报导，什么出台一些规定企业不得裁员，我一看就觉得荒谬绝伦，你政府发钱吗？你这样的结果，第一阻碍企业技术进步，阻碍企业实现你政府所号召的创新意识和技术升级。

主持人：而且我相信，像这种通过政府这种管制，往往达不到政府那效果，企业会有一些变通手法。那么如果政府强迫不许裁员，我相信企业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把人力成本降低。

陈平：我们在二十年前还在痛批铁饭碗，大锅饭给我们整个民族国家带来的这种伤害，给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品质带来的削弱。所以只能说，如果说得严重一点，这种法律出台，实际上是对于改革前的一种变相的回归，是一种复辟。尤其在今天这种面对危机的挑战时候，既保护不了这个普通员工，也害了企业。最低工资说什么推迟实行，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出台什么最低工资，反倒是政府应该向社会提供最低失业保障，政府收税是因为政府要承担一些企业、个人所不能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责任，所以企业和个人才向政府交税。企业没有义务给员工保障，企业只需要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正常交税，交税给政府，然后由政府给全体人民提供一个基本保障。

主持人：对于每一个劳动人员来讲，工资可能是属于第一次分配，税收交给政府之后，借助政府的这个手再来构建一个保障网，其实这是进行第二次利益的分配，那么政府的作用，其实重点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陈平：对啊。比如现在所发生的大规模的返乡潮，这《劳动合同法》能给民工怎么个保障？企业已经为员工付了不管是五险一金，还是六险一金，它企业就已经承担了这一块的职责了。如果政府不要企业交这个钱，企业就必须自己建立一个基金来保障员工，可如今既然已经交了，这个保障的责任就该政府担起来。企业交了钱，就应该政府来做了。

我觉得立法者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修改法律。当然来讲，我是主张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是应该守法的。就像我也是在珠三角对一些企业家也说，我说这法是立错了，应该大家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它不对的地方，但是，只要这个法一天没改，你就得遵守一天，这才是现代公民意识。而不应该玩猫腻不遵守。

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基础上面，应该考虑更加全面，要考虑到社会进步、技术进步和用工的关系，考虑到就业政策和失业保障的关系，考虑到企业的责任和政府的责任的关系，所以我说，推出了如此有重大争议的《劳动合同法》，我们不仅是要反思就这个法律本身做一些修改，而且还要通过这一个法律的修改，揉进去考虑到更多的因素。

为什么西欧、北欧社会走向停滞，为什么美国今天像通用这样的企业没有竞争力？立法一定是充分理解认识人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惯子不孝，肥田收瘪稻。人性的本身，是应该要有压力的，有压力才有动力的，有挑战才有应战。一个具有活力的，一个不断地创造灿烂文明的国家、民族，万万不可以走上建立很多福利的一个社会体系。

主持人：就是说，基本保障是应该有的，但不能高福利。

陈平：只能做到由政府给社会成员提供一个最最基本的保障，给一些丧失劳动力的人提供人道主义保障。我前面讲，给失业的、待业的人提供一个活着的保障，但应是活着很紧巴巴，不是太好的一个保障。让他想方设法还是要找工作去。

既然我们要支持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升级，企业是由什么构成的？由人来组成的，企业是人的组织，所以福利应该体现在人的升级上面的作用，这是一个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用工固定化，僵化，铁饭碗，硬性提供企业员工的最低工资保障，这是什么？消极的福利政策。

我们的社会要吸取欧洲、美国，包括日本他们在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经济发展起来以后，那么走过的福利化的道路，得与失，同时考虑到人性，同时要更具备历史观，更具备历史观，而推行一种，或者说国家来创新一种积极的福利政策。积极的福利政策，是遵循着这个我愿意称邓小平为伟大领袖，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规律。而那种固定化的，铁饭碗的，大锅饭的，是消极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福利政策。现在《劳动合同法》在经济危机当中，我可以说白了，第一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第二起反向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推动这个法律的修改，它的意义不仅于这部法律之内，而在于这部法律之外。要让社会充分地建立起一个能够保障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的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一个积极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动力，它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保障；而消极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是会导致社会的退步，其结果反而是破坏社会的基本保障和福利。

第 041 期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国企该如何担当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目前国企在中国经济当中的地位，和这次它在我们渡过经济危机当中的作用？

陈平：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启动内需以对抗经济危机的计划，必然是国企唱主角。

投资多数都是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这样一些领域在目前中国大陆都是由国有企业来担当主角，甚至垄断。所以必然是国有企业唱主角。而国有企业唱主角，也就会形成起码是事倍功半之效。

主持人：您对它的评价不高。

陈平：为什么？我们不从上分析，拿数字来分析，你看现在是哪些企业下滑，国企下滑的很少，下滑的主要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一些港澳在这里投资的加工型企业。对抗经济危机，就是要阻止是这块下滑。

当然国企也有下滑的，那是因为非国企下滑了，影响到了国企垄断生意的使用量，收入减少了，才会下滑。比如中石化、中石油高度垄断，它的消费市场发生问题了。那么，它的消费市场为什么发生问题呢？那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就业市场遭遇困难了。

主持人：而就业又主要是中小企业来完成的，是民营企业来完成的。

陈平：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承担了 70%多的就业人口。好，我这几个数字出来就很清楚了。你说让这个国企承担拯救中国经济的主体，担得了这个大任吗？担不了啊。

所以我对这种模式表示质疑。也对国企在目前拉动内需，拯救中国经济，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表示怀疑。现在根本的一点是要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抵御经济危机。帮助他们转型和成长。而且我觉得，帮助他们可能花的钱还要少得多。

应该给予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一个公平的环境，也就是还权于民。而不是强化国有。

主持人：有几家国有航空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要求追加注资，而已经有一家获批了，个别的国企出现经营困难的时候，去拿纳税人的钱，来替他们去买单，这种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平：第一程序上有所欠缺。整个运作是暗箱运作，既然是国有企业就是全民的企业，应该不应该获救注资，最起码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一下吧。这些都没有，就注资了，程序上有所欠缺。

日子好过的时候，赚了钱就充分地享受这个成果，亏损了，政府就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注资，这算怎么会事情。

主持人：赚钱的时候，很多利润是被国企本身这个利益集团它内部消化了，但是到了亏钱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转过来却要纳税人来补这个窟窿。

陈平：垄断的国企永远都是变相地压迫顾客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服务的一个企业，中国的几个民航公司服务质量之差，我想凡是经常坐飞机的人，现在已经到了麻木了。

主持人:但目前国际油价已经降到了六十美元左右,但是国内成品油价依然没有降下来，那么现在这几大石油公司就可以来坐享这样的一个利润,而让消费者去承受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活费用。

陈平：它还是因为垄断造成的。权力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经济上市场的垄断，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所以打破权力垄断和打破经济市场垄断，都是摆在今天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紧迫的任务。

主持人：其实每次面临一个危机，都是一个改革的一个契机，那么相应地应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陈平:我认为首先这个执政者应该主动地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等到自下而上,就被动了,。能够自上而下，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气，而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一，要需要是勇气，第二是需要真正的天下为公之精神。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今天是要牺牲自己的有些权力，也就是垄断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的。

主持人：那么在经济领域，应该怎么来处理国企的位置，和它和政府的关系？

陈平：如果真正要想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抵制经济危机的冲击， 能够拉动内需，能够获得危机中的发展，那么应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里面的改革，那也就是除了必要的真正是国计民生的才需要有国企或者国有控股，要继续缩小国企在经济生活中的成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明确什么叫国企。国企就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就是人们共同拥有的企业，那好，怎样来处置这些人民共同企业的财产，怎么样来管理这一些人民共同的企业，怎么样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到对他们共同拥有企业的这么一个监督管理权？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应该立刻着手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要对这个做一个界定，什么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或者是战略地位的行业？

陈平：第一，有世界各国之参照有比较，第二，还得经过一些法律的程序，此外，并不是说，这个公有、国有都是不好，关键是怎么管理它，是处在所谓行政主管部门之下，还是能够被人民有效的监督。不能够假人民之名，行自己拍脑袋之事，这是不行的，或者行自己私相授受之事，这更糟糕。所以我说，在有些时候，所有制不是绝对关键的，而在于如何行使管理和监督。那么在另一方面，不容许垄断又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这个就说是，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是一视同仁的，不允许垄断。

陈平： 那么垄断不管是表现在国有企业身上，还是表现在私有企业身上，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都是一样的。社会带来不公平都是一样的，它同样牵扯到，曾经说过的一个命题，缺乏公平，就缺乏效率，只有创造公平的体制和环境，才能奠定高效率的一个社会。

主持人：那么按照您刚才这个分析的话，那么反垄断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话题。

陈平：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要在所有制问题上面，主张民营的私有的多发展，而国有的，就尽可能地在一些竞争性的领域，在一些没有必要的领域当中少一点。那是因为垄断和国有具有天然的联系的。在中国这个体制下面，国有和政府是连得很紧的。有些就直接属于政府部委的直属，那么这样情况下，利益的驱使，包括感情的联系，很容易使得社会的公权力成为了企业的私权力，虽然它叫做这个公有制企业。

主持人：虽然它也叫有限责任公司。

陈平：就是暗度陈仓，把公权力变成了这一个群体的私权力，那么同样私企也有这个问题，私企如果垄断了，更加明目张胆地为了欲望去损害消费者。，去随心所欲了。

主持人：那么在目前面临这场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需要打破各种所有制导致的垄断。

陈平：从垄断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政治权力，打破垄断，必须受到制约的。要有制衡的权力，第二，国有企业要斩断其与政府，公权力的延伸。那么这也是要通过反垄断，让它这个政府权力的延伸变得更困难，同时也适用于非国有企业。从这个角度，对权力的制约是我们应对危机挑战的必须应该面对和实施的步骤。

第 042 期　创造公平是抵御经济危机的良方

主持人：过去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发展就是硬道理，其实强调的都是效率两个字，有两个字是在这两年开始被提出来了，就是公平，那么在目前，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公平两个字，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陈平：我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公平和效率不是矛盾的，真正的公平，就有最好的效率。有效率的机制，一定是公平的机制。公平也就是公正与平等，公正它既有法律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含义。就是它是符合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道德观。平等不是平均，是人们面对发展的机会的平等。

平等的概念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说人生而平等，人生而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又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基本的权利是等同的。什么是基本的权利呢？我想在中国政府参与的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公约》里写得很清楚了，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所以，一个真正实现了公平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美国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美国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主持人：那是因为黑奴在享受到一种平等的待遇和尊重之后，释放出来的。

陈平：尽管没有完全享受平等，完全废除了种族歧视，但是比起法律规定的不平等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所以释放出来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让他效率变低了。

主持人：公平不仅仅是所谓的道德感的体现，或者说是一个自我感受的东西。

陈平：公平也是最有效率的机制赖以建立的一个标准。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就像运动员赛跑，你如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不存在赛跑了，所以我说就像运动场上面，什么叫公平，大家在同一起跑线，这就叫公平。公正是指一个标准，平等是我们大家同一起跑线。只有这个公平了，才有后面能够导致人们去努力地向最快的速度去奔跑。

所以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公平和效率是相伴而生，有公平就有效率，有好的效率，一定是有公平。

主持人：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的话，在我们目前要救经济之市的这个课题面前，那么我们怎么体现出这个公正和效率的关系？

陈平：第一，尽管人生而平等这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今日的社会当中，人生而不平等的现象太多了，太普遍了，包括生产资料、行业准入、企业获得贷款，等等方面，也包括人们选择职业，选择居住地等方面，在所以我们现在社会效率并不高。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不能说我们是一个高效率的社会，一个高增长的三十年，而不是高效率的三十年。为什么？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仅仅的是在向公平迈进的过程中，还没有成为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有些领域，不公平的现象还是严重的。

主持人：那么在经济领域，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平：政府在很多时候成了对权力垄断的群体，垄断权力又延伸到对经济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凡是垄断领域，都是政府自己站错了队，坐错了位置，把自己成为与民争利的角色上面，这些领域都是既不公平，又是低效。

过去三十年可以这么说，是高速增长的，而不是高效率的。是向总体来讲，是向公平社会的目标迈进的三十年，但还不是一个公平社会。首先在法律上就有很多不公平。这个民间不能碰，那个民间不能参与，如果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更多地，或者稍微多一点地注重或者偏差一些公平的追求，那可能我们高增长的同时，有相对高一点的效率。那么今天，我们的代价也会相对小一些。包括今日我们面对这种危机的冲击，也更容易抵御。

沿海为三十年增长做出了贡献的那些多的企业，构成他们的基本工人队伍的都是农民工，农民工做工人的事，而不具有城市人的权利，这是不公平。当然，把城乡划成两个在获得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方面，不平等的两大社会阶层，这一件事情可以说是百年未有的最大的不平等。如今，农民工到沿海进城来务工，如果让他们也享有城市人的这个权利。那么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所受到的冲击就会小得多。因为他们如果享受了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子女也获得了身份的城市化，在面对危机的情况下，就更有保障。那么现在大部分失业了的农民工，连社会保障都没有，难道让他们返回农村重新种地去吗？重新去搞乡镇企业去吗？实际上这么搞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浪费，所以我说，公平和效率是一回事。

主持人：在拉动内需上，很多的希望其实还是寄托在农村的消费能力之上，而以目前农民们的一些现状，怎么能够让他们有一种消费的能力？

陈平：公平公正，也就有效率，我们面对经济危机，更要讲究效率，而讲究效率，更要讲究公平。你刚才说十八万亿，这都是人民的钱，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哪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那么人民的钱，怎么样花，该不该花，花的效率怎么样，那么都是由人民来说了算。这就要有实现人民说了算的机制，这就自然而然推出来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不等同于完全西方化。但是本质上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就是权力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

权力的整个过程必须受到制约，而怎么制约，必须要从法律上，建立一个可操作的程序公正。所以说，抵御经济危机，更要强调公平才能使我们拯救经济卓有成效。这样子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我们谈中国的救市之举措，要强调效率，更要强调公平。只有有公平，才能有效率。

第 044 期　全民救市需要还财于民

陈平：四万亿加十八万亿，听到不兴奋，而是担忧。第一担忧有没有这么多钱。第二，真有了，花出去，会是什么后果？第三，是不是真的需要拿出来这么多钱，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一步？

主持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陈平：办任何事情，第一叫开源节流，第二叫挖潜力，中国现在是不是说没这个潜力了，是不是到了非得借债不可了？而借债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就像对于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机

制好，那么真的缺钱，借了钱来，有好的产品，好的技术，它能很好地发展，否则借了债来，更完蛋。反而是更加不堪重负。

对中国这么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潜力是可以挖的，而这种挖潜力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实现体制的变革，实现社会更加公平的过程。

主持人：您所说这个挖潜，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陈平：潜力来自于被称之为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可以把这块财产从低效的，和人民并不能直接享用的、并不能变成资产性支出消费的状态，把它转变成为一种消费力，我并不赞成把它全部转成消费力，但把它相当一部分把转变成消费力，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全民所有制资产有好几十万亿，那么既然是全民所有的财产，那为什么全民不能够享受这个资产呢？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块资产的其中一部分转变成为消费力呢？当然这里面，一直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似乎这个资产一分就是私有制了，就私有化了。

可既然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全民也不是一个虚的概念，全民是每一个人，那怎么叫私有呢？全民私有制财产还是归属在每一个公民的权益下。无非交托给国家政府管理罢了。这里面有好几种方式，能够实现这种全民财产让全民实际拥有，或者是直接拥有，或者是享受到它的资产消费力。

主持人：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陈平：我提出一个方法，肯定会有一些人反对，你这不是私有化吗？我刚才说了，什么叫私有化？财产本身就是有归属的，你不承认有归属，那你天方夜谭，那叫乌托邦，承认有归属，你叫它私有化也好，你叫它公有也好，全民也好，它都是有归属。无非管理方式不一样罢了，

我们精心设计一个合理的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权益分配机制。

主持人：那要分配到每个人手里？

陈平：对，你也可以分配到每一个人，但是也要考虑，分配每个人，是平均分，还是按照贡献分，还是按照工作年限分，此外，是直接分享受红利权，就相当于分股票，还是直接分财产支配权，我觉得最起码要分享红利权。

这是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一定是可以做的。如果说担心财产权分配，那么收益权应该分吧，如果收益权再不分，那还叫什么全民所有财产？收益权分了，也就相当于分的是全民股票，而且这股票又是可以能够流通的，有些人愿意手里拿着股票来长期收益，有些人对这个股票看好，愿意花钱买，有些人要把这个股票卖掉，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盘活了这么一块巨大的属于全民的财产。

陈平：全民财产中有一些可以采取政府托管的模式，因为这一块可能关系到共同利益，那么可以保持政府托管形态的控股，或者大股。

主持人：可能是这种公共性更强的这种产品和服务。

陈平：　　在过去一两年，很多舆论说包括像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等赚了那么多钱，应该要分红，分给谁啊？要分给全民，你可以直接分，可以间接分。

主持人：直接分怎么分？

陈平：直接分就是给全民分红吧。

主持人：按人头。

陈平：有很多种间接分的方式，社会福利保障的建设完善就叫间接地分，这样子的话，就是把这块巨大的资产给它盘活，盘活变成权益是可流动的，第一，我相信它立刻会使中国出现一个巨大的内需，不仅增加了资产性消费这一块，工资性，收入性的消费也就更大胆。这样，全民所有制财产通过一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还财于民，就可以盘活存量资产，启动资产性消费，让人民能够大胆放心地，更加也激活收入性消费。

此外，这样子也更体现了我们要追求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又解决了多年想改革解决，而难以解决的国企的所有权缺位的问题，人们分到它的权益，因为有利益关系了，他就会关心了。这对防止低效、腐败，都会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第三，巨大的消费能力的涌现，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子，它又会形成巨大的税收。这样子，又会使我们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个正方向的非常良性的循环。

主持人：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觉得刚才那个方案的可行性有多大？

陈平：中国目前在私和公这个问题上，多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再加上传统的中国的帝王思想，形成了类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状况，总是把资产所有，国家所有和执政者所有联系在一起。但是打破这个联系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因此，我觉得采取折衷方案的可行性是很大的。使用证券化方法的可能行是很大的，也就是借助于或者巧借于这个资本市场的证券化这一条方式，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创新。

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对执政者来说，都是几年一任，在台为官，下台为民，资产不是都带不走的嘛，那何不在这么一个时代，通过全民资产的还财于民方案，来激活整个国民资产，这造福于民，同时又造福于国，实际上也造福于现在的政府和执政者。因为经济发展了，政府可支配的钱会更多，支配的财产会更多，税收会大幅度增加。相反，这一块国有资产，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和利用，还成了包袱。

我听着二十多万亿不兴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觉得还财于民是一条道路。能够使中国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因素为有利的局面。国有经济这么大，总是离不开改革，三十年前，我们启动了改革，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它是增量的改革，存量不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实现了一条非常高瞻远瞩的战略。这才证明了我们中国没有走前苏联，以及东欧那种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休克疗法的道路，那中国走的

路更加高明，更加是沉稳，更加具有深远的战略英明。

主持人：经过了三十年之后，改革再出发已经具备了可以比较安全地去动存量的条件，同时不至于对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大的不良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在可控的情况稳步来操作这个事情。

今天增量这块已经增不动了，已经到了要动存量了，怎么动这个存量呢？就是还财于民。

所以你刚刚把话说得也很透了，三十年前增量改革，三十年后既是应对危机，又是实现深化改革的又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存量改革就是我们要走的改革的最深层次的部分。因为存量改革，它会牵扯到我们社会制度怎样更加走向公平。我们探索出来一条更加公平的道路，也就更加有效率，我们一再说，我们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更加强调全社会的和谐，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富有和发展，那么我觉得，三十年以后，我们面对危机走的这条路，有可能能够不仅在经济上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上面，也在社会文化上面，也在文明的形态上面，我们能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当然来讲，这一招要真的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多困难，有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不失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第 046 期　救市，如何标本兼顾

主持人：您对政府投资来救市怎么看？

陈平：我在前一次谈了关对危机的认识，我提出来了对于这次危机的认识，是工业文明的增长方式由盛到衰的危机，而且是一场总爆发。对于救市的方式方法和方向，我提出来要穿新鞋，走新路。新鞋就是绿色产业，新路就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一点对于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中国目前既身处世界工业文明中，又与其主流的社会形态，也就是选举制民主体制和私有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有一些制度上的不同，也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异，从发展的历史上面落后了，还保留着更多的农业文化的价值观、社会组织方式等等，这就是决定了中国面对这一场全人类的危机，更准确地叫做增长方式的危机，应该既遵循全球的共同道路，也就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也要继续深化自身的改革。

主持人：那么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陈平：我觉得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我们希望中国在这一次全球性的危机转型中，能够在制度上也能获得一个后发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和全人类共同穿上新鞋，走上新路的同时，我们在制度文明上面，能创造出比西方社会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社会。希望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那么公平和效率，对于目前正在努力地来克服经济危机的中国来讲，有一个什

么样的价值？

陈平：更加重要，比克服经济危机更加重要。走向未来，必须要走上公平和效率的道路。那么同时，现有体制中一些受到批评的特点，可能还会是我们实现跨越式的转轨和发展的有力条件。

比如说，和西方社会相比，从政府的动员能力中国要更强，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相对来讲，会比普选制的民主社会、完全的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社会要更强一些。而这个能力又是转型所需要的，无论是民族整体的转型，还是人类的转型，任何转型过程当中，一定是对于共同利益强调得会多一点，对于个人利益会少一点，这是一种规律。所以在转型当中，本身就需要公共权力的强大，需要个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整体利益，所以，这是我们后发优势一个方面。

我刚才说了，中国要穿绿色产业新鞋，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那么同时还要解决、或者更加注重解决我们体制上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是实现公平？

陈平：我们现在在公平上面，第一是资源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垄断了自然资源、社会的生产空间资源，国有企业和行政的垄断过高，而由于不公平，又导致效率低。

另外，政治权力缺乏制约，这不仅仅导致腐败，而且会导致整个资源的低效，也不利于转轨，当然我前面讲，政治权力的强大有利于转轨中的动员能力，但是又有它的巨大的副作用。所以我说，解决公平与效率，也是今天中国面对这个危机急需要深化改革的地方。

再具体来说，一方面受冲击的实体经济会产生很多企业的破产和隐性破产，产生大量失业，而失业群体又大多是农民工，农民工作为城乡二元身份等级制的牺牲品，受不公平的影响最大，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中国社会在实体经济受冲击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动荡。

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我提议，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四万亿的计划中，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四万亿绝大部分是投入到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是投入到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得廉租房、这当然绝对正确。但是把基础设施仅仅理解成为公路、铁路、桥梁、码头、机场，我觉得是太狭窄了。

主持人：为什么呢？

陈平：我想今天的执政当局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吧，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中一再提到，在生产力的诸要素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能动的是人，那么基础建设最关键的建设是什么？是人的建设。当然基础教育也是人的建设，但基础教育没有把大量已经工作的、在需要转轨、需要升级的产业当中的人包括进来，为什么不把这些人作为一个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进行投资呢？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早在危机到来之前就提出了企业要转型，要升级，而产业升级就离不开人的升级，所以我认为，把中国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作为一

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进行投资。可以取得不是一石二鸟，乃至一石多鸟之效。

主持人：都有什么样的效果？

陈平：首先，提高最活跃的，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人的素质，比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往往会显得更重要，有了人的提高，一切物的改善，都是水到渠成。第二，面对着国际市场的萎缩，而国内内需市场的提高有一个过程，某些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把这些因企业转型乃至破产而失业的人当成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来建设，而是任其失业，那么这就会成为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不公平，不人道的。

那么第三个，把企业的升级换代转型，和面临着失业的农民工的提高当成一项基础设施来建设，同时又可以借机部分解决城乡二元身份等级制结构的不公平，让他们获得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举措。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把人的建设当成在这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要只盯着有形的工程，实际上人是更有形了。任何时候，只有尊重人，只有充分发挥人的潜力，那么其他的物质财富才会被创造出来。人既是最大的消费者，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要素。投资道路、桥梁、码头、机场、港口，那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在这些基础之下，基础的基础还是人。

很多劳务输出型的省份包括四川、重庆、江西等等，地方政府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对农民工进行一些技能上的培训，那么现在看，培训的内荣应该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应将培训的行业集中在可以转型，可以升级的方向，而不是集中在高能耗，高污染和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此外，改变目前在培训当中只注重实用，也就是如何操作机床等等最基本的培训，而能够从培训内容上加入观念转变的内容。

把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和对农民工的培训、对企业的转型升级救助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领域。远远地比投向几条公路、几个码头更有用。积极财政政策无非是国家多担一些信用风险，但承担信用风险是有条件的，钱应用在符合转型发展的方向上面，用在能够承担这种转型的一个个企业、社会组织上面。我们首先想清楚，这些钱用到哪里，目的是什么，怎么用得好。

这一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是第一生产力，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也是最积极的生产要素。拯救经济，抵抗经济危机，拉动内需，实现企业的转型，实现技术进步，实现我们一直追求一百多年来追求的公平与效率，我们都是要把人看得很重。都是要高高地举起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大写人字不仅仅是，是士大夫们的大写的人字，而且是平平常常的庶民，包括了今天经常被人们不太能够看得起的衣冠不整那些农民工。只有提高了全民的素质，只有全体人民都成为大写的人字，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危机挑战，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那么赶上人类的这一次危机中的转型的一个机会。

第 048 期 阳光执行救市政策

主持人：美国救市方案出台后，很快就曝出了丑闻，让人非常担忧，关于这个钱的用法，应该怎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监管？

陈平：应该这么说吧，本身由政府来做这些事情(救市),如何能够有效监管和有效率的运用一直是一个难题。国际上很多学者反对这么做，理由就是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什么是市场经济社会深入人心的概念和价值标准？就是经济活动受利益驱使，应由市场来实行监督。由市场来完成对人的行为的制约。逐利失败、你把钱糟蹋了，对不起，得由你负这个责任，你自己去破产，不能让市场主体风险和利益这两者不对称，华尔街这些金融高管，包括像房地美、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政府拿纳税人钱去救房地美、房利美，监管勒令其首席执行官离开，但人家还是一个拿九百万美元，一个拿一千多万美元的补偿金走人。这就是他没有承担他的风险，也体现为政府的监管缺位。

主持人：那么具体到这次救市的资金的使用问题，政府这个钱怎么用，怎么监管？

陈平：我们能够想到或者能看到的方法，我觉得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的让他处于阳光下。

主持人：您说的阳光下是一个比喻，那么具体操作。

陈平：就是让他处在尽可能多的人的一种监控下。但是尽可能多的监控，又影响它的效率了，那么从这点来说，目前看来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媒体的监督。因为媒体自身需要获得对大众的影响力，或者获得大众的收视率，或者获得它的发行量，具有深层的驱动力去无孔不入地去挖消息，去揭露黑暗的东西。去曝光不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有点过分，尽搞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出来，但这样一来，媒体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代表社会实现监督的功能。千千万万的媒体工作人员，是千千万万的眼睛，无孔不入的到处去钻着打听、了解，这就让无论是执行救市的官员还是承担救市的企业，处在无数双的眼睛的监视下面。

媒体是一帮职业的狗仔队、职业的偷窥者，它不是最好的，但它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通过其他程序性的监督来保障，其实是蛮难办的。所以我说阳光下去运营，阳光下去执行，这个阳光就是媒体。甚至媒体比阳光还厉害，阳光有的时候还有照不到的地方，允许媒体这么做，那媒体只会做得过了，不会做得不及。

主持人：无孔不入。

陈平：以政府形态，以行政权力来救市，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又是一个不得不采纳的救急措施，因为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都承担不了这样一个在危急时候的重担，也只有政府能够承担，但政府又不是一个最高效率，最公平的办法，但是反过来说，目前也只有政府，也没有其他选择。

主持人：如果是进行监督的时候，我们重点要盯哪些地方？

陈平：防止人的贪婪战胜了理性、人的私欲战胜了良知，防止人们在这过程当中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因为政府救市是权力的运作，不是市场运作。若是市场运作，只要监管的法律，监管的措施得力，他就要自负其责，由市场来惩罚他，就像雷曼破产，就是市场的手段在惩罚，美林这么一个大家伙，也被美国银行兼并了嘛。。但是政府主导的救市行为尤其是一些投资行为，它是权力的行为，市场的手管不到它。那么怎么办呢？也得有制约于的手段才行。

主持人：说到这个权力的手，据世界银行估计，1975 到 1995 期间，中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量大约在四千亿到五千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四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计划，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

陈平：我们经常听到各种批判的声音，决策失误了，就是总结经验，下不为例，但下面还是照样继续犯。为什么？因为做出这些错误决策、造成浪费的这些官员，他没有承担错误决策的风险。执政党也不愿意出现这么多浪费和错误决策，但是你要知道，行政力量难以对政府的投资行为实施监督与约束，依靠自我的行政力量来制约监督行政，这本身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方式只会把行政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管不了。

市场的主体，由市场的手来去监督它、管理它。行政的权力本来是做裁判者，是监督执行的。当行政的权力在危机时来从事投资行为的时候，那就不能主要依靠行政的权力去监督，只有让那让人讨厌的媒体来做这个事。

我们今天面对这场危机，不管政府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筹集来的资金去怎么用法，首先使用的方法应该在阳光下进行，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条阳光通道，什么是阳光的通道呢，那就是烦人的媒体。挑明了说，媒体经常会发出一些让人不高兴的声音，但我们要接受媒体的这个负面效应，而充分发挥媒体的正面作用。

什么叫媒体，就是媒介和内容，它是个介质，是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执政者和民间之间沟通信息的介质。

主持人：就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平台，能够汇聚观点，然后表达一些多元的声音，同时把监督的功效能够实现出来。

陈平：你就看最近不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官，假设不是那些新媒体，那么很多案件报不出来。反过来我们看台湾，陈水扁贪腐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台湾的媒体一直以来不断追踪，陈水扁今天会从一个总统变成阶下囚吗？台湾的正义能够得到这种伸张吗？这个下野八年的国民党能够重新上台执政吗？

我们既要阳光救市，又要阳光通道。而这阳光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人民的一种监督，而人民的监督，是需要有中介的，这就是媒体。

第 049 集　救股市不是救经济

主持人：12 月份初的十个教授建议书的大标题非常醒目，就是要通过提振股市来拉动内需。您对这个题目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陈平：我看不出来，目前提振股市和拉动内需之间有什么样的必然和紧迫的联系。现在的股市价位，如果按照公司的经营状况、投资回报、利润率等等来看，已经不算低了。尽管和过去的一年多两年疯狂时相比，股价变低了。那么，是不是股票价格炒高了，企业的市场就会变好了？需求就会增加了？是不是股价上涨了，人们的购买力就增强了？

主持人：《十教授的建议书》里面是这样的逻辑关系，比如说股票特别好，那么人们在各种花费的时候就会特别有底气，一旦是股指大幅下跌，这个纸上富贵已经没有了，大家就会紧缩开支。这是建议书里提振股市和拉动内需之间的一个关系链条。

陈平：股市不可能脱离基本面，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如果基本面不好，第一不太可能股市好，第二，即使股市好了，也是违背常理。也是短命的。投资者不是傻瓜，明明现在经济基本面不好，谁买？让个人买，那是愚弄小股民，让机构买，机构是不会买的，机构比谁都更门清；于是只剩下让政府动用纳税人钱来买，包括用社保基金来买，那么这么做，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

主持人：十个教授的建议书里面，还确实提到了说可以成立平准基金来作为目前解决压力的一个工具。

陈平：它的必要性在哪里？我们说资本市场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资本市场的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基础都是实体经济。股票市场变好，企业就会好了吗？说什么股票市场变好，人们就敢花钱了，但是，影响人们信心的并不完全是股市，最根本的是有充分的就业，然后就业有连年增加的收入，此外投资者有回报，经营者收入增长。

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是决定他是否敢于消费的决定性的因素。此外就是要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也就是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前景，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才是信心的很实质的基础。股市好所带来的纸上富贵，那叫锦上添花。而如果股市好过头了，那就是泡沫过大了，反而又会毁掉实体经济。毕竟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一些享乐性的需求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上面的。所以我说，我看不出提振股市和拉动内需的必然联系。面对出口大幅度下滑，工厂半停工，停工，破产，失业在增加，你说把股市拉上去，人们就有信心消费了？

主持人：其实是建了一个空中楼阁。

陈平：而且这是误国误民误己。

主持人：为什么提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陈平： 今天的中国，最紧迫的是什么？最紧迫的是内需，比内需还要更紧迫的是就业。就业是内需之源，就业是社会稳定之保障。如果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就业问题为什么严重，

别说内需拉不起来了，社会都会陷入动荡与冲突当中。说把股市拉高就是拉动内需，是误国误民误己。

主持人：而这个股指的高低，是对就业没有影响的。

陈平：游说社会资本，——不管是民间资本，还是企业资本，政府所掌握的纳税人的钱，还是社保基金——去到股市上去，把股票提高，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是会更加损害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现在更需要钱，首先需要在困难下面保障失业工人，在失业的前提下面，也能够有饭吃，有基本生活条件。此外企业需要流动资金，在这么困难下面去维持生产，去实行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提高。社会需要资金尽快速度转变为消费资金，与其说让政府拿钱出来去抬高股市，还不如给全民发红包，发消费券去。比抬高股市对拉动内需的作用要直接得多。当然我并不主张那样子。

其实，现在股市已经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了，实体经济的基本面和虚拟经济的股市，几乎是两张不相干的皮了。还让社会资本去炒股票，去拉高股市，我不知用心何在，我只能说这种声音是投机者们试图绑架社会的声音。就像前一段时间一些地产商说，要让我死，银行先死。

主持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用一个什么态度，来对股市和楼市？

陈平：对于楼市，一定得价格回归理性。什么叫理性？就是和我们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时期的经济状态相吻合的价格水平。只有在这个水平上面，房地产才能够重新进入有交易，且交易越来越多的状态。股市也是一样，只有人们看到了经济的前景，才会重新建立起良好的预期，有了良好的预期，股市才会兴旺起来。

主持人：十个教授的建议书特别提到了在香港平准基金是发挥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政府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实现一个股市在低点的时候投资者和股市的一个共赢。

陈平：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投机资本在货币上面进行投机来冲击市场，平准基金是对于投机力量的抗衡，而不是针对整个经济危机的手段，用平准基金来来解决经济危机，这两个是完全混淆的概念了。

主持人：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1997 年的时候是金融手段来对抗金融手段。

陈平：对，金融手段，政府用金融手段来对抗金融投机行为。现在的局面可不是投机造成的，现在是泡沫破灭了，需求大幅度地衰退，你怎么用平准基金的方法呢？即使是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人家也没把拉动股市当做拉动内需的手段，我连这个提法都没见过。

主持人：事实上，不是通过提振股市来拉动内需，而是反过来，是通过保就业进而拉动内需，进而提振股市。这因果关系是反向的。

陈平：保就业，保稳定，拉内需，促增长。股市它不是基本面，不要本末倒置。我再说得重一点，对每一个中国人，今天什么是最危险的？就是就业。因为它会让社会不稳定，社

会不稳定了，什么事也做不了了。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或者是大打折扣。社会的前进的步伐就会嘎然停止，就会某种程度上倒退。中国发生 1989 年那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邓小平为首的提出来稳定压倒一切。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什么事也做不了。

今天稳定的基础是就业，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就业。任何去提出来偏离这个直接目标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在今天都应该被当成人们的耳旁风。尽管说我们是允许意见表达，是可以多元的，但是在决策的时候，依然是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一个判断。

不应动用纳税人的钱去大规模去拖市，现在看来也不会去建立平准基金，第一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第二在今天没必要这么做。我们今天是要强化人们对实体经济的价值认同，这是一个价值回归，只有有了这个价值回归，实体经济才会重新走上康复的道路。我们受害受害在虚拟经济的泡沫，如果还要想方设法用泡沫来救经济，我想这也是咱们中国一些学者的伟大的发明。所以，今天在这儿我还是再次呼吁，全社会用尽一切方法，促进就业，增加企业的生存的可能性。

第 051 集 是否该救楼市应该让市场做主

主持人：有专家非常直接地提出，买房子就等于是爱国，那么您对此的评价是什么？

陈平：对于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我认为不是在救房市，为什么呢？我认为，它本身是减轻中国企业、购房者、包括租房者、房屋出租者和房屋转让者负担的措施。原来有些措施过分了，第一，交易契税高，让买卖双方都负担过重。第二，买卖二套房贷款的限制、限制境外人购房等，我觉得都不是合理的政策。

主持人：那些实际上都是在压抑需求。 把房价推得那么高，房地产商固然有获取暴利的一面，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30%到 50%，来自于这个房地产，难道政府不是在土地上的暴利吗？政府在里面成了一个土地倒卖者。

陈平：财政收入政府主要是依靠税负，这个税负干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自己本身消耗一部分，相等于是管理费，对吧，政府本身的开支，就相等于是一个管理费用，所以我觉得政府出台政策抑制房价的出发点是对的，房价炒那么高，对国家和人民都是一个灾难。

主持人：对，大家工作都没有安居了，肯定没有乐业嘛。

陈平：所以这样子，打击高房价是对的，我希望或者说我呼吁，尽管面临着经济危机，面临着衰退，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还是应该坚持打击脱离社会发展的高房价，打击这个肥了少数人的高房价，而保证社会居有其所，这也是维持稳定的最根本一点。

主持人：现在开始松绑，大家都认为是稳定房价，能够使交投活跃的一个措施，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最初的出发点？

陈平：第一个，政府不应该想着稳定房价，房价不是政府想稳定就稳定的。现在还接连发生了降价罚款，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就是要走出行政命令经济，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人搞降价罚款，这真是这个行政计划经济，这个老爷权力经济阴魂不散之表现。当然了，倒是可以用当年毛泽东的那句话，这个是螳臂当车。

决定房市能不能交投活跃，关键是整体的经济形势。当出口大幅度下降，当发电的企业去年还是电不够用，今年电就是卖不掉的时候，难道就房子就应该卖得掉，卖得火了吗？它的价格卖得高了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电用不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开工不足，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失业在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在减少，那么在收入减少情况下面，要想房子还卖得数量差不多，起码房价也是按照等比例下跌才对。房价还不跌，其他都变少了，就你不变少，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人们购买房子，是一个大笔的投资，都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讲，要动用很大的一块储蓄，或者说负很大一块债，这不是轻易容易下的。经济非常好的时候，有点是头脑发热，多买一两套还可能。现在经济不好，靠政府出台免掉一些税，减免一些买卖的负担，人们就肯买了吗？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救楼市心切，是因为地方财政多依赖于房地产兴旺，依赖，但是，当你遇到了这么一个经济危机，你就得面对它。你还想回到没有危机的状态下面，那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以为救房市就能够救经济，是天真的想法。

如果说买房子就是爱国，那不如说号召全体中国人全部买国货，不买进口货，那更加爱国，那还全面拉动中国经济，但都买中国货，我们的原材料那么都要靠进口，全球一体化时代国家用号召或者用行政权力都不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主持人：那就是贸易保护又要开始了。

陈平：那从贸易保护就会走向全球化的倒退，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我看最后就是战争。就是拿战争来解决问题了，这都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现实。

主持人：有这样说法，什么都能跌，就是不能让房价跌，因为国民经济约等于房地产，约等于民生。

陈平：房地产本身是一个产业链特别长的行业，如果说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可能整个链条里面紧跟着都要受到牵连，所以大家会把它看得特别重，但房地产在社会当中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它是安居乐业的保障，如果安居乐业都不能保障，还谈什么产业链条。所以买房就是爱国之类口号，只看了一面，没看到全局，而且还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买房子就是爱国，那不如说号召全体中国人全部买国货，不买进口货，那更加爱国，那还全面拉动中国经济，但都买中国货，我们的原材料那么都要靠进口，全球一体化时代国家用号召或者用行政权力都不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主持人：那就是贸易保护又要开始了。

陈平：那从贸易保护就会走向全球化的倒退，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那我看最后就是战争。就是拿战争来解决问题了，这都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现实。

现在的正确做法：就业、就业、还是就业，一旦失业了以后，保障、保障、还是保障。你只有增长了，房地产才可能重新变得好转。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你就按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权，买不买房跟我的收入，跟我的经济预期，跟我的判断是有关系的，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强迫不了，都做不到的。对于政府的救楼市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救楼市理解成为是按照曾经的高价位去救，让价格只涨不跌，这是做不到的事情，相反，应该允许价格跌到和目前的经济发展和目前人们的收入预期相吻合的水平，我觉得这才是救市。我对救市的理解是：不要人为去干涉价格，不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第 052 集　政府救市切莫越俎代庖

在中国中央政府调整房地产宏观政策之前，已确立了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方针。允许中国地方政府根据各自情况，出台“救市”政策。中国共有 20 多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先后出台“救市”政策。 12 月 11 日，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在江宁楼市的“年终总结”上表示，“为防止烂尾楼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出现，房管部门将查处恶意降价楼盘。”禁止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房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而就在不久前，保利、万达等 22 家开发商在沈阳市组成不降价联盟，承诺一年内不降价。同时，沈阳市铁西区区长表示，区政府将先期预存 500 万元，对参加联盟的开发商因为承诺不降价而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主持人：那么您怎么看这当中政府的作用。

陈平：世界上的滑稽的事情总是经常会发生的，五百家企业价格不降，并不能够改变中国房地产的走势，政府别说拿五百万，拿五个亿，也改变不了，这都是病急乱投医。政府病急，急什么呢？急他财政收入。

主持人：为什么那些企业他们愿意加入这样一个联盟呢？

陈平：他们希望都别降，我们先扛住，但是，靠一个地区的那么几百个房地产商，扛住不降价，结果就不降价了，就能够实现房地产的这个春天到来，我觉得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要求社会上所有的行为都是很理性的，这个经常会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一道风景线。那个政府的五百万奖励，更加是一个消化，证明我们的政府确实需要改革。

首先我们说这五百万管用吗，不管用，第二点，有什么权力拿这五百万纳税人的钱来奖励开发商？经过什么合法程序了，经过人大的预算了吗？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下一步的改革是第三次革命，这些政府出台政策的这些行为就证明了，这政府真应该好好地改革了。

只有发展经济，才是根本出路。今天国际市场萎缩了，只有发展内需，发展内需就必须改革，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激化存量，才能够激化内需，其他一切措施，不管是出于某种目的，还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还是一时冲动，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违背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的，马克思早说了，商品经济其中一条原则就是买卖双方的自愿，违背这个基本的准则，既侵犯人权，同时又是徒劳无益，还是危险的。

主持人：南京的物价局去查处低价售房，认为违反公平交易，那么，如果真的是二十多家房地产商联合形成一个价格联盟的话，恐怕他们当地的物价局也应该去查一查，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变相垄断。

陈平：这真的应该是反垄断了。所以我说像这样一些地区，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看了，要跑去投资都害怕，这可是让企业家望而却步的投资软环境。政府可以说完全是不讲理，不讲法，不尊重这个基本的商品经济规律，这样的地方何以能够投资？

主持人：为了拉动经济，有的地方政府出台这样一个措施，比如说本地建了一个机场，但是上座率非常低，所以政府要求政府官员出差的时候，尽量去坐飞机。那么像这种政府参与经济的一个行为，您又怎么评价？

陈平：这个也都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的预算几乎处在不受监督的状态下面，表面上投资这个机场又拉动了一点需求，但是第一，这个经济拉动是短命的，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所以也是低效的。第二点，你让官员都坐飞机，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钱从哪儿来的，那都是纳税人交的钱，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

所以，政府要多把脑筋动到正路上，第一增加社会财富，第二，更加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 而更加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才能把财富的增长效益激发出来。其中非常重要一点，是机会的平等。政府对于不该拥有的垄断权力，应该放弃，让渡于民。人民有了更多的创业的机会，社会财富就会增加，增加了社会财富，房子也能卖掉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加了，人民的生活也会过好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了，这是正道，你刚刚说的那些，都不是正道。不是正道，有的时候还是危险的，

就像现在有些所谓抵抗金融危机的办法，就是简单地去增加投资，而投资什么呢？投资一些生产需要的基本建设，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说到底，第一，还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二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第三，是固有增长模式面临资源再不能够有效供给的危机。这么一场危机，老路已经走不了，按照已经过剩的领域去投资或再投资，以为这样就能够创造需求，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雪上加霜。因为生产过剩的状态又有了新的因素，这个新的危机的因素，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二是一个新的概念，叫有效需求的潜在资源。

主持人：怎么讲？

陈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都是有一个度的。到了那个度，需要就递减了。现在已经出现全球手机第一次销售量减少，就是因为有效需求资源已经快用完了。所以我说本次经济危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有环境资源难以为继的硬约束的危机，也有有效需求资源近于枯竭的危机。所以只有我们转变增长方式，开拓新的有效需求的领域，那么才能够使我们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增长。所以我再次地强调一点，就是改革走新路，是全人类拯救经济

的唯一出路，中国来讲，尤其任重而道远。因为我们需要改革的这个内容更深更广。

第 059 集 只有拉动民需才能促进消费

主持人：学者博兰克讲，美国人太爱消费了那么中国人是太爱储蓄了，那么您觉得这个话有没有道理？

陈平：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现象的描述，因为爱消费，并不是美国文化的本质现象，不是美国文化的固有现象，因为美国是一个新教徒创立的国家，基督教新教徒的基本论点并不推崇消费。我想任何一个知道美国历史的人，任何一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一方面他们也会看到美国人浪费的一面，但也会了解美国人节约的一面，博兰克对一个现象有描述，你到餐厅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吃饭，那中国人在吃饭上的浪费远甚于美国人。第一美国人不会点那么多，尤其不会为了面子点那么多，第二，剩下来打包带回去在美国很普遍，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影响面子。而中国人，到餐厅经常一点一大桌，点得不丰盛就没面子。然后吃不完，筷子一推，就走了，扬长而去，觉得根本就不在乎。谁浪费？

所以我说，说美国人太爱消费，是现象描述，不是说的原因。

主持人：那么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因是美国人在这些年当中，被经济增长的一种需求所裹挟，不得不太爱消费，不得不过度地消费。

主持人：为什么是不得不。

陈平：他是被挟持的，是被什么挟持的呢？是被增长的需求。应该说是被全球增长的需求所挟持，不得不过度消费，我们可以看怎么挟持的。利率越降越低，格林斯潘推动美国经济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利率。

那么利率那么低，这人们肯定想，我不能存钱，存钱是亏啊，那还不如把钱变成资产，比如买房子，或者变成消费，我还是得到了实惠，所以金融政策驱使着美国人不存钱，然后先是有一个科技网络的一个泡沫，当科技网络泡沫破了以后，金融杠杆又制造出来房地产的泡沫。一方面利率越来越低，另一方面，购买资产包括房地产的门槛越来越低，代价越来越低，一头是挤，一头是拉，他怎么可能不消费呢？

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杠杆，资产又转变成为美国人再消费的能力，而全球化效应又让美国超市里面东西是越来越便宜，而且买了东西，都可以无条件地退换。所有这一切，都是想方设法诱惑美国人去消费。此外，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和文化时尚，把拥有更多的奢侈品作为高贵、时尚，高雅的生活。就这样从文化、价值观，到金融政策等社会经济结构，都挟持着美国人过度消费。

主持人：观念上也被洗脑了。

陈平：对，但，但是可能我说到这儿，人们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增长的需求，因为这一个人类的文明形态和生产模式不增长不行。不增长，你社会就要出问题，不增长，人人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在衰退了。所以罗马俱乐部提出零增长，但是零增长也是在工业文明的大圈圈之内，其实是做不到的。那个圈就像个雪球一样，它必须越滚越大，它才能够继续滚下去，它要不滚不增大，它就会化掉。这是我对美国人爱消费的一个解读。

主持人：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您怎么分析？

陈平：我刚刚说了中国人在餐桌上面那种浪费，就从这个现象来看，中国人不是不消费，中国人可以说还蛮爱浪费的呢。那么，我们要看哪些人在储蓄，这些人为什么在储蓄。不爱消费的储蓄，多数发生在中低收入阶层，也同时是缺少资产性保障和社会保障的阶层。什么叫资产性保障，也就是资本，就是我们说叫做生产资料，中国大部分人都不拥有资本或生产资料，此外，很多人存钱为了买房子。存钱养老和预防意外，存钱教育下一代，存钱预防生病，所有这些他不靠储蓄怎么办？这叫做不得不储蓄，不是中国爱储蓄，是中国不得不储蓄。像中国的八亿农民，一方面农村的自然经济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土地越来越少，可在城市里打工，又缺少社会保障，连城市人的身份都不是，他怎么会不存钱啊。

主持人：对，他唯一能靠得住的将来，可能就是这些储蓄。

陈平：中国是不得不储蓄。再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的消费占的 GDP 的总额的比例，是越来越低，政府支出占的 GDP 比例是越来越高，一个是从百分之六七十降到三十几，一个是从百分之十几涨到三十几，那么肯定是民间的相对消费能力越来越弱了。

一方面是不得不储蓄，一方面是能够被消费的钱相对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是越来越少。所以博兰克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所以他对中国的国情也没说对，中国人是不得不储蓄，不是说中国人爱储蓄。

主持人：面对这次经济危机，最最核心的是能够让人们当下要消费，这样才能有内需，能够拉动增长

。

陈平：对明天没有底，今天怎么会为当下消费呢？

说起来我又要说到房地产，把房价搞得超过了中国大量需要房子的人的支付能力了，房价越高，人们更加是不愿意消费，中国人存钱买房子是最大的心病，看着那么高的房价，他肯定日常消费尽量地节省，把钱存着去买房子去。所以现在说救房市来拉动中国经济，一方面是不道德的，一方面也是错误的。同时，又是愚蠢的。

主持人：不道德在什么地方？

陈平：住房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人为地把房价搞那么高，认为是拉动经济，这本身在道德上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同房地产政府把卖地作为主要财政收入之一，这本身就不道德的，是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当然了，我这地方替中国房地产商说一下，房地产商被那么高的地价、财务成本所拖累，除了少数官商勾结者，大部分也是赚不了太多钱，但总体上，指望房地产的暴利，并且把房地产鼓吹成为国民经济，拯救国民经济的法宝，是不恰当的。

救经济要靠拉动内需，当然，我不主张用内需的概念，而是用民需的概念，民众之需求，为什么我提这个观点，因为中国政府的支出数量已经太大了，政府这么大的支出，其实是压制、剥夺了民众的消费。民需才是真正的内需，官需不是真正的内需。民需是真正拉动经济的，官需是毁坏经济的，所以我说，我建议以后改改说法，我们怎么样拉动中国人民的内需，简而称之民需。

主持人：要区别一个，这个钱到底是谁在花，是老百姓在花，还是政府在花，那这背后是不是有，与民争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财富到底是放在谁那边的问题。

陈平：对，这三十年我们看了一个趋势，从绝对角度，中国老百姓是比以前生活好了，比以前富裕了。但是从相对角度来看，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是加速了这么一个趋势：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市富乡村穷。应该使国富民穷，变成民富国强，这样子，民需就自然地蓬蓬勃勃地产生出来了。也就不会再说什么爱储蓄了，人家现在不得不储蓄啊，而且储蓄那么一点点钱，有时候为了想挣一点钱，还给这个股市里面，给洗掉一大块，中国老百姓够可怜的了。哪有那么多钱消费？

另外一个，政府别把财政收入寄托在土地上面，这是在谋民众的根本生存之利啊，是在与民争基本生存空间之利啊。最应该做的，怎么样把我们连年节节攀升的政府的消费减少一些，总之，我认为刚刚那个博兰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仅仅是一个现象的描述，美国人消费过多，是这个增长模式所挟持的状态下的结果。中国人的储蓄，是不得已情况下面，对于消费的缩减，而不是因为有储蓄的偏好。

第 060 集　就业率比 GDP 更重要

主持人：衡量经济危机有没有走出去的时候，常常还会用一个指标就是 GDP，比如在中国大陆就很现实的，就是 8%，您对这个 GDP，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陈平：我是不赞成把 GDP 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的。尤其对于我们目前应对这场危机，如果只强调 GDP，更是会使我们的很多应对危机挑战的政策，往往会走上事倍功半，或者连事倍功半之效都达不到。

首先来看，为什么提出来要保八，这是以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我们有大量的就业的压力，压力来自两方面，城镇每年的新生的就业人口，和农村每年需要向城市转移的就业的人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没有一定的增长，就消化不了。这里有一个既是统计的，又是经验的数据。就是这个中国的就业压力，只有在 GDP 不低于 8%的情况下面，我们才能够基本稳定，低于 8%，就会出问题。所以保八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除了就业压力以外，需要这么高的增长率，还有我们的体制的原因。

在所有制上面，国有占的比重过大，可是，尽管国有的资产比例较高，但真正能够带来民间财富的增加，带来很多就业的，却是非国有这部分。中国的中小企业或非国有企业，在

吸纳就业上面占了70%多，而他们在资产占有方面才只有20%多，国有的在就业方面仅仅是解决了20%多，但是在资产上面占有了70%多，这就导致我们需要有8%这样的高增长率，才能够这基本解决就业压力，所以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所有制的问题。

其结果是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必须要保八，才能够这个使社会相对稳定。而长远来看，必须要通过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危机的挑战，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保八。保八的结果，反倒可能会使解决就业的效率更差，国民财富的分配上面更公平，因为保八可能会加大国有对于资产的占有量，那么可能会加大人们在机会面前的不平等。

主持人：一旦这个指标单一化，可能其他的指标，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陈平：对，因为最容易实现保八目标的，那就是投资，主要靠政府投资、银行指定贷款，然后国有企业花钱，这样统计数据容易达到八，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失业问题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里面并不能够真正缓解，甚至还会恶化。

因为更加增加了低效率的资产。以保八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它整个导向就是低效率的，这个低还包括两方面，第一投资回报的低效率，第二个，社会财富的积累的低效率，第三是这个提供就业的低效率。 正好与出发的目的不相符合。保八出发的目标是因为就业的压力，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标准，一个目标，成为政绩的考核，那么它会这个偏离原点的目标。

主持人：就是有可能是为了保八，反而会伤害就业。

陈平：为什么西方它一二就已经繁荣，我们八还是刚刚好，能够维持，那就是我们存在这些问题，存在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市富乡村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怎么样改变这个状态呢？要推动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包括大量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去改变状况，说道理是没用的，你必须要量化到一些指标上去，把这个指标变成一个考核的业绩，

不可否认，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或者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想一步变成市场主导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也不现实。大社会要有大社会的结构，多年来的一元化的集权体制，使这个社会没有能承载自身公共使命的一些结构，也就是没有真正独立的社团，所以即使现在执政当局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愿意朝这个方向来走，你也没法快得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过程，我们还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但我们又要应对这个危机的挑战，又要尽可能地把这危机造成的伤害减到最低。所以我们这时候，又不得不来继续来用这个大政府来做事。既然要大政府来做事，政府一定是靠政绩指标考核推动，所以我就想，用什么样一个指标，能够让上上下下政府官员把他的力量和驱动力，用到我们希望的那个方向去。

主持人：那么现在您觉得，如果不是GDP的话，我们用哪些指标，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陈平：那么我主张用就业率这个指标，当下最重要的是就业，此外，还可以用就业用人均收入，或者是人均消费这些指标吧。我先说以就业来衡量，这时候既然大政府嘛，肯定资源的分配权还在政府手上，那么好，就要求你用这个权力来保障就业。当然，刚开始可能会用行政手段命令企业不能裁人或者是必须招多少人，但最后他一定会发现，如果过强制命令，企业可以关门不干。

主持人：更大的麻烦。

陈平：又怎么办？、用行政命令不让企业裁员不行，更加是大规模失业，这些大政府的大大小小官员们因为责任在身上，他自然会想办法多扶持那些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它很多是劳动密集型。

主持人：它的吸纳能力会更强。

陈平：它不管它是体力劳动密集，还是脑力劳动密集型，扶持它，它能够多吸纳就业，这时候，他就顾不上他所谓的亲儿子国有企业了。那么他自然会偏向于谁能给我多创造就业，我就支持谁。这时候，就创造了社会的消费能力。那么人们的收入也就会增加了，而且的话，各地方政府也就通过创造就业，实现了维持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职能也就发生变化了。

我这罗里罗嗦说了半天，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还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一个格局，怎么样来承认这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前提下面，来用这个大政府，来迎接这个危机的挑战。同时实现一种转轨。那就是改变指标体系。

主持人：要把这个指挥棒给改了。

陈平：改变政绩的指标体系，改变政绩指标体系，就不要再说 GDP 了，而是说就业率，而是说这个人均收入，居民消费，这样子，让所有的这个大政府里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以促就业来促进人们的收入，促进市场的繁荣，促进人辖区内人民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怎么促进？那就有舍才能有得。舍什么？舍掉原来这个大政府权力控制下的垄断的这个产业空间。

主持人：其实就是减少政府的利益，减少国有资本的利益。

陈平：他减少了，让他有所得了，得什么，得的是政绩。得了政绩是为了什么，别说好听话，是为了乌纱帽，这样子，这个改变一个指标体系，就是事倍功半，就会实现一个。

主持人：事半功倍。

陈平：对，事半功倍，我刚才说错，就是说改变一个指标体系，把它作为新的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那么它必然会推动我们政府体制的改革。从大政府着手，向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

第 065 集　放开市场才能解决就业难题

主持人：中国政府也推出一些举措支持就业，那么对于这些措施，您觉得它的效果会怎么样？

陈平：一般，效果不大。第一，鼓励到基层就业，到基层什么地方？大学毕业生出来不到基层，难道都到社会高层去？一是到中小企业，可中小企业本身日子都难过；一是自己创业，目前条件也不好，各种风投不是闻风而逃，就是蜇伏下来过冬了；一是到国有企业，可据我所知，很多企业都在停止招人了。　就业，还是发展是硬道理。

主持人：那么就是发展什么，怎么发展？

陈平；问题是民需，是民间之需求，民间之消费。只有发展起民需，你才能够让大量的这个中小企业充满活力。

主持人：对，才能提供这个新的就业岗位出来。

陈平：怎么样能够提升刺激民需呢？我在上一期已经说了，在一个大饼不增长的情况下面，只有通过利益、资源、机会的转移，才能实现民需的增长。就这么一块饼，那怎么办？让出来。首先是让出机会来。

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有企业来做的事情，极少数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做的事情，其他一律公民面前，一切平等，一切机会平等。机会的这个让渡最优先，因为只有机会的让渡，这才是长远的考虑，才是发展所必需。包括直接的给钱都不是发展所必需，而像是一种救济。救济不是发展，解决不了这个庞大的就业压力。基本建设也不能完全称之为是发展，发展是具有活力的，发展是有载体的，发展是要由大大小小的、充满活力的，走向未来的企业来承担的。有这么多载体的活跃起来、生长起来，你怎么可能解决那么多就业。

主持人：中小企业是承担了就业的主体，而在目前，恰恰也就是中小企业他们是遭受损失最大的这样的一批。

陈平：在这个社会的机会的不平等当中，中小企业是最弱势的。所以在经济危机下面，中小企业也是首先受冲击的。

主持人：那么，和就业相关，让渡哪一些空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陈平：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文化服务业，现在我们文化服务业都是高度垄断。此外，由国企垄断来做的，但是效率很低的一些产业，能可以让出来，包括像金融，甚至一些军工业，都是可以开放的。

主持人：中小企业需要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离他们又近，在信息获取、信用的判断上又更方便，这个路能放开的话，相信也是一个不错的市场。

陈平：应该这么说，就不该搞成除了官方金融，还有民间金融这一说。金融就是金融，国是人民的，什么叫官方和民间，应该说，民间的才是正常的，垄断的是不正常的。

主持人：除了像金融之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医疗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陈平：对，医疗肯定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垄断。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也是看病难，但是看病倒是不贵，除此之外，什么都困难，都要票，为什么呢？是因为计划经济，更加垄断。所以一方面，人大量地失业，一方面又没有服务，这都是因为垄断的结果。那么现在我们买油不要油票了，买粮不要粮票了，买草纸也不要草纸发票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而为什么现在看病难，还是看病贵，怕看病，因为还是垄断。

当然，有人会提出很多理由，就是医疗嘛，是直接关于人，好像一放开，就不得了啦，我觉得这是托词，是对于垄断的利益不肯放弃的托词。放开来，怎么保证医疗的质量，保证对于人的生命的责任？那就要问政府是干什么的了，不是要政府自己去行医去，政府卫生部门就是行使监督管理责任的。所以政府本身，不能因为是民间做的事情，出了事政府就不需要负责任。全社会每一个角落，出的事情政府都有责任，谁让你要执政，谁让你要当管理者的。对不对？那管理者责任就在这儿。

医疗服务这块，你放开来，它本身又会形成一大块的这个就业。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教育，有没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个更开放的市场，进而有更好的服务，能够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现在设置了很多门槛，来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实际上都是是因为教育部门在卡着，以我看，教育部自己就不应该去管学校去，所谓公立学校就是由纳税人的钱来办的学校，应该接受教育部门的监督，但不是说它就属于教育部。

主持人：我倒想起一个比喻，就是教育部的部长不应该是大学的总校长，而应该是制订政策、设立标准的这么一个角色。

陈平：所以也得脱钩，只有脱了钩，他才能履行好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不脱钩，他就是一个部门利益的总代表，肯定是找出千百般的理由，来反对向民间的开放。不过这点很可笑，他难道不是人吗？等他退休了，回到民间了，他也会对这个垄断很不满，但他只要在那位子上一坐，他就屁股指挥脑袋，还是围绕转既得利益，所以我说，根本一点，还是体制改革。

主持人：那么回应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和失业相关的问题，那么您的回答是什么？怎么解决？

陈平：我的回答还是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的重新配置。

第 066 集　缩减政府开支是救市的必须举措

主持人：从 1951 年到现在的国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重的变化，您是怎样的感受？

陈平：我的感受是政府越来越大了，同时它的效率也越来越低了。一个庞大的，臃肿的、官僚数量众多的政府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对于这个执政者本身，都是不利的。

主持人：那为什么对于执政者本身会是不利的？

陈平：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希望国泰民安。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消费比例很大，它也是一种内需，但是，这个内需和民需、国民的消费是有区别的。国民的消费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市场而运行。而政府的庞大消费，它是不可持续发展。今天中国遍布大江南北，政府的机构盖的这楼堂馆所，比如他们的办公楼。包括办公楼前的广场，可以说超过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规模，威严状态也超过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衙门，这种政府支出的庞大，只会导致政府走向低效，走向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体，而逐步地偏离了人民政府的本质性的要求。

这本身是权力缺乏制约的必然结果。权力缺乏制约，就转而依靠这个有权人本身的觉悟，我再说一个岔开一点的话，这觉悟两个字怎么来的，这觉悟是宗教语言，是宗教词汇，觉悟是不能治国的。这么多年来，政府的开支所占的比重，能够上到这么高，而人民的消费，节节下降，说穿了，就是权力在不受制约状态下面，尽管这个我们的执政者所追求的是公平的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但是执政党高层可以管得住自己，管得住他身边的人，他难以管得住那么几百万，几千万的官吏。

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总是会出现，民间在社会财富中占的份额一步步减少，而庞大的官吏集团占的份额越来越多。最高层也越来越着急所以从这点来说，你必须要把权力置于强大的制约之下。过去我们只是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仅仅是从腐败的层面上来看待问题，我要说的，绝对的权力，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而且是社会国家绝对的会失去平衡，我相信，对于执政者，也是不愿意看见失去平衡的。

主持人：面对这一次全球的经济危机，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开始表态，要对政府开支来做一些减少，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提出来，要实现政府开支的零增长，那么这种举措，您对它怎么评价？

陈平：我认为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还是为了国家民众的福祉，哪怕就是为了执政者的一个利益，这些举措都是首要之选。目前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地不够。我认为不是零增长，应该是负增长。应该拿出一个减少的指标出来。比如说用几年的时间，从财政收入占 GDP 的 28%降到 18%，并且把政府的预算开支变成真正人民可监督的。

主持人：其实我也注意到，在前不久的时候，像中央的领导人，也曾经说到就是一个词叫共渡时艰。其实这个共渡可能就包括比如说政府和老百姓一起来共渡。

陈平：仅仅是零增长不是共渡，零增长实际上是没有共渡，为什么呢？因为经济萧条，买什么都便宜了，此外失业者也减少了消费，政府仅仅是不增长，这叫共渡吗？必须减少自己的开支，必须面对 28%这一个比例的数字，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为人民，为执政者自己，都应该下大决心，来压缩政府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主持人：提到共渡时艰，想一想在六十多年前，曾经当时的解放区所发起的一场这个大生产运动，那个时候是政府和这个居民一起来共渡时艰。

陈平：但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大生产运动呢？因为日子很难过，1941 年皖南事变

以后，当时的国民政府给的钱少了，有些就不给了，因为搞摩擦了嘛。另一方面呢，日本又开始了更加残酷的一种清剿，我可以这么说，不是觉悟导致了大生产运动，而是为了生存。

反过来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也是一种挑战。因此的话，我们希望这个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能够下大决心，发挥中国共产党当年大生产的那种魄力、勇气、决心，来大幅度消减政府的开支。大量地走到推进有效需求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主持人：那就是一方面是减少这个 28%，另一方面要把目前这 37.5%的民间消费让它变大。

陈平：现在提出了那么多项目，叫做拉动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包括一些社会保障的政策，甚至直接给困难群体发钱的举措，但是还有最关键最根本的一条没有做到，就是政府权力仍不受制约，开支依旧过大。首先应该牺牲自己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全民共渡时坚，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的转型，走上和谐的社会。

主持人：对，政府的开支做减法，老百姓的开支做加法。

第 071 集 还财于民才能启动民需

主持人：在前面我们讨论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曾提到马克思的定义：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在您理解，占有两个字怎么看？

陈平：传统的解释就是占有，也就我拥有，我所有，但是我觉得这种解读本身是过于绝对了。它把法律上的所有或者说被法律所保护的所有叫占有，它忘记了占有还是一个时空的概念。不管是占有也好，所有也好，都有两个属性，第一个，时空属性，第二个，目的性。

主持人：那么我们先从时空属性开始讲。

陈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占有关系因此也不断地变，所以占有本身是有时空属性的，第二个，尤其是生产资料，它本身就是与社会经济活动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要素本身是运动的，既然是运动的，它本身就是有时空的。

第二，对生产资料来讲，占有和支配要服从于占有和支配人的这个目的性。马克思所说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说的就是私人占有，光考虑自己。

主持人：每个人都是从利己的角度来出发嘛。

陈平：但他没有考虑到社会，私人占有如果是为了满足自己，生产资料就没有发挥为社会的功能，或者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就是导致经济危机。但是，如果要公有，怎么公有法？一个房子，一个车间，一个工厂，终归是要由人来行使支配权。

普遍地可以看到，私有的占有会显得更节省，非私有的，包括公众上市公司，都会显得花钱更大手大脚。公共公司的这个高管的薪水，一定是远远高于私人公司的。但对于长久的考虑，那肯定是占有者考虑，支配者是不考虑的。此外，难道支配就不是占有吗？既然任何一种占有，都个体的活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时效性对于这个占有和支配都发生作用。从时效性来说，支配是一种最坏形式的占有。

主持人：目前在很多国家，公有的成份正在减少，美国的国有企业呢只占 GDP 的 1.2%，那么像印度和意大利也就是到了 12.5%和 14.5%。

陈平：我觉得说是两层含义，第一，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论断不能成立。因为公有也是占有，公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上面去。在目前，有这么一股思潮，尽管这个思潮成不了气侯，但是为了我们人类不要再去走那个弯路，我还得要说，公有的路，解决不了本次经济危机，别以为美国政府在救市，把一些金融机构变成政府控制了，英国政府也直接注资银行了。但是要知道，这时候采取这种形式是救急，不是一个常态。

要记住，公有是解决不了危机的，公有思潮只会加重这场危机。刚刚前面我从理论上饶舌了半天，想说明的是，私有是私人占有，公有制还是私人占有，无非占有两次，变成支配权了，还是受自己的目的支配的。

实践证明了，这个公有制不是发展经济的良方，实践证明了，放权让利是搞活经济，造福于民，最后也造福于国家的一个正确的道路。

主持人：那实际上就是从形式上的公有，事实上的私有，变成从形式上和事实上都是私有，能够大家能够真正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这个生产资料。

陈平：对，因为这个形式上的私有，并不排斥一部分产业的公共权力的管理，确实是有一些产业，它是需要公共权力管的。但是呢，公共权力管理，不等同于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管理。

主持人：那么怎么实现？

陈平：这私有产权和公共权力管理，这两者是可以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另外，我们说什么叫公有制？公有制就是也叫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有体制，国有经济。什么叫国有经济？是国家政府代表人民来管理的，那么它还不是私有的吗？

无非是在这个概念下面，法律保护公有，真正的所有人反倒不去保护去了，于是所有人对这个财产是既监督不了，也享受不了。我不反对公权力的对于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产业的管理控制，但是，控制管理，不等于公有制。

这里面我们还全民所有本来面目，政府是为了公共利益，来对它行使管理，就是国营，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概念，比现在国有还准确一点。

主持人：国营和国有，它是有区别的。

陈平：对，就是由国家来经营，就由政府来负责经营。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我们体制的一个创新，就是现在的国有资产，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人民所有、国家经营，叫国营。

主持人：您特别讲到了一个以前常说的一个词，国营，那么您好像对这两个字，寄予了特别多的希望。

陈平：我觉得呢，国营比国有，第一更加合法，更加准确，国营是政府受托经营，全民资产怎么能成国有呢？在今天，为什么我重提这个概念？因为现在我们急需的是要抵御经济危机，要拉动民需，只有让人民能够从这个国营这块巨大的存量资产当中，能够落实了这个所有权，也就落实了所有的权利当中最核心的分配权。这个人民才有资产性的消费能力。

今天的中国的民需不足，因为人们只有收入的消费能力，而没有资产的消费能力。人们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那些长期问题，一些，一些不得不解决的一些需求，还要把收入里面相当一部分再拿出来，进行资产性的。投资啊，储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你肯定是民需不足，而且肯定是一个低效的高增长，从社会来说，我们希望要有的是一个高效的的增长，我们现在急需要完成和转型，就是还人民资产消费的能力，怎么还人民资产消费能力，国有回归到国营，国营回归到人民真正行使所有权和分配权。

第 073 集 大中华经济圈共对危机

主持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香港就曾经借助了中国大陆的力量，平稳地度过了那次经济危机，那么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您觉得四个经济体和文化体的一个合作，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陈平：1997 年是一次金融危机，它不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概念小于经济危机。那么今天我一再说了，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个危机，它使我们整个的世界都要为之改变，

主持人：如果是这样，对于这四个区域来讲，他们所经受的挑战又在什么地方？

陈平：今天港澳台大陆，在经济层面已经是一个经济体，无非是这四个地方的管辖权状态有差异，在政治制度上面有差别，但是，经济上已经是同一个经济体，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了，都是一个大中华经济圈，而整个大中华经济圈就是亚洲模式的发展和扩大，那么今天，当这一场经济危机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时候，不能够再把这大中华经济圈里面的四个地区再分开来，而是要按照整体的考虑。如果说在这场经济危机之前，大家日子都很好过，到今天，我觉得必须四个经济体要做一体化来考虑。

主持人：那么这个一体化，通过一些，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加速它的一个实现？

陈平：我的建议对于台湾朝野，包括香港，乍一下听起来可能难以接受，西欧包括现在东欧都能走上欧盟的道路，大中华经济圈里面的港澳台大陆在政治制度和政治观点上还存在分歧，但经济上已经是连成一片，无法分你我了，那么首先是否能考虑面对这场经济危机，建立一个经济事务的常设的联络机构，常设的协调机构，进而对经济生活进行一系列梳理和规范。我觉得这条路，迟早要走的。

而且危机刚开始，来势凶猛的一拨又一拨还在后面，不仅是对着大陆冲来，也是对着香港冲来，也是对着台湾冲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可以各唱各的调，经济上，可没法各唱各的调了。经济上，必须唱一个和谐的交响曲了。否则，只会延长危机的时间，加深危机的痛苦。

主持人：其实当冬天更深的时候，人们是需要挨得更近一点，能够相互取一点暖。

陈平：　　港澳台大陆本身哪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用的都是汉字，，认同共同的祖上文化，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也是亚洲模式的深化和发展，如今，文化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已经融化成为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在就业问题上，在分工问题上，在贸易政策上面，在金融政策上面等等，可以设想，在这一系列方面如果大中华经济圈能够参考参考欧盟，你会发现这将带来很多很多好处。首先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会强多了，另一个则会引发推动大中华文化的复兴。

主持人：大家在融合当中，创造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一定是从共同的文化来的。

陈平：我今天强烈地呼吁，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联盟的机构。我认为，需要有大中华经济圈，就港澳台大陆，政府、金融、工商，各界人士有代表，各界这个阶层有代表参加的一个，一个这个协调机构。今天经济这个紧密到了如此的程度，还是没有一个哪怕你清谈的沟通协调机构，也是大大地有利。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现在有国共两党的什么经贸论坛，这个有大陆香港的不断地有一些定期的，不定期的会商。

主持人：对，包括 CEPA 这样的一个机制。

陈平：我建议是先向欧盟学习，这样子，会使我们面对这一场经济危机，大家日子都好过一点。

现在看了很多这个舆论，香港经常说希望大陆送大礼，光送大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大礼送的越多，它自身能力伤害，丢失的越多，对不对？台湾江丙坤几次带队到大陆，希望大陆政府能够帮助台商。但这都是双边性的，我觉得现在是在经济层面一体化的时候了，在经济议事层面，应该是四边互动，不是双边。

主持人：而且也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是应该多向的。

陈平：先把政治上的分歧放在一边。我没有谈到很多具体的形式，无非是通过这个呼吁，需要改变一下的观念，用这个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来探寻新的模式，现在有上合组合，我呼吁尽快建立中华经济圈合作组织。而且要有常设机构，这就是我今天谈的主要的观点。

第 076 集 产业振兴的关键是振兴需求

主持人：中国政府强力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那么您对它未来的这个影响，怎么看？

陈平：我们要具体的产业具体地分析。

主持人：我们先从这个钢铁业开始。

陈平：钢铁最大的市场需求可以说是基本建设，包括各种高速公路、铁路、码头，此外还有房地产、汽车和造船，。说振兴容易，但卖给谁？在三十年前是一个短缺经济，振兴是满足需求。现在是需求不足，需求减少，你振兴到哪儿去？钢铁业本身不是最终消费产品的产业，最终需求不足，钢铁怎么振兴呢？我理解这个钢铁产业振兴的这个用心，但我可以这么说，难以振兴起来，因为市场需求在哪里？

主持人：钢铁产业这个规划出来之后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振奋的，认为可能有利于解决目前钢铁行业集中度不够，优质钢的产量不够等状况。

陈平：我们能够今天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已经知道了是因为需求不足。现在是首先要拉动需求，创造需求，才能够振兴产业，没去创造需求，产业怎么振兴？所以说这个规划还是想走投资增长型模式。可三十年的投资增长型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有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现在国际市场不旺盛了。

主持人：第二个是汽车产业，我们刚才也稍微说了一。

陈平：汽车我觉得不需要太多说了。怎么振兴去？卖给谁？中国能够到达美国那样的汽车消费水平吗？人均都有车，也就是说人均都不止一辆车，可能吗？不可能。现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堵车快成了世界之最了，你说我们再修路，可它还会继续堵，因为你修的路越多，你这个车子在路上跑的里程也越多，对吧。所以，从交通产业，我不赞成提振兴汽车产业。我们应该提的是，交通产业振兴。就是怎么样在公共交通上面做文章。让公共交通变得快捷，方便，舒适，胜于个人轿车的交通，那么这样子，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承认个人也很喜欢个人轿车。因为我也是自私的嘛，但是同时，我又是矛盾的，我知道这不是长久的。不是社会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禁止私人小轿车，但是这里面，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和一些经济的方法，来让更多的人去选择公共交通，这是政策条件。从另一方面呢，把振兴计划放在公共交通上面，让公共交通变得越来越方便，

舒适和近似于私人交通工具。所以我说提振兴汽车产业，不如大力地提出振兴交通产业，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交通产业。而不是汽车产业，这是我对第二个振兴行业的一个评价。

主持人：第三个是纺织业。

陈平：我们的纺织现在已经很庞大很发达了。这个产业已经产能非常过剩了，生产技术也都不差了，振兴这个产业，还是要创造需求。说到服装就很明显了，创造需求首先是人们要有钱愿意多买衣服，买好衣服，多买几件，这个产业本身很发达，中国的纺织业很厉害，缺少的是需求。

主持人：那么下面这个装备制造业，我的感觉和钢铁是一样的，后面的还有船舶、石化、轻工、有色金属、电子信息。

陈平：船舶现在本身这个船舶已经是，这个造船业是一片萧条。 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都会是非常萧条。所以，我们振兴这些产业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出路在哪里？为什么要振兴。是因为供不应求要振兴，是因为现在这个生产能力差要振兴？还是因为现在这个技术水平低要振兴？但是所有的产业目前都是满足需求的。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振兴需求是关键。

可能我们这些专家们认为振兴产业就是振兴需求，因为产业振兴了，人们也就是有工作做了。 但是，不失业的前提，是这些产业的产品，是有很好的市场，而且还有不错的利润。现在呢，我们这场危机本身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生产过剩的状态下面，你去振兴生产过剩的产业，去加大这些产业的投资，只会得不偿失，加重病症，而且是消耗掉了一些宝贵的社会转型的资源，得不偿失。

只有朝阳的，才是有前途的。只有朝阳的产业才会给社会提供良性的有效的就业需求。只有良性的有效的就业需求持续地增长和扩大，社会消费才会增长，才会由这个消费增长拉动一个个产业，才能真正振兴，振兴是市场的振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振兴，不是说政府强行说振兴，或者给了些资金就能振兴的，那么有的时候这是强行的保护落后，其结果是对谁都不利。

振兴产业，有一个对产业的选择问题，选择的标准，我刚才说了，是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振兴产业要振兴需求，振兴需求除了按照在产业发展上面的选择以外，还有就是体制的改革。所以说，产业振兴计划，和体制改革计划，应该同步进行。否则，即使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但是，需求上不来，仍然是事倍功半，或者是吃力不讨好。好事也做成了不好的结果，所以这里面就是要把需求给拉动起来。而在对中国而言，这个需求拉动，更关键的是民需。而要想拉动民需，就首先要改变国富民穷的这个状态。改变国和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改变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变成真正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受制于人民的政府。这样子才能是，人民创造了财富，大部分人民享用，极少部分是政府用它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这个今天谈这么一个话题的结论。

第 078 期　股市开门红不是经济复苏的代名词

主持人：这一轮分外地抢眼，尤其是在全球这个经济形势当中，那么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陈平：我的心情是这个更加地担忧，为什么更加担忧？股市是一个晴雨表，那么它会率先对经济的发展作出一个反应，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在减缓，甚至是这个严重地下滑，那么股市开门红，可能是反常的。

主持人：这是您的一个判断。

陈平: 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三十年一步步成功的是外向型经济。当外向型经济萎缩，那么请问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从何而来？难道是内需一夜之间冒出来了吗？

主持人：领涨的这些股票，像钢铁，汽车，这些都是和产业振兴的规划提出有关系，最起码是有一个概念来支撑。

陈平：也就是靠一些消息来判断这个股市的好坏，然后决定自己该不该投资，但是，把这样形成的股市的波动，就理解成为经济形势的好转或者恶化，这本身是不科学的。

主持人：为什么呢？

陈平：一个健康的股市，是建立在企业的真实的业绩上，从这点来说， 2009 年春节过后的所谓的开门红，股市大涨，我看是投机为主。就是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而言，或者说是投资机构而言，现在的资金是很宽松的。为什么？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面银行信贷大幅度增长，而企业贷款和去年同期比还下降了，那么一看就知道，一部分资金会流向股市。

我觉得股市这么上升，而且和经济的基本面如此地脱节，不是个好事。现在真正要帮助的是外向型经济的企业，第一在市场大幅度萎缩条件下面先活着，从依赖于国际市场转变于开拓国内市场，第二，从代工加工，走向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做这些事，都是需要钱的。

主持人：但现在钱是流向了虚拟经济，没有在实体经济上。

陈平：这个开门红，我看不是一个好事，本身这次危机就是因为泡沫过大，虚拟经济过大，现在应该政策导向、舆论导向、或者利益导向资金向实体经济上去，所以我说开门红现象只会延误对于这场经济危机的应战。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我认为下个星期上升的势头一定是风光不再了，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好的基础。

主持人：那么股市的一波行情其实既不能代表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它本身也不能成为让经济复苏的一个救市之道。

陈平：只有国民经济真的好了，这个股市才会真正得好。股市的这种所谓的开门红，我的结论是应该引起更大的警惕，对于社会资源配置，它无助于解决危机，还会加深危机。这

是我的看法。

第 096 集 难以持续的经济复苏

主持人：现在关于中国大陆这个经济的走势的这个评价，我看到感觉乐观的声音比较多。您认同不认同？

陈平：我不认同，这些数据出来，反而使我感到更深的焦虑。

首先我们看到是什么复苏，是代表着未来的复苏，还是那些旧的产业在复苏？这个危机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那么也就是说，危机当中的一些萎缩的产业，绝大部分本身就该萎缩的。那种靠投资产生的复苏，前面没有一个有效需求在等着，那只会加重危机，浪费资源。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说 2 月份、3 月份，钢材库存少了，你看现在库存又开始上来了，钢材价格又下去了。你说那个复苏的指标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要的是走向未来的经济振兴，而不是要复苏。复苏两个字就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要从今天的工业文明的衰亡的繁荣，走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循环经济，走向更健康的生活状态，我们要的是这个振兴。

主持人：复苏是走回头路。

陈平：对，所以这个复苏是没前途的。更别说这复苏是假象了，所以我根本不为出现这些所谓复苏的几个数字感到欣慰，我感到更大的焦虑。

主持人：那么如果真的走向能够面向未来的振兴，现在应该做什么？

陈平：明知不可长期发展，而要发展之，那只是加重我们的一种危机。问题出在，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现实必须维持社会稳定，也就是说人们要有饭吃，要有工作做，所以要创造工作岗位，要创造市场，但是，有些东西创造不出来的。有效需求不是硬是让它出来就出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和科技革命，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有效需求。

在这么一个危机阶段，社会是要积极地想办法来减轻危机的痛苦，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现在所做的，加大投资，加大信贷，可如果是为了让人们有钱消费，还不如直接跨过由投资的转化，而直接变成对人们生活直接的救济和补贴。

主持人：就是不是说把钱去政府拿来做投资，而是直接把钱给消费者。

陈平：因为这钱都是国民财富。可见，怎么样让投入产出比非常好的经济政策能得以实现和贯彻，实际上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陈平：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目的，还是要服务于国民的经济生活的。一定的体制必然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的固定思维模式。今天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农民工的就业还有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和他们的发展。怎么真正能够让这种国家的财富优先保障最需要的，优先投向效益最好的，而不是按照权力来分配，那就一定是权力要像我们宪法上说的真正地做到属于人民，就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第一步，首先要制约权力，首先要让人民能够在这个国家的根本的重要的法律的制订，法规的制订方面，真正能够承担主人的作用，这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都是利益选择，那么权力不受制约，那肯定是利益选择失衡。

主持人：总是偏向于制订政策的人，或者是既得利益者。

陈平：当有旺盛的国际上需求时，内部的失衡可以在全球化当中获得平衡，但今天世界变了，我们必须要靠内部新的平衡，才能够这个完成经济的转型，所以这个体制的改革，就尤为重要。

主持人：就经济再说经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陈平：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分配，权力要受到制约，权力的规则重新制订了，经济的财富的分配也得到新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

改革的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因为没有出口的红利，作为平衡，而靠这种投资方法只会加重不平衡。

主持人：但是这样的一个改革，我想是很难的，大家更多的还是，无论是服从于利益，还是那个服从于习惯，还都愿意走老路。

陈平：人嘛，谁都不太会主动地让渡权力，让渡利益，绝大部分都是在迫不得已下进行让渡，那么今天已经面临着这种被迫的局面了。

主持人：可能这样的话，那个也需要目前可以推动改革这些人，他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局势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被那些所谓的复苏的乐观的那些数字所迷惑，能够看到目前真正的问题所在。

陈平：现在唯有进行这个深刻的、尤其是掌权者带有牺牲精神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在缺少了外部平衡的条件下面，中国大陆内部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够激活民需，而不改变权力结构，是做不到的。而如果做不到，最终受伤的还是全体中国人。包括掌权的，和没有权力的都受伤。

主持人：但是您现在能感觉到这个改革的苗头和方向吗？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很乐观的一些信号？

陈平：没有，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阶段会对于权力更加看重，因为危机来了。但是，作为对中华民族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还是应该希望全体中国人尽快地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

在改革中应对危机挑战。利用危机挑战，而形成一个这个改革的共识，并且是带有牺牲精神的共识。

主持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那四个字叫同舟共济，可能大家也更容易形成一些共识。

陈平：对，到时间了。

第 097 集 面向新经济新文明的增量改革

主持人：我们前面节目提到了，改革对于目前走出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如果要是说，改革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在哪几个方面着手？

陈平：我在上一次的谈话当中，我说要全民形成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改革共识，但是，在实际的道路选择上来说，只有改革阻力小，又能达到改革目的的道路，才是最佳的道路选择。

第二，我曾经说过了，在这一场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的挑战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有自身一系列的优势，他们会又跑到前面去了，向着一个更高的社会阶段去发展，作为非发达国家的成员，我真的是感到一种宿命、一种无奈。但是，这宿命与无奈并不等于完全地认命，我们在发现差距，发现这个规律之后，既要承认差距和规律，也还是要尽可能地去寻找一种能够缩短差距，或者实现跳跃的一种途径。就两点，一个是改革的阻力最小化的道路选择。一个是跳跃性的改革道路选择。

主持人：那么这两点有没有共通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可以一举两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

陈平：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当然认为是能够找到共通之处，或者是相互配合的方面。

主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

陈平：改革的阻力最小化的道路，那就是对于既得利益，触动的越少越好。既得的，在人家口袋里的，尽量别掏出来了，别去打土豪分田地去了，那要革命的。革命是会要付出代价的。

主持人：而且会给改革设置很多障碍。但是真的有这样的路径吗？

陈平：我们有啊，中国大陆 1978 年开始的改革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成就，是充分发挥了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的特点，走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到吸引外来投资，从三来一补，到合资独资等等，所有这些呢，都是在增加量上面。现在我觉得，能够选择继续增量改革。现在，增量改革的前景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觉得，今天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正一方面是政治权力太大，导致腐败，一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垄断，腐败肯定需要要民主政治改革的，但是人们对经济生活，是远远比政治权力要更敏感，而我觉得在经济生活这一块，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走增量的道路，以资源行业为例，比如说煤炭、金属，石油等行业，垄断就垄断了吧，但是新的可再生能源，就完全按照公民面前一律平等，而且国民财富也集中向这些领域投放，万万不可再去扶持垄断了。通讯也是高度垄断的，但只要产生什么新的通讯技术只要它产生了，那一部分也都新事新体制办去。

主持人：但是我现在是有一个疑问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看见眼前有一块新的肥肉，也不去吃，怎么能够把它控制住呢。

陈平：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互联网，不就没垄断住嘛，那是新东西，现在想垄断，也来不及了。我们的法律就要确定下来，新的技术、新的领域的产生，那就应该是执行新的政策。现在从经济生活层面，咱们中国大陆急需要迅速地去发展一些绿色的可循环的经济产业，这些产业现在对于既得利益还没有立竿见影地冲击，那么阻力会比较小，所以尽快地用现有的形成国家意志，通过法律规定下来，成为一个没有垄断的、公平的环境，从经济生活领域当中，着手建立这个增量改革的保障机制。

另一方面，把投资的资金转变成为社会福利保障，转变成为对于人的投资，这双管齐下，都是增量，所以我说，这是一条思路，继续走增量改革发展的道路，也就是阻力最小化的道路，阻力最小化，一定是收效最大化。

另外，我刚才说了，从世界格局来说，我们还有什么道路选择。这个抛砖引玉，谈出我的一个思考。我们这一谈经济发展，总是面临着一个三农问题，现在有人说是四农问题。

主持人：农村、农业、农民，还有一个是？

陈平：农民工。想到什么出路呢，一说四农问题，出路都好像是农村城镇化，但是这一条路还是工业文明之路，我们眼界打开一点想一想，现在的都市对人们已经是一个折磨了，无非是说这都市效率高，人们在都市里机会多，区域经济效益高。所以在千般缺点当中，也还忍受着它，但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状态。难道只有新能源才叫做未来的文明？实际上面，未来的新文明一定是一系列改变，要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循环经济，它一定包括我们的居住、生活、工作的空间的改变。

主持人：那在您看来，这个都市化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陈平：对，都市化，城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不是一个未来规划师，我只是说出一种可能，既然这种都市化是对一个自然形态的一个彻底的破坏，是工业化、工业文明的一个极端的代表作，那么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当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新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第一，它寻求一种新能源的方向，是可再生能源，它寻求的是可再生材料。在精神上面，它要人与人之间关系显得更美好，人与人之间显得更平等。那么这一些，是现有的都市、所包容不下去的了吧？他一定是在新的空间中来实现新的文明，这两者是有必然联系的。

所以，我提议，作为中国执行两个创新的道路选择，一个增量的改革道路，一个跳跃性的战略选择。就是跳过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我我这是抛砖引玉，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把它规划得很清楚的。我这是随便在这里畅想了，但是，不妨抛砖引玉，引起讨论和思考。

第 098 集 警惕中国经济破坏式“复苏”

主持人：如果要是请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总体来看，您觉得目前这个股市的上涨，正常不正常？

陈平：股票市场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资源符合发展的配置，更好地推动或者帮助有巨大需求的一些产业获得资金，如果从这个角度，那么可以说现在的这种股市的活跃和上升，就显得很奇怪了，也可以说不正常了。但是如果我们去把股市，理解成为一个投机市场，那么现在这个状况才是正常的，为什么说它正常呢？因为现在资金前所未有的宽松。有这么大量的宽松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上去，这个在一定阶段当中，股市不被炒的一片红火，那才怪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个坏事。因为资金或者说货币，缺少真正的投资方向。人们不愿意把资金投到实体经济当中去。那这就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主持人：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有了钱之后，不愿意投到实业当中去，而是投到这个流动性已经非常充足的证券市场。

陈平：有了钱不愿意投到实体经济当中去，那就是人们在实体经济当中看不到前途，所谓看不到前途，也就是看不到旺盛的市场需求。看不到一种诱人的前景，资金就不去做这些投资，就去做这个投机。我并不说投机不好，投资和投机有时候很难分的，但资金在实体经济这一块看不到前景。那就意味着活跃的股票市场，那就是一个泡沫。这种状况，对于国民经济，我认为是往往是有害的。

从前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从全球范围来说通过反思都认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还是要回到实体经济当中去。那么现在变得很奇怪了，实体经济除了政府资金主导的一些基本建设的投资项目，其他绝大部分的行业都是处在不景气当中。所以，我说目前上面股市的活跃以及股市的上涨，从中国大陆，以及包括全球，包括香港，包括台湾，包括美国，和实体经济都是脱节的，在实体经济我们看到失业人数继续在增加，消费市场上面的购买力在继续地下滑。实体经济的企业资金是越来越紧，这些企业它市场在萎缩，市场在减少，状况越来越糟糕，日子越来越难过。另一方面，社会上的资金又前所未有地宽松，宽松到很多对资金需求并不是那么急迫的一些机构的手里去了。现在在媒体上面，包括一些讲话，几乎绝不承认这个钱用在了炒股市上去了，我觉得这一点，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股市每天两千多亿，钱从哪里来。我不相信这全是自有资金，一定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获得了这种投机于股市的资金来源。

主持人：一季度新增贷款达到将近五万亿。这其实是有史以来创记录的一个数字。

陈平：这样子的话，会发生这样几个情况。一方面，让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更加背离。在所谓的股市好，经济就好的这么一个虚幻的状态下面，实体经济会处在更加艰难当中。它会引导到更多的资金去脱离实体经济。

主持人：对，其实它成了一个抽水机，不停地把资金往这儿抽取。

陈平：实体经济越来越缺乏这个资金，市场本身前景又不好，会让就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就业压力大了，失业增多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会更加下降，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主持人：很多人在2008年的时候在股市里深陷，在套牢中，从个人解套想法来讲，是希望出现这个股市的上涨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这一轮的风险，您觉得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我认为绝大部分散户是解不出来的。能够在股市上进行这样操作的投机的，都是机构投机者。那么大量的散户，会成为熊市反弹这一个绞肉机当中，被绞的肉。

主持人：绞肉机，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比喻。

陈平：因为散户是没有能力左右这个市场的，我想可能很多学者已经发种预警的声音，并且举了在这个1929年到1933年那个阶段熊市反弹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总的趋势是不断走低的，现在还刚开始。所以，这种状态下面，我觉得货币管理的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应该密切地关注包括反思目前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否则会后患无穷。

主持人：这后患会包括什么？

陈平：包括真正的能够带动社会繁荣的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受挤压，进一步边缘化，在此同时，可能还会引发通胀，而在企业继续衰退，也就是实体经济市场继续衰退情况下的通胀，就是滞胀。

主持人：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它本身的发展，又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泡沫。

陈平：对，而这个泡沫缺乏一个经济基本面的支持，我没有看到哪一篇文章，没看到哪一个专家说了经济究竟好在哪里，究竟是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产品，哪一个服务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具有长时间持续竞争力的、持续发展的一个市场出来了。那你说经济好了，什么好了？

主持人：五月行情的热点，离不开这个世博题材，那么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陈平：这个题材本身就炒作的题材对不对，一个世博会，有多大规模？一个世博会，就有那么神奇吗？它能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带动作用吗？建设世博会需要投多少钱，整个来世博会的参展带动的人气和消费又是多少钱？这个账是可以算出来的。

主持人：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曾经出了一个奥运题材，那么世博会创造的经济的总量，就业的总量，恐怕远远是赶不上奥运会的。

陈平：对，所以这个，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希望和命运放在奥运，放在世博，并且把这个相连起来，我觉得只有小孩才会这么想。健全的人绝不会相信这种鬼话。这都是为股市投机炒作，在这里忽悠，但是面对危机，要想真正走出危机，获得发展，靠非常宽松的货币资金，变成股市的投机炒作资金，让股市出现这种虚假繁荣的景象，而在实体经济，企业资金仍然紧，就业仍然困难，市场仍然下滑，那个虚假的繁荣是时间长不了的。所以，借用以前电影一句话，还是奉劝他们一下：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第 100 集 中国经济是否真的已经触底回升?

主持人：短期内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回升期，您对这样的一个结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陈平：我可能持反面态度。我们知道，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日子越过越难的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出口严重受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一出口市场量在减少，而且目前还在减。当他们那边失业率在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不可能说是让消费能够有一个大的增长。第二，欧美日，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了。美国从原来叫做负债消费，现在变成了储蓄率为正，储蓄率到了 6%，这多少年没有过的，大手大脚的负债消费，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主持人：第一个，其实您是在说购买能力在下降，第二个其实是购买意愿。

陈平：还有两个，叫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这个不是经济危机来了才开始坏的。大概五六年前就开始恶化了。为什么恶化呢？供过于求，竞争激烈。

主持人：进入到恶性竞争，包括互相压价。

陈平：对，然后欧美日的采购商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包括压价，包括支付条件都更苛刻，所以企业本来日子就很难过，盈利已经很薄很薄了，前几年不是中国企业和政府都在大声呐喊要创新、要自主品牌吗？那时已经感到这个走不下去了，这是中国经济开始增长变缓、开始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这块还没有触底呢，在重要的外部和条件没有好转、没有触底的状态下面，我们经济谈不上触底和回升。

第二，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内部需求，如果说触底回升了，我也没有看见中国大陆国内市场的蓬勃兴起，蓬勃兴起的根本条件，是就业市场非常旺盛，是大量的实体经济的企业有非常好的销售市场。包括原来以为会红火的电子产品市场，什么苏宁、国美，一季度，都还是业绩下降了。那么国内到底有什么内需市场快速地成长起来填补了出口市场的损失呢？在哪里？

那么，出口市场没有触底，国内市场没有快速成长去填补原来出口损失掉的购买力，那经济何来回升？可能有些数据表现的好一点，那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基本建设投资的拉动，这是短期繁荣。

主持人：中国经济周期上升期，唯一被证实对宏观总量具有先导意义的指标是货币信贷，而近期货币供应量和人民币贷款迅速攀升。

陈平：货币信贷供应到哪里去了？我想任何一个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走到街面上、商场里看一看就会发现，第一，现在什么商品处在一个热销的市场状态，现在有什么新技术导致的新的消费领域的产生？我们看不见，根本的一点，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讲，是为了获利，投资的社会的目的干吗，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我们现在是产能过剩，出口受阻，指望着在国内市场能够有新的购买力，那么如果我们这种刺激经济的政策，是主要放在形成人民的购买力上面，我觉得要比今天放在投资上面要有效得多，至少会比现在有效。刚刚说了，货币多了，但是第一，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这些钱。第二，他也拿到这些钱没用。钱得到干吗？你都是要生产，生产干什么，是要销售，是为了市场。这市场在哪里？

所以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建立在政府行政行为和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的宽松的信贷行为，把这个作为经济已经触底回升的依据，我觉得不成立。真正的回升是消费需求增长了，购买力大幅度上升了，而购买力大幅度上升，需要就业大幅度上升，人们的工资大幅度增长。

我们原来 30%是对出口直接的依赖，间接的 70%。这么一大块的出口市场哪有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通过内需得到弥补呢？毕竟出口市场的衰退是很严重的。只要中国大陆体制不改，机会依旧不平等，财富分配依旧不公正，中国公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就不可能强。有一个好的就业市场，有一个好的创业市场，它才敢消费。这一环一环的，现在都不具备重新走上增长的快车道的的条件，那么，货币的宽松，可能只会弊大于利。

我觉得现在真的蛮危险，你去问那些机构投资者，他们还相信不相信经济会好，他不相信。现在说触底回升，早着呢，现在全球经济危机还远远没有触底。各国政府都在徒劳地去挽救不该挽救的产业，而不敢或者不愿结束一个行将结束的旧的增长模式，去迎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是我现在最担忧的，包括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现状的深深的担忧。

第 4 辑 危机中的中国改革之路

第 007 集 改革开放三十年带给我们的思考（上）

主持人：您愿意把改革开放划分为几个阶段？

陈平：我认为，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是解放思想的阶段，或者说，求生存阶段。

从 1978 年直到 1980 年代后期；那个年代首先要改变的以及最根本改变的，就是从轻视物质享受到认为过好日子是应该的。

主持人：一度是压制物质追求的。

陈平：越穷越好，越苦越好，这么一个官方的价值观摆在哪里，社会怎么会发展？所以，我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转变，就是人要过好日子，有了这个合理性、合法性，才有了后面三十年所展开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奇迹。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都是应该被推倒的，等等。所以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追求人的物质幸福的权利。

主持人：1990 年代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陈平：1990 年代主要是在制度层面展开，第二阶段标志性是从拥有私有产权是罪过，到私有产权变成合理，合法的，其他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价格放开等等，都是在这个根本的认识、价值，包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后，所产生的衍生物。

197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不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岗位责任制、承包制，出发的前提都是人有过好日子的权利，第二个阶段呢，则是最基本的制度保障是哪些东西？

主持人：从 1990 年代开始的这个第二阶段，您把它一直放到现在？

陈平：对，现在依然面临在制度上怎么保障过好日子的问题，依然需要制度保障让好日子过得更长更好。三十年改革开放根本一点就是回归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摆脱一切束缚自己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枷锁。三十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也是我用的另外一个概念，这是中国人民正常化的过程。

从今天来看，这种对物质需求的压抑是太不正常了。但是我展开来说，其实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为什么会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惨败，怎么会弱到这种程度呢？我们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拥有自身的价值观。到满清末年，背负的这个东西太重了。四亿多中国人还没和人家斗，已经给那包袱压得趴在地上动都不能动。所以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因为当初的人都疯了？都失去了辨别力了？不是，而是因

为孔子学说在当时已经演化成为历史文化包袱的代表，或者象征了。

所以，从满清末年开始，一直到 1978 年的三中全会，它是一个历史时期，就是一个字，破。整整的那么一个时代，就是一个破的时代。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不破哪来立？

主持人：这么长时间一个跨度的历史，大家在砸烂一个旧世界，然后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

陈平：尽管我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从感情上，都对极其专制的集权和黑白颠倒的时代非常的痛恨厌恶。但是我们从理性上要看到它的必然性。这么大破特破，到今天，人们没有任何框框，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束缚，然后，开始立了。为什么到了 1979 年代末尤其八十年代，一说发展是硬道理，几乎没有反对意见？正是因为过去都破掉了。尽管这是一个人们从感情上很难以承认的一个道理或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从理性上必须承认，三十年奇迹，根本来源于我们过去的破。

主持人：在这个 30 年的立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借鉴的经验？

陈平：这三十年根本的一点还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能牢牢把这点立起来，毛泽东也是想立，从内心的愿望来讲，我相信毛泽东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发展的。但是呢，他没有任何框框去破，但是带了个框框去立。

从历史上看呢，有些破过头的东西，也不得不破，对吧，破了以后，破错了以后再捡回来就行，再修补就是了，当然也有造成终身遗憾的。甚至是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永远的遗憾，像我们很多的古迹、文物，也彻底地破掉，但是这些遗憾，和一个民族最终实现了救亡图存相比，都是相对来讲，没那么重要的。

主持人：那在这中间，其实我们还是有两个着力点的，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那么您觉得这两个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陈平：他们两个缺一不可，开放属于改革的内容，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 008 集 改革开放三十年带给我们的思考（下）

主持人：三十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几次重大的困境和我们相应的措施是怎样样的匹配关系呢？

陈平：1978 年那时候被迫改革就是允许大家过好日子，实际上就是说，重新承认大家追求幸福的权利。然后到九十年代呢，又在改革上有一些重大突破，比如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突破，这也有它的必然，有它的契机。邓小平伟大的南巡讲话，就政治上的紧，与经济上的放，来获得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政治上的紧，不管叫高压也好，专制也好，确确

实实是围绕发展是硬道理，就为避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

主持人：要给发展提供一些好的环境。

陈平：要想以发展是硬道理，要想持久实现快速平稳发展，一定程度上面，对于个人权利的压制，对于这个不同声音的管制，可能是合乎理性的，虽然不一定合于情理。

主持人：接下来的话，您觉得如果改革开放，如果我们再立的话，我们要立什么？

陈平：我认为，如果没有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可能还是会以西方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等等为参照和借鉴。但是这场危机的到来，中国又会搭上这一趟全人类走向新文明的一班车。会立到哪里呢，现在都很难说，无法预测。中国未来三十年、六十年，第一还是改革开放发展是主旋律，那改革开放发展向何方？我想现在给它规定一个立的一个条条框框未是上策。

主持人：中国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改革开放，恰好是一个我们可能创造一些新的一些文明方式，创造一些新的体制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陈平：中国和全球，中国和全人类一起，来共同创造，共同探索一个人类的未来。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陈平：当然我认为中国或许能够也有后发优势。从经济结构上面，产业结构上，重新反思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谁重谁轻。第二，我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又该做哪些反思，这个反思投行这种金融衍生工具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有一点人们现在还不太愿意承认的，就是房地产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就说，我们要有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再认识，或者讲我们要说得比较缓和一点，我们要修正市场经济的不足之处，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修正主义。

主持人：在今后的改革开放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市场的手和政府的手，它的作用会有一个新的思考？

陈平：没有三十年前中国人将近一百年的破，就没有三十年以后的发展，对不对？所以三十年前什么都破掉，三十年后开始发展是硬道理，因为三十年这个分界线当中，什么都破掉了，中国什么都不信了，所以什么有利于发展事情，他都不会再想一个该不该做，就做了，所以才有奇迹的产生。

我想这个或者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中国发展的奇迹，可以包括在此之前一百多年中国的发展的那么多匪夷所思的那种破坏性的现象，就破坏成为主流现象，他这种另一个，一个非常特别，或者深刻的角度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华文明的顽强。知道为什么我说它证明了伟大和顽强？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类发展史上，除中国文明以外，还没有出现一个文明，一个民

族，能够自我破茧而出。

当时破得那么一无反顾，破得我们几乎是你看，文字从繁体变成简体，繁体字我到现在认为好看，繁体字我到现在认为，意，词意都准确，对吧，但是确确实实想想，要想让中国人都认识字，在当时条件下面，都会写字，那个繁体确实难了一点。第二点，没有破到，我就说了，包括拼音字母方案，造成了很多非议，但是大家想想，没有当时这种强势的强权的推进拼音字母方案，中国人能够像今天这样的那么流畅，那么迅速掌握电脑技术吗？

我举这些例子，当然有些东西，是在恶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对不对？但是呢，它的历史的作用和历史的必然性你又不能完全否定它。

主持人：那么这样相应的，可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进行纪念的时候，赶上这个全球正在破的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我们又会立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陈平：我觉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的一系列的工程不可忘却。同样，三十年前，上溯到 1840 年，为了中国求生存，一切的不管叫先烈和精英们，尽管有很多人做了很多恶事，做了很多坏事，做了很多于情不合，于理符合的这样一些精英们，伟人们，先烈们，都要予以一个真的隆重的纪念。

没有前面 30 年，就没有这三十年，没有邓小平顺中国文明复兴之势采取的实用主义的一个战略，也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也不会有三十年的今天。 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私下里，我们互相探讨的话题，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因为我们心里没有框框，我们心里没有茧，我们心里没有作茧自缚，茧打碎了。这就是我说，这是可能天降大任于中国人也。

第 047 集　只有改革才能救经济

主持人：1997 年曾经发挥作用的良方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事隔十一年还能不能再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陈平：我觉得现在和 1997 年的环境，经济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

1997 年在国内有通缩的迹象。投资在基本建设以后，它的效益从哪儿来呢？效益是从出口市场来的。持续的出口增长，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而有所获，投而倍增其获。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硬件条件，结合当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国为代表的从网络泡沫又变成房地产泡沫所吹起来的巨大需求市场，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充分地发挥了作用，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从 1997 年到 2007 年这十年，中国经济投资增长性处于良好发展状态，这个阶段中，积极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和发达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这正好构成一个循环，但是，到了 2007 年，确切地说在 2008 年初，这个模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市场衰退，对我们来讲就是外需不足。外需衰退下，继续投资基本建

设干什么呢？如果基本建设投资不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那就会造成浪费，就必然会引起不良后果。很大可能性会以让人难以承受的滞胀局面来呈现，也就是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

主持人：这么多的资金沉淀进去，社会有更大的包袱了，但是没有产出。

陈平： 那个时候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投资是为了创造满足外需的条件。今天我们投资是要来拉动内需，投资的目的就不一样，那么，老方一帖用在拉动内需上，会不会有效？我认为效果不佳。首先，三十年改革开放，始终处在内需不旺的状态，从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50%到 60%，到现在只有 30%几了，人民的消费能力的没有伴随增长而同比例同步增长。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中存在的一系列不合理造成的。说到底就是分配机制的问题。

比如说，作为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繁荣的主力军也就是广大的农民工，他们仍然得到不平等的待遇，处在身份不平等状态下，他们怎么可能伴随着经济增长，也公平地获得增长呢？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却没有获得和奇迹相称的增长。改革之初，选择的改革之路是先搁置争议，不争论，一门心思搞发展，于是，原来的垄断权力和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所有制上面的不平等等等问题，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转化成为了一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模式，导致大多数人只得了小头，少数人得了大头。

尽管中国在上述诸多不公平状态存在的条件下，也获得了长达三十年的增长，但是不要忘了，旺盛的国际市场的需求功不可没。此外，一谈到效率上面，我们的指标就进步不大，不管是单位能耗、单位资本产出等等，都没有什么质的改进；我们之所以获得巨大的进步。是因为我们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获了一块大蛋糕。但是在今天，这个蛋糕不会再长大了，我们要靠这个外部的蛋糕在内部来发酵，来孕育出市场需求，而基本建设投资在今天产生不了有效需求，或者不可能以产生有效需求为主。

所以我说，救经济，或者我一再强调的保就业，保稳定，首先要做的是改革。因为三十年内需比例越变越小就是因为体制的因素。当然，我们不要去全盘否定过去，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

主持人：有它的合理性在那儿。

陈平：这三十年，快速、有效、准确地抓住了世界经济这么一个大好形势，这是邓小平作为改革总设计师一个非常具有长远的深邃的英明战略决策。如果在前面三十年讲太多公平，可能这个全球化的大蛋糕，就分享不了这么多。有的时候局部看来不合理的，在整体看来它是合理的。有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中看来是错误的，但摆在历史发展的时空当中去，他是英明的。

这三十年我觉得就是这么一条道路，这三十年，地方政府征地做工业区，盖了房子卖给投资者来建厂，受损害的是农民利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能够以这么廉价的土地资源为诱惑，能够让整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向中国这么疯狂地转移吗？在今天看来不公平条件下面，我们的很多农民兄弟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中国也适时地抓住了全球化的好处。

我承认， 改革开放是以一种今天看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来又一次实行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化。我们今天需要着重解决公平、正义，那是又因为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主持人：按照您刚才的分析，改革之初选择了一个微痛的变革，但是到现在，我们开始强调内需的时候，这一个变革是不是会更痛苦？

陈平：那么今天的经济危机，让所有人都痛。所以，危机危机，有危就会有机。
今天的经济危机，让所有人都痛。危机危机，有危就会有机。

主持人：所有人都在痛，那是不是说，现在改革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改革的成本更低？

陈平：阻力会变小，怎么讲，就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在经济危机当中也受到冲击了，执政者为了长久执政下去，那么为了社会的稳定，我相信执政者也会主动地去改革。尤其在现代这种危机的压力下面，会让原来觉得不愿意改的，也会想着改革的可能：不改可能也会失去。改了，可能还不至于失去。

主持人：可能还能留一点。

陈平：今天我们要救中国经济，要拉动内需，必须依靠改革。因为只有解决了公平正义，解决了这种，我们未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地形成有效需求的内需。

中国的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新的工人阶级的群体是农民工。他们是缺少社会保障的，而首先冲击的必然是他们。因为他们干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他们做的大部分是出口型产业，所以哪怕你拿出来几千亿，先把这块最需要的，也是可能是这个最不安定的一些群体给保住。

主持人：首先让他们能够先有饭吃，能够心平气和地来，一起来挺过难关。但另外一个，也同时实现了您刚才说的那个，中长期的一个改革目标，就是实现公平。

陈平：也是争取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积极财政政策用于救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用于救本。救急是为了争取时间，保持稳定，改革是为了真正创造我们再发展的一个时空。救市应该抛弃救股市、救楼市的这么一个念头，救市就是救急，救急就是首先让社会有一个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什么最急呢？人要吃饭是最急，人要工作是最急。企业不能，少破产是最急。

改革需要时间，改变需要回旋余地。那么现在这个经济危机大急当前，怎么办？我们拿出一部分钱来救这个急。拿钱来买时间和空间，这样子，我觉得花不了四万亿，用不了四聚力。增加了向心力，增加了凝聚力，也就增加到了改革的时间与空间。也提升了人们的信心。这是我的结论。

第 053 集 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由来已久

主持人：在您看来，外因和内因在这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当中，分别都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角色？

陈平：具体地来说，2007 年下半年美国次按危机爆发，引起了美国消费市场的逐步萎缩，也就是加速了中国经济危机的显现，加重了中国经济危机的表现。

我用的加速和加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身就是存在着危机的，这个存在的危机我觉得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一是内需的比例在不断地缩小，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0%多，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30%几，下滑了一半。这个危机早就埋下了，在不断地加深。

第二，产业结构落后，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及与技术相关联的配套体系发展滞后。尽管我们被称作世界工厂，但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世界车间，就是完成代加工这样一个工序。中国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如电子行业，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和国际的差距是很大的。尤其在核心技术领域，和世界的先进国家差距在有些方面还在拉大，这本身又是一个危机。

第三，在资源与环境的过度透支，30 年前的环境比今天要好多了，资源也比今天要多多了，也就二十几年前，我们还有很多矿产资源出口，现在我们的资源基本上全部靠进口。

主持人：对，既然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或是世界车间，当然对环境的破坏，对能源的消耗，都集中在中国这儿了。

陈平：为什么这一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冲击会这么大，为什么一些代工类的企业在去年还显得很强大，到了今天却出现有些企业想拱手相让，却连送都送不出去的情形呢？第一，缺少技术，第二，缺乏品牌，第三就是环境资源，中国很多地方环境已经到了对人具有极大的伤害性的程度了。我么说不是要否定三十年的伟大成就，而是说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就包含了一系列的不利因素的发展。这些不利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本身就是潜伏的危机。

实际上从 2006 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市场增长放缓、人民币汇率上升开始，中国企业的危机就已经开始显现，并不是 2008 年才显现。从 2006 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在大力地宣传推动科技创新，为什么要提倡创新，提倡产业升级呢，实际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危机，意识到了当时的繁荣和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回答，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主因，从我的认识来讲，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世界的经济危机，它们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它们有共同的这个原因，也有相对而言不同的表现形态。

主持人：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地方。

陈平：它们是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上面，危机的表现形态，波及方面是有所不同，显现的时间而有早有晚，而中国本身的危机有长期积累的因素，这决定了中国的危机以哪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以实体经济的危机表现出来，是以严重的就业问题表现出来了，同

时再往深一步说，会以威胁到社会稳定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长期以来，内需始终没法激活，中国民众的的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其增长率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于是，当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够依靠外贸、依靠出口来实现增长的时候，这个系统就出问题了。健康的经济相对来讲有一个稳定的分配比例关系，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全民都能够相应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如果民众分享到的成果越来越少，怎么叫健康呢？

第二，产业升级，这么多年来面临着很多困难，因为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做相当大的基础开发投资。这么多年来，国民资源主要的、最有价值的、最核心的部分，包括宝贵的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其配置权都被国有企业高度垄断。而从开始那一天起，中国的民营企业起到的就是拾遗补缺的作用。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再加上民营企业大多从事一些低利润的加工业，企业的规模又比较小，在政策上又受到歧视，那么从整体上来说，怎么会有能力来投入基础的研发呢？又怎么可能和强大的、处在支持它们的社会制度环境下面的跨国公司去竞争呢？很多满腔抱负和有极大创造力的科研知识分子下海以后，最后也非常无奈地选择了代工，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

这无力为之的根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那么这些原因，也就导致了三十年经济发展一定会付出环境和资源的高昂代价。所以，即使美国不发生次按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经济的衰退，中国的这场危机也最终会到来，只不过会像事慢性病，不像现在得了急性病。只不过，现在我们的这场急性病，也还会转成慢性病，这是可怕的。

主持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些对策是不是也要有一个调整？

陈平：　这次中国经济危机不是 2008 年 8、9 月份后受到西方金融海啸的冲击才引发的。

主持人：就是说危机不是输入型的。

陈平：对，危机是自身的。第一，危机本身是全球的，这里没有说谁输入给谁，第二，中国的缺乏内需，缺乏技术竞争力，环境恶化，以及最后集中表现为就业危机和衰退危机，这危机早存在之，当然，如果当初我们积极地、清醒地、理智地有提前量地进行改革，有可能逐步就给解决掉。

第 054 集 “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陈平：中国的危机更多地来自自身，目前危机也有加深的趋向，所有这些，都是源自我们在改革的当中有严重滞后的方面。

主持人：那么您是指哪些方面？

陈平：哪些深层次里面的改革严重滞后呢？一是在经济体制里面，所有制问题没有理顺，

此外就是垄断。所有制也就是财产的所有权问题，财产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同时它指消费能力，这么多年在所有制问题上面，在所有制所牵涉的财产上，我觉得一直没有理顺。没有像我们在推进市场经济上面那么样的干脆利落，在实行对外开放上面那样地勇敢。

主持人：那为什么呢？

陈平：因为这牵涉到既得利益。原来是一大二公，都是公有制，现在有那么多非公经济的成份，从这点来说，所有制上有所改革，但这个仅仅容许了新增的一块，而没有触动 1949 年以后通过相当长时间节衣缩食而积累起来的全民的财产。

主持人：国有资产。

陈平：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增加的全民财产。这上面的改革严重滞后，我也并不是说，只有完全私有化，才是唯一的道路。而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全民所有制财产，什么是国有资产，它的定性是什么，同时怎么实现这个定性；要高清楚全民所有和国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有资产和政府部门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全民所有的财产要如何能够落实到全民身上，让全民能够享受到这一块的财产增长。

国民经济的统计公报上说全民所有制财产或者国有资产又增加了多少万亿了，那么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分享到这个增长，如今有谁感受到了自己跟这个增长有关呢？或者是个人的生活质量、消费能力因此有了哪怕一点点的收益和增强呢？这就是我说的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滞后。

还有一点，国有资产的经营者，管理者，支配者，仅仅是一个受托责任者，还是在享受着它的支配权、享受着它实际上的所有权？这个我觉很关键，我看不出来是受托责任，因为真正的所有者也就是公民，对国有资产的状况无论好坏其实是无能为力的。1990 年代国有资产萎缩造成了大规模的下岗，人民无能为力，如今 21 世纪国有资产在垄断行业高速地膨胀，挤压了大量民营产业的发展空间，人民既未曾从国有资产中获利，反受到挤压，也对它无能为力，只是是两个字，无奈。

政府是权力的拥有者，官员不是圣人，都是一个个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有所有者不在场，权力又不受制约，这些实际控制者怎么会有受托者的心态呢？又怎么会自觉地尽受托者的责任呢？

在经济领域，垄断和所有制的不明确、权益的模糊，导致全民不能同步分享增长的好处，这就出现了危机的逐步积累，也就是内需相对比例的持续下降。三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由于改革的滞后，而使得危机的潜在因素一步步加深，到了全球经济危机发生，自然也就以我们的方式暴露出来。我刚刚说，会是更加严峻的情形要面对，那就是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主持人：而这个社会稳定，在中国大陆一直是非常重要的。

陈平：为什么当局者会把稳定看得那么重，因为心里知道制度中有诸多不合理的东西，

社会里有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才要强调稳定。

这次经济危机在中国突出的矛盾就是稳定，那这个突出的矛盾又是我们自己的体制原因而形成的。比如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使城市和乡村它享受到不同的待遇，表现为在实体经济里面，大量的产业当中都是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如今面临着大量的失业，那这对稳定的威胁可想而知。

所以在这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中，各自表现是不同的，各自所面临的棘手的迫切的矛盾也不同，我说的两个观点，第一，全球化的时代，外因内因是相对的，第二，中国的危机的表现形式，是由中国的内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内因既有客观的，如资源不充裕，人口众多，而且人的素质、技能不是太高，等等；也有主观的因素，主观因素就是制度的改革滞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大量的变化，上层建筑却变化颇少，经济已经相当多元化了，政治结构还一元化。在这一个状态下面，它就会积累下来很多矛盾，这些矛盾的爆发也是或迟或早的问题。无非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矛盾快速的集中的并且是很重地爆发出来，而在我看来，现在也还不叫爆发，现在还是这个前奏。

主持人：那么您的这个预测，真正叫爆发的时候，会在什么时候？

陈平：中国的内因决定了中国危机的形式和状态，中国的内因，有客观的有主观的。客观的是我们不能选择的，而主观的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当然，主观的选择要动到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权力的利益、政治利益。我很赞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的报告，他讲中国的改革是第三次革命，我觉得确确实实，要有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和牺牲精神，才能够革自己的既得利益之命，才能够迎接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

主持人：重新分配，重新调整。

陈平：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这个第三次革命用得准确恰当，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2009 年，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改革会表现得很激烈的，当处在快速增长中，就像蛋糕越来越大的时候，改革总是要容易一些，而如果处在增长停滞，并且是相对萎缩的一个环境当中，改革更多地要指向既得利益，所以这个第三次革命，就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也是既有权力格局的再分配，而权力又是和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相关系的。所以，往后是一个激烈而深刻的变革时期，而且难度非常大，更需要勇气和胆略。

主持人：对，里面也要有执政智慧，政治智慧。

陈平：上层建筑的改革是下一阶段中国历史趋势的使然，中国面对危机再次求生存发展的必然。用革命两个字，表现了一种决心，表现了一个巨大的勇气。也反映出来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这是一个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但确确实实要看到它的困难，就是今天利益格局已经是做大了。和几十年前利益团体没形成或者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了。

现在是要分配存量，所以难度很大，我想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呼吁，既然当局表现出了以革命两个字所代表的一个决心，那么我想呼吁全民应该配合，应该有耐心，也要有这么一个牺牲精神，来共渡时艰，当局既然有革命的决心，那么公民也就应该与当局一起共渡时艰，有耐心，有宽容，有理性来完成未来的中国的不管叫做第三次革命，还是改革。

第 056 集　2009 ，转型之年、跨越之年

主持人：2009 年，它真的能够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陈平：我相信 2009 年一定是新的选择的一年，是人类反思革新自我的一年。2009 年，上半年经济危机会表现得越来越猛烈，冲垮一道又一道新筑起来的救市的防线。会以一种可能是今天在世的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态势去发展。

当然，全球一定会几乎是不惜代价地去挽救经济，挽救社会体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不见效，或者是收效甚微之后，到了快弹尽粮绝的时候。，人类社会会开始寻找新的路，会开始承认一些措施是失败的，承认我们过去走的道路是有问题的。

在中国，2009 年，中国政府和民间会逐步会发现，2008 年最后两个月猛烈出台的这些救市举措收效不大，会发现企业破产倒闭越来越多，失业的人口在快速增长，社会矛盾在越来越多地激化。

第一季度是第一波更加强的经济危机冲击波，第二季度又会来更加强烈地一波冲击，那么到 2009 年的第三季度，中国会逐步开始在痛苦中认识到，单纯地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经济危机已经是显得无能为力了。尤其是用传统增长模式状态下的思维来拯救经济的举措，不仅苍白无力，有的时候是反而是显得在帮倒忙，就会开始会意识到制度的创新与变革的重要性。

在中国，体制创新和变革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是没有太多子弹，说起来我们有一万九千多亿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的子弹比美国少很多，作为世界实质的中央银行地位，就使得美国还有很多很多弹药可用。全球的贸易安全，还是得依靠美国来维持，全球的基本秩序，还是要美国霸权来维护，谁拥有话语权，谁拥有制订规则的权力，那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美国也就具备更多的拯救经济的弹药。对中国来说，我们本身的救市的弹药，实际上是不多的。

主持人：那么这样，在 2009 年的下半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陈平：在美国， 2009 年下半年，我觉得会很明显地发出一个社会转型的信号，整个西方社会都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社会转型的信号、文明转型的信号，或者价值观的转型的信号。

主持人：那么这种价值观和文明，它的重点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新文明的一个起点？

陈平：它是对于我们这个过去走的路，尤其对于以欧美所主导的世界主流文明的反思。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汤因比，在他的历史巨著《历史研究》中已经一再地阐明了一个基本的规律：挑战反应是一切新文明诞生发展的原因。这次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

对我们人类的旧文明的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在现有系统和现有文明内解决不了，那只能通过新的文明的创新去解决它。

主持人：那么现在从美国的您的观察来看，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迹象。

陈平：有这个迹象，国会里面的主导意见是说汽车工业必须拿出改革的方案，除了降低开支，还必须说明你的发展方向，那就是要在新能源上面迈出你的脚步。汽车工业是过去文明的一个主要形态，过去的文明可以归结为是石油文明，汽车工业是和和石油文明相联系的，和工业文明的能源结构是相联系的，所以走向新能源，这个信号已经很明确了。不管提出这个要求的这些议员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催生一个新文明，但是实质上，他们发出了新文明的呼声。

一个新能源不等同于新文明，但新能源是新文明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能源首先建立在尽可能要是寻找可再生的能源，对环境不破坏的能源，这本身就是一个本质的观点了，不再是那种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一个价值观。

过去五百年工业文明是对自然破坏的一个文明，它不断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在人与他赖以生存的自然这个关系上面，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慢性自杀，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彻底否定人类这五百年道路，这也是必经之路。经历了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实质上面慢性自杀的一条道路，人类或许能够探索出一条常盛不衰的一个道路出来。

回过头来说，2009 年中国会比美国、欧洲处在更加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成所谓现代化社会，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一个成熟的工业文明，但我们现在又要走出这个成熟的工业文明，所以从这个发展的阶段性而言，中国会更艰难。

在生产的主要形态在消费模式等等方面，我们已经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但我们的社会制度还没有从一个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央集权社会，走向一个现代化的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一步还没有完成，在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重要的一步之前，我们又面临着再次进行历史的跨越。所以对中国的挑战是更加地巨大。

1840 年开始，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有双重地挑战，一方面是船坚炮利，带有一种殖民化的侵略的挑战；另一方面，它又裹着一种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文化而来，而我们应对这个挑战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封闭而自大的传统帝制的中央集权，是一个农业文明。所以我们一方面被船坚炮利所打的是无招架之功，另一方面，我们又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今天这个西方的月亮都是圆的这么一个文化倾向，在这一百多年来，反反复复进行文化的创新和社会制度的探索，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到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到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到共产党的也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都是错的，铁腕现代政治体制，是中国农业文明遭遇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这也是挑战反映的结果。

主持人：那么现在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越，就不仅仅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往往工业文明的这样一个跨越，同时还要在超越这个工业文明这个阶段，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陈平：所以我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未来挑战都是很大的。经济上，我们处在全球化分工的弱势的一方，在政治和社会制度和文化上面，我们要实现两个跨越，一个是未完成的社会制度的变革，然后还要再向更新的文明形态出发。

第062集 向深水区要改革红利

主持人：具体看中国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危机，您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长度上来看？

陈平：这次中国的经济危机，首先它是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主持人：这是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

陈平：当然，在中国人们所感受到的危机的一些现象和突出的矛盾，可能会和在美国或者欧洲感受的都会有所不一样。但是，在有些方面，也是一样的。

主持人：比如说。

陈平：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就表现得很凶猛，因为本身美国是世界的金融中心，美联储是世界的中央银行，但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感觉那么大的金融危机,我们的金融就健康了，未必。尽管我们的金融不受这些金融杠杆工具的直接祸害，但我们的金融也会因我们的实体经济受连带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会很大的。比如说，房地产的呆坏账，然后企业的坏账，所以我说中国的经济危机，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共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特征。

那么其中一点，中国在就业问题上面又会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我们首先是个人口大国，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就业问题就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庞大的务工阶层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农民工，农民工干的工厂的活，但是他又不享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些农民工一旦失业，就两头落空，所以我说，中国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一个部分，但是它可能的爆发点，或者说危机的引发的这个痛苦点，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

应该说这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肯定是功不可没，一些潜在的资源和优势条件被改革开放所激发，而成就了这个三十年的辉煌，但是，在奥运会之前和奥运当中，许多人都在说，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走了一个世界非常成功独特的道路。

主持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陈平：这个说法，我相信现在可能声音小了。三十年，我们的成功有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当时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折腾得国家快崩溃，正是因为国民经济要崩溃的危机，这时我们才打开国门，抓住了全

球化的机会，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在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当时的短缺经济的危机。

但是，一步步地，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面，又在积累着今天可能令我们很头痛的一些危机。危机的根源来自于内需不足，我说是民需不足，也就是民众需求不足。当我们抓住全球化红利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回避并掩盖了我们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那些当时应该改却没有改的内容形成了今天危机的根源。

主持人：出口一俊遮百丑，只要出口在增长，内需问题就被忽视和搁置，是不是这样？

陈平：改革的道路本身就是邓小平所设计的那样，第一，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嘛，那哪儿水浅从哪儿走，就是先易后难，把一切的深水底下的大石头都绕过去了。那么，所有绕过去的、回避的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危机的积累。绕过去的越多，积累的也越多，这个不是说对错的问题，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样子，人的本性一定会选择容易的，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倾向，导致它必然走的路，就是选择容易的，而避开困难的。

第二，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怎么样发展快，就怎么做。上面两个因素的结合，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改革开放之路。

中国的世俗实用主义文化，就是既没有那个认死理的制度，也就没有推导死理的强大理性传统。中国实际上缺乏理性主义比较缺乏，邓小平伟大，就在于他顺应了中国文化之特点，充分地理解和认识什么是中国，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发展硬道理论，这些东西都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确的提炼，并且要把它用到了施政的纲领上面去。但这些东西肯定会要付代价的。 比如说我们不去动国有资产的大部分存量，保留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都给今天的危机埋下了根子。

所以，全球化为中国式的改革道路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没有这个全球化的条件，我们就走不成这么一条改革的路。

主持人：但是这也可能带来一个弊端，内需不足。

陈平：是，这里面根本的原因是在改革之初，重心没有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民主的目标则是为了利益更多地由民众来分享，但在当时，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全球化这个机遇就可能抓不了这么好。

主持人：对，可能会影响一些时间精力，没有放在这个抓住全球化这个机遇上去。

陈平：同时动员和组织社会抓住这一机遇的效力，也没有这么高。

此外，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也离不开人口的红利。五十年代，毛泽东把马寅初打倒，很愚昧地学习前苏联鼓励生育，到了改革开放后，一下子社会有这么多人投入到对外开放这个新的增量上，投入到私营经济的发展中，财富就迅速地创造起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本身需求又很低，又不需要负担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就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不要忘了，那么这个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城乡二元结构是分不开的。

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克服了短缺经济的危机，但是，也埋下了不断积累的生产过剩，严重依赖出口，然后民需又不足的潜在危机。而这个潜在危机，更深层的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所带来的机会的不平等，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社会积累方面的这个享受不平等。

主持人：那么就这些矛盾，其实是和那个发展是相伴随的，也是一个相伴相生的一个关系。

陈平：抓住了机会，解决了危机，获得了发展。那么也种下了今天的危机。那么这里面，这个我们不能用一个对错来衡量，也不能因此说，中共过去拖延改革，不是拖延改革，任何的道路都是一个选择,每一种选择，可能都有利和弊，也就看哪一个选择是利大于弊，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说当初的选择了简单易行的改革之路，而回避了或者说延缓了一些今天到了很难以迈过去的改革的内容。这个选择我觉得从历史角度看，是这个得大于失的。

主持人：其实这三十年，一方面是经济在发展，就您说的物质，实力在增强，另外一个是开启民智，形成理性的一个过程。

陈平：对，当然来讲，这个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我说一方面我们发展了，一方面发展也是意味着这个既解决了旧的危机，又积累了新的危机。这个新的危机，就是用我们由于现在人们说起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应该加一句，是政治体制改革理性的选择性的滞后，那么而导致的现在这个经济机会的不平等\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包括还有社会的腐败，包括现在人权的不完善，但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历史的合理的存在，和历史的合理的积累这些矛盾。今天要改它，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类社会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要影响一些利益的。我们过去三十年，所选择的路径，都是尽可能的在利益冲突上最小化，那么今天避免不了的，要在利益冲突上比较剧烈。但是再剧烈，也得吃饱了饭来做，对不对。

主持人：对，大家可以不用说饥肠辘辘的，而是可以理性的，甚至可以稍微平和一些来讨论这个问题。

陈平：所以我看待今天我们面对的中国的经济危机，它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是三十年中国发展所积累的危机，是一个我认为理性的历史正确选择的积累的危机。所以我还是一句话，这个平静地对待它，理性地看到要解决它，有很多难处。这样子，也不要回避它。社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中国经济危机，我从这个全球观和历史发展观来判断，来提出我的这个看法。

第064集　改革的牛年催生信心的牛年

陈平：我认为开春以后，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两种局面，一种是真的牛，不是股市的牛市，也不是房地产的牛市。而是改革的牛市，新一代领导人下定决心，变危机为改革的动力，现在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机遇。因为，没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危机的挑战，改革是蛮难的。2000年以后一直在谈深化改革，但是静静地想想，到底改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国企越改越大，垄

断越改越厉害，腐败越改越多，那么，到底改了什么？一次一次的执政党的大会，一次又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主旋律都是改革，可实际效果在哪里？

我说，领导人不是不想改，真想改。他也真是发出那种，一种民本主义思想。那么包括地震的时候温家宝总理的那些行为，真是好总理。但是，要论到改革，我看是有劲难以使上。为什么？

改革不见动作，主要是面对既得利益，弄不动了。面对既得利益做大手笔的改革，只有是在面对巨大的挑战状态下面，才有可能。十几年一直在争论燃油税的问题，但是在2008年底这，短短两个月之内，就公布方案讨论，然后很快就定下来。这就是危机的力量。这次危机，又是推动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这次危机，谁都跑不掉。

平时，你让任何掌权人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他既使有良知，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他推不动。更别说那些私心大的，在这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更容易谋取私利，他怎么会想改变呢？所以这个危机，我相信至少有超过50%的概率使得今年成为会成为改革牛年。

主持人：那么这是关于改革的一个牛年。

陈平：只要执政者下决心，从胡锦涛，温家宝，包括习近平这些领导人讲话当中，早就是有改革的决心，不过真的是蛮难推动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是处在一种好像怎么样才能把它改革真正地推起来，那么借着这一次危机，牛起来了，推动了，那么民心一定大增。因为人民盼了好久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追求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奥运会的举办成功，应该说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是大大的前进了。但是毕竟我们还没有完成。人们盼望着改革的攻坚战的打响，打响攻坚战的这个号角，就会让牛年的中国人真的人人牛气冲天。

主持人：那么现在可能大家也有一些担心，还有大量的企业，2008年的企业积压的存货，已经经过了一个多月努力，还没有完全消化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这种悲观情绪，怎么办？

陈平：我觉得第一，要勇敢地面对农历年后经济上恶化的环境。不要是靠侥幸来过日子。要清醒地面对，宁可想得坏一点，也比你侥幸地想得好得多、要安全得多。第二点，不要指望现在的这些经济举措能够快速地大大缓解危机，这不是一下能解决得了的，要做长期的一个准备。第三，也别指望还能出什么经济上的奇招，能够在 2009 年之内让经济牛起来了，经济这个，　陈平：危机减轻，我觉得都别指望。

在这里面，我要说的，唯有深层次的改革，**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建立公平的社会体制的改革，才具有立竿见影之效果，危机肯定是要发生的，失业不会一下子解决，收入下降不会一下子停止，但危机它不一定就会成为社会的威胁，经济的牌出尽的时候，就要出政治的牌了。

政治不是一个空洞东西，政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权，政治根本是为经济服务的。把坚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出去，赢得大量的民心，包括失业者的民心，包括生活困难者的民心，才能够再一次全民众志成城。尽管人们可能一段时间生活困难了，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了，但是在这么一片非常充满希望的田野当中，人们会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它去。以一种民

间和政府互相理解的心态去克服危机。

所以我说，谈危机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经济和政治不是分隔的，经济和文化也不是分隔的，人心也不是分隔的。得人心者而得天下，赢得了人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社会就稳定了。所以我说，希望在中国的农历年过后，是一个中国人心大聚的开始，人心大振的开始，而这一切都是改革为先，要吹响改革的号角。

第068集 要靠改革推动经济增长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2009年GDP的增长能够在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平：我可以这么说，保八未必能保就业，因为增长要看什么增长。目前这个体制，如果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即使是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大规模的投资来推动这增长，可能这个增长的结果反而会恶化我们的经济形势。

主持人：那么您对这个增长的结果，是一个怀疑态度？

陈平：对，因为今天中国的危机，既是属于全球性的危机的一部分，有它的共性。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个需求不足的危机，信心下降的危机，需要这个金融秩序的重建，生产结构的调整，生产模式的转变，这些基本的矛盾和共性的以外，还有中国自己本身的原因。我曾经称之为叫做理性选择下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今天不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到第一位去，那么增长推动是靠这个政治体制，和体制所规定的机会和财富的分配模式，那么，以前积累的危机因素还会延续，还会加重。

主持人：那就是说，您不认同目前我们所追求的这种通过加大投资，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一种增长。

陈平：对，我不是说吗，中国今天当务之急是就业，当务之急是民需。就业是因为人口众多，社会保障体系缺乏，不解决这些就业，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要解决这些就业，就需要激发民需，激发民需就要改变机会和财富的这个分配规则，才能够把民需给激发出来。

主持人：那么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会成为头等大事，它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您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什么的内涵，为什么他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变化？

陈平：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什么叫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们在生存发展的机会上的平等。是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所以两个词合起来叫做公平。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公平.

主持人：其实您关心的是，怎么能够实现。，

陈平：当然，从形式上要建立一系列法律，一系列的规定，包括合理的所有制，但是，你不管你去制订一个多么的严密完整的一个法律条文，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没有和结构的运作相一致的程序，那这个条文制订出来也没用。就像我们1954年就有第一部宪法，按照那个宪法，怎么可能发生毛泽东后来搞的文化大革命呢？怎么弄得毛泽东想把刘少奇打倒就打倒，想弄死就弄死，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主持人：对，最近这两年发生一个事，就我们在制订这个反垄断法的时候，其中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说最大垄断可能是目前的央企，但是偏偏在里面特别规定了，关于央企的这个垄断形式另外处理的，它是不受这个法律来制约的。

陈平：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也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只有公平的社会，才是解决危机的必然之路。至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是具体什么个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能够做到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能够凌驾于一切监督制约之上，只要能够做、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会受到制约，并且这个体制应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要去追求探索的一个政治体制。

主持人：那么您刚才还提到，第二个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公平，那实际上是一个结果的一个公平。

陈平：不，比如刚才说了央企，这国有是到底谁所有啊？现在这国有跟人民所有有关系吗？上街去做民意调查，绝大部分人肯定说没关系，那么好，国有既垄断又高利润，它产生的的财富，又不能按全民分配。

主持人：对，和民众没有关系。

陈平：那么这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不平等，不公正。人们创造了财富，却得不到财富，同时你又说这些领域民间不能做，只有国有企业能做，可创造的财富又跟民间没关系。

主持人：对，事实上是侵占了民间的那部分盈利空间，然后拿来，获得一个暴利。

陈平：暴利又不能成为这个人民的这个消费能力，、那么肯定民需越来越弱嘛。此外，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必定有公开的合法的，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利益输送，那就必然会形成官官相护嘛。

主持人：对，国企其实本身就官商嘛。

陈平：这个官官相护的结果，实际上是伤害了我们健康的肌体嘛。。所以我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个建立公平和谐社会，这是当务之急。别看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它实际上经济上面度过危机的一个根本之道。

第 069 集 政府主导、投资增长战略有历史合理性

主持人：回头看既往的三十年道路，那么您觉得，它和经济危机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陈平：你刚用了用了因果关系，所谓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实际上今日中国的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包括中国现在的危机，都更多地来自自身，不是输入性的。但是我说，放在中国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它可能是原因，放的全球角度，它又是结果。

主持人：这是两个视角。

陈平：对，因为今天中国不是孤立的，三十年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与这三十年世界经济、政治进程尤其是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我举个例子，现在都在否定或者在批评中国这么多年的投资增长型战略忽略了或者说没有注重民生建设，没有注重这个民需的发展，认为中国今天的危机，也是这个投资增长型战略的结果。

主持人：这是一个普遍认识。

陈平：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化来看，从世界角度来看，这三十年尤其是后二十年，没有这种投资增长型战略，又怎么样能够那么大的胃口吞下了这么多的全球化红利？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又怎么可能连续多年中国名列外资投资最多的国家之列？又怎么可能变成在全球任何地方到处都是中国制造？没有那么多投资，怎么能够为中国制造奠定一个基础呢？在前面三十年一个流行的号召就是要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对不对？你要改善投资环境，你就得投资，

主持人：大家现在诟病的焦点之一，是说这个是投资型，而不是消费拉动型。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是外向型，而不是内需型。

陈平：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落后，急需要来自境外的资本、技术。那么你拿什么去引入这些资本和技术呢？当时中国的自身市场是比较小的，即使把国内市场都打开，人家来投资，也消耗不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进大出就是必然的选择，当时也没人想到去非议它，十三亿中国人，我几乎没听到谁曾经去怀疑大进大出是错误的。所以现在别都来马后炮。走过的路，有走过路的原因。要大量地要急需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包括人才，在当时那个起点，必然会是采取一种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模式。

那么，采取外向经济的模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面就会产生依赖。一开始就是采取外向型经济的政策，所以导致了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这是原因和结果。但是你要让中国人快速地脱贫，需要大量的引进国际上的资金、技术，怎么可能光引进，不依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走这个路都没错。

主持人：从 1978 年开始的前 11 年当中，是一个放权让利的过程。但是后来逐步地开始走上了一个收权争利的过程。那么这些是不是导致我们很多市场没有开放，导致消费不足的原因？是不是导致目前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面前遇到困难的原因？

陈平：不，如果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说，八十年代中国尽管建立了特区，尽管

也开始开放，但真正的大量的外资争前恐后地涌入中国，还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那么一个情况下面，客观上就要求当时的中国政府要加大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抓住世界经济这么一个机遇，迎接产业的转移、占领西方的市场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在软环境方面，体现为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现为对国人有一点不太公平的对外资的倾斜，在硬环境上面，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时代的机遇，迅速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成倍地增长，这点来说，我觉得加大政府的权力，加大政府的税收的规模也是必然的。你看亚洲的四小龙韩国和台湾，都是政府主导性很强的。

主持人：那您是把政府主导，看作是后发国家在腾飞过程当中的一个后发优势。

陈平：后发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军事的这么一个相互关系状态下面，唯有采取政府主导。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唯有政府的强力主导型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才是成功的。原来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能和西方采取同质化的社会体制，西方采用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套非常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社会里面唱主角的是个人和企业，落后的国家如果也跟它采取一样的体制，那落后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个人竞争的时候，肯定会显得弱势，因为市场竞争是残酷的。所以，落后的国家通常采取了集权的政治体制，或者我们说强权的政治体制，由政府来主导对外开放和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把这个三十年来尤其是 1990 年以后和辛亥革命以后所走过的路相比较，我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主持人：怎么讲，在辛亥革命之后，其实是一片混乱，军阀割据。

陈平：那时候，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如果还不能够把全部的资源都调动起来救亡图存，不就完蛋了？那时候，中华民族要生存要独立的历史使命是在呼唤强权，所以就诞生了强权。那么三十年代改革开放，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这种规律又再一次地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又再一次地让中国政府从希望小政府，但是走着走着是越来越大政府，从希望造福于民，让民众富起来，但是呢，走着走着，政府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这是处在这么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和中国特定的自我的状况所决定的。

我今天在这里谈了这样一些观点，好像跟我过去对于国富民穷等等批判有矛盾，似乎我的观点又变掉了，其实我并没变。批判的东西是放在当下这个话语环境下面而说的，今天则是在历史话语空间中来解读的。

主持人：对，其实历史的合理性，未必是未来的合理性。

陈平：对，所以我批判和肯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未来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一次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当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调整。包括它的社会组织形态、文化价值观念、企业模式，别看现在好像还都没变，但实际慢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世界的主流文明正在和将要发生一些巨大变化，那我们也得变。我们前面几十年基本完成了我们民族自强、独立和解决温饱的任务，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转型奠定了基础，如果说 1911 年，中国人开始走向共和，那么半路又选择了强权。那么在未来，我相

信我们中国人会再次在共和和强权中作出选择，选择一个有别于过去一百年的道路，当然具体我说不清楚，我不是要回避什么敏感的东西，而是我真的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原因在于没有参照系了。

我只感觉到，我们中国人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这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脚不着地的连跨两大步，首先一步到位地完成尚未完成的这个现代社会，包含了政治现代化，就是民主宪政体制。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迈向未来化，我这儿提出个未来化的概念，这个未来化，就是由这次经济危机直接把未来化提到了全球人的面前。

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得选择去探索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仅是一个增长模式，不仅是一个可循环的一个经济发展道路，还有它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还有文化，而且一定是有一场全球化条件下面的，一场新的文化复兴的历史大潮。

第070集　放权让利 抵御经济危机

主持人：现在大家其实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拉动内需，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

陈平：我首先啊，我认为内需这个概念不太准确，我的说法呢是要拉动民需.因为这么多年，是民需倒退，官需强劲。政府的开支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快要排在世界之首位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准确来说应该抑制官需，拉动民需，这就是包含了两个这个命题，一个官需不该这么大，第二，官需这个大了，对于国民经济，有害无益。官需效率是低下的，同时直接压制了民需，而民需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是抑制和降低官需，让利于民，或者还利于民，刺激拉动民需。

主持人：转型期的国家，政府的强有力的作用是后发优势之一,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引导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

陈平：这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和官需的旺盛，这两个不是划等号的。亚洲四小龙中除了香港比较特殊，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型。但是并不是他们官需很旺盛，并不是他们官需上的比例很高。，需要政府来强力推动，并不意味着政府本身来拼命地消费。政府本身来挥霍浪费，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到处大兴楼堂馆所，这是两回事。中国目前政府建筑之气派，都走到了古今中外之最。所以这一点应该这个很好地反思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原因。

凡是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汉朝有一本书叫做《盐铁论》，它所争论的就是盐铁要不要由这个政府来垄断？当然，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面，老百姓怎么可能跟政府抗衡呢？所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官府垄断经营。当然，当时有这个边防之需，要抵御匈奴，扩大疆土，巩固边防。所以当时自然会盐铁官营占了上风。

主持人：维持这个庞大的军费开支。

陈平：有军费开支，但是也有自己的消费呀。谁都希望这个控制的拥有的占有的财富越

多越好，越方便越好。这是一般人之常态的倾向。但是从《盐铁论》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什么道路？历朝历代，只要什么生意好做，不管是不是真的必须是官营才是有效、安全的，都会给加上帽子收归国有，这个帽子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国计民生。到了唐朝是漕运，到了宋朝的时候，是酒要不要收归国有，那么后来到晚清民国的时候，是铁路要不要国营垄断，是银行，要不要垄断。这是人们很忽略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就是私有产权一直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

主持人：没有建立起来原因是什么？是公权力，政府的权力太大？

陈平：以前是叫皇权，也就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中国文化推崇赞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么一个价值观主导下面，对于个人， 对于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权利的重视就比较薄弱一点。

主持人：其实这个家到最后，最后整个社会就变成了皇帝的私人所有。

陈平：这个文化适合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农业文明一个个人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而存在下去。他必须以家为基础，以土地为根基，然后呢，形成以宗族、家族为纽带的村落，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构造。

要维持这构造，就必须有与这个构造相适应的一套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而和这个价值观相吻合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的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行政集权制度。上面一个皇上，皇上之下，是庞大的官吏，所以中国的政体自秦汉以来那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秦汉以来就大一统皇权官僚体系，统治着家天下的臣民。

主持人：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盐铁论》，当时汉武帝之所以支持盐和铁收归这个公营，除了经济上面的这个利益，还有一个利益就是要从政治上打击豪强，打击地方势力，一统天下。

陈平：因为中央行政集权，和经济上的垄断，这两者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没有经济上垄断，中央行政集权也就难以建立，也难以稳固，从《盐铁论》到现在这个电信要垄断，石油要垄断，其实一脉相承。只不过当初没想到互联网是会这么样子，要知道当初也一定早给垄断掉了，因为互联网比那个电信还重要啊。

这种垄断，它一方面它保证了中国两千年的中央行政集权体制的相对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中国社会始终发育不出来新的新的生产关 和生产力的一个枷锁。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兴衰兴衰，兴盛，衰亡，兴盛，衰亡。

主持人：如果把《盐铁论》放到当下面对经济危机，拉动内需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它，它对当下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我们看历史，历史上每一次的兴衰，衰的时候都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主持人：但是一方面，确实朱门酒肉臭。

陈平：对，也就是说在这一种这个状态下面，好像财富越垄断越少。一方面高度的垄断，为什么又没钱呢？因为垄断官营时间越长，它本身的效率越低，对社会的贡献越小，这样子的话呢，尽管是高度垄断了，但是，民生越来越难过，越来越穷了。反过来，一个垄断的官府，最后自己好像钱也越来越少了，不是它垄断了钱就变多了，相反，他这个财富也越来越少。

所有的财富都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财富本身是有时空属性的。

主持人：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关系怎么讲？

陈平：也就是说，只有在空间、时间当中的运动，财富才会不断地增值，财富如果不动，闲置了，财富就会逐步贬值，所以来讲，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让人们创造财富，老百姓丰衣足食，政府也是财源滚滚。民富国强，只有民众富了，这个国之强，才能强得长久，要想国富民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富致民弱，民弱致国弱，民弱致国穷，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待问题。

主持人：那么在当下，您看到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历史的什么样的迹象？

陈平：我看到了仍然是垄断优先。在1978年，我们中国出现了可喜的或者说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改革，从这个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这个时间你看，整个都是放权让利四个字。

主持人：这个放权让利主体就是政府。

陈平：对，当时这四个字也是很这个时髦的。或者是一种政纲性的。

那么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呢，确实中国老百姓过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你看那个趋势，又是这个政府的手就越来越长了。所以不要小视这种历史的习惯，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很重的一种集权体制的特点，两千年文化的遗传基因在这里面有很重的表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也是又在重复这种历史的一种道路。1日子稍微好过了，又开始又是以各种各样的名目，什么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什么国计民生等等理由，又开始政府和国有进入高速扩张的一个时期。

我今天呢，就把这个视角放的历史时空上面远一点，把这个历史的这个深层的东西给翻出来，翻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危机，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的那种救市，可能达不到我们要拯救经济的目的，或者说，这个事倍功半，收效甚微。魏征给唐太宗李世民最著名的一句话，叫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我今天就把以史为鉴给搬出来，回答为什么当我们在出口受挫时候，我们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

那是因为我们民需不振，民需萎缩，而为什么民需不振，民需萎缩，也就政府与民争利太多，而且是不自觉地争利。，今天我们要抵御经济危机，应该重提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四个字：放权让利，但是，我希望这次我们再放权让利，不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恩赐，而是真正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皇上了，今天的政府，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一个受人民之托管理国家的政府，今天们重新放权让利，应该是制度性变革条件下的这个还权于民

这是我说这个从历史谈的原因，当然只是一个侧面，但我想，对于我们抵御今天经济危

机，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第 072 集 探寻真正属于东方文化的新需求

主持人：您觉得，那个东亚模式和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在的关系？

陈平：我觉得所谓东亚模式或者亚洲模式，也就是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其实都是美誉而已，为什么美誉呢？ 因为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是在西方文明兴起并且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之后，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的一个发展或者崛起，很难称得上与西方相等的一个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把一些附加价值比较低的，或者说劳动密集型等等认为需要转移出去的产业转到了亚洲四小龙，所以，亚洲四小龙当时红红火火的发展的都是出口加工业。到现在，包括中国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道路的延续。

主持人：都是全球分工的一部分。

陈平：对，还是在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一种发展状态。是一个配角，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应该冷静地看到这么一个状态，什么叫配角呢？就是生产什么，做什么，怎么生活等等，不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不是我们自己说我需要那个，我要生产这个，我要像这样生活，等等。所有这样一些原生的概念，该怎么样活着，什么叫幸福等等，都是西方强势文明潜移默化地在引导着我们。

我说一个不好听的话，亚洲四小龙包括今日的中国，叫四肢发达，大脑简单。在这么一个西方文明主导的分工体系下面，我们是比以前握着财富多了，但是，我们对怎么样生活，已经没概念了。精英分子是有意识地去看看西方有什么新东西，西方人怎么生活；不是精英分子呢，无意识的和被动的也在模仿。这样子导致的结果就是从精英到普通百姓，都是四肢发达，大脑简单。

主持人：那这就是您对这个亚洲模式的，您认为那是一个美誉的一个原因。

陈平：对，但这个是不是坏事呢？一方面我说，它不是坏事，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你落后了，不是挨打就是挨欺，不打你，不欺你，那你就当个配角吧，当配角就是听着主角的指挥去做事去。那么既然听着主角的指挥做事去，你当然大脑简单了，关于该怎么生活，你当然就没有创造力了。

主持人：那么您这是从这个生产模式，进而对生活模式的一个影响所做的一个分析。

陈平：今天美国欧洲发生了金融海啸，外部市场需求一旦衰退，我们就觉得可不得了，就想着要赶快要把我们内需发展起来，但是，从刚刚我说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内需也不是

那么容易能够拉起来的。

因为在这么一个世界分工的秩序当中，我们已经在岁月的浸润中失去了原创生活需求的能力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尤其新兴市场的国家，还是有意识无意识看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在怎么活着，在需求什么，然后我们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

但是，这次经济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生产这个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它是西方文明也就工业文明有效需求已经枯竭导致的危机。即使我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财富分配得更加公平合理了，也仍然面临需求什么以及如何生活的问题，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今天的世界。强势的西方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到了一个由盛到衰的拐点，那么当我们在考虑怎么来抵御经济危机，怎么来发展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要往更深层次的里面去研究、去探索、去发掘。

主持人：那么这样需要人们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调整？

陈平：就是我们要明确认识到，我们今天要从文化的层面，要从我们该怎么样生活的层面，去发掘我们的需求，自主创新不是仅仅去创新那几个硬的技术，而是要创新我们的文化。创新我们如何生活的文化，创新我们的价值观。

今天回过头来，很清楚地看到，亚洲模式是历史必然，在一个阶段中当了很好的配角，然后被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我们还没找到真正属于东方文化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我们谈经济问题，谈经济危机，包括谈政治体制改革之外，我们还要谈怎么样去发掘历史的基因，去探索未来的空间。把东方文化的复兴这个伟大历史使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它提到议事日程，这不是说多几个电影，多几本小说，多几个电视剧，而是要创造出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创造新的需求。这样子，文化复兴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还权于民这三套马车才能交错启动，这可能是今天对于中国人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机遇。

主持人：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您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复兴之后所产生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需求，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勾勒？

陈平：第一，文化复兴会产生我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我们的需求，但是它们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已经不能是再像过去那样子，把东方西方、把民族国家划得那么清楚了，我们所有的行为，既是民族国家的，也是世界的。

们谈文化创意产业，谈什么这个科技创新，根本的是文化复兴。一个新的世界，都是从文化复兴开始的。东方西方都是一样，没有这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就没有这个欧洲的工业革命。也就不会有强势几百年的西方文明，那么今天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场经济危机是这个新的时期的一个信号，而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想不通过文化复兴，就能够拉动内需渡过危机，我觉得不太可能。首先拉什么内需都不知道，即使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改了，拉动了民需，但是民需什么还是不知道。因为放眼望去，这个欧美也看不见他们需要什么，没得学了。

另外，你今天跟中国，包括亚洲的很多企业接触起来，你又发现，有一个令人蛮可悲的现象，生产什么，制造什么，研发什么，都不是从我们需要什么这个原点开始。

主持人：那么他们是朝向什么开发生产的？

陈平：他们是现在西方有什么，西方人做什么，然后我们做什么，没有原生态的东西，

有时候连原生的想法都没有。这也难怪，因为确确实实这个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五百年太强盛，确实也太优秀了。但是在经济上看不见新需求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把眼睛朝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

主持人：返向内求。

陈平：对，我们来通过文化复兴，来产生这个新的世界的一个新的需求。这就我说，这个从亚洲模式，到文化复兴，到这个产生新需求，推动新的发展。

第 075 集 经济回暖需要改革的支撑

主持人：2008 年的 11 月开始，中国的新增贷款超过了四千亿，那么 12 月份超过了七千亿，2009 年 1 月份继续增高，有人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显现积极的后果，经济正在回暖，您感受到没有？

陈平：我觉得中国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的救市措施，必然会导致货币贷款的激增。这个贷款种的绝大部分流向了国企，其中相当多的用于基本建设，用于政府推动的刺激经济的经济振兴计划。而信贷的激增中有多少真正到达了那些能够大量地促进就业的行业当中去呢？我觉得少之又少，作用极其有限。

主持人：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陈平：因为目前的产业结构中，大量的就业岗位都是在外向型经济当中，尤其是在沿海。欧美、日本目前都是经济萧条，它自然是需求大减，消费疲软。那么作为世界的工厂的中国，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出口呢？没有那么多出口，这世界的工厂怎么还能够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呢？

中国今天经济的状态真在回暖吗？我觉得是不可靠的。 除非两种情况出现，我们说这个回暖是真实的。

主持人：哪两种？

陈平：一是国际市场又开始兴旺，二是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变了，而且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都是说，我们的企业能够转向中国大陆内部市场，民众能够在增长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也就是现在说的内需，我说的民需的增长，而只有改革，才能最快速地拉动民需。

单纯靠行政的力量硬让信贷扩张，在这种经济危机当中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承认，中国是有巨大内需潜力，人口众多，未满足基本需求的人类群体非常巨大。但是，在现在正在蔓延的危机当中，未满足基本需求的巨大群体也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这个内需的潜力，要靠制度改革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制度改革，才能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

或者是国际经济，尤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上升，或者是中国真正启动了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中国经济才能回暖。提升民需也就是从官向民进行利益输送。利益输送不是简单地发消费券，而是把更多的垄断的机会给民，也就是还权于民。要把原来政府庞大的开支大幅度减少，把这些消费的开支变成民众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民需才能发展。否则，回暖从何而来？如果还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型经济，一旦出口下滑，那就是加重危机。现在的中国政府擅长做的也很熟悉的还是投资增长型的发展模式，但是对于怎么样让民众的需求发展起来，这是不擅长的。因为这么多年，没有这么做过。

主持人：对，以往可能路径依赖，驾轻就熟。

陈平：所以我对这个回暖，我认为还是个幻觉。现在的中国大陆不需要因为出现一点点好的数据，就觉得侥幸地觉得自己过了这个经济危机。我们需要的清醒而理性地对于未来危机局面的估计。而痛下决心，借机来进行深刻的大公无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子，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地走上经济回暖，这个改革已经不是一个类似承包制的改革或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改革，而是根本的选择和分配的改革，是对权力的改革。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走得很好，因为那是增量的改革，抓住了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全球的市场的机会提供了我们增量改革的空间。现在我们要做存量改革，存量改革，就是利益分配上面动真格的了。而利益分配动真格，那必然是政治体制改革。

主持人：这将是一次会让一些人觉着痛的改革。

陈平：我相信现在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反对民主，从来不反对民主两个字的也会出来反对民主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谈民主政治改革，已经是开始要动真格了，要动真格，有些人就会感觉痛了。痛是利益之痛，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之痛。所以我说，我预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就会到来。

因为没有新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会比 1978 年和 1992 年那两次更加深刻。我们将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这民权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根本一点，我们走到了不得不还权于民的时代，而这还权于民的最直接的动机，不是美好的概念，而是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要有新的发展。

所以，从说到经济回暖，最后说到改革，而说到改革呢，说到了这个思想解放，而且我又说到了思想解放的核心，我称为民权主义。

第 080 期　中国迎来政治体制改革最好时机

主持人：我听到了一些呼声，比如说在经济改革之外，加强政治改革，那么您觉得，这种呼声，在这个时候，变得如此地多，如此地紧迫，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陈平：在中国大陆社会上面，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也越来越热，在海外，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社会局面的担忧之心也越来越甚，一些友好的希望中国大陆能更好地发展的人，也都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呼吁。

这些热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需求。面对危机，要保护三十年来得之不易的改革发展成果，要避免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盛衰周期律，要再次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道路。要保障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中华文明复兴和崛起的势头。

主持人：在您看来，您理解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核心是什么？

陈平：我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它要解决的核心是公平。我对这个公平的理解是平等与公正，

何为平等？这个简而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既有政治权利的平等，也有经济权利的平等。政治上的权利平包括选举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等等。而经济权利的平等就是说，在发展的机会，在资源的利用等等方面，谁都没有高于他人的特权，而只有和他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也就是机会均等，这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公正？公正就是，比如说，按劳取酬，按照你的劳动贡献获得你的报酬，这叫公正地分配。对不对？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通过一些官商勾结，通过垄断，就不公正，通过侵吞获得财富，就不公正。所以我认为，当下改革，既可以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称之为继续地经济体制改革。

平等与公正。平等不是财富分配的平均，平等是机会均等，机会平等。公正不是公平，公正是这个我经常喜欢说这句话，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是吃利息者，只要是合理的存款利息，合理的投资回报，都是取之有道。过去传统的或者我们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把财富的公正仅仅理解为说简单化的按劳取酬，这个我觉得太简单化，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状态，那么就应该把包括依靠投资，依靠放贷，依靠我房子出租所获得的收入，也看成是正当的。

主持人：那么您认为，通向您所说的平等公正的路径是什么样的做法？

陈平：从原则上，那么应该说，惟有民主一条路，因为民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路径上，在形式上，在程序上面，我倒觉得，既不要完全照搬现在这个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法国的民主制度的模式，但是也不要对这个模式完全拒绝，拒绝去认识它、吸取它。

为什么不要完全去招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西方文明的民主发展毕竟有三千年的历史，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就开始实验了，一步步地才发展到今天。

我们中国却从来就是专制。惟有开明专制和这个非开明专制之分，没有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别想在中国历史上去找民主时期，没有的，从来没有，即使是最好的状态如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百家争鸣，也是因为那么多小国为了谋取霸权，所以必须要进取改革，要进取改革，一定是要百家争鸣，这样才能够产生很多新思想，但那时候的政体，全都是是君主专制，到了秦统一天下，那更加建立了一个政权一直到达基层，专制到达基层的帝国官僚政治。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民主的历史。

主持人：中国改革又一再讲时机两个字，那么目前是进行这个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吗？

陈平：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在一百多年前败给西方文明？我想我们应该承认，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的失败。 “五四”当时那批知识分子的看法没错。西方战胜中国那确确实实是民主与科学战胜了中国的。

主持人：专制和蒙昧。

陈平：对，或者说专制和儒家的这套东西。我一再说，中国从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宪政的共和国，但是最后又重新走回专制政体，这是历史的选择。那么为什么今天，我觉得可以来重谈民主，重创民主之路？

第一，一百多年前，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现在，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结论，目前也还是没有民主传统，但是我们有一百多年的科学实践，民主和科学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已经再也不会信满清末年阻碍中国改革的那些保守士大夫的鬼话了，所以我说，科学启蒙应该说基本完成。

1949 年后有一段是非常的专制的，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政体没有在民主的道路上面迈多大的步子，但是国门打开了，这三十年尤其是后二十年，中国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没有思想犯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言论是自由的，爱怎么说怎么说了。还有， 2008 年奥运会，中国人完成了心态的转变。一百年来都觉得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不起，在这么一个悲情意识状态下面，怎么能够客观地、理性地去学习、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等等呢？根子里面就会有抵触的，情感上就会有抵触情绪对不对？那么只有心里面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和西方平等了，平等自信，才会有宽容。有宽容，才会有理性，所以我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宽容的心态，和打开国门的这个条件，这些东西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文化的再改造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刚刚讲得这么长时间，没有太多用人权这个概念？我最近呐，对这个人权两个字，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主持人：什么样的新认识？

陈平： 人权不能损害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就像人不能损害他人权利一样，人也没有损害自然环境的权利，所以我说对人权得重新界定。我一再说的观念是公平，而不是人权。那么公平呢，又一定包含人权，公平一定包含民主，但是，我认为，第一，惟有政治体制改

革，惟有广义上的民主政治，才能够迎来中国未来的继续的繁荣与增长，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民主能够实现公平。

民主是一个理念，民主是一个机制，民主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不管我们称之为国家，还是一群人的共同体，权力属于谁？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句话，谁都不会反对，作为机制，民主是一个不断纠错的机制，它通过不断地纠错，来不断地自我完善，来不断地发展，丰富，来做到更好地能够实现这个民主的目的。就是更好的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幸福的社会。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某一个固定的形式，既不要民主崇拜，也不要民主忌讳。但是，一定要走向民主。

第 086 集 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上）

主持人：现在在谈论这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当把目光放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如果您来看这个发展脉络的话，您会把时间点定在什么时候？

陈平：我认为是分析和看待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大陆本身在这场危机当中表现出来的情形，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场危机既是外来的，又是内生的。要解决中国大陆的向前发展的问题和当下的危机，就当下论当下，我觉得是可能是片面的，或者局限的。

就危机而论危机，可能表面上看来是就症下药，但实际上没有找到它的真正的原因和它形成的过程。我主张，最少应该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看今天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它的成果。为了更清楚地来看待今天，那么我认为或许还要再往前看一点。

主持人：往前到什么时候？

陈平：从 1949 年。为什么我主张从 1949 年，更准确地说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胜局已定时候来看待问题，来进行分析？ ？因为任何一个经济的分析，不能脱离这个经济所存在的历史时空，那么时间点又必须放在这么一个制度或体系的发生时期来看，才是完整的。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1949 年这个政治制度和体系的建立，对于中国来说改变了什么？

陈平：今天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不能够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做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我们看待今天的这个经济危机，我认为在时间轴上面，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后，空间应该放在整个地球的不同板块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回想一下，1949 年前后，亦包括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件？

重大事件的发生可以从历史的理性的解读角度，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性的历史的解读，和道德的历史评价混为一谈，这历史永远就没法说了。就像我们从理性的历史的解读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秦始皇对于中国之形成的贡献，没有文字统一，道路统一，包括车轮子的宽度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有今天的中国吗？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吗？有留下来那么多的至今让人们赞叹不已的丰富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吗？后来两千年的中国在语言文学上的辉煌，又和前面残酷的统一又不可分，你想当时，那秦始皇面对的是这个六国，要归于一，不杀人可能吗？ 秦始皇所处的历史时期还是暴力起相当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时代，不把六国的那么多贵族，抓了抓，关的关，杀的杀，怎么可以能统一得了呢？任何统一都是残酷的，从历史上而言。那么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贡献，也姚看到秦始皇个人人格的残暴。从道德上去评价，秦始皇不该这么做，从历史上来说，他如果不这么做，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我以这个方法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大陆的统一，以及今天的初步的重新崛起，将 1949 年后的 60 年分为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我概括为在客观上为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崛起奠定了相当多的基础。我举几个重大事件吧，一个，从过去我们用的火柴，叫洋火，我们点的油，叫洋油，我们穿的的布料，叫做洋布，这么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要从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来输入，到今天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一点和中国快速地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是分不开的。那怎么才能这么快呢？因为我们有快速的，非常高效的生产要素的积极整合。这里面包括成功的实现了招商引资，但涌入来，你拿什么去承载去，人家为什么来。我们有软的优惠政策，有硬的让人赞叹不已的基础设施。有非常好的生产要素的提供，诸如土地厂房。整个三十年，贯穿于其中的从沿海到内地的出口加工区成片成片地涌现，连接一个开发区到港口，的高速公路大量涌现，都离不开土地资源，这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那怎么会有这么高效、大量、而且又这么具有成本优势的土地资源可提供呢？要是没有这些土地资源提供，跨国公司就那么爱来吗？

那么，回溯到六十年前，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土地上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知道，从 1946 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所获得政权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用中国人历来的一个理想主义的说法叫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原来属于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当然，在当时进行这场土地改革，还有它当时的很急迫的一些目的。当时如果不进行这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就不足以动员起农民和本身就很贫穷的乡村的资源来支持战争。但是从，我相信作为当时的领导人，可能他们心里面有了更长远的一个战略目标。

主持人：什么长远目标？

陈平：如果不能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予以摧毁的话，就难以完成中国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以及实现民族振兴、崛起的历史要求。因为在当时，中国确实一穷二白，要工业化，唯一能动员的就是农民和农村。因为我们是个农业国，动员是一个术语，从另一方面解读，就必须要咱们的这个农民作出牺牲。所以土地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是耕者有其田，但是，它深层次的目的，那就是将在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的被人称为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给摧毁了。只有把这些东西给摧毁了，才能够将一种集权体制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才能够把中国的这个农村的资源，充分地动员起来。说地主乡绅不好，丑化他们，我觉得那是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真的来讲恶霸地主是少数。中国当时小农经济状态下面，大部分地主也都是过的紧巴巴的，很多地主也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同时再雇佣几个长短工。但是，他们代表

了一个社会的结构，你不得不把地主乡绅都摧毁了，尽管摧毁的过程是残酷的。你不把这个给摧毁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体系怎么可能一直到达生产队，一直到达自然村，村子里面有两个核心领导力量是不行的，只能有一个，才能把它动员起来，才能有效率。

第 087 集　土地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下）

主持人：从 1948 年的土地改革到 1953 年农民合作社的建立，短短 5 年内，中国大陆土地所有权再次从分散走向了集中。

陈平：田地刚刚分到人家，人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两亩地还没热起来，马上全部又收归人民公社，那不行的，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土改，耕者有其田，摧毁中国农村两千年的这么一个社会结构，然后再到合作化，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

主持人：其实在这里面，我能感觉出来，前面的那个土改是一个破的过程，那么后来从合作社，到后来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个立的过程，就是把一个旧的体系摧毁了，我们逐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陈平：就根本，还是在打这个土地的和土地上农民的主意。现在我说空间了，当时面临的空间是地球上的其他板块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当中了，那农业社会怎么和工业社会去平衡？不去打这个土地的主意，不打土地上农民的主意，这个实力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没有其他资源嘛，所以这种情况只能打土地的主意，我从现在所看的历史文献种发现，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他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顺应着中华民族重新复兴的这么一个历史使命这条线上走去。

主持人：但这个判断，依然是一个历史的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一个道德判断。

陈平：在理性之下，一定有很多道德的丑陋，在道德的净化过程当中，一定又会有很多历史的悲剧。这两者，往往是这么一个矛盾的结合。现在被认为是我们民族英雄民族伟人的屈原，如果说，秦统一中国如果是历史的进步，那么屈原的爱国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但屈原的个人行为，个人情操，又是一个道德的楷模。在历史理性上，他应该被批判，在个人情操上面，他又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这是道德评价，所以这两者要分开来。

话说回来，还是说到土地，如果没有这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那么试想想，如果土地还是停留在耕者有其田的那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私有制的状态当中，我们从 1979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非常快速的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提供了对大量的外商产生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从哪儿来啊？如果土地还是私有的，有那么容易吗？那政府没有土地上的大量的财政收入，又哪儿有钱来建设完善那么多基础设施？光靠税收够了吗？不够的。所以这也是，祸和福的关系。所以我说，那么要谈今天，必须回望六

十年。

主持人：看一看六十年之前的因，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果。

陈平：那么六十年前，所开始土地改革，再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那么伴随着这么一个在土地上的政策，那么又有了这个城乡二元体制，现在我们认为是不平等，不公正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就是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

但是没有这一步，在整个中国大陆那么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面，没有尽可能多的从中国农村获取资源，也就没有工业化。为什么我们的工业化在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的道路。那是因为我们做出的牺牲也比人家大得多。现在评价起来，确实是这个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那么你想想，涉及到人的利益，哪儿有那么容易就能够剥夺的？所以反映在政治上，一定要实行专制，政治上一定是高度集权的，但仅仅的就靠一个集权也不行。所以呢，又一定实行思想文化上面的统一。这就叫做硬的制度，软的思想，通通集权，这个硬的制度，一步一步强化到整个中共组织体系，对其他任何的组织体系，都予以排斥，这样才能保证这样一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民族利益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需求。在思想上，也要不断地灌输，要让全中国大陆的人民都服从于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必然是在思想文化上面，那只能有一种声音。所以，在思想文化上面，也就从反右，到后来的这个文革，所走的路，它都是越来越趋向于宗教化。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它也是历史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主持人：那么现在看，当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其实三方面是非常有机地在朝着一个方向在走。

陈平：所以我给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总结，就是这个三驾马车去实现一个民族意志，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高度国有，高度公有，思想文化上面的高度的一元化，就是政治上的一元化，经济上的一元化，和思想文化上的一个一元化，就三个一元化，从今天来看，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当然，是不是有比刚刚说的这三驾马车或者三个一元化更好更人性化的道路呢？我们说，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从人类的良知上面，从人类的道德上面，我们或许应该想，应该有比过去更好的道路、更人性化的道路，更加保护基本人权的道路，只可惜没有发生这样一些道路。所以，我这么说，并不是从道德良知上面表示对过去的三十年的全面的赞同，我只是从历史理性的这个分析当中去看待它的历史作用。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所作出的牺牲和奉献不都是白白地奉献，这种奉献尽管是非常痛苦的，就像三年的大饥荒，那真是付出了极其痛苦的代价。很多在这当中的当事人今天已经作古了，他们就是在地下也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自我谴责，因为毕竟人要爱人，他的起点是他对中华民族具有爱心。但是那些过程当中确实是爱心太少了点。他们应该受到一种自我的、包括后人的道德的谴责。但在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当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还是和受害者，牺牲者，他们在那一个历史时期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就不相信毛泽东心里没有内疚，但是历史有时候太无情了。

主持人：那么现在如果来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三十年，和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您会怎么概括？

陈平：我的概括就是，这个前三十年，在社会形态上，我称之为叫三个集权，政治集权，经济集权，和思想文化集权，三个集权，有当时的领导人和当时的领导团体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应该看到，它有它历史的成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太落后了。到了今天我们再看，改革开放的这个时候的，这三条线，那么政治上依然集权，经济上大部分自由，小部分仍然集权，思想文化上面是基本上是自由。叫做民间自由，但是呢，这个作为社会动员组织的一个载体，还不自由。

第 088 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与失

主持人：在前面的讨论当中，您是把目前所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个因果的起点，一下子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之初，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是把视野放到 1978 年到现在的话，那么当时的种种作为，和目前的所面临的这个困局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陈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延续了前三十年的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体系，中共统领下的一元化执政体系。第二，部分延续了政府垄断的经济体制，我没有说国有垄断，国有这概念太模糊，实际上就是政府垄断、执政者垄断。改革开放前，所有全垄断，改革开放后，主要垄断了资源行业，基础设施行业以及重要的服务业，包括金融。此外我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的收敛。改革开放三十年，逐步言路打开，个人言论自由，基本上是你爱怎么做怎么说。但新闻出版不自由，我们宪法写的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但实际上没自由，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自由和部分的不自由与这三十年的发展对于制度的需要是连在一起的。

这三十年的发展是举国之体制的优势与人民脱贫致富之欲望两者的结合，同时快速有效，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从而使整个中国大陆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基本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走上了基本的小康之路。

主持人：那么应该是发挥了他的一个积极作用。

陈平：我刚才说了是举国之体制的优势和全民的脱贫致富的强烈的欲望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三十年确实把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每一个个人的利益之追求，在经济层面真的是结合与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十年大陆的成功，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复制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并且超越了他们的发展模式。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度，怎么样能够快速地崛起呢？还是延续的这个前面三十年的一条路，政治上集权，它保障了这种动员力度和资源调度力度，来抓住开放的机遇，抓住世界经济重新分工的机遇，所以我们吸引外资时，那种对外的吸引力和发展速度，真是空前绝后。但同时呢，又使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这么深度和广度的对外开放中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现在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那确确实实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是连在一起的。而那个尊严获得提高的同时，还把门打的这么开，按照一般的常规来说，外商的投资占了经

济如此大的比重。那不成为经济殖民地了，但就是没有。我不得不承认，没有中央政治上高度的集权，那恐怕难了。

主持人：没有像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民族产业的空心化。

陈平：集权肯定一批精英在这里统治，这些精英一定程度上面能够超越普通百姓的眼前利益的诱惑，能够看的远一点，把整体的利益看得重一点，但看得远，看得重，怎么样来解决普通百姓的这个看得浅，看得近呢，那么就是集权。就是你得听我的，要你得听我的，要抓住这个世界全球化的分工的机会，成为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产品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不起，人权，你就牺牲一点吧，所以这个来讲，牺牲一部分人权，而优先保障了生存发展权，这点有它的道理，我们这么说。

在今天，国有企业在基础建设行业，资源行业，在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垄断饱受诟病，但是，第一，这些行业如果不垄断，不可能靠民间私有企业去建设一个开发区，去大规模地完善基础设施，同时呢，这种垄断阻碍了公民平等，同时也阻击了外资外商进入这些领域进行垄断性的投资。它是产生了很多的弊病，但是，它有积极的一面，有历史的合理性，那时候中国的民间的经济力量还不可能很壮大，民间还处在崇洋媚外阶段，在这些重要的领域不实行这种政府垄断，那后果会什么样？

主持人：核心产业可能控制权力会被丧失。

所以我说这个继承的第二个就是，重要的产业部门的政府垄断，另一方面，把一些大部分不需要垄断的产业和全民的脱贫致富的冲动和欲望结合起来了，和这个外商外资的追逐更高利润的，追逐更大市场的冲动结合起来了，这就使得中国这三十年，在一些竞争性的领域，那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那简直是雨后春笋。这就造就了中国制造走遍全球的局面。

然后说在思想文化上面，要想保证部分经济领域的政府垄断和政治权力的执政党高度集权，在思想文化上也不可能全放开，全放开，前面两个就保不了。所以呢，对于思想文化呢，也就叫做半开半不开，这个半开半不开，官方也别扭，民间也别扭。但是，我觉得历史就像条河流，它的局部有的时候会有逆流的，拐个弯，逆流而下再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给予理性的认识。

这三条线，一条线基本全面继承，但是走向了开明的专制。但这么做我觉得是恰好符合了中国大陆这三十年在世界经济的重新分工中的位置，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从每一年以百分之三四十的出口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记得很多年，中国吸引外资都是世界第一，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中国对外依存度到70%多，直接出口的比重，占到国民生产总值 35%，36%，百分之三十五六，依存度到 70%多，仍然还能够保持很完整的主权。并且整体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国人的尊严越来越获得尊重，这点来讲，就证明这三十年这条道路，尽管当中有很多从所谓世界潮流来讲是逆潮流的政策和行为，但从更加宏观的层面，也就是从历史的时间轴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板块的空间轴来看待，确实既是合理的，又是挺高明的。挺高明的，这点上，我不得不说，承认人们给邓小平所封的一个头衔。这个设计师还是蛮高明的，有他的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同时又韬光养

晦，抓住世界经济的这么一个时机，发展是硬道理，我理解他的不争论，不是说是无原则，他不争论实际上就是在争论，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发展是硬道理。所以这个总设计师，还是有他真令人折服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要在看这些成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的安排之下，我们所形成的一些不利的因素。因为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安排，或者人们的选择，都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就像我们从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全人类还没有哪一个制度的选择安排，是万古长青的。凡是发生选择错误的民族、文化，绝大部分都会消亡。凡是做出了相对正确的这个选择，它就会生存下去。站在这么一个视野上，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刚刚说了，开明的中央集权和半开半不开的经济的垄断，和思想的禁锢，适应了三十年的全球化，抢到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的最大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的机遇。但是它也形成了一些弊端。弊是什么呢，我们给它归类一下，就是说政治上的集权，和垄断重要的经济产业，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在思想文化上面又是一个半自由半不自由状态，这个半自由半不自由，是旧的没法全部认识和清理，新的也没法建立，就是价值观会处在这个真空。这么一个社会时期，它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权钱交易，大量的腐败，以及人们在道德、伦理上的一种堕落。这是一个代价。

第089集 新生的重点是新的思想解放

陈平：三十年这么快速度脱贫，而致富成为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它代价什么，就是腐败与道德的一定程度的沉沦。那么你想，什么样的集权才能够对腐败相对的抑制呢？绝对的权力，就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后三十年的经济繁荣，必须发挥全民追求富裕的欲望。但是，全民都追求富裕难道这些有权的人他不是人吗？追求物质权利的意识会渗透到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去，包括所有的官员当中。这时候的官员就会在这个为人民服务和为己服务当中矛盾，这时候，你如果不采取权力互相制约的一个政治体制，那时你就是大错特错了，但当时又在这么一个世界经济重新分工的环境当中，这时候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又使得政治集权的需求反而上升为现实的的需求。当然它的副作用一定是腐败的产生。政治权力上不受制约，思想文化上不能全面地自由，那么又要追求快速发展，腐败和道德沉沦也就必然的。

另外一个层面上呢，那么就是必然会产生分配的不公。财富肯定是垄断的国企占的比例大，它逐步会挤占民间，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同样这就挤占了民间的需求，占有了民间的财富，到今天我们发现，世界经济翻过一页了，世界历史翻过一页了，而这时候，我们唯有内需，唯有中国大陆内地的蓬勃兴起的消费市场，才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合理的这个财富的分配，以及很多经济领域的国有的垄断，影响了中国内需的增长，这个现象伴随着经济增长同步地严重。

所以回望六十年，分析了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中国大陆处在一个再次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一系列的条件都发生着变化，内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外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可能沿着过去的路走下去，而且人类的发展，永远都是不断地继承了过去，走向了新的未来。那么这就是，我说这个我们不能老是就经济危机谈经济危

机，就改革开放三十年，谈改革开放三十年。回望过去，把今天作为起点，而且是一个变革的起点。

主持人：那么刚才我们是对三十年做了一个梳理，那么对它这个因和果，既看到了它对经济的促进的作用，同时也看到它产生了比如像腐败这样的一些问题。

陈平：我们说危机危机呀，到底什么危机嘛，我们到底在着急什么，我觉得，第一是内需不足，主要是民需不足，官需，官需一直很强劲，这跟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相当产业的垄断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内需不足在这次危机里面的表现的非常明显，是由于外需的衰减，所以需求是目前危机的第一大矛盾；第二是增长，因为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的工作岗位，但增长什么呢，现在需求减弱了，那我们增长什么？然后就是就业，我们前面这三十年，看似几乎是全面就业，但实际上面，是大量的隐性失业，把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城乡的这个二元的制度安排，固定在土地上面。到了文革时候，还把几千万这个青年学子，强迫到农村去。

主持人：对，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就业空间的一个转移，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平：但是它被集权和普遍的贫穷所掩盖了，但现在掩盖困难了，我们既然已经释放出了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那么现在这个就业问题，就牵扯到生存发展权利。对不对，所以就业成了紧跟需求、增长后面的一个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焦点出现。

解决了前面三个问题，才能够继续保障社会稳定，当然，这个稳定是发展的，发展中的稳定，停滞是不会有稳定的。倒退更加不会有稳定，所以现在这个回顾六十年，分析前后两个三十年，面对经济危机，还是要回到一句话，如何再创发展新时期，当然这个再创，是包含着制度再创，文化再创，和价值观的再创。才能再次实现发展是硬道理。

但这个发展的这个硬道理的发展，又不是过去的这个模式能走下去的，所以，对于发展，必须要有新思维，我希望中国大陆社会应该刻不容缓地展开一次对于发展的大讨论，也就是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转危为机，为什么说中国大陆要思想解放，因为中国大陆个思想文化上面还是有所禁锢的。